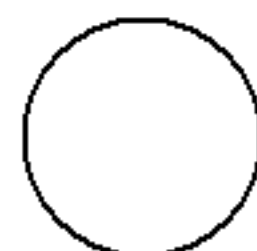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17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七期 ★

目 录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

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毛泽东(2)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5)
-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6)
-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10)
-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12)
-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14)
-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16)
-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18)
-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21)



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23)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 (25)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 …… (28)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
会談上的声明 …… (30)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結的五項建議 …… (32)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新“神圣同盟”的結局决不会比旧“神圣同盟”
更好 ……本刊評論員 (33)

赫魯曉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
廢墟”这点上大造謠言? ……文宜祝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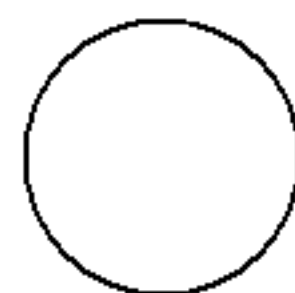
謹防假冒! ……杜 敬 (44)

一个腔調 一个步伐 ……洪 谷 (49)

邏輯与腦子 ……林銘蕙 (54)

☆ 九月六日出版 ☆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 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 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



吳庭艳政权終將不能逃脫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結局，美帝国主义終將从越南南方滾出去。

吳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經喪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贅，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換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鮮李承晚的下場，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牽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會議的協議，阻撓越南的統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謂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會議的協議，对老撾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撾重新挑起內战。除了存心欺騙的人們或者十分天真的人們以外，誰也不会相信，一紙条約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規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結、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論在政治上或者軍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們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統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吳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声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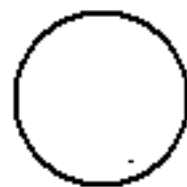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领导同我們分歧的 由来和发展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經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經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現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談怪論。苏共领导公然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公然撕毀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違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經系統地、全面地論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們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問題。

我們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这篇文章中,曾經概括



地論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們对于有关这个問題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識地作了保留，給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說明真相，弄清是非。現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問題上，扯了許多謊話，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詳細地說明这个問題。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訴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慣用的歪曲事实、顛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責任，轉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說过，“政治上采取誠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态度，是軟弱的表現。”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誠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墮落了的人才靠說謊过活。

事实是最雄辯的。事实是最好的見证人。还是讓我們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語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現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說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謊。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說，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現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經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統化的过程。人們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的認識，也經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們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許多观点，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謂“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問題，更是极共重大的原則錯誤。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偉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領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錯誤，但是，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勋相比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也借口世界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原理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在實際上篡改了列寧的學說。

赫魯曉夫把美國政府及其首腦看作是抵抗戰爭勢力的人，而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勢力的代表。他說，“在美國主張以戰爭方式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的人還占據着強有力的地位，他們還繼續在對總統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他還說，帝國主義者開始承認實力地位政策已經破產，他們中間“出現了頭腦有些清醒的徵象”。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及其首腦可以不代表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可以放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而是維護和平的力量了。

赫魯曉夫宣布，“我們希望在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鬥爭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國友好合作”。正是這種錯誤觀點，後來發展成為“蘇美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路綫。

赫魯曉夫歪曲列寧的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提出和平共處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綫”。這就是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互助合作，把社會主義國家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革命鬥爭的支援，都排除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綫之外去了；或者是把這一切都從屬於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了。

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斯大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過渡”的問題，絕不是蘇共一個黨的內部事務問題，而是同各國兄弟黨共同有關的重大問題。蘇共領導事先毫不徵求兄弟黨的意見，就武斷地作出結論，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並且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作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政，顛覆他們的領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政策。

後來事實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蘇共領導人背離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是從上述這些錯誤發展起來的。

對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一向就有原則性的不同意見，這是蘇共領導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卻硬說中國共產黨過去是完全支持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硬說我們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評價“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說我們的立場是“搖擺不定”的，是“虛偽”的。

蘇共領導想要一手遮天，這是辦不到的。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事實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曾經多次在內部會談中，嚴肅地批評了蘇共領導的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同志先後同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同志，同蘇聯駐中國大使的談話，都對斯大林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毛澤東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於過”，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價”。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东同志接見苏联駐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还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东同志接見苏联駐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談話，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談話，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談話，都一再談到我們对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批評了苏共领导人的錯誤。这些錯誤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談話中，也提出过我們的不同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确地闡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談話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睜着眼睛說瞎話，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澤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講話，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經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們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两篇文章，在駁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謠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論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繼續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偉大的革命領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們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們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进行公开的批評。当时，我們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錯誤。因此，我們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給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則上闡明了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場。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論述了中国革命的經驗，說明了所謂“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詳細論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并且說明了我們党一貫的正确作風，这就在实际上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錯誤。

我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則、坚持团结的态度嗎？

怎么能够說，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貫的、正确的立場，是什么“搖摆不定”的、“虛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轉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們提出这样的指責，大概是他們以为，我們过去的批評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賴賬，可以用謊言来欺騙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們自己是虛伪的嗎！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結果”、“偉大的結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記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結果”或是“偉大的結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給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們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們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經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會議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強調“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而且历史經驗也证明，統治阶级是不会自願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強調“开展議會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們对于宣言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表述，还是不滿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們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們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确地闡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問題的观点。这个提綱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須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說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議會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軍閥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議會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見附件一）

經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糾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的錯誤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則性問題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許多重要內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論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終結；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誰胜誰負的問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時間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則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們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見。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們沒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誰也不会想到，我們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



綫。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會議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討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的障碍。他們自以为他們的內部問題已經解决了，他們自己的地位已經“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們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軍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絕。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毀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絕向中国提供原子彈样品和生产原子彈的技术資料。

接着，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顧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見，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毀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为了討好美帝国主义，創造所謂“戴維营精神”，送給艾森豪威尔的見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魯曉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險主义”，等等。他从戴維营会談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銷美国的“两个中国”計劃，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訓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經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經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們根据一貫的坚持原則、坚持团結的立場，着重闡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闡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揚的一系列錯誤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們仍然沒有公开批評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論据，来证明他們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們要問：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們应当



对盛行一时的錯誤观点和荒謬言論沉默不言嗎？难道我們沒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嗎？

苏共領導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領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腦會議的事件。所謂“戴維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們的論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們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領導把中苏两党之間的意識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開羅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腦會議后的国际局势交換意見。中国共产党不贊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會議，也不贊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我們积极建議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并且主張为了开好这个国际會議，必須作好充分的准备。我們的这个建議得到苏共的贊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會議，参加羅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會議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換意見，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苏共領導竟然背棄自己的約言，把本来應該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轉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襲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會談，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會談說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騙人的。

事实上，在會談前夕，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別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讀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誣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領導的反华綱領。

在會談中，赫魯曉夫带头組織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規模的圍攻。赫魯曉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誣蔑中国共产党是“瘋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壟断資產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問題上是“純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魯曉夫指揮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傾冒險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魯曉夫在这次会談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許多兄弟党來說，也是一种突然襲击。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錯誤做法的。

在这次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絕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揮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釘。他們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說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嗎？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預謀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則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規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陣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談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談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魯曉夫同志有分歧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絕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揮棒”。“我們党只信服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沒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談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驟，把中苏两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間，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毀了几百个協議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毀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協議，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駐苏使館的一个工作人員，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糾紛。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揮舞手中的指揮棒，糾合一批打手进行圍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經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立場，順从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經考驗和鍛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組織圍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們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錯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們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詳細的論述。在这里，



我們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談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



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



論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的論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論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論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論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針對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針對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論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論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見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領導同意刪掉他們的錯誤論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見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問題，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問題，我們都是有不同意見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們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問題的文字。但是，我們当时就告訴苏共領導，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們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整个过程，貫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綫的斗争。在这次會議中表現出来的苏共領導的錯誤，較之前一时期已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領導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會議的发言中，已經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領導企图强加給兄弟党的錯誤路綫，在政治上是以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錯誤观点为中心內容，在組織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錯誤政策。这是一条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根本相違反的修正主义路綫。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綫，坚决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路綫。

在这次會議中，斗争的結果是，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會議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則，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會議中，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領導的一系列錯誤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評，迫使苏共領導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許多正确意見，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領導的錯誤一点也批評不得、苏共領導說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說，中共代表团在这次會議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



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要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要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綫，說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上得到贊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領導这样說，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嗎？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說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就“得到贊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談这样荒誕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須弄清楚的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綱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貨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領導提出的是一个根本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違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

这个綱領，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違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領導的許多錯誤观点，又在苏共綱領中出現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說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則，片面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設方針誣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綱領，把苏共領導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錯誤路綫更加系統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綱領，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关于无产階級政党的学說，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階級专政在苏联已經沒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階級先鋒队的性质已經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謬論。

这个綱領，用人道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学說，用資产階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綱領，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綱領，是反对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綱領，是保存和恢复資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詞中就申述了我們党的立場，后来在同赫魯曉夫和其他苏共領導人的會談中，也坦率地批評了苏共領導的錯誤。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完全拒絕中共代表团的批評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魯曉夫毫不掩飾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們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們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說，“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們有很大的意义”，“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赫魯曉夫的這些話，表明蘇共領導已經下定決心，沿着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國共產黨怎樣多次進行同志式的規勸，他們根本不放在心裡，而且毫無悔悟之意了。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

蘇共中央公開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曾經“作了新的努力”，謀求改善中蘇兩黨的關係，謀求加強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

這又是在說謊。

事實究竟是怎樣呢？

事實上，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蘇共領導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政策。這就使中蘇關係越來越惡化，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下面就是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來，蘇共領導破壞中蘇團結，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團結的主要事實：

第一，蘇共領導力圖把自己的錯誤路線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力圖用自己的修正主義綱領代替宣言和聲明。他們把自己的錯誤路線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近年來的全部列寧主義方針”，把自己的修正主義綱領說成是“我們時代的真正的共產黨宣言”，是“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社會主義友好共同體各國人民”的“共同綱領”。

任何一個兄弟黨，只要它不接受蘇共的錯誤路線和綱領，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蘇共領導就把它當作敵人，就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手段，反對它，攻擊它，損害它，顛覆它的領導。

第二，蘇共領導不顧一切地採取了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中史無前例的行動，斷絕了同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

第三，蘇共領導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惡毒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責我們採取什麼“特殊的立場”，實行什麼與兄弟黨共同方針不同的路線，並且把我們支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也算是一條罪狀。蘇共領導還企圖迫使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放棄自己一貫堅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的路線，接受蘇共領導的錯誤路線，接受他們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準則的既成事實，作為改善中蘇關係的條件。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大肆吹噓這個時期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魯曉夫對中國駐蘇大使講



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



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辯。我們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辯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們仍然留有余地，沒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評。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錯，中苏关系已經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統地交換意見，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誠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們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決議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驅逐中国駐苏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間，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討好美帝国主义者，給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見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条約；苏印間进行頻繁的接触；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瘋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囂尘上。赫魯曉夫领导的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繼續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說明了什么？

我們在上面詳細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



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自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責任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錯誤，勢必遭到他們報復性的打擊，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但是，共產黨人難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因為害怕報復性的打擊就不敢堅持真理嗎？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我們還考慮到，蘇共是列寧締造的黨，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他們進行批評，特別慎重，特別耐心，盡一切可能約束在中蘇兩黨領導人內部會談的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夠通過內部的討論得到解決，而不要公開進行論戰。

但是，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在幾十次內部會談中對蘇共領導的同志式的批評和勸告，都沒有能夠使他們迷途知返。他們在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蘇共領導對我們的好意規勸的報答，是對我們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壓力，是對我們發動越來越粗暴的攻擊。

蘇共領導有一個壞習慣：誰批評他們，就給誰亂扣帽子。

他們說：“你們反蘇！”不對。朋友們，“反蘇”的帽子戴不到我們頭上。我們批評你們的錯誤，正是為了維護偉大的蘇共和偉大的蘇聯，正是為了使蘇共和蘇聯的威信不致被你們糟蹋得不成樣子。老實說，真正反蘇的，敗壞蘇共和蘇聯的，給蘇共和蘇聯抹黑的，是你們而不是我們。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你們就一直不斷地、無數次地干着這樣的壞事。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們給蘇共和蘇聯帶來的耻辱。

他們說：“你們爭領導權！”不對。朋友們，你們這種誹謗實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們的說法，好像有人在同你們爭奪什麼“領導權”。這不是等於大言不慚地宣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存在什麼“領導權”，而這個“領導權”是在你們手中嗎？你們這樣以老子黨自居，是一個很壞很壞的習慣。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明確規定，各國共產黨是獨立的、平等的。根據這個原則，兄弟黨之間根本不應當有領導黨和被領導黨的關係，更不應當有老子黨和兒子黨的關係。我們從來反對任何一個黨指揮其他兄弟黨，也從來沒有想過由自己來指揮其他兄弟黨，根本談不上什麼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現在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不是由這一個黨或那一個黨來領導的問題，而是究竟要聽從修正主義的指揮棒，還是堅持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問題。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正是他們企圖凌駕於兄弟黨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強加給兄弟黨。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聲明規定的兄弟黨獨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國兄弟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

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動和擴大起來的，是由他們強



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 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



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



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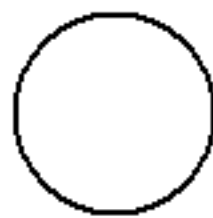
(六)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 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 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



我們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們党向他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們在此严正地声明，我們党只信服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屈服。我們认为，赫魯曉夫同志在羅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錯誤的，是違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經受到了欢迎。今后我們准备在有机会时繼續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們同赫魯曉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討論。对于赫魯曉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細研究后进行詳細的答复，闡明两党之間的原則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討論。我們相信，無論如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爭辯的，真理最終不能說成是錯誤，錯誤最終也不能說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絕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揮棒。

(二) 我們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維護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維護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們主張，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問題上展开正常的討論，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內，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則問題；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沒有經過事实考驗的、或者經過事实考驗业已证明是錯誤的观点，强迫別人接受。赫魯曉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論赫魯曉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終归是会要繼續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們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們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 我們上面所說的，我們和赫魯曉夫同志之間的分歧意見，从我們两党的整个关系說来，仍屬部分的性质。我們认为，我們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們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們两党都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陣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們相信，我們同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靜气的同志式的商談，解决我們之間的分歧意見，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們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共有利的。

(五) 我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論点的說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問題沒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險——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沒有提到，这是錯誤的，因此，我們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們提出修改草案，建議予以討論。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協議，建議成立一个專門的起草委员会，經過充分的討論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 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 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 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新“神圣同盟”的結局决不会 比旧“神圣同盟”更好

本刊評論員

馬克思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說过，一切偉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两次。他忘記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現，第二次是作为笑劇出現。”^①

在欧洲資产階級革命年代里，一八一五年曾經出現过一个“神圣同盟”。一百多年后，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两大潮流猛烈冲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統治的时候，扮演新“神圣同盟”的丑角，又粉墨登場了。

中国有句老話：“殷鑒不远，在夏后之世。”新“神圣同盟”加紧活动的时候，翻翻旧“神圣同盟”的老賬，是大有好处的。

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猛烈地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各国反动派惶恐万状。一八一四年后，在外国刺刀的支持下，被推翻了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王朝紛紛复辟。为了处理打敗法国以后的問題，沙俄、英、普、奥等国，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到一八一五年六月，在維也納开会。这是

一次分贓會議，“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②但是欧洲局面并没有平靜下来，人民更加不滿，革命在酝酿着。反动派担心法国式的革命在欧洲再度爆发，担心弱小民族起来反抗欧洲列强給他們安排的命运，因此在維也納會議以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勾結。一八一五年九月，“神圣同盟”产生了。

发起“神圣同盟”的“偉大人物”是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国王，以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都加入这个行列。据这些显貴宣布，他們遵循的“金科玉律”就是“仁慈、真理与和平”。这个同盟的“神圣”使命，就是所謂維護“和平”，“平定叛乱”，“保护合法政权”，“促进人类命运的福利”。保障国内外的“和平”，是那些皇帝陛下的口头禪。这就是說，要鎮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維護搖搖欲墜

①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頁。

② 恩格斯：《德國状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1頁。



的封建专制制度；要镇压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维护欧洲列强所需要的秩序。

“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以“扑灭革命之火的消防队长”自居的奥国首相梅特涅，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他说：革命“是一条张牙吞噬社会秩序的九头蛇。”“欧洲人民需要的是和平而非自由。”

总之，不准革命，这就是“神圣同盟”的“神圣”目标。因此，秉承上帝旨意的“神圣同盟”，在一八二一年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一八二三年镇压了西班牙的革命。恩格斯写道：“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①

可是，“神圣同盟”的好日子并不长。以“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联系起来的那些首脑，一开始就各怀鬼胎，勾心斗角。一八二三年后，“神圣同盟”就明显地走下坡路了。在镇压了西班牙本国的革命后，“神圣同盟”曾经企图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曾经企图干涉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运动。但是由于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阴谋都没有实现。一八二九年，希腊获得了独立。对于“神圣同盟”更大的打击来自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这次革命又一次推翻了波旁王朝。在它的影响下，一八三〇年八月，比利时爆发了革命，脱离荷兰，成为独立国。一八三〇

到一八三一年间，俄属波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邦国，都爆发了起义。“神圣同盟”再也无力阻挠革命的发展了，它实际上已经瓦解。到一八四八年，显赫一时的“伟人”梅特涅也被革命群众赶跑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曾经像“神圣同盟”一样，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的武装干涉，随后又成立了反苏的罗加诺公约。但是，所有这些罪恶的活动和阴谋，都可耻地破产了。由罗加诺公约扶植起来的德帝国主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粉碎了。执行列宁主义方针政策的斯大林的领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革命是不可抗御的。虽然革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挫折，最后的胜利是必定要到来的。反革命势力在灭亡以前总要勾结起来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猖獗一时，他们失败的命运是早就注定了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一系列国家走上了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包括古巴在内的十三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这

^① 《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0页。



种形势，远远超过了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那时的革命，动摇的只是欧洲的封建秩序；当代的革命，却是一场震撼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巨大风暴。因此，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早就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组成了一个新的“神圣同盟”。

很清楚，十九世纪初叶的“神圣同盟”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是当时欧洲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反苏十字军，是二十世纪初叶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新“神圣同盟”，则是当代伟大革命潮流的反动，是当代世界反对革命势力的大联合。

按照当代“神圣同盟”的首脑们的说法，这个同盟的使命像旧“神圣同盟”一样，当然是极其“神圣”而“崇高”的。他们的说法，就是：

保障世界的“安宁和秩序”，谋求“正义的和真正的和平”；

“纠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混乱”，“帮助他们建设新的自由堡垒”；

解放“被奴役国家”，促进“人的制度的逐步演变”；

如此等等。

把这类“神圣”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能够听懂的话，那就是：扼杀被压迫人民的革命

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维护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统治秩序，并且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新“神圣同盟”的首脑同他们的先辈梅特涅一样，认为，世界上一出现革命的火星，就应该执行“维护秩序与和平”的“崇高使命”，予以镇压。如所周知，美帝国主义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镇压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政府的代表曾经投票赞成联合国这个臭名远扬的决议。在这个罪恶的勾当中，印度反动派和铁托修正主义集团起了可耻的帮凶作用。

在这个“神圣同盟”看来，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是十恶不赦的“幽灵”，因为他们居然始终和全世界的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居然敢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如此不识时务地妨碍新“神圣同盟”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于是一个大规模地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华运动被组织起来了。肯尼迪、尼赫鲁、铁托之流，在精心编排的反华大合唱中，采取捏造、欺骗、诽谤、咒骂等等历来反动派惯用的老手法，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共处”，“侵略成性”，“低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质”，“用战争输出革命”，等等。人们还看到，赫鲁晓夫等人也多次地参加了这种可耻的反华大合唱。



在破坏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勾当中，新“神圣同盟”的首脑们一贯努力于使他们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并且极力招纳新的伙伴。在这方面，最近事情有了新的发展。

今年六月十日，肯尼迪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有共同的深刻的利益”。他表示希望“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关于这个演说，美国报纸作了些注释。《明星晚报》这样说：有朝一日，美国可能同赫鲁晓夫等人结成“联盟”，“组成反对‘北京危险’的共同战线”。

为了促进中苏决裂，促进反华“共同战线”的正式建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有必要给予赫鲁晓夫等人以某种“帮助”。美国《新闻周刊》说：“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共产党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法新社的一个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美帝国主义所表示的殷切期望和亲善态度，使赫鲁晓夫受宠若惊，他赶紧发表谈话说：肯尼迪的演说“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我们满意地接受改善苏美关系的呼吁”，他们和美帝国主义者“在维护和平上有共同利益。”

但是，肯尼迪并不满足，他还需要赫鲁晓夫作进一步的表示。七月六日，路透社的消

息中说，肯尼迪透露：“对赫鲁晓夫意图的严峻考验，在于他们如何贯彻实现他的禁止试验的建议以及他在目前的莫斯科会谈中，如何处理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争执。”

这个“严峻考验”的结果，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

当中苏两党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了。这封信，表明了赫鲁晓夫“如何处理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争执”。在这封信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来诽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陈词滥调，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无一不备。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第二天开始的美英苏三国会谈，已经“圆满”结束。危害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了。一年以前，赫鲁晓夫等人曾经拒绝过的可耻交易，现在做成了。

经过这次“严峻考验”，苏共领导人终于违反苏联人民的意志，完全公开地把自己置身于新“神圣同盟”的行列。

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一些国家的报刊评论说，赫鲁晓夫等人参加了“反华十字军”，他们和美国已经组成了反华的统一战线。印度报纸说：赫鲁晓夫和美国“由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印度抵制中国，已经成了共同事业的伙伴。”“这种联盟将不是以正式的盟约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日本《经济学人》说：苏美英三国代表签



署这个条约是赫鲁晓夫“跟着美国肯尼迪总统跑的那种接近美国的倾向”，这种反对中国、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美苏神圣同盟”，将“迫使全世界服从美苏两大国的利益”。这是值得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深思的。

需要知道，几年来，赫鲁晓夫一直是新“神圣同盟”的鼓动家和拉线人。现在，赫鲁晓夫非常兴高采烈。他认为，过去寤寐以求的同美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全面合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从华盛顿到莫斯科的“热线”已经建立，双方正在酝酿新的交易。赫鲁晓夫在援助印度反动派方面，也越来越卖力了，因此，最近印度报纸欢呼说，印苏关系“正在打开新的更为光明的合作的一章”。赫鲁晓夫和叛徒铁托之间，更是异乎寻常的亲密，他们不但拥抱接吻，而且赫鲁晓夫竭力赞扬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表示要“认真学习”它的“经验”。一不作，二不休，赫鲁晓夫既然在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背叛了世界人民，置身于新“神圣同盟”之中，他和肯尼迪、尼赫鲁、铁托的勾结当然会越来越紧密，甘心情愿地做肯尼迪、尼赫鲁、铁托的帮办。他们将要干出一些什么卑鄙齷齪的勾当，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要严密注视的。

当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纽约先驱论坛报》就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政策的含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国际关

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三国条约签订以后，有人以为，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大概来到了。

一些自命不凡的历史小人物总以为自己作的是划时代的大事，总想扭转历史的方向。但是，时代也总是把那些倒行逆施的“人物”毫不留情地倒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

十九世纪初期的“神圣同盟”的出现，曾经被认为是“划时代”的大事。它开始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可是，曾几何时，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革命，反对人民，这个“神圣同盟”在革命运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帝王将相的宝座一个一个地被人民掀翻了。二十世纪初叶组成的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联人民的反动联盟，也早已烟消云散了。当代的“神圣同盟”的首脑们好像并没有从他们先人的悲剧里学到一点什么。他们居然重走一百多年前或者四十多年前的老路，勾结起来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妄想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妄想孤立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当代伟大的革命潮流，不是几个扮演笑剧丑角的“明智”人物所能阻挡的。人民不会饶恕那些做尽坏事的人。这些人得意忘形未免早了一点。旧“神圣同盟”复灭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完全可以断定，新“神圣同盟”的结局决不会比旧“神圣同盟”的结局更好。



赫魯曉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 廢墟”这点上大造謠言？

· 文 宜 祝 ·

在最近，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尼赫魯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和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組成的反华大合唱中，有一个唱得特別响亮的調子，就是捏造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說，中国是“好战的”，是“主張通过战争输出革命的”。

印度反动派的头子尼赫魯說，中国“是侵略性的和擴張主义的国家”，中国“变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和危險”。

叛徒铁托說，中国共产党“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販卖分子处于同样的地位”。

赫魯曉夫等人不願意在反华大合唱中表示落后，把自己的調子唱得更高。在最近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里，苏共领导人从我們所写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不顾前言后語，断章取义地挑出“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一詞，蠱惑人心地說，中国领导要“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要“在数以亿計的人的尸体堆上創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他們无耻地說中国共产

党人是有“战争癡”的“狂人”。

我們在《列宁主义万岁》中，究竟說了什么呢？

不妨把这段話引述出来。

我們的原文說：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陣营也已掌握了現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絕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協議，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結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終是我們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們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經驗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



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这段话是白紙黑字，写得如此清楚明白，全世界的人們都可以查考研究。只要不是怀有偏見和別有用心的人，都不难正确理解它的原意。可是，到了自称“願意仔細研究”別人的文件，对解决问题怀有“善意”的人那里，这段话却完全变了样。

我們也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說法引述出来。

他們說：“在中共中央贊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斷言，‘胜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試問中国同志：他們是否明白，世界火箭一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廢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們相信，我們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們）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計的人的尸体堆上創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他們又說：“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們直截了当地說：‘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換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結果，‘將創造起美好的将来’。”

双方文字俱在，願意尊重事实的人，可以比較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我們所說的同他們捏造給我們的观点之間，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看，經過赫魯曉夫等人的引证，我們

原文中的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終是我們反对的，这个重要前提被砍掉了；我們原文中的如果帝国主义一旦要发动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毁灭，而絕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这个重要的論点也被砍掉了；而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即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廢墟，却被他們惡意地篡改成为“数以亿計的人的尸体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換言之”。它像魔术师的法棒一样，經過它一点，就把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似乎是中国要发动战争。赫魯曉夫等人还昧着良心地說，中国“建議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廢墟上”。

真是曠古未聞的捏造，天下少有的奇聞！

請問：在《列宁主义万岁》这段话中，有哪一句話說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我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主張过要发动世界战争、发动核战争，“在数以亿計的人的尸体堆上”創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

难道认为帝国主义“也有脑壳”、“也有脑髓”的赫魯曉夫等人，竟把世界人民看作是沒有脑壳、沒有脑髓，不会尊重事实、查对文件，不会比較思考、判断是非的木偶嗎？

对于这种偷梁換柱的手法，人們当然是不难看穿的。甚至连某些資产阶级报刊記者也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断章取义的“省略”，是“使中国的論据失去思想光采的企图的一



部分”^{*}；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說中国好战，是抄自铁托的、来源可疑的捏造。^{**}

对中国共产党仇恨入骨、一贯玩弄造謠伎俩的铁托集团，也曾对《列宁主义万岁》的这段话进行过恶毒的攻击。卡德尔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第五节中，就这样做过。不过，他还不致明目张胆地把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反对的这个前提砍掉；不敢把如果帝国主义一旦要发动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毁灭，而绝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这个论点砍掉；不敢像现在赫鲁晓夫等人所做的那样，在引文上玩弄如此没出息的玩意儿。赫鲁晓夫等人既不让苏联人民看到《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又断章取义地摘引这些文章，加以歪曲。看来，他们已经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而只好求救于捏造诬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了。在这一点，他们的恶劣手法比起铁托集团来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也许这就是他们同铁托集团“意识形态的分歧”吧！¹

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棒下，他们的许多追随者也环绕着“废墟”编造出越来越离奇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謠言。调子完全一样，只是唱法不同。如有的说什么中国人要“用原子‘小灯’来纵火烧地球”；说什么“谁也不愿在热核战争中挨烤，来让中国领导人取乐”；有的人还把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一会儿說成是“原子辐射废墟”，一会儿又說成为“废墟的星球”，一会儿又变为“千百万人的原子坟場”，一会儿又化成“巨大数量的死尸和焦土”，等等。真是五花八門，光

怪陆离。看来他们在编造謠言方面，正在进行着一場熱鬧的竞赛，并且好像还以为自己发挥了什么独创性而洋洋自得，其实这不过是跟在指挥棒屁股后面信口雌黄、含血喷人而已。

就是那个揮舞指挥棒的人，也一点没有什么独创性，关于“废墟”的謠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原是从美帝国主义者那里抄来的。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和八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华兹沃斯就曾断章取义地援引《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废墟的几句话，诬蔑中国“欢迎原子战争”，說中国想以“一場用氢弹来进行的”世界战争，“使共产主义有希望征服世界”。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又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废墟的几句话，辱罵中国是“好战的國家”、“残酷无情”、“侵略成性”，中国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巨大和殘暴的威胁”。

现在是一九六三年，距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年还不到两三年，赫鲁晓夫等人却这样不知羞耻地拾起美帝国主义的唾余，毫不避諱地以美国制造的謠言，向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狂吠。在这一片嘈杂的狂吠声中，誰还能分得清哪些是美帝国主义的声音，哪些是赫鲁晓夫等人的声音呢？

* 英国《卫报》1963年7月15日。

** 西德《明鏡》周刊1963年7月24日。



如果不是一味无理取闹，而稍微有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气味的話，就不应该在“廢墟”这个词上制造混乱，糾纏不休，而应该想一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旧社会制度廢墟的提法，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让我们在下面做一些引证吧。

恩格斯說：“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①。

列宁說：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廢墟上組織社会主义制度。”^②

列宁讲到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建設任务时，又說：“旧东西已經像应该被破坏的那样破坏了，已經像应该变成廢墟那样变成廢墟了。地基已經清理好了，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設共产主义社会。”^③

恩格斯和列宁在这里所用的“廢墟”一词的意义，是十分清楚、不容曲解的。它不过是說明，新社会制度将在旧社会制度倒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有什么錯誤值得非难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說：“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决不会再繼續容忍那个給他們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我們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論点來說明在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廢墟上建立新社会，又同上述論点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赫魯曉夫等人既然口口声声宣称忠实于莫斯

科宣言，为什么要对我们宣傳莫斯科宣言的这个正确論点进行恶毒的攻击？

很可笑的是，尽管赫魯曉夫和他的伙伴大肆誹謗和叫罵我們关于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廢墟这个說法，但是他们却在苏共綱領上写着：“全力促进在殖民帝国廢墟上所产生的各个国家的主权的巩固。”

赫魯曉夫在苏共綱領的报告中也說过：“民族解放革命給了殖民主义的巴士底獄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殖民主义帝国的廢墟上产生了四十二个主权国家。”

按照赫魯曉夫的邏輯，赫魯曉夫和他的伙伴这里所說的“殖民主义帝国的廢墟”，是不是就是要几亿人死亡？是不是要在殖民地人民的尸体堆上創造出“主权国家”？如果“殖民主义帝国的廢墟”，就是赫魯曉夫平常所說的殖民地人民的死亡，那末，你們要“全力促进”的是什么？要“巩固”的又是什么？

一些被剥夺了理智的人，总是要那么胡言乱語。

赫魯曉夫天天在那里說什么“明智”、“理智”，可是他总是那么不擇手段，牛头不对馬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的人。他的“明智”就是把一切主張革命，要求革命的人，都叫做“狂人”，叫做“瘋子”。要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頁。

② 《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1頁。

③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7頁。



知道，历史上的革命家总是被反动派叫做“狂人”和“疯子”的。

本来，在旧社会制度废墟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这是要由各国人民自己通过革命斗争去取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什么“通过发动世界战争”去推行革命，用发动世界战争的办法，去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只是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制造的诽谤。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口咬定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甚至要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这种离奇的论断，有什么根据呢？难道我们主张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衷心拥护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正义战争，就是要发动世界战争去推行革命吗？就是要“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了割断社会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联系，镇压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历来就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诬蔑成“颠覆”，诬蔑成社会主义国家要用发动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等人竟然使用帝国主义侵略者、压

迫者的反动滥调，来咒骂中国共产党，这岂不是把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的地位吗？

现在，不断地进行着侵略战争，正在加紧策划世界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热核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备战，严重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安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制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为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一贯进行着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但是，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充分地估计到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可能发动世界大战、发动核战争的危险。

在这里，根本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坚决揭露它，唤醒人民的觉悟，通过斗争制止它；还是散布核恐怖，瓦解人民的斗志，实质上帮助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进行核讹诈呢？如果一旦美帝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硬把核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革命人民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还是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呢？

革命的人民只能采取揭露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同它們坚决斗争的态度，而绝不能采取悲观绝望、屈膝投降的态度。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就是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分析，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正确地指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被毁灭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而绝不会是全人类；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绝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很明显，正是赫鲁晓夫等人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看成就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跟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

很明显，这些“人类毁灭论”者，才真正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对于人类的光明前途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

固然，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也可以发现这样的词句，如说，“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躊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但是，这些话跟他们上面的逻辑，不是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吗？在双方动

用了核武器的情况下，按照赫鲁晓夫等人的观点和逻辑，世界岂不也要变成“人类的废墟”？那么，又有谁来“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呢？

要么是你们思想混乱，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是你们像你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

拙劣的捏造，变成了自我暴露。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蓄意歪曲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在“废墟”问题上挖空心思大作文章，恰好暴露了赫鲁晓夫等人已经堕落到不择手段造谣惑众的地步，妄图欺瞒苏联人民，蒙蔽世界舆论，煽起一浪又一浪的反华高潮；恰好暴露了他们甘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义务宣传员；恰好暴露了他们散布核恐怖，以死亡的威胁来吓唬世界人民，不准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准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以此为肯尼迪的“和平战略”效劳，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由此可见，恰恰是赫鲁晓夫等人所宣扬的观点，倒的确是在“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乌云永远掩盖不了太阳，谎言和捏造也永远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辉。谎言编造得越离奇，只能越暴露编造者自己的丑恶嘴脸。



謹防假冒！

杜敬

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能只凭招牌。区分这两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这就是：他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对待各国革命人民的态度是怎样，对待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态度是怎样。

試举几例，以資識別。

“詛咒和警告——即使把它們叫作‘严重警告’并重复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这是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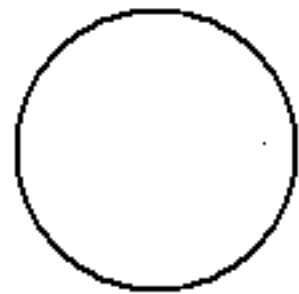
二百五十次，这个数目总算沒有說錯。美帝国主义屢犯中国的神圣領空領海，截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的那一天，中国政府已經提出了二百五十次严重警告。这是有关我們国家主权的大事，这是我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侵略本质的严正揭露。我們必須記下每一笔賬，让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知道美帝国主义的繼續不断的侵略罪行。

且不說美帝国主义对我們的严重警告采取什么态度。奇怪的是，那些口头上說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目标、有着共同敌人的人，而且自称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作了創造性发展的人，对于我們这一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行动，不仅不支持，反而輕蔑地挖苦、嘲笑。大概这就是他們所說的“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場”吧！然而，这究竟是誰的同盟者，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呢？

在苏共领导人看来，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不应当警告，也不要如实揭露，而应当替它粉飾打扮。大概这就是他們的哲学，因为他們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們說，警告对帝国主义者是不起作用的，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失去了对原子-氢武器的壟断，以及苏联建立了強大的軍事能力”。去年，苏共领导人曾經輕率地把火箭运到了古巴，看来是要使自己的軍事能力發揮“重要作用”了。然而，在美帝国主义者发现了古巴領土上的火箭，并以此进行詭詐和威胁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既不是古巴人民，也不是全世界人民，而是那些自称能用火箭保卫古巴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他們在决定运走火箭的时候，还命令自己的船只，服服貼貼地接受了美国的檢查。他們甚至企图牺牲古巴的主权来同帝国主义做交易，要古巴接受什么“国际視察”。



赫鲁晓夫等人的政策就是这样：一会儿是冒险主义，一会儿是投降主义。

在赫鲁晓夫等人看来，没有核武器和导弹，是不能对帝国主义者起“重要作用”的。可是有了核武器和导弹，他们在实际上也还是要听任帝国主义者的摆布。那末，出路何在呢？赫鲁晓夫找到的出路就是投降主义。

他们之所以反对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严重警告，实际上是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看成是可以允许的。有心人不妨看一看，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但是信中根本不提全世界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对于美帝国主义者只是奉承，不敢揭露，甚至尽量避免用“美帝国主义”这个“刺眼”的字眼。不讲主要敌人是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何说起呢？当然，这也难怪。因为，一提“美帝国主义”这个字眼，似乎就得罪了“明智”的朋友，就犯了“圣谕”，就要招来烧身大祸，那还了得！

还有：今年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日本代表为大会起草的关于和平和裁军的报告原稿，因为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苏联妇女委员会主席波波娃等，就对这个报告采取仇视和拒绝的态度，威逼日本代表进行修改。她们说，那么多的“帝国主义”太刺激人了。刺激别的什么人，他们是不在乎的，而刺激帝国主义特别是刺激美帝国主义，那可万万不敢。美帝国主义本来是很“善良”的，刺激得它发了怒，我们可怎么活呀！

另一个代表为世界妇女大会起草的另一个报告中，又控诉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的痛苦，这当然就使波波娃等同样表现出极大的惊慌不安，有人说这个报告简直“是一颗原子弹”。唉呀！你们要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扔原子弹啊！这怎能容许！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①那些说我们是假革命而以“真革命”自居的人们，却偏偏不敢刺激帝国主义，特别是不敢刺激一点美帝国主义。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说：“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并且指出，必须“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苏共领导人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最忠实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而在自己的文件、讲话和行动中，却不坚持关于主要敌人的论断，不去揭露主要敌人，在一切国际民主组织的活动中，也都不准许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相反地，对于真正忠实于宣言和声明，积极主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人，反而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页。



說是对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釋”。看来，在某种情况下，发表宣言和声明，他們可以同意，或者被迫同意，也可以在上面签字，但是在实际上，执行不执行，他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了。

在那些人头脑里的美帝国主义，同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头脑里的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样子。因此，我們要警告，要揭露，要反对，他們当然統統不同意，而是要掩飾，要听信，要辯护。

你听：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話是绝对信不得的”。“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們一定要欺騙人的。”①

同样的話，不厌其烦地接連重复了两遍，可謂用心良苦矣！

是啊！切不可忘記，帝国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是同样有脑壳、有脑髓的人呀！我們苏共领导人，而且是一些“最英明”的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者的話是绝对信得的！绝对信得的！为什么你們中国共产党人却偏偏說绝对信不得，绝对信不得？你們坚持这种“特殊立場”，遵循这种“特殊概念”，还能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嗎？你們还“竟敢援引馬克思列宁主义”，你們算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責难，据說并非空口无凭，而是有事实为证的：“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諾言——沒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②

不幸的是，尊敬的肯尼迪总统却偏偏不

賞臉。不要說并未“仍在履行”什么諾言，而且根本就不承认曾經承担了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义务。妄图除掉革命的古巴，这是包括在美帝国主义不可动搖的国策之內的。顛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健忘的人，讲稍远一点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就是在最近，肯尼迪还說：美国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示，不接受在加勒比海地区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并且“不能在和平的意义上同它共处”，“我希望局势有一天将会改变”。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唯恐有人忘記，隔了一天又把总统的話重复了一遍。

言犹在耳，这将作何解釋？

不要着急，那些說帝国主义者的話绝对信得、绝对信得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有道理的。他們会說：美帝国主义者的和平諾言是绝对信得的！绝对信得的！而其战争和侵略的叫囂，却是绝对信不得的！绝对信不得的！

掩飾，辯护，強要別人听信，犹恐不足，进而煞費苦心地为美帝国主义做画皮，千方百计地要把美帝国主义打扮得儼然像“救世主”。远在天涯，則对空遙拜，一朝得見，則笑臉相迎，热烈拥抱。甚至不惜用一些令人肉麻的語言和举动，要人相信这决不是什么侵略成性的敌人，而是可亲可敬的朋友，是“和平战士”。

同美英签订所謂“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大出卖，大背叛，大投降，已經昭然于世。而他們自己不仅把耻辱拿来自卖自夸，还借此为敌人吹噓。赫魯曉夫說什么：“我要对美国和英国的政府以及受本国政府委托

①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进行谈判的美英代表所作的努力给以应有的评价”。《真理报》说什么：三国条约的签订，证明了“最有远见和思想清醒的政治家”肯尼迪之流，也“不得不考虑现实”。原来，肯尼迪、腊斯克之流竟然做出了像《消息报》所说的“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和平事业”的天大的好事，这还不是“和平战士”？这还不是“救世主”？

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赫鲁晓夫“特别热烈”地欢迎了腊斯克，并得意洋洋地让美国人和苏联人“围桌混合而坐”，说“这既不会对资本家有什么危险，也不会对共产党人有什么危险”。

在签字仪式之后，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招待会。当腊斯克和霍姆同赫鲁晓夫一起进入招待会时，乐队奏起了美国作曲家格希温的曲子《爱神来临》。

这个曲子的歌词是：

“爱神来临，赶走了阴影，
爱神来临给我带来了最美好的日子，
你的一瞥使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因为爱神同你一齐来临。”

也是在那天，腊斯克还会见了葛罗米柯。葛罗米柯笑着对腊斯克说，他办公室的窗户是“朝向西方的”。能够住在窗户“朝向西方”的办公室里，真是三生有幸！

这几个小小的插曲，或者可以解释为生活琐事。但是，这些政客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政治的。通过这些小事，他们究竟想告诉人民一些什么呢？他们想把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描绘成什么样子呢？

按照他们的描绘，对那些敌人当然是“詛

咒”不得的。美帝国主义者，肯尼迪，是和平天使啊！是爱之神啊！是救苦救难的大慈悲家呀！他们“给我带来了最美好的日子”，“使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呀！这怎能容许你们这些凡人詛咒呢？实在是罪恶滔天！

只此几例，我们已可以根据如何对待敌人这个标志，看出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庐山真面目了。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是，历史上的一些垃圾，是可以借尸还魂的，旧书是可以翻版的。这是什么东西在借尸还魂？这是哪部名著的翻版？新旧对照，自见分晓。

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卡·列金，访问了美国国会，并向国会发表了祝贺演说。当时，二百多名议员把列金当作美国的“客人”，一一和他握手，议长还特别向他致谢。列金在他的美国旅行记中写道，德国社会主义报刊的一些编辑“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赞成群众罢工的演说。而我认为，在这个国会面前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参加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德国工人要求各民族间的和平，要求通过和平进一步发展文化，使它达到最高的成就”。

列宁是怎样批评列金的呢？他说：“请想一下，这位也算是社会主义者嘲笑什么：他嘲笑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居然会想到必须谈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德国机会主义的‘政府要人’（按指列金）太格格不入了。他们要说不触犯‘资本主义’。他们背弃社会主义的奴僕行为使他们蒙受耻辱，他们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

根据列金旅行记中的这一段插曲，列宁



还指出：“这说明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的手法是‘用温柔的方法杀害’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德国机会主义的手法是用拒绝社会主义来讨好‘温柔’可爱的民主资产阶级。”^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的重要分歧，这是一个例子。请赫鲁晓夫等人自己照照这一面镜子吧！你们和列宁的区别在哪里？列宁所批评的，不正是你们这一伙吗！你们在自己的头上冠以列宁的称号，只能看作是对伟大列宁的污辱。

再看，也是二十世纪初，在反对清皇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分裂成为革命派和改良派。改良派的康有为，曾经领导过维新运动，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公开为清皇朝辩护，认为无须革命就能实行“新政”。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等即组织保皇党，同革命派相对立，认为革命就会亡国，因此猛烈地反对革命，攻击革命派，说主张推翻清皇朝是“大怪不可解之事”^②。这时，他们已经堕落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起着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作用。

革命派的孙中山，则批评许多人为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在他看来，由清皇朝统治者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③。因此，他在列举

了清皇朝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当中所实行的虐政之后，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革命派同改良派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的重要分歧，这是一个例子。请赫鲁晓夫等人再照照这一面镜子吧！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你们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相貌不是也有些相似吗！

如何对待人民的敌人，历来就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现在仍然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那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不愿意也不敢揭露人民的敌人，极力美化人民的敌人，借以蒙蔽群众。他们自己，由对敌人实行无原则的让步和逢迎，以至变节投降。他们“创造”了什么呢？新创造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遗产。如果这也值得夸耀，世界上就没有“耻辱”二字了。

历史告诉我们，现实也告诉我们，革命的人民不仅要认识敌人，并且要认识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仅要警惕敌人的欺骗，而且要警惕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欺骗。

莫信招牌，谨防假冒！

- ①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0、251页。
- ② 康有为：《辨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12页。
- ③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页。



一个腔调 一个步伐

洪 谷

中国有句古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欧洲也有句谚语：“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

看来，古今中外的道理都一样，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不久前，苏共中央发表的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又为这个普通的道理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

在这篇以谎言代替说理的绝妙“奇文”里，以及在这篇“奇文”公布以后所发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和讲话中，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用蛊惑人心的恶劣手法，随心所欲地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帽子。这些帽子上贴的标签有“破坏和平”、“反对和平共处”、“有战争瘾”、“假革命”、“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等，等等，不下数十种之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是，应该坦率地说，这些帽子没有一项是新鲜货色，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全都是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仓库里搬出来的一批行销不畅的陈货。多少年来，叛徒铁托之流就是用这些胡言乱语来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

的。赫鲁晓夫等人只不过是照样学舌而已。

叛徒铁托集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恨之入骨，搜罗了一切最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我们，这一点也不奇怪。令人惊异的是，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继承者自居的赫鲁晓夫，现在居然也对马克思主义叛徒的滥言发生兴趣，而且还把它们搬弄来作为攻打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武器。虽然铁托集团连半个戈比也没有给赫鲁晓夫等人，但是他们叫骂得丝毫也不比铁托之流逊色，甚至连骂人的腔调也是一个样儿哩！且不说别的，就拿这封公开信同不久前铁托在南共联盟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对比一下吧。

铁托说：中国领导人“显然低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质”，“他们号召为世界革命而团结，而不是号召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团结，而在现阶段，世界革命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和亿万人民的毁灭”。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说：“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主张“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

铁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国际争端“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否定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之間和各国人民之間积极和平共处”，“采取在亚洲和整个国际关系中制造紧张的政策”。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国同志“反对和平共处”，并且提出“針鋒相对的斗争”的口号，“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給主張軍备竞赛的人帮忙”，“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铁托說：中国领导人想“在工人运动中取得霸权和意識形态壟断权”；中国正在“发展起最坏的民族主义”，“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欧洲及发达国家人民相对立”。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国同志“想用最輕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

铁托說：“中国领导人由于对欧洲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争取改善生活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持有吹毛求疵和輕視的态度，正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消极的和挫伤士气的作用。”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沒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倩”，“硬要人們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的方针。

铁托說，中国领导人散发“各种反对其他党及其领导人、包含教条主义内容、包含各种誹謗和歪曲真相的小册子和材料”，“是进行派系斗争和干涉其他党和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共同志特別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进行顛复活动”；“他們用許多种語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誣毀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屬自

己的影响和控制”。

够了，难道还需要再一一列举嗎？就从这些材料中，人們已經不难发现，赫魯曉夫等人的腔調同叛徒铁托的腔調是多么“吻合”和“一致”！

不过，这里似乎有必要提醒一下赫魯曉夫和他的伙伴：叛徒铁托咒罵了我們許多年，並沒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罵倒，就連我們的一根毫毛也沒有伤害得了。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罵得越起勁，他們的叛徒嘴臉也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得越彻底。現在，你們也学着铁托的腔調来咒罵中国共产党，又能够得到些什么呢？难道你們就一点也不担心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嘴臉嗎？你們自己也知道，像叛徒铁托那样的一副嘴臉“是不令人羨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

人們並沒有忘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八年七月曾經在德國統一社会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稱說：“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輕信的人，使他們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他还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們的言論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

可是，几年以后，还是这个赫魯曉夫，却把他自己嘴里吐出来的話又吞了进去。他完全背叛了自己原先的立場，竟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称作“兄弟党”，把叛徒铁托之流称作“亲爱的同志”，而且津津有味地学着铁托的腔調大罵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一意地



把叛徒铁托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請看，赫魯曉夫已經隨落到什麼地步！

說到赫魯曉夫等人的這種急劇轉變，不能不使人想起去年十二月間鐵托的莫斯科之行。當時，正是加勒比海危機發生不久，赫魯曉夫的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行為遭到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致譴責的時候，赫魯曉夫以邀請鐵托到蘇聯“休假”為名，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請到莫斯科去“交換意見”。在鐵托逗留蘇聯的十八天中，赫魯曉夫給了这个叛徒以“最親切”和“殷勤”的接待，同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有益的會談”，還讓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讲坛上和其他許多群眾集會上，發表了一系列“熱情而友好的”講話。这个叛徒不但以贊賞的口吻表揚了赫魯曉夫“能在最緊要的關頭大膽行事”，並且向他們指出：只要赫魯曉夫同他們“在一起”，就“能對付在國與國之間的关系上所產生和表現出來的一切問題”。赫魯曉夫“怀着濃厚的興趣”听取了這個叛徒的鼓勵和指導，一再高興地表示，他們在“重要國際問題上的觀點”，同鐵托集團“是吻合的或者是接近的”。

事實表明，赫魯曉夫同鐵托進行的“有益的會談”，的確為他“提供了很多東西”，幫助了他更“勇敢”地去“大膽行事”。

會談還未結束，赫魯曉夫等人就立即掀起了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高潮。赫魯曉夫親自出馬大肆攻擊和美帝国主义進行堅決斗争的人，是採取“最廉价的斗争方法”和“巫师庸医的做法”；誣蔑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國與國之間的战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还大肆宣揚，在所謂“古

巴危机”中，鐵托集團“採取了正确的立場”，而“冒充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教条主義者却採取了挑釁性的立場”。他竟敢公然推翻兩次莫斯科會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的正确結論，叫喊“對於明文記載的論點不能……加以重複和加以片面理解”，說什麼“那些過去和現在都站在教条主義立場上的人代表了主要危險”，說什麼“現在左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性并不比修正主義小”。他还指責，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把他們“革出教門”，是對鐵托集團使用“野獸的法律”，要求給这个叛徒集團“在一切兄弟黨的家庭中占有应有地位”。尤其恶劣的是，他們竟然把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大會作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場所。例如，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們就會精心策劃和導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反華丑劇。在这次大會上，他們一面明目張胆地為叛徒鐵托集團翻案，讓这个叛徒集團的代表公開販賣現代修正主義貨色；一面粗暴地攻擊堅持莫斯科宣言和聲明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甚至當中共代表團團長在致詞中引證和闡述莫斯科聲明對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的時候，用強行制止和叫喊、跺脚、吹口哨等流氓手段進行阻撓。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赫魯曉夫等人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難道還不十分清楚嗎？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

今年五月，正當中蘇兩黨舉行雙邊會談的前夕，鐵托集團又召開了以反華和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中心內容的南共聯盟五中全會。在这次會議上，叛徒鐵托公開叫囂要結



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说什么他们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将站在“反教条主义力量一边”，“最积极地参与澄清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这个叛徒还以长者的口吻警告赫鲁晓夫：不许苏共“牺牲别人”去达成“妥协或者无原则的协议”。南斯拉夫《消息报》甚至狂妄地叫嚣，中苏两党会谈取得成果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等人完全执行了叛徒铁托的这一意旨。他们在会谈前，一面为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辩护，一面公开发表决议和声明，“断然拒绝”讨论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责成他们的代表团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在会谈进行中，他们又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挑起了一次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运动。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还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公开地扩大到国家关系中去。他们的这些行动，无例外地都得到了叛徒铁托集团的赞赏。

目前，反华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赫鲁晓夫按照过去的惯例，又需要同叛徒铁托“交换意见”了。不过，这次不是铁托到莫斯科“休假”，而是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休假”。

据报道，师徒二人见面以后，又是拥抱，又是接吻，亲热得了不得。铁托夸奖了赫鲁晓夫“为了使共处和建设性协商的明智政策占上风”所作的努力，赫鲁晓夫也情不自禁地说“你们这里的太阳比莫斯科的温暖”，表示要同铁托继续他们“在莫斯科开始了的会谈”。

赫鲁晓夫究竟要同铁托商量些什么呢？他当然不会把他们的私房话全部拿出来公诸于世。但是，这些天来，他在许多公开场合的讲话，已经向人们透露出他究竟想干些什么。这就是：

第一，要把铁托集团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使这个叛徒集团能够从内部来进行破坏活动。

第二，要求铁托集团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可靠和忠实的同盟者”，要求铁托集团进一步支持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一步支持他反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活动。

第三，要求铁托集团在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之间加紧进行活动，帮助赫鲁晓夫等人扩大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错误影响。

第四，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的“经验”。赫鲁晓夫竭力赞扬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并要“认真学习”它的“经验”。他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对铁托集团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复辟的幌子——“工人自治”十分感兴趣，说苏联“企业管理形式已经过时……是官僚主义的形式”，而铁托集团骗人的所谓“工人自治”才是一个“进步的现象”，是对苏联“有用的”。他甚至考虑要把铁托集团骗人的所谓“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某种办法写进苏联新宪法草案中去。

从赫鲁晓夫的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词中透露出来的东西，已经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是要充分利利用这次“休假”的机会，进一步加紧同叛徒铁托的勾结，为他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的行为寻求支持，为他效法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蜕



变的“特殊道路”请求教益。这种勾结，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它告诉人们，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苏共领导人为了欺瞒舆论，为了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解，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说什么他们同铁托集团“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这简直是胡扯！既然你们同铁托集团“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在各个方面都是“一致”和“合作”的；而且，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你们的纲领就是按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复制出来的，那么，你们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又在哪里呢？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时间刚刚过去一个半月，赫鲁晓夫在八月二十八日就对一批南斯拉夫和外国记者说，他同铁托“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南斯拉夫和苏联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学说的基础上。既然“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那还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原则分歧呢？既然铁托集团已经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学说的基础上，那么，莫斯科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断还算不算数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还说什么出现了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立场的接近”，企图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铁托集团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什么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是赫鲁晓夫等人干脆脱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滚到铁托修正主义者那一方去了。这一点，甚至连资产阶级报刊也看得很清楚。美国《芝加

哥太阳时报》就曾毫不掩饰地说，“赫鲁晓夫已向南斯拉夫式的共产主义靠近”，赫鲁晓夫同铁托已成为两个“接吻的堂兄弟”。美联社说得更直截了当：赫鲁晓夫“看来目前满足于跟着南斯拉夫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铁托在普拉作过一次臭名昭著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铁托狂妄地宣称，要使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两年以后，铁托又洋洋得意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两年，苏联也重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我们过去因为它受到很多批评，并被称为修正主义者。”请问赫鲁晓夫，现在你们这样热衷于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接近，这样无休止地去“重复”叛徒铁托集团内政、外交的“实践”，人们难道不是有理由怀疑苏共领导人是要让叛徒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在苏共党内完全“得胜”吗？

由伟大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以它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敬仰。苏联人民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战斗的声音，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在美帝国主义大敌当前的今天，在列宁缔造的党内竟然有人紧紧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同叛徒铁托称兄道弟，而对六亿五千万兄弟的中国人民视若寇仇，不择手段地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赫鲁晓夫等人这样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但是，随后，总是会逐渐明白的。



邏輯与腦子

林銘蕙

七月十九日，赫魯曉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說：“从某些人的論調中看出，似乎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有权利对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一場战争，……把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根据这种邏輯，帝国主义国家也会有‘权利’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复辟。”赫魯曉夫在这里捏造了一个莫須有的前提，提出了一个奇妙的邏輯！

事实上，这种邏輯并不新鮮，而是早已有之的。

列宁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曾經提到这样一件事：“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維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

段来推翻政府，政府也就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列宁非常贊賞赫爾岑說卡維林之流是“草木一样的人，軟体动物一样的人”^①。

对沙皇政府迫害革命党人不感到憤慨，而认为是一种“自卫”手段；对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不感到憤慨，而认为是一种“权利”——这两种邏輯是完全可以“媲美”的。卡維林像“軟体动物”一样，跪倒在沙皇脚下。沙皇喝一声：一切革命党人统统給抓起来。卡維林馬上奉命唯謹地学舌道：这是政府应当采取的“自卫”手段。卡維林的这类邏輯，是为沙皇反动統治辯护的邏輯，也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慣用的邏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采用这类邏輯，作为辯护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武器。

在越南南方，在老撾，在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国，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正在用飞机、大炮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甚至认为草木、禾苗和鳥兽也“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必須用最新式的化学武器把它們消灭掉。肯尼迪和它的走狗叫囂說，这样做是有“权利”的，因为据說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正以战争手段在这些地方推行革命，妨碍了“自由世界”的“安全”。

在美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之类的組織，正在剥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自由，把他們投入監獄，送上断头台。肯尼迪之流叫囂說，这样做是有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頁。



“权利”的，因为据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都是所谓“外国代理人”，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代理人”。

对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正在进行颠覆、渗透活动。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美帝国主义每年都举行所谓“被奴役国家周”，说什么：“由于共产主义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侵略，使波兰、匈牙利、立陶宛、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东德、保加利亚、大陆中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北朝鲜、阿尔巴尼亚、伊台尔—乌拉尔、西藏、哥萨基亚、土耳其斯坦、北越等丧失民族独立。”^①因此，“作为人类自由堡垒的美国”，有“权利”用政治的经济的以至战争的手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恢复资本主义。

我们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逻辑也早已领教过了。自一八四四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看到这种逻辑的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军队还霸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美国的第七舰队还横塞着我们的台湾海峡。从这支舰队的飞机，从这支舰队中派出的军舰，时时刻刻地威胁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但是，美帝国主义却念念有词地说，中国人民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就是“企图使用赤裸裸的武力”来“扩大权力”，就是“用武装力量来实现领土野心”，就是实行“武装侵略”，就是“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因此，大美国完全有“权利”从遥遥万里之

外，从远隔重洋的太平洋彼岸，派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之一——第七舰队，来遏阻中国人民“侵略”自己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美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就是这样。它自以为祭起了这套奇妙的逻辑，就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可以把侵略南越、老挝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的罪行，说成是“反侵略”的“义举”；把镇压各国人民革命的罪行，说成是打击“外国代理人”的“严正行动”；把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罪行，说成是“解放被奴役国家”的“崇高行为”；把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说成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牺牲精神”。最近几年来，肯尼迪之流特别起劲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好战”。不久以前，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又再一次使用这套逻辑。他公然说“世界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人发动强使别人接受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动”。至于他自己所实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却是所谓努力“谋求和平”、“永远不会发动战争”的政策。^②

遗憾的是，全世界人民竟然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智”，竟然完全不相信美帝国主义者的这套奇妙逻辑。美帝国主义分子走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愤怒地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这怎么办呢？

① 见195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被奴役国家周”的决议。

② 见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载1963年《新华月报》第7期。



好了，现在有人来替肯尼迪之流劝说世界人民信服这套奇妙的逻辑了。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他早已吹捧肯尼迪之流是所谓“谋求和平”的“明智”之士。现在，他更进一步地跟着肯尼迪捏造说：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了，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权利”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赫鲁晓夫真不愧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煽动家，肯尼迪应该给以奖赏。

但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这种奇妙逻辑，有一个非常不妙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它的前提都是虚构的，都是彻头彻尾地违反客观事实的。事实胜于雄辩。在美国，在南越，在老挝，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肯尼迪和他的走狗，找到在那里发动战争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找到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没有？完全没有。相反，在南越，在老挝，在过去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革命战士却俘虏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官兵，缴获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式武器。到底是誰对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难道还不清楚吗？现在，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周围，在远离美国五十州的遥远地方，有几百个美国军事基地，驻扎着数十万的美军，带着热核武器的美国飞机和美国潜艇日夜不停地在巡逻。这到底是誰在准备发动对别国的战争，难道还不清楚吗？

或许赫鲁晓夫会争辩说，他并没有说中国已经发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而是

“从某些人的论调中看出”，中国主张用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办法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问：中国共产党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文件中曾经有过这种“论调”？就是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公开信中大肆攻击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来说吧！在这个文集中，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声明：“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难道这种态度还不明确吗？

很明显，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对别国发动战争，而是准不准别国人民进行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逻辑千条万条，总的一条是：革命有理。这就是说，既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人民当然完全有理由去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现代修正主义者不同。他们的逻辑千条万条，总的一条是：不革命有理，反对革命有理。他们公然威吓说：谁敢要求革命，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完全有“权利”用战争去摧毁你们。这种修正主义的逻辑，同肯尼迪之流的逻辑又有什么区别呢？



自命为列宁主义者的赫鲁晓夫和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之流竟有相同的逻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赫鲁晓夫在这次苏匈友好大会上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帝国主义也是人，这些人也具有人的感情，也有脑壳，就是说他们也有脑子。至于他们的脑子工作的方向是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的方向是共产主义，他们帝国主义有自己的方向，这没有什么见怪的”^①。看来，赫鲁晓夫在这里也没有忘记表白一下自己脑子的“列宁主义方向”。不过，他认为有必要教训人们：这种方向问题，现在已经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地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必须大讲特讲的是，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都是人，都具有人的感情，两者的脑子是有相同之处的。大家知道，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都不是超阶级的，人的思想都是有阶级性的。人的脑子是思想的器官。不同阶级的人的脑子产生不同阶级的思想和逻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肯尼迪之流的脑子是用垄断资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因此，这两种脑子所产生的思想和逻辑是截然不同的。现在，赫鲁晓夫自认自己的脑子和感情，同肯尼迪之流的脑子和感情有相同之处。脑子、感情和思想既然有相同之处，它所产生的逻辑当然会趋向一致。美帝国主义者一再夸奖赫鲁晓夫像一个“能干”的“美国政治家”，这决不是偶然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几句扫兴的话。赫

鲁晓夫的脑子尽管非常“明智”，逻辑尽管十分奥妙，但是，这种“明智”和奥妙，除了可以使自己变成“能干”的“美国政治家”以外，还有什么价值呢？请听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在这块半殖民地的大陆上，饿死、并非由于不治之症而病死或未老先衰而死的人每分钟约有四个，每天有五千五百个，每年有二百万个，每五年有一千万个。……与此同时，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②反映在拉丁美洲人民脑子里的就是这种血淋淋的景象。反映在亚洲、非洲人民以及其他受剥削受压迫人民脑子里的也是类似的景象。他们迫切地要求革命，要求挣脱帝国主义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是任何人使用任何方法都阻挡不了的。赫鲁晓夫自认自己的脑子和感情同肯尼迪之流有相同之处，别人当然不能说不同。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请教一下：你有什么神妙的方法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脑也同帝国主义的脑子一样地思考问题？难道凭一套奇怪的逻辑就能够改变人民的脑子，改变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使他们忘记血淋淋的景象，并且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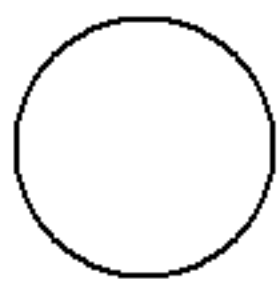
^① 见7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话的电视转播录音。

^② 见《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红旗

HONGQI



18

一九八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 ★

目 录

关于斯大林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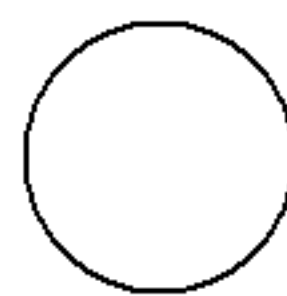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1)

在尼赫魯反华政策的背后……………徐景琳 (13)

“不发达經济学”是新殖民主义的

“理論”……………黄展鵬 (25)

提高农村基层党組織的战斗力的……………魏文伯 (30)



☆ 九月十三日出版 ☆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斯大林問題，是一个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階級的反响，至今还在議論紛紛。各个不同的階級，代表各个不同階級的政党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国际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数人的意見其实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們同苏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違反列宁关于領袖、政党、階級、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說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對我們提出的原則性的論据，避而不答，只是給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的时候說过：“不回答論敌的原則性的論据，硬給論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爭論，而是謾罵”。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維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謾罵来代替爭論，我們却要用原則性的論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偉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階級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



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



路綫，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

斯大林，他領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軍隊，进行了艰苦卓絕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偉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論著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貢獻。

斯大林，他領導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來說，实行了符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和偉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无产階級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階級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无产階級专政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离开了辯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須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經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錯誤。他在党和国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无产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錯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錯誤的主意。这些錯誤，給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損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



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



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終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負責，所以我們党进行的反对“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进行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实践經驗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們采取的方法是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結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认为，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們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們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們不是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总结經驗教訓，而是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編造的所謂“錯誤”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們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蠱惑人心的語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語的时候，我們实在担心弄髒自己的紙笔。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說，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內，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嗎？偉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說，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內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經驗，不是无产階級专政的經驗，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統治下的經驗嗎？偉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强盜”。这岂不是等于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經在一个长时期內，是以一个“强盜”为首的国家嗎？偉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說，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經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領袖的政党嗎？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說，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偉大苏联军队，曾經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統帥的军队嗎？光荣的苏軍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賭棍”。这岂不是等于說，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經是以一个“賭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是对偉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魯曉夫，現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罵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盜”的同謀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罵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魯曉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瘋狂地反对苏維埃制度，反对苏維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語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們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話来質問赫魯曉夫：“对偉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殘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偉大成果、在建設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說得出这种話”！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留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



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受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



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組織——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領袖、政党、階級、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說，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历来坚持集体領導，但是反对貶低領袖的作用。我們重視領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頌揚，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提議，决定禁止給党的領導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們这些一貫的、正确的主張，同苏共領導提出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領導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是为了什么发揚民主，实行集体領導，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苏共領導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來說，无非是：

一、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領袖斯大林同党的組織、同无产階級、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階級政党，丑化无产階級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領導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內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願顛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領導；

五、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魯曉夫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頗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他們“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評價”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苏共領導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魯曉夫捧到天上。

他們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魯曉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級政治工作人員，吹捧成“紅軍的积极締造者”。

他們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績完全归功于赫魯曉夫，說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經常地听到赫魯曉夫的声音”，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們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偉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魯曉夫，說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誰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彈和氢彈，都是斯大林領導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員和苏联人民的偉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領導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魯曉夫呢？

他們把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的赫魯曉夫，吹捧为“創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光輝范例。”

苏共領導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飾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說，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誣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識形态和道德以及領導的方式方法强加給其他党”。这种說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誕无稽。

按照苏共領導人的說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結束了俄国資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現了一个所謂“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識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籠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講話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統治，說斯大林“是用斧头維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繪当时的社会秩序說，“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領導所說的“个人迷信时期”，簡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資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領導的說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階級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魯曉夫說：“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們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誰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誹謗无产阶级領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鮮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識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經用这类口号咒罵过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騙取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經写信給馬克思說：“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敗之后，就咒罵馬克思說：“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頂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經用这类口号咒罵过列宁。考茨基誹謗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說列宁把“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罵斯大林。他說，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創造了卑鄙的領袖崇拜，給領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現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罵斯大林，說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見，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傳下来的，是他們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領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們用詆譏否定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魯曉夫用詆譏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詆譏得到成功。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偉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們劝告赫魯曉夫同志一句誠懇的話，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錯誤的道路，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來。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偉大革命学說万岁！



在尼赫魯反华政策的背后

徐景琳

最近，联合反华的各路“英雄好汉”們，都在竞赛似地大造特造各式各样离奇的謠言，来誣蔑中国和攻击中国。別的反华“好汉”暫且不談，这里单說說印度反动派尼赫魯散布謠言，說什么中国軍队在印度边境“大規模集結”，云云。

尼赫魯在造謠上真不愧是一个“能干的”角色。他深懂謊話不可說得太死，而要模稜两可，閃爍其詞。所以，他在散布“中国軍队在北部边境集結”的謠言时，故弄玄虛地說：“我并不是說会爆发一次战争，但是我不能說不会爆发战争”。可是，他的下屬們比起尼赫魯来，未免略低一筹。他們竟說：中国已計劃好以八月五日为大規模进攻的开始日。看来，造謠也需要才能。那些在造謠技术上比尼赫魯稍稍低能一些的角色不幸，在于他們造出了一个八月五日的确切日期，很快地就揭穿了他們自己。

在这之后，狡詐的尼赫魯一会儿說：中国在边界上“集中了大量軍队”和“物資”，印度“要尽量增强我們的防御机器，以应付一切意外”；一会儿又說：“中国的声明表明他們不会再进攻印度”，但是“并不是說他們不可能

違背那些声明”，等等。可以看出，尼赫魯由于种种需要，有时改变一下調子，但是，他始終咬定存在着什么“中国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必須“加强自己”，必須“尽一切力量，作好准备，来对付可能发生的不測事件”。

尼赫魯在叫嚷“中国威胁”、“中国入侵”方面，忽紧忽松，忽而火燒眉毛，忽而影影綽綽，这都是以他的反动的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为轉移的，都是他达到某种反动目的的手段。被現代修正主义者吹捧为印度“强有力的领导”和“明智”政治家的尼赫魯，他的这套手段，特別具有深刻的目的性。

人們知道，尼赫魯政府一貫乞灵于“中国威胁”的神話，来維持印度国内的“紧迫感”和“危急感”，以便勒索印度人民，鎮压印度人民，以适应印度大资产階級、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需要。当他們叫嚷“中国入侵”迫在眉睫时，是想借此要求印度人民繼續“負起軍事开支的重担”，“过艰苦生活”，“作更多的牺牲”。当他們将“中国威胁”的神話变成一个似有似无的暗影时，是想既使“紧迫感”不致完全消失，又借此緩和一下内部矛盾，并鼓吹“加强自己”，即加紧扩



軍备战。

对外政策是对內政策的繼續。不論尼赫魯在反华上玩弄什么手法,他的目的不外是,企图以此来掩盖它的美国的政策、禍国殃民的政策,轉移国内人民的視綫,緩和統治集

团內部的爭吵和国内危机,并且借此討取更多的外援。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点,我們不妨来看一看在尼赫魯的反动統治下,印度国内的財政經濟方面的危机和政治方面的危机。

一、尼赫魯反华加深了国内财政经济危机

一九六二年是尼赫魯政府反华活动最瘋狂的一年。尼赫魯原来指望,通过制造边境冲突,乞取更多的外援,实行扩軍备战,以刺激国内生产,挽救它早已开始并日益严重的財政經濟危机。可是,事情发展的結果究竟怎样呢?

由于尼赫魯政府蓄意反华,捏造出莫須有的“中国入侵”的危險,不顾一切地扩軍备战,提高軍事預算,印度的財政危机弄得更加不可收拾。根据印度議会批准的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度財政預算,本年度軍事开支高达八十六亿七千四百万卢比,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强。后来印度議会又同意采取措施,使軍事开支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一。日本一家杂志評論这个預算时說:印度的扩軍活动已經使“印度空前地变成了一个具有軍事性质和通貨膨脹性质的国家。”巨大的軍事开支使本年度財政赤字空前龐大,高达四十五亿卢比,比上一年度的二十四亿卢比增加将近一倍,达到了印度独立以来的最高峰。

扩軍备战的結果,还使得印度原来存在

着的对外貿易逆差进一步增大。外貿逆差加深着外汇危机。近年来,印度軍事訂貨进口激增,出口則因物資轉用于国防需要而进一步萎縮。据估計,本年度軍事訂貨进口将增加十亿卢比,貿易逆差势将超过一九六二年的四十一亿卢比。加上本年度应偿还的外債本息等,外汇差額将越来越大,外汇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为了解决財政困难和外汇亏空,尼赫魯反动政府的办法之一是,繼續乞求外援,增借外債。

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印度儲备銀行公报》发表的資料,仅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底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底,印度四年累积外債共达一百五十二亿卢比。据印度財政部副部长去年九月在国会联邦院提供的材料,印度在第三个“五年計劃”期內,要偿付的外債本息共計六十九亿一千七百万卢比。在印度目前借入的新債中,有一部分必須抵付旧債,老債新債愈滾愈多。据英美报刊透露,为了解决今后三年的問題,印度需要从国外得到五十亿美元。今年六月日本出版的《日本



的动向》半月刊，在一篇题为《正在变成军事国家的印度》的文章中说，印度“外债越积越多，债台高筑，经济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尼赫鲁政府在一只手伸向外国的同时，另一只手就伸向人民的腰袋。为了应付巨额开支，印度政府拼命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去年，尼赫鲁政府在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宣布所谓“紧急状态”，又巧立名目，大搞变相捐税。如什么募集“国防基金”、发行“黄金公债”等，据估计，仅这两项，到今年六月止，印度政府就从人民身上捞去共六亿八千七百三十万卢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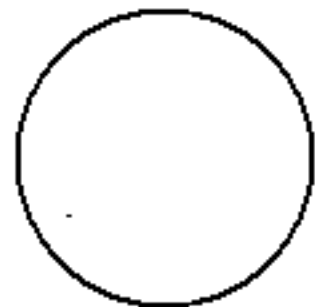
印度今年度的新预算中，规定增收的新税总数达到二十七亿五千万卢比，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取自普通老百姓的间接税。而由资产阶级和地主负担的公司税和财产税，总共只有三亿九千四百万卢比，即占百分之十四。印度《闪电》周刊说，印度政府“把总共二十七亿五千万卢比新税中的二十亿卢比的负担加在普通人身上”。这个新增税超过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六个年度新增税额的总和。此外，各邦政府还将另行征收新税十一亿八千万卢比。从今年七月起又搞出了一个新花样，叫做“强制储蓄计划”，强制每月收入一百二十五卢比以上的职员和工人，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作为“储蓄”，五年之后始予归还。

这种空前巨大的赋税对印度人民意味着什么，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想要具体了解一

下印度人的情绪，不妨翻一翻印度政府把这个预算提交议会时的印度报纸。二月二十八日印度政府向议会提出预算，三月一日的新德里各家报纸上，便充塞着这样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创纪录的赋税”、“八十六亿七千万拨给国防费”、“邮电费增加”、“煤油、茶叶、肥皂涨价”、“强制储蓄计划”……。《印度时报》说，“预算建议的炸弹在星期四晚上炸开了，新增加的税收是那样的重，使这个首都目瞪口呆。”它还说：“对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预算的特别广播的人们来说，显然，一个节约和艰苦的新时代开始了……最大的恐惧变成了事实。”《政治家报》说：“老百姓对于新预算建议的反应是大声呻吟。”这家报纸报道：“一个家庭妇女问道：‘我怎样来平衡我的预算呢？我不能像德赛（印度前财政部长）那样用赤字财政的办法’。”人民感到愤怒。而尼赫鲁在一次讲话中却还号召人民实行“多工作”、“少花钱”的“自救之道”呢！

印度经济上的严重困难，还表现在工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印度“全国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据说“读起来很不是滋味”的报告。这个报告承认：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停滞不动”，工业发展“步伐放慢”。

据统计，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国民收入只增加百分之二。前一年度，即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



百分之七点一，相比起来降低了百分之五左右。工业虽經軍事訂貨的刺激仍保持上一年度的增长速度，但較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的增长速度，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就是与軍事訂貨关系密切的化学、机械工业，开工不足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而非軍用工业，如紡織、制糖、化肥及配件制造等，情况更坏。問題特別严重的是中小企业。全印一万家小型鑄造厂由于限制坩鍋进口而大部分倒閉；四百多家不銹鋼工具制造厂由于停止原料进口，連百分之五的生产都不能維持；在西孟加拉一地的七百家小型紡織厂，由于政府提高出厂稅而宣布停业；在北方邦的一千家榨油厂中，有六百家因为油籽稅增加和缺少油罐而倒閉或减产；等等。

在农业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的糧食产量，比上一年度减产一百二十万吨。印度的大米产量由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的三千四百一十万吨减至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三千二百五十万吨，造成严重的粮荒。为此，印度政

府的糧食部长不得不“带着討飯碗到美国去”乞討。

由于物資匱乏，捐稅繁重，再加上商人囤积居奇等等，造成了物价的飞漲。据印度官方統計，今年六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二月份上升了百分之六点四；与去年同期相比，米价上漲百分之二十五（在加尔各答竟为百分之四十三），砂糖为百分之五十四，布匹为百分之四十，日用品为百分之十至二十。至于零售价格，上漲的比率則更高。据印度全国应用經濟研究委员会估計，本年度物价的上漲有发展到“严重程度”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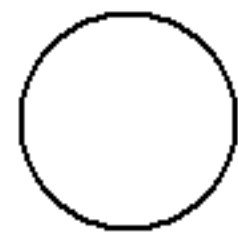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尼赫魯政府可悲地陷在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他企图通过軍事反华来挽救国内的財政經濟危机。而实行軍事反华、扩軍备战、橫征暴斂、大借外債的結果，却是財政赤字空前龐大，外汇拮据，工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物資匱乏，物价高漲，經濟情况更加混乱，大大加深了印度的財政經濟危机。外国报刊說：“印度在国内面临愈来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大有使經濟崩潰之势”。

二、一个大財閥的自白和尼赫魯坚持反华

尽管尼赫魯政府的反动政策，使国内經濟困难重重、險象丛生，然而，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大財閥和大地主，却繼續不断地做着反华、扩軍备战、大发橫財的迷梦。在他們看来，这样做，会給他們带来“丰硕的紅利”。

去年十二月四日，在《印度斯坦时报》上，印度大財閥甘·达·比拉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貪心的財閥，直言不諱地宣揚反华战争的“好处很大”。

比拉說：“战争引起的紧急感对于各方面的活动——不排除教育和科学方面的活



动——有极大的好处。”他说：认为“同中国的战争一定会大大损害印度经济并阻碍它的发展”的看法，“只是陈腐的臆测”。无需解释，在这个大财阀的话里，既有对印度国内财政经济危机的掩饰，又有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的实话。这位大财阀所说的“好处”，只是对大资产阶级的好处，这位大财阀所说的“印度经济”，只是大资本家们的企业。

现在我们继续听这个靠战争发财的大财阀说下去。他说：由于同中国作战，“我们可能要增加许多个师，以便增强我们的武装力量”，这样一来，新增部队的军官、行政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的薪金“显然将造成额外的购买力，导致增加对一切日用品的需求，……然后，我们必须增加在军备、运输、铁路和公路、扩大军需工厂等方面花大量的钱。这一切都需要钢。所以我们必须增加钢产量，建立更多制造资本货物的工厂和制造厂，以便把钢变成各种战争物资、军备、铁路设备、桥梁、卡车甚至是资本货物。”“我们需要弹药，这意味着要扩大爆炸物的生产，也意味着增加化肥的产量。这样，化学工厂就被提上日程。……我们需要降落伞用的布、棉纱和棉花、篷帐等——这就是说，纺织工业需要生产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这就要求增添教育设施。”比拉总括了这一切说，实现了这些，就是实现了印度政府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在计划目标和战争生产的目标之间有密切的

联系。”好了，听了这篇异常精采的新夏洛克的骛麟自白，人们不难了解：印度大资产阶级是多么渴望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扩军备战政策是多么适合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发财愿望。

从扩军备战中，印度的大资产阶级确乎得到了好处。官僚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军事订货的刺激下，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哄抬物价，确实发了横财。

请看看这几个数字：属于官僚资本的军火工业的生产总值本年度将达到十亿卢比，约为上年度的一倍和前年度的两倍。国家垄断资本的国营印度斯坦机床厂，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纯利达二千一百五十万卢比，占其股份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三。塔塔钢铁公司的毛利，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的一亿六千四百五十万卢比，增加到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二亿二千一百万卢比。属于那个比拉财阀的比拉黄麻厂的利润，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的一千六百零三万卢比，增加到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二千零七十三万卢比。达尔米亚水泥公司一九六二年的毛利达一千一百六十万卢比，比上一年增加一倍多。

发反华财的当然不止这些工业资本家，还有大批的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等等，总之是整个印度大资产阶级都沾了光。

作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尼赫鲁政府的官老爷们的双手也没有空着。别的不说，且说最近印度各反对党提出



不信任尼赫鲁政府的动议中，有一条理由就是这个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七月间印度矿业和燃料部部长马拉维亚，因为贪污行为受到揭发，被迫辞职了。据外电透露，尼赫鲁政府的许多内阁官员在贪污舞弊案件中，都有牵连。英国《东方世界》今年九月号，有一篇文章指出：印度国大党头子们也被迫承认，那些在一九四七年还是一贫如洗的人，通过国大党的关系，然后又通过国大党同政府的关系，在十六年时间内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

很明显，尼赫鲁政府执行军事反华、扩军备战的政策，一方面使印度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混乱，一方面使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统治集团利用反华，混水摸鱼，大发横财。这就是尼赫鲁政府为什么在军费激增、外汇拮据的情况下坚持反华而不能自拔的原因。

看来，这种情况证明尼赫鲁现在所走的路子就是旧中国的最后统治者蒋介石所走的路子。旧中国的这个彻头彻尾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服务，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

的蒋介石，从反革命的內战起家追逐战争的利润，沿着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经济独占的轨道，走上了他的绝路。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用各种野蛮的方法，横征暴敛，来搜刮掠夺人民，一方面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主权，以取得外援来屠杀人民。蒋介石要从內战的持续和扩大中追求更大的财富，而他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没有穷尽，他们对内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兴趣也就没有穷尽。蒋介石倒行逆施，穷凶极恶，坏事做尽的结果，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终于被中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过去进行的是反革命內战，尼赫鲁曾经进行而且现在还在准备的是对外扩张，是反华的边界武装冲突，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共同的地方，是他们所进行的或者策划进行的战争的性质都是反动的，他们都企图通过进行战争或准备进行战争，来追逐高额利润，来投降美帝国主义，来维护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对广大人民的反动统治。可以断定，只要尼赫鲁沿着蒋介石这条道路走下去，其结果也一定要走到同蒋介石一样的下场，这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

三、印度反动派不顾印度人民的死活

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发横财相对照，印度各阶层人民包括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都已普遍下降，广大工农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是尼赫鲁政府不顾印度人民的死活，在“紧

急状态”的借口下，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掠夺和压榨的结果。

日本出版的《日本的动向》半月刊写道，现在印度全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人口陷于近乎饥饿的生活状态”。在直线上升的生活费用、各种名目的剥削、繁重的劳动和失业等几方面的夹击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达到惊人的程度。由于许多企业停工减产，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使失业工人的数目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纺织业危机就有十五万工人被解雇；而因尼赫鲁政府实行搜刮民膏的“黄金管制条例”一项，就使全国五十万金匠丧失生计。据印度报纸记载，目前有四万失业者靠“卖血糊口”；被迫走投无路因而自杀的金匠，到六月止，达到一百六十人之多。在业工人的生活与失业工人比较，只能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差。生活费用因物价飞涨而大大增长，“紧急状态”以来，工人们又要经常为资本家加班加点，而工资并未提高。据印度劳工调查研究所今年四月报告，在北方邦坎普尔城的麻、毛、棉和皮革厂中，平均有百分之六十五点四的工人负债。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自七月份开始实行的“强制储蓄计划”，无异是火上加油。据印度官方估计，除铁路工人之外，受这一计划影响的工人，占全国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七到三十。

失业、饥饿、苛捐杂税，风雨交加地袭击着工人，城市无产者实际上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星期日报纸《人民报》，根据英国记者团的考察报告，发表了一篇关于加尔各答贫民生活的附有插图报道。据记者们的直接观察和调查，这个有六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有二十万人露

宿街头，有七十万人住在肮脏不堪的贫民窟里；这个城市还有一万九千个乞丐，三十万麻疯病患者，六十万肺病患者，有一百多万人在饥饿边缘上挣扎。报道继续说：“最使人痛心的是，加尔各答的将近一半儿童挨饿。”作者说，你可以看到小孩子们“胀得鼓鼓的饥饿的肚子和可怜的骨瘦如柴的四肢。”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人间地狱的图画啊！尼赫鲁统治印度十六年来，给印度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美好前途”，原来就是这样的。

印度农民的生活更为悲惨。在农村中，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更多。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度新增加的捐税，有很大一部分是落在农民头上的。如各邦土地税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至百分之五十不等；中央与各邦巧立名目的各种新税每人平均分摊到十卢比；灌溉税和土地改良税都已提高。据印度报纸说，不久还将把“强制储蓄计划”推广到农村施行，规定凡每年缴纳土地税超过五卢比者，须另缴相当于税额半数的钱作为“储蓄”。据估计，此项“储蓄”总数可达四亿二千五百万卢比。负担是这样重，又加上农业减产，结果弄得农村凋零，农民生活异常困苦。印度的《闪电》周报说：一九四三年饿死三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阴影已笼罩着广大农村。现在，有两千多万人的拉贾斯坦邦已正式宣布为“缺粮邦”；有三千四百九十多万人的西孟加拉估计缺粮二百二十万吨，据印报报道，该邦农村已数月未见米粒，每天一餐麦糊尚难保证，死于饥饿者日见增多，成千上



万农民外出逃荒，有的妇女靠卖身换粮，连小土地所有者也因缺粮而纷纷出卖土地。而在比哈尔邦的某些农村，农民已经是用树皮草根充饥，甚至“不顾死活吃有毒的野果”。印度报纸承认，今天印度农民的生活，已降至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现在，连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也愈来愈感到难以度日了。他们是政府增税计划的主要牺牲者，也是募集“国防基金”、“黄金公债”、“强制储蓄”的重要对象。自去年宣布“紧急状态”以来，他们的负担不断加重。有许多人还受到停薪的威胁，比如比哈尔邦政府的四百名雇员，今年已经有五个月没领到薪水。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手头拮据。因为按照新的所得税条例，每年收入五千卢比的人，由原来纳税四十二卢比，增加到二百四十二卢比，再加上强制储蓄一百四十八卢比和附加税三十卢比，共达四百二十卢比，相当于过去税负的十倍！据今年八月英国《经济学家》刊载的一篇题为《印度国内动荡不安》的文章说：“高税和高价”，“这两个问题严重地打击了工厂及都市中受

薪的一般中产阶级”。这篇文章说：“本来每年收入二百二十五英镑的人，才要缴交所得税，但是，新计划规定，收入只要达到上述数字的一半以上就要缴交。说得清楚一点，这意思是说，除非你已把你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拿出来保寿险或作养老金，不然从上个月开始你会发现你的薪津袋轻了一点，有百分之三的薪水被拿去作‘强制储蓄’，等五年后始予归还。”有人说：他们的收入中不小的一部分是“拿米养政府的”。

现在，在印度，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为一方，以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阶级对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尖锐。有人描写道：“在豪华的旅馆和饭店门口，衣衫褴褛的乞丐伸着哀求的像爪子似的手等着，而里面，一瓶法国香槟酒或苏格兰威士忌要卖七个半英镑。”印度《闪电》周报在本年六月发表的一篇长文中说：“我们看到了富人变得更富——不仅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变得更富而且正是由于紧急状态而变得更富——的惊人情景”，“激烈的阶级仇恨正在积聚起来”。

四、印度人民的斗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

还是那家《闪电》周报的同一篇文章说，印度政府“凭一纸空文的诺言来维持民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对于用自己的劳力、汗水、眼泪和痛苦换来的只是增添黑心的大企业的更大的财富的人们来说”，空洞的许愿、

骗人的谎言“再激不起他们的情来了。”真正一点也不错。面对着残酷的榨取、沉重的捐税、飞涨着的物价和凶暴的政治迫害，人民已被逼到绝路，不得不奋起为反饥饿、要活命而斗争。上述文章的作者怀着恐惧的心



情，以带有絕望的声調惊呼：“雷声在震响，危机和人心的沮丧像烏云一样压在我們的国土上空。”

人民反抗的風暴起来了。首先是受害最深的工人們，不顾尼赫魯政府的反动禁令，紛紛举行罢工、集会、靜坐示威，进行反对物价高漲，反对“强制儲蓄”，反对“紧急状态”，要求增加工資等斗争。罢工在各个方面此起彼伏地进行着，而且有許多发生在炸药、軍服、电力、石油、港口等部門；罢工的規模越来越大，参加者多至数千数万人。

在这一片罢工浪潮中，印度各地金匠反对“黄金管制条例”的斗争，很为突出。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尼赫魯政府实行“黄金管制条例”，千百万金匠被剝夺了生計，弄得走投无路，所以他們的斗争情緒特別激烈。全国五十多万金匠多次分別举行游行集会。在旁遮普邦一地曾有数千名示威金匠包圍了該邦财政部长的汽车；在古加拉特邦一地五千多首飾工人曾举行絕食抗議；在加尔各答的金匠和珠宝匠曾集会哀悼因失业而自杀的金匠；今年七月底，全印金匠工会还号召全国金匠发动“不合作运动”，消极抵抗“黄金管制条例”。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約有四千名金匠到尼赫魯的府邸外面示威。

最近，在孟买市爆发了一个大罢工的事件。罢工首先由孟买三万市政工人发动。市政工人們为了抗議印度政府征收重稅、物价上漲和“强制儲蓄計劃”，要求增加物价津貼

百分之二十五，从八月十一日午夜开始举行不定期罢工。五天之后，即十六日午夜孟买电力和运输业二万三千名工人，为支持市政工人的斗争也宣布罢工。一个星期后，这座城市的其他国营公司的工人和一些大旅館的工人也卷入罢工浪潮，大部分廚师、服务员、职员和清洁工都上街罢工，声援市政工人，据估計参加者約有十万人。接着又有一万二千碼頭工人停止工作，支持市政工人的斗争。到了八月二十日，工人罢工达到高潮。据英国路透社电，全市有一百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結果使得“孟买港口的航运完全停頓了。在城内运输工作也停止了”。全市陷于瘫痪状态。

在这期間，印度反动政府对工人采取了一系列殘暴的镇压手段：逮捕了近千名工会领导人和罢工工人；警察“襲击了这个城市各地和郊区的市政工人住宅”；孟买市政府“向罢工工人发出限期复工不然就要被解雇的最后通牒”；发动全市警察守卫政府机构和交通要道；等等。在反动政府的高压下，孟买工人坚持十天的罢工于二十一日上午停止。

这里要提一下，叛徒丹吉在这次罢工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公然反对工人群众要活命的罢工斗争，要工人等待他去同印度政府和資本家开会商量，以便成立“平价商店”和“合作社”等等。这真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墮落到极点了的一个例子。挂着共产党招牌的这个丹吉，連工人爭取生存权利的罢工斗



爭都要反对，都不允許，而只允許他自己这个背叛、出卖了工人階級利益的壟断資產階級的奴才，去向反动政府和大官僚資本家乞求恩惠和施舍。丹吉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还不清楚嗎？

不論是尼赫魯政府的鎮压也罷，修正主義叛徒的破坏也罷，工人們为活命而进行的斗争，是无法制止的。印度的一家报刊《自由新聞》就这样写道：“在工人中間出現了一种新的战斗精神，它是自紧急状态开始以来未曾見过的。人們不再认为罢工是反社会的了，不管有沒有保卫印度法。至少我們已經在孟买碼頭看到一次大規模的罢工。另外，有可能在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工业地区出現更多的罢工。”这个报纸承认：“工人們對我們最近的一些政策是如此憤怒”，“印度的劳工今天处于一种近似革命的心理状态”。

工人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受到尼赫魯政府反动政策危害的还有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破坏、粮食歉收、賦稅增重、迫害加强的凄風苦雨的生活条件下，印度农民也感到难以为生了。日本广播协会記者报道說：“我最近到新德里附近的农村时，听到了对尼赫魯总理的强烈的批判和对执政党国大党的强烈的不信任的呼声”。这位記者“感到意外”，但是他肯定对“尼赫魯总理操纵的国大党，产生了强烈的批判，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英国《泰晤士报》五月二十九日刊载該報記者从新德里写的一篇报道說：尼赫魯政府的政策“在乡村中引起很大的憤慨”。日益增长的积

聚起来的憤慨情緒，必然轉化为反抗行动。据印度报纸的零星透露，今年以来，在印度一些地方曾发生过憤怒的农民反对政府征用土地的斗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北方邦的二十多个村庄的五千多农民，四月間曾为此到尼赫魯住所前举行靜坐示威。外电报道說，今年六月間，在阿薩姆邦首府西隆以南的三个山区县，有当地的部族农民举行武装反抗。

印度的知識界的严重不滿情緒，也在增长。青年学生，一方面受到經濟动蕩、物价高漲的影响，高昂的學費、書費、公共汽車票價使他們的求學受到威胁，于是他們发动了許多次要求降低这些費用价格的罢課請願活动。另一方面，他們不滿尼赫魯政府压榨国内人民的政策，同情工人农民的悲惨遭遇，他們还多次地参加了工农群众的反饥饿的斗争。特别是在尼赫魯政府借口反华，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結，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让“美国之音”在印度轉播的合同，和印美英“空防”协定之后，青年学生更是群情激憤。在新德里，青年們游行至尼赫魯官邸示威；在加尔各答，学生們向邦議會递交了抗議书。广大知識界的上层人士也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一种对現狀和前途的不滿和忧虑攪住了他們，促使他們站出來說話，表示不同意尼赫魯的某些内外政策措施。在这种形势下，甚至那个一向支持尼赫魯的、被称为“活甘地”的所謂献地运动的領袖巴維，最近也公开表示反对“印度保卫法”和繼續監禁印共



党员，說“印度最大的敌人是贫困而不是中国”，說“如果我们进口美国粮食、美国武器，以致靠美国人出主意来解决我们的問題，那我们的独立还剩下些什么呢？”

由于受到国内壟断資本的排挤和美国資本的威胁，加上高稅收、高物价的打击，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愈来愈不滿。

面临着人民反抗斗争的兴起和高漲，印度的統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尖銳化起来，呈现出—幅“山雨欲来風滿楼”的图景。我們記得，尼赫魯在制造反华事件后，曾吹嘘全国的“团结—致”，直到七月份，他还在那里硬說什么“印度全国空前的異乎寻常的团结—致”，“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忘記了无聊的爭吵”。可是，无情的事实却是那些“无聊的爭吵”不仅沒有“忘記”，反而加剧了。目前，整个統治集团四分五裂。在西方記者的笔下，今天的尼赫魯政府是一条“无人掌舵”，“正在下沉的船”。

印度的《經濟周刊》也招认，尼赫魯实行反动政策的結果已使他本人扮演了“自己—手造成的局面中的悲剧角色”。

作为这一句話的注釋的事实是：

五、印度反动派必将彻底破产

摆在尼赫魯面前的就是这样—副烂摊子。怎么办？这个問題折磨得尼赫魯寢食不安，非常头痛。外电报道，近来他在公开場合出現时，都显出“精神恍惚”，倦容十分。

“許多平素自詡为最接近他的人都成了他的最尖銳的批評者”。原来屬于尼赫魯派的許多人物看到大势不妙，正在随風轉舵，紛紛出来反对尼赫魯，弄得尼赫魯众叛亲离，統治失灵。

省邦实力派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大权旁落。本来在印度所有各省邦中—向就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自从去年尼赫魯实行了軍事反华后，各邦当权派借口“紧急状态”，乘机利用职权，打击異己，使派系傾軋更加尖銳。

国大党外的极右翼势力抓住反“紧急状态”、反“保卫印度法令”、反增稅、反强制儲蓄、反貪污等題目，大作文章，掀起倒尼运动。就在八月十三日，印度議會开始辯論据說是“印度下院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泰晤士报》）由反对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議。由于国大党在議會中占压倒多数的議席，不信任案沒有通过，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統治階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不能解决印度国内的階級矛盾，也挽救不了尼赫魯反动統治的破产。現任印度內政部长的南达早已惊呼“国大党已进入危机时期”，“人們看到了国大党被取代的前景”。

这个投入了美帝国主义怀抱，充当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工具的尼赫魯，滿以为掀起—次新的反华浪潮，不仅可以轉移人民視綫，緩和国内危机，而且可以由于反华符合美帝国主



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而討得更多的外援。但是，和过去尼赫魯历次反华結果一样，人民的視綫是轉移不了的，階級矛盾也不能因此緩和。

对于尼赫魯反华的种种手法所包藏的目的，印度人民和印度輿論界已經从几年来的切身体驗中，开始有了認識。

最近一些外国报刊的报道，多少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

西德的德意志新聞社八月二日报道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人們深信：“边界爭端的加剧是为了把人們的視綫从国内政治舞台轉移开。”

七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印度下层階級的一致意見是，印度政府正在牺牲穷人來增强自己的軍事力量。人們普遍認為，政府的政策和防禦措施使穷人变得更穷，而絲毫不去触动有权有势的富人。”

《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八月二十六日的一期說，尼赫魯設法煽起人民的所謂“爱国主义情緒”即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緒，“但是現在人們反应冷淡。”

至于尼赫魯为了乞求更多的美援，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进一步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工具，这种丧权辱国的行徑，正在激起人民的更大觉醒。

虽然印度的輿論界各有不同的背景，各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却不能不日益增多地反映了这种認識。《閃电》周报、《印度时报》、

《自由新聞》、《联系》周刊、《政治家报》等，曾連續发表社論、文章、漫画、讀者投书或致尼赫魯公开信，抨击尼赫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拴在美国政府的宣傳車上”，“美国之音”淹沒了尼赫魯的“不結盟”的濫調，“空中保护伞从后門进来”，使西方国家“想在什么时候进入印度就能进入”，从而“出卖了主权与独立”，“背叛了国家”，“拔掉了不結盟老根子”等等。《閃电》周报曾經說过这样一段話：“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独立用盘子托着奉獻給征服者，也并不是所有征服者都是带着劍的。如果拉丁美洲、西亚、甚至西欧的现代史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話，那就是：在本世紀下半叶，民族独立是以‘对付共产主义的共同防禦’的名义逐步被蚕食掉的。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在这条滑溜易摔的道路上蹣跚而行，卫星国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印度人民开始觉醒了，任凭尼赫魯之流使用什么手段，也蒙蔽不了人民的視綫；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还会更进一步地认清尼赫魯政府的反动面目。

代表印度大資产階級、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利益的尼赫魯政府，在反华烟幕下，对国内人民越是加强鎮压、掠夺和压榨，对外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只会越发加深它的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尽管他还能苟延殘喘一个时期，但終究逃不了彻底破产的結局。



“不发达经济学” 是新殖民主义的“理论”

· 黄展鹏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英、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谈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且把“不发达经济”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称之为“不发达经济学”。

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儼然以“科学研究”的姿态出现，说什么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从近代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是“切合学术研究的目的”的。他们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面孔，为所谓“不发达国家”“寻找”贫困和落后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提出了一些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理论”和“方案”。迄今为止，所谓“不发达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各个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争论，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经济学家们都异口同声地鼓吹以下几个论点：一、“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二、“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已经放弃了剥削和掠夺；三、“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为了协助“不发达国家”取得“独立”。

事情是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呢？我们不妨分别考察一下这些论点。

“不发达经济学”的“专家”们认为，“不发达国家”需要“发达国家”援助，是由于“不发达国家”贫困和落后。他们为“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落后“寻找”出种种的原因，诸如：迅速的人口增长率，外部经济不发达（市场规模小），缺乏经济发展精神，没有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等等；^①而大多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资金。“不发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纽克斯在《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论点，他说，“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储蓄的能力小。实际收入低是生产力低的一种反映，生产力低主要又是由于资本缺乏。资本缺乏是储蓄能力小的结果，这样完全形成了循环关系。”^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唯恐人们不相信“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真实感”，特意作了如下的表白：“我们

① 参见：美国纽克斯：《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形成问题》一书，1953年版；印度辛格：《经济发展的机械力学》，1952年8月号《印度经济评论》。

② 美国纽克斯：《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形成问题》，1953年版。



不希望有人误解，认为我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像模式（指“贫困的恶性循环”——引者注）里所表现的那种情况，或者模式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①乍一看来，这个奇特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术语确实有些费解，但揭穿了，也不难了解，这就是说，“不发达国家”生产力之所以低，“是由于资本缺乏”；“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因为它自身的“经济增长率始终等于零”^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不发达国家”要摆脱贫困和落后，除非依靠外部力量来突破这个恶性循环，否则就很难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将不仅是一种友好的帮助，而且是一种经济上的必要。”^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口中的“发达国家”，当然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

既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说成是医治“不发达国家”贫困和落后的药方，那么，就让我们以智利为例，来检验一下他们所吹嘘的“理论”吧。

据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去年宣布，在最近十七年中，美国为智利提供了六亿五千万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一亿美元的“赠款”和五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去年三月间，以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古德温为首的美国使团到智利访问时，还答应在今后五年内为智利提供四亿七千万美元的新贷款。亲美的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上台以来，对“美援”的依赖愈来愈加深。智利财政部长路易斯·马凯纳承认，一九六二年的全部财政开支的百分之三十将由美国贷款提供资金。美国新

殖民主义者对这个所谓“不发达国家”所下的赌注是颇为可观的。

按照“不发达经济学”的这种“理论”，“不发达国家”一旦接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就可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那么，智利既然接受了美国的“巨额资金”，它是不是变成了经济发达的国家或者已经开始明显地走上了经济发达的道路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智利的经济状况是最有力的回答。

智利自从接受“美援”以来，特别是从亲美的亚历山德里一九五八年执政以来，执行了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它的所谓“稳定经济计划”。所谓“稳定经济计划”，就是要实施冻结工资、压缩就业、货币贬值、削减国内信贷等等措施；这样做，名义上是促进智利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却导致了这个国家工农业生产的萎缩。在美国商品的打击下，智利的民族工业企业的开工率，在一九六二年只相当于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农业的衰退使这个国家每年要付出一亿美元以上的外汇来进口食品。工农业生产的不景气，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在这个只有二百万职工的国家中，失业人数竟达二十万。物价飞涨不已，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事实胜于雄辩。美帝国主义对智利这个“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大量“援助”，并没有突破这个国家的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没有使这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恰恰相

①② 鲍尔和耶梅：《不发达经济》。美国《科学》杂志1959年11月20日。

③ 见瑞士《吉克洛斯》杂志1962年第1期。



反，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促使这个国家更加陷于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的悲惨境地。

在所谓“不发达国家”中，由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经济落后是个事实。在这些国家争得民族独立之后，为了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主要地应当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争取一些外来的经济援助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援助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了消除所谓“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对“发达国家”的“援助”的疑虑，资产阶级学者煞费苦心地为这种“经济援助”涂脂抹粉。他们宣扬帝国主义的“援助”已经放弃剥削和追逐利润，说什么“发达国家”已经“停止对落后地区的剥削，而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政策的目标”；西方国家准备“把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所拿走的一切东西还给非洲”；还说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富国以相当大的款项帮助穷国，这种支出有着明确的开发的目的”，按照美国援外计划“所提供的资金，同私人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帝国主义的投资不能不有所区别”；如此等等。

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援助”吹得天花乱坠，但是，美元源源不断地从“不发达国家”流进殖民者的腰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里，以美国从拉丁美洲攫取高额利润为例，就可以窥见一斑。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去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两年来，拉丁美洲各国从美国政府那里

取得了总数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的贷款。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向美国付出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借款和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的利息和佣金，即实际上，这些国家只得到了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的“援助”。在这期间，美国公司还从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投资中赚取了十六亿美元的利润。这就是说，在这两年内，美国从拉丁美洲国家拿走的美元，要比这些国家从美国那里得到的“美援”多十三倍。这也许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贝耳所说的“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之一吧。

再看看美帝国主义对非洲原料资源的掠夺吧。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四年间，美国从非洲运走了价值七十多亿美元的原料，相当于战前十四年的五倍。目前，美国每年由非洲输入的原料达五至六亿美元。美国把非洲作为它的战略和稀有物资的供应基地。美国研究关于“不发达国家”问题的专家尤金·斯坦莱在《后进国的将来》一书中公然说：“自由世界不能够让自己丧失后进国中的战略物资”。一九五六年，美国从非洲进口的钽占全部进口额的百分之七十九，钶铁矿占百分之七十八，钴占百分之七十六，锰占百分之四十二。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从拉丁美洲攫取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从非洲掠夺大量的原料资源，这能说是殖民者准备“把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所拿走的一切东西还给”“不发达国家”吗？不！这些事实证明，所谓帝国主义已经“停止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已经放弃“追求利润”的“不发达经济学”“理论”完全是一种欺骗。事实也证明，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并没有改



变也不可能改变。连美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对外“援助”是为了追逐利润，为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死掉了的杜勒斯曾公然说过：“美国援助其他国家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否则我们是不给它们任何援助的。”美国负责执行“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更直言不讳地说：“从‘援外’拨款得来的红利，大概是我們至今用钱所赚来的最大的红利。”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厚着脸皮宣传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为了“协助”“不发达国家”取得“独立”。去年，美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汉密尔顿说，“援助计划的目的是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技术，以便他们可以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

如果说这是指经济独立，那显然是一种欺骗。实际上，帝国主义正是通过“经济援助”这一渠道，渗入到“不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操纵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使之成为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萨尔瓦多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提供“援助”的结果，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电力、燃料、港口、铁路等重要经济部门；还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正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哥斯达黎加《前进报》指出的，萨尔瓦多“国家主权已被作为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附属机构借款的抵押品”。

帝国主义既然在经济上要掠夺和控制“不发达国家”，所以，在政治上根本谈不上帮助“不发达国家”取得“独立”，而是相反，必然要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奴役和压迫这

些国家的人民。例如，美国政府给“美援”规定了許多苛刻的条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美国《哈泼斯杂志》主编约翰·费希尔给当时新上任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福勒·汉密尔顿的信中曾经说：“我知道你明白这个道理：美国在援外上每做一件事（或每拒绝做一件事）都是为了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所以我相信，你会在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勒紧这根链条。”肯尼迪在今年四月二日“援外”咨文中公然宣称，“美援”计划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几十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维护自由和希望，防止暴政或进行颠覆活动（应读作：镇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以“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贝耳则更具体地说：“美国一直大力主张在援助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国内改革。”进行什么样的“国内改革”呢？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尼迪政府前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说：受援国应当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应读作：建立一个镇压民族民主斗争的忠实于美国的反动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②。伊朗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五二年，对于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的前首相摩萨台，美国政府以停止“援助”相威胁，并策动颠覆摩萨台政府。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美国又以“援助”支持亲美的萨希迪上台。

美帝国主义向来以援助为钓饵，搜罗一些国家的反动分子，充当美国对这些国家的

① 《纽约时报杂志》1952年2月3日。

② 美国《外交事务》，1961年4月。



人民进行奴役、掠夺和剥削的忠实奴僕。南越的吴庭艳集团，南朝鲜的朴正熙集团，就是在美国的金元和武器的支持下勉强维持他們的搖搖欲墜的反动政权的。用“美援”来反对和顛复不“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的政府，用“美援”来扶植“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的反动政府，这怎么能說是协助“不发达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呢！

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所鼓吹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真实感”，实际上，倒不是所謂“不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沒有能力摆脱贫困和落后，他們的“經濟增长率”也不是天生地“等于零”，这些宣傳都是“沒有絲毫的真实成分”。具有“真实感”的倒是帝国主义的經濟掠夺，造成了殖民地 and 附屬国的贫困和落后。由于接受帝国主义的“經濟援助”，使初步获得独立的国家又重新丧失了独立，原来經濟落后的国家它們的經濟更趋恶化，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化，这就是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被压迫民族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真实感”！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资产階級經濟学家竭力为“經濟援助”所造成的恶果辯解，說什么帝国主义的財政和技术“援助”所以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主要是因为受“援”国家里不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还是那个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些条件除了要有“一个可靠的政府”外，还应当对帝国主义的意旨有一个“明确的看法”，采取一些有利于帝国主义經濟渗透的“正义的措施”，有一个“相当大的受教育的优秀分子集团”^①。在资产階級經濟学家看来，飽尝帝国主义“經濟援助”苦头的“不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不仅不应当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剥削，而且应当迎

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更馴服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綜上所述，不难看出，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在所謂“不发达經濟学”的“学术”外衣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国新殖民主义辯护。这种“不发达經濟学”把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說成是发达地区同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同贫困地区的矛盾，这样一来，階級对抗的矛盾就被抹煞了。“不发达經濟学”还說什么发达地区和富裕地区已經不奴役、掠夺和剥削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而是变成“援助”和被“援助”的合作关系。“不发达經濟学”企图通过这些宣傳，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散播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以遏制他們的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使他們繼續成为、或者重新成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不发达經濟学”实质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經濟学”，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宣傳工具。宣揚这种經濟“理論”的，正如列宁所說的，“不过是资产階級的有学問的帮办”^②。

事物发展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以自己的掠夺和剥削的罪行，充当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面教員，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使人民进一步認識帝国主义真面目，識別“不发达經濟学”等形形色色新殖民主义“理論”的反动实质，使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烽火更加熾烈。

① 美国《外交事务》，1961年4月。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2頁。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

魏文伯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也是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项经常性的根本性的任务。广大农村是社会主义的极重要的思想阵地、政治阵地和经济阵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包括人民公社中的党委和所属支部，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基本纽带，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它必须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并且积极参加农村中可能而且需要实行的科学实验，才能胜利地进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我们华东地区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和全国各地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一样，都是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数次的考验证明，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基层党组织，绝大多数都很好地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作用，都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农村中党的组织反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们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不怕困

难、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传统，在领导群众同一次又一次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群众衷心地拥护它们，称它们是“革命的火车头”、“社会主义的带路人”。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更好地领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必须经常不断地对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清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组织好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团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孤立、分化和瓦解阶级敌人，粉碎他们的进攻；必须坚决执行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问题，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要提高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还有基层组织建设的许多经常工作要



做，如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严密党的組織生活，加强党的基础知識的教育，經常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发揚党的优良傳統和作風，等等。这里不一一叙述，只着重談談提高农村基层党組織战斗力的几个根本問題。

农村的基层党組織，要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首先就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澤东思想，用階級斗爭的观点，将党员、干部武装起来。階級斗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問題。进行以階級斗爭为綱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提高党员、干部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无产階級觉悟的必要途徑。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經常反复教导我們，要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爭，要認識到階級斗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階級的殘余还是存在，資产階級还是存在，小資产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没有結束。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爭，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階級

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①去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又強調地指出：“在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爭。”^②无数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論断。但是，过去我們有許多同志对这个問題是認識不足、理解不深的。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既然农业集体化了，生产資料归集体所有，农村中也就没有什么階級和階級斗爭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农业实现集体化以后，农村中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階級，包括地主、富农在內，虽然他們的剝削手段和压迫手段已經被剝夺了，但是他们仍然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复辟；广大农民虽然已經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他们摆脱小生产者的地位还不久，自发的資本主义傾向对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有些人还会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变成新的資产階級分子；社会上还存在着的資产階級的思想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对集体化的农民仍然在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短期内能够清除的；党和国家机关、經濟組織及其他組織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頁。

② 《紅旗》杂志1962年第19期第4頁。



中，也还会产生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也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总是要阴谋颠覆和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除了要继续在经济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外，还要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从华东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被推翻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牛鬼蛇神，他们并不都是能够接受改造的，其中有一部分人一有机会就纷纷出笼，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们的活动花样很多，有明的、暗的，硬的、软的，无所不用，无孔不入。他们活动的主要锋芒又是和我们争夺干部，争夺农民，争夺下一代，妄图篡夺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权，瓦解农村中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以达到最后复辟的阴谋目的。像扬剧《夺印》的斗争故事，就出在华东地区的江苏省高邮县甘垛公社小耿家生产队。这样的斗争，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所有农村的基层组织，所有党员干部，要永远保持革命的警惕性，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如果我们身在阶级斗争之中，而对阶级斗争这一客观现实不去正视，不去认真考察和思考，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不站起来发动群众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这就无异是在阶级敌人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样，农村的基层组织就将

涣散无力，就要丧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
用，就不能有力地领导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
产斗争，而且就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复辟
的危险。因此，承认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
斗争，是不是去进行阶级斗争，这是一个要
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或失败的根本
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不仅表现为敌我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农村的基层组织中来。这就是说，除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复辟活动外，在农民群众中，在干部党员中，由于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影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阶级敌人可以利用的某些旧的习惯势力和新的社会风尚之间的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表现为阶级斗争以外，还表现为干部群众之间有关经济利益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等矛盾。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严格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因此，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内部、基层组织内部、特别是



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搞好生产。而要教育好农民群众，又首先要教育好党员和干部。

对农村党员、干部来说，一方面，阶级敌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用剥削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来腐蚀和溶化他们，达到打进来、拉出去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彻底改造他们带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加上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有些党员和干部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容易产生阶级斗争观点模糊、优越感、特殊化、贪图安逸、不求上进等毛病。其中有一些人，就有可能经受不住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的袭击，迷失政治方向，丧失阶级立场；有的不坚定分子，就会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教育农村的党员和干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站稳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要教育党员、干部懂得如何分清是非，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会如何团结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等等。

当前，华东各地农村正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教育，旨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发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提高阶级觉悟，自觉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一般的做法是，在学习有关文件报告的基础上，摆出当地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把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活动，各种牛鬼蛇神、歪风邪气都揭露出来，进行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活的阶级斗争教育。有些地方还把揭发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发动群众讨论，让大家来分清是非，弄清问题的性质，划清敌我界限，研究应该接受什么经验教训，等等，以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有些地方还采取请“四老”（老红军、老干部、老贫农、老职工）讲“四史”（革命斗争史、当地和本村变迁史、互助合作史、家庭翻身史），结合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回忆对比等方法，进行生动而又深刻的阶级斗争史的教育。

通过这样的教育，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大大加强了，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了。对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好比是打了一次防疫针，增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一些阶级斗争观念模糊、思想麻痹的党员干部，擦亮了眼睛，认为再不能蒙在鼓里了；一些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党员、干部，自觉地检查自己，清洗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思想灰尘；至于极少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人，经过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评，也是能够接受党的挽救，重新回头的。广大贫农、下中农群众，年纪大一点的，经过教育后，温故知新，决心翻身不忘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年轻人，原来不懂得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剥削和压迫、艰难和困苦是什么味道，现在也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当前还有阶级敌人，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政治积极性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样，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大大加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进一步得到巩固了。

以上说明，经常地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大讲阶级斗争史，好好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确实是无产阶级教育人、改造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关于阶级斗争史，不仅现在要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大讲特讲，而且有必要记录下来，编印成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用这个方法教育我们的青年和后代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永不变色。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不要因为抓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忽视和忘记了阶级斗争；相反地，应该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来推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原来有些同志担心抓了阶级斗争会影响生产，事实恰恰说明，抓了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影响生产，而且会推进生产，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

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

垒作用，还要在一切工作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这就是说，要切实依靠农村中真正可靠的力量，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团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和瓦解阶级敌人。

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问题，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是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早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一开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我们党指导革命、并取得革命胜利的有力的理论和策略武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规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和总方针，领导人民群众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对农村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对中农阶层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其他中农的阶级路线。我们按照这条阶级路线去做，又迅速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这就说明，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贯的阶级路线。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页。



展农业生产，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阶级路线。

可是，现在有些少数基层党组织的同志，由于阶级观念模糊，对于继续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发生某些怀疑和动摇。他们认为：“集体化以后，大家都靠劳动工分吃饭，还分什么贫农和中农，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许多贫农已经上升为中农，生活起了变化，不能再依靠他们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在农业集体化以后，是不是还要继续依靠贫农、下中农呢？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过去深受地主、富农的剥削和压迫，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他们也最深切地感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因此，他们现在也是最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最热爱集体经济、最坚决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同时，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如果我们不依靠他们，那么我们依靠什么人呢？不依靠他们，我们在农村中就要失去最可靠的依靠力量，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阶级敌人就要趁机进行复辟。所以，承认不承认贫农、下中农是我们的依靠力量，承认不承认阶级路线，实际上是一个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感情的問題，是一个阶级觉悟的

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热情地歌颂了贫农的革命积极性，他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①他又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②农业合作化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③只要我們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不能否认党的阶级路线，就不能否认要依靠贫农、下中农。

眼前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江西省丰城县石溪公社有三个毗连的生产队，生产条件大体相同，但是由于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不同，工作和生产却是三个样子。一个生产队生产连年上升，社员生活逐年改善。群众说这是“好蔓结好瓜”。这个生产队九个队委委员有七个阶级觉悟比较高的贫农和两个下中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22、22页。

^③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7页。



农，他們一心一意團結和帶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他們总是白天劳动，晚上办公，生活儉朴，不特殊化；他們实行民主办队，民主理财，各項賬目日清月結，定期公布。在他們的影響下，社員的思想好，風格高，积极劳动，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經濟。另一个生产队，土质、水源条件很好，可是生产連年下降。虽然两个队长都是貧农，可是这个队的領導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个有严重的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手里。这个富裕中农大量貪污盜竊集体財物，并拉队长下水。社員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一个生产队，队的領導权被名义上为富裕中农实际上为漏网地主的階級敌人篡夺去了，生产一直走下坡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貧农受到打击。这三个生产队的三种不同情况，說明了正确貫徹执行党的階級路綫，建立貧农、下中农的优势，是多么重要！

是不是貧农、下中农在集体化以后生活上，就不能依靠了呢？不。集体化以后，貧农、下中农生活逐步改善，这正是集体經濟优越性的表現，是一种好現象。今天广大貧农、下中农生活的改善，是由于所有制的改变和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的結果。如果我們不断地加强思想教育，生活的改善，只会使他們更加热爱集体經濟，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們的社会主义觉悟只会越来越高，他們的集体主义思想只会越来越增强。毛澤东同志在合作化运动中，就曾經批評了认为土地改革要依靠貧农，合作化不需要依

靠他們的錯誤观点，指出：“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階級的广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將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階級，是比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觉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①当然，也有极少数貧农、下中农，由于受了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加之我們教育不够，以致階級界限不清，階級感情淡薄。但是，只要我們重新加强对他們进行階級教育，他們一般都能迅速觉悟过来的。所以，問題的实质是我們加强对他們的教育的問題，而不是一个能不能依靠他們的問題。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階級斗争要依靠貧农、下中农，生产斗争可以不必依靠貧农、下中农，說什么“斗争要走階級路綫，生产要走劳力路綫”，“土改靠貧农，生产靠中农”。显然，这种看法是非常錯誤的。这些同志不了解，貧农、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多数，一向是农村中的主要生产力。在土地改革以前，由于他們遭受剝削和压迫最深，劳动所

①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农占优势轉变为貧农占优势的》按語。《中國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858頁。



得的大部分被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剥削和掠夺去了。因此，他们生产条件最差，收入少，生活贫困。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生产积极性。集体化以后，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收入增加，政治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了。贫农、下中农这种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高度积极性，是发展集体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些富裕中农虽然生产经验比较丰富，但是他们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不如贫农、下中农坚定，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远不如贫农、下中农高，有的甚至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富裕中农的生产经验，只是个体经营的经验。对于如何搞好集体经济，他们的经验并不如贫农、下中农丰富。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只能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在阶级斗争中是我们坚强的依靠力量，而且在生产上、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也是我们坚强的依靠力量。如果我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依靠贫农、下中农，那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所谓政治上依靠贫农、下中农，也就在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从近几年华东农村的情况来看，哪里的贫农、下中农真正站起来了，形成了阶级优势，哪里的集体生产就搞得热火朝天，哪里的生产就会年年增长，群众生活就会逐年改善。再从全国许多知名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贫农、下中农这一事实来看，也很有力地说明了在生产斗争中同样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

还有的同志认为，贫农、下中农“意见多、

困难多、麻烦多”，把他们看成“包袱”，不愿意和他们接近，不肯倾听他们的意见，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也是不正确的。对这些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肯提意见，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经济、热爱干部的表现，也正说明他们是我們可靠的依靠对象。我们应该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商量，改进我们的工作。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我们应该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带领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决不能不闻不问，更不允许责难他们。贫农、下中农又提意见，又有困难，似乎增加了我们基层干部的“麻烦”，但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正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对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他们要么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混淆了贫农、下中农同其他中农的区别，要么又忽视团结其他中农，团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对于群众中的意见缺乏阶级分析，不去区别是什么人的意见，是代表哪个阶级的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少数人的意见。

我们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①我们党的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其他中农的阶级路线，就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彻底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北京第13版，第38页。



的明确的群众路线。前面说到，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农村中的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是农村中的多数，他们的意见和利益也是代表全体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的。如果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不去依靠他们，就不可能组织一支坚强的革命的阶级队伍，那么，也就不可能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把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在农村中的工作就将寸步难行，就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全体群众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知道，农村中的其他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他们一方面对农业集体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动摇性较大，其中有些人，一有机会就要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劳动者，经过党的教育以后，能够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又必须团结他们。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有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建立贫农、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才能不断克服富裕中农的动摇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保持和巩固同他们的团结。毛泽东同志说：“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①从这里，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地理解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致了。

总之，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有扫除上

述这些思想障碍，提高认识，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坚定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党的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其他中农的阶级路线，正确地领导群众前进。

三

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还要积极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密切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

干部党员能不能按照规定的制度，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考验每个干部党员阶级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放在阶级觉悟最高和劳动最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他们应当是政治上的旗手，生产上的能手，应当力争成为劳动模范。这样，我们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就能和群众建立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群众就会和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他们就能及时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同

^①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按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701页。



时，我們的基层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身作則，就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和激励群众，更好地领导生产，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針、政策和任务。

最近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华东各地农村的基层党組織認真执行了党的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形成了一种新的風尚。現在不仅参加劳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劳动的天数增加了，干硬活的多了。这对提高基层党組織的战斗力和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坚定干部的无产阶级立場，增进干部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使干部又紅又专，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为了使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件大事坚持下去，使之經常化、制度化，巩固和扩大成果，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認識，增强他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解决經常出現的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

干部参加劳动的問題，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上的兴无灭資的問題，是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场大革命，必須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事情很明显，如果要使一个不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真正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員，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立場的干部，这是一场长期的深刻的思想意識上的革命，是一个彻底改造自己的过程。同样，即使对于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來說，

从当干部的第一天起，就自始至终不脱离生产劳动，或者由脱离生产劳动再回到生产劳动中去，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意識上的革命。这是因为，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虽然从小就有劳动的良好习惯，甚至許多人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农民，但是，几千年来剝削阶级輕視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好逸恶劳的思想，也不是对他們沒有影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基层干部近年来滋长了一种錯誤的看法，认为当了干部以后，再同社員一起干活，再下地挑粪，面子就不光彩了，就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了，就“不像一个干部的样子”了。这是一种十分錯誤的思想，必須彻底改变。

的确，好逸恶劳、輕視体力劳动，这是剝削阶级造成的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傳染病。同这种恶习进行斗争，提倡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新風尚，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彻底清除这种恶习，只有在劳动中才能逐渐做到。无论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或者不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都要經常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鍛炼自己，才能不断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場。也只有这样，才能經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驗，不致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反之，如果当上干部以后，一下地就嫌累，一挑粪就嫌脏，久而久之，厌恶劳动，逃避劳动，靠誤工补贴吃饭，一方面在經濟上增加了群众的負担，另一方面表明他在心理上已經产生了以特殊者自居的优越感，思



想感情也就变化了，这样，他同劳动人民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剥削阶级的思想病毒就会在他身上找到易于侵入的创口。至于像不像“干部的样子”这个问题，我们要问：什么是干部的样子呢？干部在搞好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一模一样，这才是干部的真正样子。其实，他们所说的干部样子，并不是我们干部的形象，而是旧社会做官的形象。许多地方的事实说明，干部一参加劳动，群众对干部的看法也就变了。过去，群众批评一些不参加劳动的干部一身是“官气”，当他们参加劳动以后，群众就把他们当成“自家人”，“知心人”，自己的阶级兄弟，觉得是可以亲近的，可以信任的，可以把集体的事业托付给他们的。

妨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另一个思想障碍是，有些干部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参加劳动是“不务正业”，“好处不多”，“得不偿失”。他们把劳动简单地看成是干部多做几个工分、少做几个工分的小事，是很有限的，而不理解它对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有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对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我们决不能作简单的、肤浅的理解。如果从每个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说，的确是有限的。但是，全国干部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集体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就不少了，更重要的是，干部参加劳动后，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情

就舒畅，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他们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不又是无限的吗？同时，还要进一步了解，有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条，他们就能够集体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取得生产斗争的感性知识，学会生产斗争的真正本领；他们就能通过种试验田，搞农业生产的科学实验，和老农、科学技术人员一道，摸索农业生产斗争的客观规律；他们也就能够在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活动中，及时掌握阶级动向和群众思想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领导好。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①这就是说，干部参加劳动以后，得到的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是取得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知识和经验，是又红又专，失掉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毛病，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是蜕化变质的危险，这难道能说叫作“不务正业”、“好处不多”、“得不偿失”吗？

在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上，如果片面地强调工作忙，工作和劳动有矛盾，不愿意按规定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思想问题，要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3页。

朱



首先提高思想認識，解決思想問題。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也要承認確實有一個工作與勞動的結合和安排問題。我們不能把勞動和工作對立起來，只管工作，不管勞動；但是也不能只管勞動，不管工作，把工作撇在一邊。因為我們是幹部，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做到勞動好，又要做到工作好，工作、勞動兩不誤。如果只管勞動，不管工作，走上另一極端，那麼我們和普通社員又有什麼兩樣呢？因此，我們農村黨的基層組織，要善於組織和安排幹部的勞動和工作問題，並經常總結這方面的經驗，使幹部參加勞動經常化、持久化，同時又把工作做好。

* * *

要進一步提高農村的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要切实解決上述有關提高農村的基層黨組織戰鬥力的若干根本問題，縣以上各級黨組織、尤其是直接領導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縣委，負有極其重要的責任。縣委以上各級黨組織要經常幫助公社黨委和支部了解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分析各階級的動態，把敵對階級的各种活動集中起來，對群眾進行教育，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教育的成果。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每年都要利用農閒時間集中地搞一兩次。縣委以上各級黨委還要經常深入檢查基層黨組織貫徹執行黨在农村的階級路線的情況，了解貧農、下中農階級隊伍的情況，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和他們交知心朋友。對於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問題，縣以上

領導機關要為基層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創造必要的條件，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會議、報表，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勞動；同時，縣以上機關的幹部，尤其是領導同志，要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規定，帶頭下鄉去參加勞動，並在勞動中和基層幹部一道，幫助基層幹部解決工作與勞動的安排問題。縣委以上各級黨組織這樣做了，公社黨委和支部也就會跟着做。

加強對黨員幹部和群眾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在一切工作中貫徹執行黨在农村的階級路線，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等問題，是關係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經濟工作上的幾項基本建設，也是我們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我們所有的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必須在上級黨委的領導和幫助下，依靠全體黨員，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全體勞動群眾，全心全意，一心一德，認真地、堅持不懈地解決這些問題。隨着這些問題的不斷解決，我們農村的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必將進一步提高，更加成為農村中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堅強堡壘。這樣，我們農村的基層黨組織也就能夠更好地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在總路線偉大紅旗的指引下，不斷取得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偉大勝利，為把我國建設成為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红旗

HONGQI

19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九期 ★

目 录

社論：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周年……………(1)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5)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7)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9)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蜕化为资本主义經濟…………… (12)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16)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別动队…………… (18)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21)

中共对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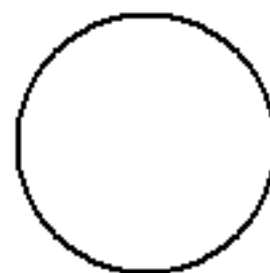
是铁托“勾銷了錯誤”，还是赫魯曉夫以铁托为师呢？…………… (24)

簡短的結語…………… (26)

收获时节訪小平易公社…………… 吳 象 張长珍 姚文錦 (27)

关于发现問題和分析研究…………… 严中平 (34)

☆ 十月一日出版 ☆



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周年

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經走过了十四个不平凡的年头。十四年中，任何艰难險阻，都沒有擋住中国人民的英雄步伐。敌人指望我們失敗的預言，一个一个地破灭了。我国人民在旧中国的破烂不堪的地基上，正在建設宏偉的社会主义大厦。

現在，我国人民在克服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严重困难之后，工农业生产在繼續稳步上升，商品供应量在不断增加，人民的生活在逐步改善。我国的經濟情况一年比一年好，整个国民經济已經出現全面好轉的局面。乡村、城市，都出現了一片兴旺的新景象。

我国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同时，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高举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努力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加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結，坚决地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斗争，并且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偉大的苏联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对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莫不兴高采烈。

他們說：“中国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它的人民的劳动，稳步地、耐心地、坚定地向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前进”。

他們說：“社会主义的确改变了中国，吸引了群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偉大的中国人民沿着他們所选择的道路前进。”

他們高兴的是：“中国的主题歌不再是克服灾害了，而是一个重新前进的越来越嘹亮的交响乐。”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偉大的苏联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都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



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他們說：中国人民“希望和平。但是，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不是光凭禱告和請求就能保卫住的。今天的中国就是靠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才得以进行建設的。”

他們駁斥那些誣蔑中国好战的人說：“我們根本不认为中国是好战的。”

他們說：“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可能怀有侵略意图，而且中国是一个有广大資源的国家，它在忙于开发这些資源。”

他們說：“人民中国真誠信守和平的原則，并且确实具有同怀着同样的和平意願并准备表现出亲善和理智的所有邻国友好相处的願望”。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偉大的苏联人民，一切愛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对于中国人民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給予了很高的評价。

他們說：“中国人民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历史意义的教导，对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被压迫者表現忠誠和抱有信心。”

他們說：中国人民是真正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道义上支持，也从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是被压迫人民的朋友。”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于我們党、对于我国人民的一种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們衷心感謝全世界一切同志們和朋友們的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必将推动我国人民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去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更加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更加忠实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同时，也将使我国人民更加謙虛謹慎，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們的团結，以增强全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民族独立和爭取社会主义的力量，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各国反动派。

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所取得的每一項重大胜利，都是中国人民貫徹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綫和政策的結果，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結果，都是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蓬勃发展，增强着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



爭有利，对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利，对保卫世界和平有利。因此，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争取进步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各国反动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感到恼火而肆意进行诬蔑和诅咒，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曾经看到，帝国主义的统治人物，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印度反动派尼赫鲁，叛徒铁托集团，在这方面做得特别起劲。他们都曾经不断地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当我们连续三年遭受到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更是幸灾乐祸。甚至在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以后，他们仍然胡说我国在遭受着“经济衰退”。但是，铁的事实，对于那些颠倒黑白的说谎者，是毫不留情的，在事实面前，说谎者完全破产了。现在，甚至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评论家，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关于‘中国越来越走下坡路’的说法”，“完全被推翻了”。

目前，出现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现象是，由美帝国主义者担任领唱的反华大合唱的成员中，又增加了一些新伙伴。有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也在学着美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故意抹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无视我国经济全面好转的事实，他们硬说，中国“目前正在经济后退”，中国经济情况的好转“现实没有给予任何依据”，说什么中国人民只喝大锅清水汤，没有裤子穿，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和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攻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现象，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了。当俄国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就曾经不断地诬蔑和否定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他们嘲笑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幻想”，是“投机的把戏”；他们多次宣称“集体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当时，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有苏联的右派反党集团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们都和帝国主义者唱着一个调子，也大肆攻击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正确政策，硬说苏共中央的政策已使国家濒于灭亡，硬说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灭亡。结果，这些可怜虫的预言都成了历史笑柄。现代修正主义者这样狂热地希望中国经济垮台，看来，他们也想当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式的预言家。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歪曲和诬蔑中国的经济情况的同时，最得意的是嘲笑中国人民很穷，因此就看不起中国人民。的确，中国一直到今天，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很落后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就说过：“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



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①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信心，有志气，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经过长期的斗争，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决不会向帝国主义和其他什么人乞讨过活，而且完全有信心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过愈来愈好的生活。

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地、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坚决地主张保卫世界和平，提出并且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地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了他们的美帝国主义的投降政策，扯下了他们披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使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变得日益困难了。

在一九一八年，列宁曾经批判叛徒考茨基说：“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因为我国在四年大破坏的战争之后有贫农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而加以嘲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②现代修正主义者学着考茨基的样子，对于我国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一度造成的困难，幸灾乐祸地进行嘲笑。可以说，列宁的这段话也恰恰适用于这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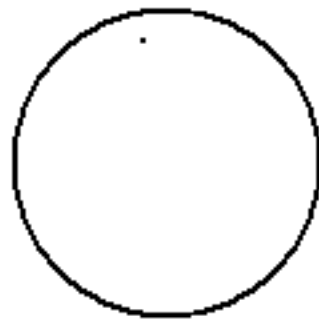
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将要继续证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内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正在意气昂扬地走着社会主义这条伟大的道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日益繁荣富强！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① 《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这个問題，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問題，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問題，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認識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問題，苏共领导同我們，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魯曉夫同志最近訪問南斯拉夫，发表了許多講話，把过去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們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魯曉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談革命”，而是“具体建設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貢獻”，很值得赫魯曉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魯曉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們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魯曉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說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間在若干原則性的意識形态問題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現在赫魯曉夫对铁托集团說，“我們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論为指南”，都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魯曉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声明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說：“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

声明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賴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

声明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結的活动”。

声明說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說：“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們說得出口！

請問：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現代修正主义“理論”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結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这真是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魯曉夫同志說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說，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場是“不正确的”。赫魯曉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



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①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②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地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③

所有这些都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① 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1954年3月号。

② 1961年12月8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③ 1961年12月6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濫

我們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在那里也已經沒有資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泛濫，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个体經濟，小生产者經濟，每时每日常产生資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經指出，“列宁說，只要产生資本家和資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經濟在国内还占优势，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險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談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頁。）

铁托集团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馳的路綫。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經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組織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沒有触动富农經濟。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棄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縮減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縮減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农村，是个体經濟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說，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們恶毒地咒罵“集体化和剝夺是一回事”，^① 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貧困”的道路。^② 他們还荒謬地主張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③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賃，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廢除农产品的計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貿易，鼓励农村資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資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濫，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資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馬尔承认：

^① 卡德尔：1959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詞。

^②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③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問題》。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1954年第4期。



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① 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②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③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

①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1962年第5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② 南斯拉夫《指数》杂志，1962年第2期。

③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货币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們遭受重重剝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說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剝削階級占据着統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辯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說，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經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連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說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場”和“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組織。然而，所謂“农場”，实质上是資本主义农場。所謂“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資本主义經濟組織。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經濟的发展。

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問題》一书中說：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們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們絲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說它們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說在发展和帮助資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給予“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壟断权。这种所謂“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漲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剝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銷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簽訂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場”，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剝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統計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經常受到最粗暴的剝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們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見，这些所謂“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組織，都只不过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組織。

剝夺貧苦农民，发展資本主义农場，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說过：“我們并不放棄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經这样做了。我們必須設法解决这个問題。”

为了走資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規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場”對他們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剝夺貧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資本主义农場。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資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談到小农經濟向大的农业經濟过渡的时候說：“这里两条道路：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資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沒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說：“所謂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經濟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剝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維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結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維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資产階級政府。成立資产階級政府的結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資本家，恢复資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頁。）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資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辯的事实。

我們要质問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够硬說南斯拉夫沒有資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蜕化为資本主义經濟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現在城市私人資本主义和农村資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經濟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經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謂“工人自治”的經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資本主义。这种国家資本主义，不是无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階級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資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資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資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經理在內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資产階級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資产階級，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屬於劳动人民的財產。所謂“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資本統治之下的一种殘酷的剝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規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貿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謂“工人自治”。这种所謂“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給所謂“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場上推銷产品，自己决定工資，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潤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規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賃固定資產。

铁托集团把所謂“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們說，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設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从理論上說，稍有馬克思主义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謂“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論”，同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这一类“理論”，也早已被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駁得体无完肤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无产階級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資料轉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階級，必須把生产資料集中在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維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張把工厂交給“生产者”直接“組織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經严厉地批評这种主張，指出这种主張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階級专政。

列宁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間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們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們削弱或阻撓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維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棄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維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見，所謂“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謂“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騙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資產階級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財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絕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銀行控制全国的信貸，控制各企业的投資基金和流动資金，監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稅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計算，他們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純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們这个官僚集团的揮霍，用于維持它們的反动統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鎮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債和支付外債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納貢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經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經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



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它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①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① 1953年2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①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②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国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① 巴卡里奇：1959年4月7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1959年4月—11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我們要質問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經濟，說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經濟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織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給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約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約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絕大部分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給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財政經濟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統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組織得到的貸款，共計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內，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計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締結了一連串卖国条約。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禦援助协定”的換文規定，美国政府官員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內，对美国軍援物資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視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規定南斯拉夫必須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軍事援助协定”規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禦力量作出最大的貢獻”，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軍隊。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軍事使团，直接監督訓練南斯拉夫軍隊。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經濟合作协定”規定，南斯拉夫必須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員国希腊和土耳其締結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約，規定这三个国家在軍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軍事集团的成員。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簽訂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 (一) 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 (二) 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 (三) 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 (四) 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 (五) 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 (六) 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 (七) 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



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資場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锡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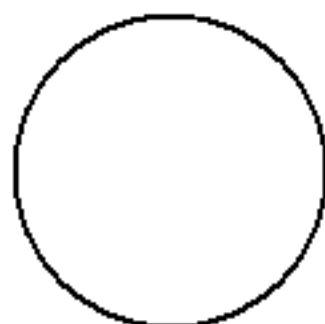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



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們那里是不是沒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階級专政真的沒有了，資产階級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設立了許多法西斯式的監獄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罰，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間的卖国賊。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記者时說，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說得多么好听，他們所謂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資产階級分子內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剝削階級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階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徑。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經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資产階級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經濟命脉，最大限度地剝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資产階級。这个官僚資产階級，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濃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資产階級。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資产階級专政的政权。

我們在上面所說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說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資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屬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破坏，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复辟。当資本主义經濟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資产階級逐步形成以后，他們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資产階級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經濟制度的資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資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資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貴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維持他們在南斯拉夫的統治的。同时，他們还采取种种欺騙手段，来掩盖他們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們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資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淪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屬国，这是違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絕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們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



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們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統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騙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場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們終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絕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說，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沒有产生任何疑問”，又說，現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

不錯，南斯拉夫曾經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魯曉夫創議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們同意，为了爭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們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計到，南斯拉夫领导者們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經走得相当远了，他們可能拒絕爭取，拒絕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現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來說，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損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們的伪善面目”。

我們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絕了我們的爭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絕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树起了一面現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綱領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經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勁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別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經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問題，已經不是爭取他們的問題，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問題。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經作了明确的論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迴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會議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迴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作出的一致結論，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話，为苏共领导的錯誤立場辯解，这完全是枉費心机。

事实证明，我們对铁托集团的立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則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的共同協議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計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們背叛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拋棄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騙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銷了錯誤”，还是赫魯曉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魯曉夫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銷了非常多的錯誤。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錯誤，更說不上什么勾銷錯誤。铁托集团說，要他們改正錯誤，“沒有必要”，“只是浪費時間”，“这純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綱領了呢？沒有。他們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了呢？沒有。他們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沒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會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絲毫沒有改变他們的修正主义的立場。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說，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綱領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組織方面的具体化”。

赫魯曉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錯誤，而是因为赫魯曉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請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赫魯曉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魯曉夫都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說成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魯曉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場。铁托說，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問題”。赫魯曉夫也說，艾森豪威尔“真誠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維護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魯曉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們放棄革命斗争。铁托說，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魯曉夫也說，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們將毁灭自己的諾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魯曉夫都宣揚，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謂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揚“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魯曉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

七、铁托和赫魯曉夫都宣揚“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說，“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魯曉夫說，可以用“議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揚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經濟一体化”。赫魯曉夫也宣揚通过“和平經濟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魯曉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災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魯曉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赫魯曉夫說，苏共已經“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陣营。赫魯曉夫也說，“集团之类的說法是暫时的”。他們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陣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赫魯曉夫無論在对外政策或对內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魯曉夫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撕毀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違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違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傳統的偉大的苏联人民，絕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絕对不会容許这样做。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陣营。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对不会同意赫魯曉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魯曉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烏云。但是，在苏联共产



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騙和蒙蔽的人們終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經证明，并将繼續证明，任何人，要扭轉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只不过是螳臂当車。他們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簡短的結語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訓。

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还存在着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誰战胜誰的斗争，还有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資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政党，不仅在沒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資產階級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資產階級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資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經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貴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規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們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說，社会主义国家已經消除了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說，他們那里已經消除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了，已經建設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却是他們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們已經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險的道路。这使我們十分担忧，也使我們十分痛心。

我們本着热爱偉大的苏联和偉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願意向苏共领导誠懇地呼吁：同志們，朋友們，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收获时节訪小平易公社

吳 象 張长珍 姚文錦

九月上旬，不必在江南，就在晋南盆地，也还是骄阳似火，炎热炙人的时节。而在高寒的雁北，却凉风阵阵，严霜将降，秋收已经开始了。

雁北是雁门关外各县的总称，由于地处内外长城之间，又称塞上。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也是旧中国著名的荒凉、贫瘠之地。“枯草黄沙满目哀”，这一句诗，写尽了过去塞上的景色。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上贪婪的反动统治者的压榨，使雁北的农民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

解放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被推倒了，雁北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站起来了。长期停滞的生产逐渐发展了，人民生活也不断地得到了改善。但是，自然灾害这个凶恶的敌人仍然在威胁着雁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从一九六〇年起，连续三年大旱。俗语说，“大旱不过三年”。第四年，该是好年景了吧。谁知今年只在立夏前后下了一场稍大的雨，就又旱起来了。毗邻的各地，雨水都比较充足，唯独雁北，不见下雨。连续三年遭灾之后，又遇上这种“卡脖子”大旱，秋收将是个什么景象呢？

最近，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情，访问了塞

上朔县的一个人民公社。

这个公社的名字，叫“小平易”。

小平易公社，在朔县城北二十里洪涛山的脚下。全公社共有一万二千多人，六万一千多亩地。二十个自然村，分为十八个生产大队，九十二个生产队。五个大队在平川，十三个大队在山地，但是从人口和土地上来看，平川和山地恰好各占一半。这个公社和雁门关外一般的公社一样，经常受干旱的威胁。北面有几个山口，狂风经常卷着飞沙袭来，这里首当其冲。可是，每逢大雨，山洪暴发，长起的庄稼也会被水冲走。去年这个公社就是遭了旱灾以后，又遭到特大的洪灾的。旧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平复，今年的大旱又带来了新的严酷的考验。小平易公社的灾情大概要比别处更重些吧。

但是，刚从县城出发不久，我们发现沿路的庄稼长得不错，就开始怀疑原来的担心是否多余。越往小平易走，令人鼓舞的丰收景象越是明显，我们的不安，也就越来越被惊喜和兴奋所代替了。看，成熟了的高粱，秆粗穗大，火红一片，黍、糜大部已经割倒，金黄的谷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头，茁壮的玉米长势喜人。耿庄有一块两千亩的大片玉米田，



每亩約一千六百株，百分之三十是双穗。順手掰开一穗来看，顆粒飽滿，閃閃发光。山坡上、田野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緊張地揮舞着镰刀。村边打谷場里，庄稼堆得像一个个小山头。三头大騾馬拉的胶皮大車，滿載着新割下的庄稼又过来了。赶大車的年輕人手里甩着响鞭，嘴里哼着歌儿，更增添了丰收的喜悦气氛。在山区，新修的水平梯田和防風林触目皆是，上泉观、魏家穿的水平梯田已占到耕地一半以上。在平川，安庄一带渠道两旁的楊树已密密成林，纵横相接，逶迤数十里。社員們生龙活虎地收割了一阵，就到渠边树蔭底下喝水、抽烟、歇息。我們也坐下来，問他們年成怎么样。一个性急的青年搶着回答：“反正咱安庄八个生产队，队队都要超包产，到底誰超得多，还要再賽一賽。”說得人們都笑了。一个老汉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却幽默地反問我們：“你們看怎么样？你們見過在災年收成这样好的沒有？”紧接着，他又說：“真是天旱地不旱，災年大丰收，我活了五十多，还是头一遭見哩！”

看到的这些景象，遇到的这些人，完全证明我們原来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了。这些，后来在公社党委書記的談話中，更得到了证实。

公社党委書記岳来秀同志告訴我們：“高級合作社时期的一九五七年，这里粮食总产量是六百零五万斤，虽然亩产还不到百斤，但已經不是单干时期所能比拟的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粮食的产量又提高了。一九六〇年遭了旱災，当时公社成立不久，抗災的能

力还不大，粮食产量也达到六百二十八万多斤，比公社化前还是提高了。一九六一年又遭旱災，产量却上升为七百一十八万多斤。一九六二年是第三个旱災年，庄稼却比上一年长得更好。不料收割之前又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災和两次严重的雹災，产量下降为六百零二万多斤。今年全社計劃产量是七百四十万斤。从現在已經收打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普遍超产。如果收打工作做得更細致一些，超产一成很有希望。这就是說，总产量可能达到八百万斤左右，和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不相上下。所以說，災年大丰收，不是沒有一点根据。”

他笑了笑，又接着說：“丰收不丰收，不能仅仅从产量上去看。我們的产量还不算高，連我們自己都不滿足，增产的潜力还很大，但重要的是战胜了災害。如果在解放前，遇上这样的災年，真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卖儿卖女，討吃要飯。那时，这二十个村，除了平川一两个村以外，几乎村村缺粮。就是在平川的耿庄，三百多戶中，还有一百八十六戶当长工，二十三戶討飯，不少戶卖儿、卖女、卖老婆。山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戶，多是白天穿什么，晚上盖什么，沒有被褥。直到公社化以前，还有上泉观、魏家穿等九个大队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現在呢？全公社社員家家戶戶有穿有盖，許多社員还买了新毯子，穿上了大皮袄。过去这里很少見过的自行車、收音机、馬蹄表、座钟等等物品，現在許多社員家里都用上了。今年，尽管連續四年遭災，却不但不要国家供应一顆粮食，而且有



十六个大队要卖给国家二百五十九万斤粮食。此外，还要储备六十万斤。”

岳来秀同志说起话来缓缓的，显得很平静，好像他说的都是些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往昔的灾难，当前的欢乐，对比如此鲜明，变化如此巨大，我们听了却禁不住心潮滚滚，平静不了。

“为什么灾年能够大丰收呢？”

岳来秀同志思索了一阵，才又缓缓地說：“乍想好像不成问题，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威力嘛！但是，为什么公社有这么大的优越性呢？怎样去发挥它的优越性呢？的确应该好好想一想，有些事情恐怕还得谈到五年以前。”

于是，他和我们在一起，回溯了五年来人民公社同自然灾害的斗争。

要战胜灾害，改变塞上低产的面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抓水。

有水吗？有。雁北地下水不少，地上水也不少。可是，在旧社会活命都不容易，谁还顾得上什么水不水呢？赵家口山里有一股零点二六个流量的河水，长年白白地流走了。但是，发山洪的时候，水一来又是一场灾。一九一九年有个大地主叫李树株，在下游修了一道十二里长的渠，才算有了点水地。李树株专门给水渠起了个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民丰渠”，实际上不过是条“吸血管”。沿渠各村，谁要用水，每亩得给他交米三斗，或者浇水一亩分给他半亩地。这个精于剥削的地主，就靠这条“吸血管”发了大财，刮走了农民四百亩好地。直到土地改革，这些土地

才回到农民手里。可是这里水地面积发展得比较慢，到一九五七年还只有四千亩。合作化使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激发了战胜灾害的斗志，抓水的劲头起来了。沿渠好几个合作社，都向乡里、区里要求延长渠道，扩大水地。水源不足怎么办？修建水库，拦蓄洪水。这种大工程谁家办得了？办不了就联合起来办。他们果真联合起来了，赵家口水库动工了。水库动工不久，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化大大促进了水利建设的发展，水库上前一段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让洪水听咱们的话！”“让旱魔向咱们低头！”这是人民公社发出的战斗号召，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豪言壮语。广大群众的热情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人踊跃报名，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水库工地。山沟里歌声嘹亮，红旗飘扬。苦难的人们受尽了灾害的折磨，如今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同灾害进行斗争了。在那些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啊！依靠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威力，依靠国家的支援和友邻公社的支援，赵家口水库基本上建成了。

但是，战斗并没有完结，而只是开始。

水库西南，有一道高土梁，叫“火石梁”。火石梁两旁横贯着大大小小四道沟。土梁和沟壑挡住了水的去路，不劈开火石梁，填起四道沟，有了水源，水地面积也不能扩大。修库的工程艰巨，开渠的工程更艰巨。修库成功了，开渠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为修成一条输水的渠道，前后战斗了五年，失败



了五次。就这样认输了吗？不。英雄的人民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越困难越顽强，越失败越坚韧。一定要让洪水听咱们的话！一定要让旱魔向咱们低头！为了要赶到洪水前面，第六次战斗提前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社员们豪迈的英雄气概，冒着塞上刺骨的尖寒，在冰天雪地里搏斗。五年的实践，使人们更加深信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威力。多次的挫折又使人们锻炼得更加沉着，更加坚毅。到今年四月，火石梁大渠，终于修通放水，在抗旱斗争中发挥威力了。公社又从各个大队抽调了十一个土专家，组成水利专业队，指导水库和大渠的维护和加固工程。目前，全公社已有八千亩全年无雨保收田，四万六千六百亩一春无雨保种田。明年水地面积还可以继续扩大。

丰收，不会是大自然的恩赐。灾年的丰收，更需要付出双倍的劳动。去年秋天以来，整整旱了一年，也整整抗了一年，越早得厉害，就越抗得起劲。最后谁战胜谁？人民公社战胜了自然灾害！而人民公社之所以胜利，不仅由于它能够充分发挥大集体的力量，而且由于这个力量在五年中逐渐巩固，不断发展，日益加强。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在这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翻了身的中国人民，要靠它再翻一次身，推倒贫穷和落后的大山，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面貌。

人民公社在组织农民抗灾增产的过程中，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农民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在人民公社成立的短短的五年中，小平易这个过去被称为“雁门关外野人家”的地方，不但出现了机器耕地、施用化肥的新事，而且从去年开始，又响起了向电气化进军的号角。占公社人口三分之一的耿庄、安庄、小平易、木寨、张家口等五个大队，已经安上了电灯，有的还用电力代替人工和牲畜磨面。今年七月，正在庄稼吐穗的时候，木寨大队出现了两眼电井。当银练般的地下水在嗒嗒的马达声中涌出地面的时候，扔下饭碗的男人看来，抱着娃娃的女人看来，孙子扶着爷爷看来，媳妇领着婆婆看来。井边赛如赶会，人挤着人。有一个叫池来喜的老汉，一连十来天在井边转，舍不得回去。“老天不下雨，地上能冒水”，老汉说，自己多亏活了八十岁，赶上这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世道。

有了水，有了机器，有了电，可是人们并不满足。像重视抓水一样，公社还很重视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其他增产措施，在耕作制度、耕作技术、作物改组、选用良种、增施肥料等等方面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人民公社在短短的五年之内，靠着它比合作社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已经改变了不少这里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

例如，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是今年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它却经过了扩大——缩小——再扩大的过程。本来玉米是一种普通的作物，产量高，又怕风、怕雹、怕霜，很适宜于雁北种植。可是，由于这里历



史上沒有種植玉米的習慣，單干時期根本推廣不開，合作化時期也只有個別的合作社種植得比較多。公社化以後，才大面積推廣開來。當時因為初種，沒有掌握種植技術，產量並不高。因此，有許多社員不願意種。於是，第二年面積又大大縮小了。以後經過種試驗田，總結豐產經驗，面積才又逐年擴大，由五千畝增到七千畝、九千畝，畝產也由二百三十斤增到二百七十斤、三百斤。現在廣大社員都喜欢玉米，把玉米當作一件寶。為了保持作物之間適當的比例，反而要勸他們不要種得太多了。

廣種薄收，是雁北農業生產的特點，因此耕作非常粗放。這種舊習慣當然也不好改，然而近年來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今年，完全當得起“精耕細作”四個字。往年秋耕不足三分之二，去年秋耕達到百分之百，平川有一萬三千畝地用拖拉機深耕過。一入冬，在“提前消滅春旱”的口號下，又大力開展了耙、耨、壓、碾的保墒活動，有些大隊還進行了復耙復耨，春耕春種很講究質量，大秋作物夏鋤普遍達到三次以上。因此苗全、苗旺、沒草，抗住了乾旱，爭得了豐收。不久以前，公社又利用農事間隙，組織了一次深翻地活動，有近三千名精壯勞動力參加。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幾乎全部參加了。規模之大，干劲之足，質量之高，都是從來沒有過的。公社把這作為改良土壤，實現技術改革的重要項目之一。人挖與機耕、畜耕並重。全公社計劃深翻土地四萬畝，為爭取明年更大的豐收創造條件。

進行農業技術改革，實現農業現代化，在這裡雖然僅僅是個開端。但是小平易公社的農民，正是從這個開端中看到了無限美好的未來。

人民公社在改變低產面貌的同時，也改變了和改變着人們的精神面貌。五年來大大小小的一次又一次的抗災鬥爭，每一次都在農民的心靈深處打下一個依靠公社，依靠集體，同舟共濟，人定勝天，共同富裕的思想烙印。

去年七月，一場久旱之後的暴雨，耿莊遭到了嚴重的水災。遭災後的第二天一清早，來自十個大隊的七百多人趕到了耿莊。有幫助放水的，有幫助撈東西的，有搶修堤壩的。木寨大隊的三輛馬車出動拉糧，安莊大隊的五輛馬車出動拉炭，公社供銷社的六個售貨員帶着衣服和日用品來了，公社醫院的四名醫生帶着很多藥品來了。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耿莊。在這些支援的人群中，來自木寨大隊的人，尤其使耿莊的社員心情激動。在舊社會這兩個處於上下游的村莊，在地主階級的挑唆下，曾發生過數百人的械鬥，結下了“世仇”。直到合作化時期，為爭水還不時鬧点小磨擦。只是在公社化以後，才成了一個大家庭中的兄弟，逐漸互相親密起來。本來木寨也遭災了，但是木寨的社員却說：咱們災輕，先顧耿莊當緊。耿莊的大渠決了三個口子，滾滾奔騰的洪水有使一千畝良田變成溝壑的危險。木寨的社員紛紛放下手裡的營生，趕到耿莊的地界，冒險堵渠排水。

人民公社是由高級社聯合起來的大集



体，比一个一个的高级社具有的更大的优越性，通过这些事例，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集体主义思想的大课堂、活教材，教育了耿庄的人，也教育了全公社的人。耿庄有个名叫王巨的社员，当洪水把他的房子冲毁以后，不吃饭，不喝水，颠三倒四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该怎么办呀？我该怎么办呀？”在旧社会，当王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遭过一场洪灾。那场洪灾虽然只冲走了些粮食、衣服，房子还是好端端的，他父亲就一蹶腿走了口外，扔下他妈和他，讨了半年吃。悲惨的回忆，使他的思想混乱了。但是时代不同了，今天是人民公社的时代，兄弟队的热情的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的伟大力量，使他清醒了过来，坚定了决心。王巨和所有社员一样，握紧了拳头，扛着铁锹、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灾害没有压倒他们，他们却以更团结更坚韧的斗争压倒了灾害。去年七月洪水冲倒的房子，到今年八月就又新盖起八十间。王巨也住到新房子里了。

今年又是大旱，但是耿庄的产量却比特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至少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公社化以后，由于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领导更加深入具体了。由于各村联合成“一大家子”了，农民眼里看的、心里想的，不只是本村的小圈子，而是整个的公社了。这样就给先进经验的交流，互相帮助和支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这个公社有三个增产幅度大的生产大队：耿庄、安庄、上泉观。三家各有独特的经验：耿庄是引洪灌溉、作物改组，安庄是精耕细作、园田化，上泉观是水土保持、造

林防风。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公社树立起这三面旗帜，不断总结他们的经验，组织参观、座谈、推广，使各个大队增产的单项经验，逐步发展为全公社的成套经验。今年春天，推广先进经验又有新的发展。两个最先进的大队主动提出包干帮助两个最落后的大队。这样，帮得更具体，学得也更起劲了。

连年大旱，水贵如油。在推广耿庄、安庄节约用水的经验以后，全公社各个大队的九千多亩高产作物玉米，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今年把七千亩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水来了，一块挨住一块浇，再不像过去那样，你种麦子，我种黍子，你要浇，我不浇，把水浪费在渠道里。春灌时，种植高产作物少的大平易、斗沟等大队，一算账，自己浇十亩，也不如兄弟大队浇上二亩增产多，便把水让给了耿庄、安庄。夏浇莜麦时，耿庄的莜麦地没有木寨多，舍不得把水用于其他作物，便把水让给木寨多浇一天。浇玉米时，木寨的玉米地没有耿庄多，就又把水让给耿庄多浇了一天。元子河大队轮不上浇水了，可是有二百亩一亩能收几亩粮的玉米没有浇过，各大队便公议匀给元子河浇上一天。各个大队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协作，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结果，是共同取得了抗灾增产的胜利。

人民公社的巨大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灾害作斗争，同时还表现在它所实行的管理制度，更完满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有效地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旧习惯势力的侵蚀作斗争。别的不说，只看看这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很清楚了。

公社党委书记岳来秀同志给我们讲了一



段发人深思的故事。一九六〇年遭了旱灾，有两个三百户以上的大队，自然条件并不见得差的祝家庄减产特别严重，自然条件并不见得好的耿庄却大大增产。这个强烈的对比引起了公社党委的注意。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下去调查研究。调查来调查去，原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一个队的干部积极劳动，一个队的干部不怎么积极参加劳动。耿庄二十九名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经常和社员肩并肩、膀挨膀，扑倒身子一块干活。社员们说：“干部跟咱们同甘共苦，心连着心，就是累弯了腰，心里也痛快。”天越旱，他们抗旱的劲头越大，什么抗旱的措施，一条条都能兑现。而祝家庄呢？大队的干部不积极下地，生产队的干部中，有不少人也跟着样子学。干部一脱离劳动，耳也聩了，眼也花了，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了，社员的干劲也受到影响。大旱当头，怎么能不减产？这样一调查，一研究，一对比，给公社党委上了一大课，知道要搞好生产，不仅要同自然灾害作斗争，还要同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倾向作斗争。这是“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比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更要艰巨、复杂，而且是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带有决定性的环节。从一九六一年起，公社党委就紧紧抓住干部参加劳动这一环。果然灵，这像是把钥匙。干部一带头，社员群众在抗灾斗争中就战越强。

小平易公社，现在干部参加劳动已成了风气，这和公社干部带头是分不开的。岳来秀同志兴奋地告诉我们，公社党委是怎样教育和组织干部参加劳动的。他谈得很多，直到夜深了还在谈，就是没有谈他自己的事

情。后来，从公社一些同志那里，从社员群众那里，我们了解到，正是他，从十四岁起就给地主打短工，学会种庄稼的本领。当了公社党委书记，始终不忘庄稼人的本色，走到哪里就劳动到哪里，和群众打成一片，因而受到群众的爱戴和信任。正是他，当去年水淹耿庄的时候，奋不顾身地抢救社员，自己却晕倒在洪水里。在他的示范影响下，公社一级的十三个干部个个力争成为生产上的能手，人人自备铁锹、锄头和镰刀，到哪个队工作就在哪个队和社员一起干活。在他和公社一级干部的示范影响下，全公社一百八十名受补贴的干部，今年头八个月就做了四万三千八百多个劳动日。干部在劳动中扛起了正梁，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就更高了。这样，公社的优越性也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九月十六日，我们辞别了小平易公社。但是，小平易公社的丰收景象，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小平易，小平易，其实，它既不小，也不“平易”。在这个原本十分贫瘠的地方，在风调雨顺的年月中获得丰收，已经会使人们感到惊讶，而在这连遭灾害的一九六三年，竟然获得大丰收，它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像小平易这样重灾丰收的社，在雁北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这些社与其说是增加了粮食，不如说是扭转了历史，使灾年减产的历史变为灾年增产的历史，使塞上低产多灾、生产升降不定的历史，开始变为战胜灾害、生产稳定上升的历史。而且历史的这种发展趋势，随着人民公社的成长，已经是任何力量永远无法阻挡的了。



关于发现問題和分析研究

严 中 平

科学研究的方法問題，必須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在总结专门学科的具体研究經驗中，去寻求解决。本文是我

們几个中国近代經濟史工作者对这个問題的粗淺体会，偏狹片面的地方，可能很多，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对研究对象进行大略的調查研究，发现問題，抓住关键

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选择研究題目。选好了研究題目，就是确定了某种特定的研究对象。人們在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对于自己所选的特定研究对象的認識，大致不外两种情况：或者是朦朧矓矓，只有一个輪廓，至于其中究竟包含什么問題，則不甚了了；或者是头緒紛繁，处处是問題，形不成系統，抓不到关键。这个时候，科学工作者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大略的調查研究，发现問題，抓住关键。

为了发现問題、抓住关键而进行調查研究，包含两方面的工作：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原則方面的研究和特定研究对象的实际知識方面的了解。在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就要求对这两方面进行彻底的研究和了解，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大略的調查研究，却是必要的。所謂大略的調查研究，在理論方面，需要做到基本上能够正确地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理論原則；在实际知識方面，需要掌握基本上能够暴露事物主要矛盾

所必要的那些資料。一般說来，人們对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多，那么，問題提法的正确程度就越大。

大略的調查研究，可以从檢閱前人的研究成果做起。通过前人研究成果去发现問題、寻找关键，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入手方法，而且是一个必須經歷的工作步驟。忽略了这一点，就难免重复前人的劳动，或者重蹈前人的复轍。

檢閱前人有关自己专题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來說，当然首先是指前人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的专题論著而言的。其次，还应该放宽眼界，把中国古代的和外国古代的、近代的有关历史知識也包括在內。

毛澤东同志告誡我們，研究問題忌帶片面性。片面地看問題，“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①。例如，既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1頁。



大山，那么，我們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就不能不了解帝国主义方面的有关历史实际，不能不了解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及其特点。否則，就会形成主观片面性。

注意中国古代的和外国古代的、近代的有关历史实际，还可以从比較研究中得到启发和发现問題。

恩格斯指出过，为了全面地批判资产阶級政治經濟学，“光知道資本主义的生产、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在它之前存在过的或者在发展較差的国度內和它同时存在的那些形式，至少对其主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予以比較。”^①可見，对于我們來說，不論是中国封建社会也好，外国的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也好；都应该列为比較研究的对象。这样說，当然不是要求人們漫无边际地放寬研究范围。至于怎样放寬眼界而又控制得当，只有在研究过程中經過摸索才能解决。

檢閱前人成果的具体方法，可以从分析前人的分歧点和問題的提法入手。

“眞理是由爭論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②。前人爭論中的分歧之点，常常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前人成果中最能启发我們思考的部分。但是，必須看到，前人的分歧之点也可能偏离問題的關鍵，只是在表面的枝节問題上爭論不休。这就会把我們的思想引上錯誤的方向。因此，我們必須批判地檢查前人的爭論焦点，把問題提到更高的理論原則上去考察，另辟蹊徑，发现新的問題，找出新的關鍵。

批判地檢查前人的爭論焦点，首先需要考察前人提出問題的前提和基本观点。前

提和观点常常并不是明白交代出来的，这需从前人論著的精神实质中去寻找。在这方面，我們过去比較容易产生两种傾向。一种傾向，是拘泥于經濟史这門学科的对象范围，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階級力量对比的时代背景，完全排出視野之外，就經濟論經濟，使經濟脱离政治。另一种傾向，是忽略了科学工作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要求，厚古薄今，玩物丧志。从这样的前提和观点出发，自然很难正确地提出問題。

考察前人对問題的提法，还必须找出前人所引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原文来进行核对。在引证經典著作时，我們比較容易发生的偏差是忽略經典作家的立論前提，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等等。这些偏差，一經核对，大致都会暴露出来。

考察前人对問題的提法，还应该注意前人据以立論的史事和史料是否充实可靠。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一再告誡我們，应该进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詳細地占有材料。不論是查勘前人据以立論的史事、史料也好，或者是前人未曾討論而必須自己收集資料从中发现問題也好，都要注意史料是否全面系統及其可靠性、局限性的問題。

为了找到大量的系統而又可靠的資料，必須具备丰富的目录学知識。为此，除去充分利用工具书以外，就只有依靠博覽群书，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頁。

② 1853年9月2日《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7頁。



长期积累的硬工夫了。一个科学工作者需要养成一种习惯，随身携带小本本，经常做个“有心人”，经常有所寻求，逐步积累一套自用的目录索引。这没有什么窍门可说，关键全在一个“勤”字，即脑勤、眼勤、手勤。

鉴定材料的可靠性和局限性，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一个总的原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进行考察。这就是从各个方面去考察形成资料的历史条件，诸凡文献的取材来源、形成经过、读者对象、目的要求，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阶级成份、政治立场、思想面貌、生活经历、治学作风乃至当时的典章制度、传统习惯等等，都会对资料的可靠性和局限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里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阶级立场问题。

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局限性常常不是那么显著突出，一目了然的，而是异常隐晦，需要多方核校、细心推敲才能明确的。例如，一九三二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根据土地册籍估计过全国的耕地面积。后来他们对南昌周围十七个县进行航空测量的结果表明，册籍数字只占测量数字的百分之六十八。这

说明地主阶级为了逃避田赋负担，以多作少，把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都隐匿掉了。可见，不审校、不推敲，人们是很难得知史事的真相的。

大致可以这样说，文献所记事实，越是有损于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本阶级、本集团或个人利益的，则其阶级偏见就越深，可靠程度就越小；文献的流通范围越是狭窄不易泄密的，则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态度，可能就越是比较坦率；资料提供人或编撰人的思想政治作风越是接近人民的，其治学态度越是谨严不苟的，或者当事人记录当时当地亲身经历的，则文献的可靠性就越高，否则，就越低。总之，人们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考察资料的可靠性和局限性。

我们所说的大略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可能把有关材料全面地搜罗无遗，也不可能对史事史料件件都下考订工夫。但是，为了提高问题提法的准确性，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问题提法的材料，必须足够丰富和可靠，这是肯定的。因此，大略的调查研究也必须花费相当大的工夫。

二、追踪历史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揭示历史现象的阶级实质

假定人们已经收集到丰富的准确可靠的资料，应该怎样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正确地发现问题，抓住关键并且找出规律来呢？不言而喻，这就是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实际的问题。以下，只就历史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谈谈我们的一些体会。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

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缓和了，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得到了解决，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①。科学研究的要求，就在于“从这一过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程的一切迷亂中追蹤其依次發展的階段，並且證明其在一切表面偶然性中的內在規律性。”^①（着重點是本文作者加的）因此，人們必須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去進行研究，否則就看不出矛盾的激化、緩和、解決和產生，就抓不住關鍵問題，當然更說不上劃分歷史階段，發現內在規律了。

這裡所說的“依次發展的階段”，可以作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某一事物的歷史過程上先後相承的依次發展階段；另一種理解，是同時並存的某些事物在性質上形成先後相承的依次發展階段。

就前一種意義上說，這裡的“依次發展的階段”，可以意味着整個人類歷史上，先後遞續的、以千百年計的各種獨立的社会經濟形態；可以意味着同一社會形態中，以數年或數十年計的階級鬥爭的發展階段；也可以意味着某種更為短促的發展過程。總之，都是由事物內部矛盾發展變化所形成的某種發展段落。人們為了正確地分析問題，必須從歷史過程的長河中，正確地截取足以成為獨立研究對象的某一時代或某些年份的現象來進行研究。

馬克思曾經指出，“在政治經濟學中，任何時候都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證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證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②馬克思的意思是說，除非長達六、七年的統計材料就不夠暴露危機各階段的全部矛盾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性。上面的說法，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恩格斯和馬克思考察一

八二五年後四次危機的間隔年限所得到的初步結論。到了七十年代恩格斯便根據新的歷史事實修改了這個估計，把六、七年的間隔延長為十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根據一八二五——一八七三年這四十七年間八次危機的歷史，才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我們絲毫無意於說，人們研究任何經濟現象，都必須積累幾十年的材料才能找出規律來。但是，可以肯定說，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僅僅根據一年的材料，總是很難找出規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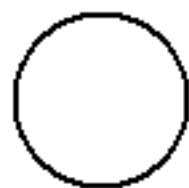
當人們對自己研究對象的內在矛盾和矛盾發展的階段性，還茫無所知的時候，必須採取某種具體辦法去追蹤矛盾的發展歷程，劃分階段，哪怕只是初步的未必怎樣完善的辦法也好。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初步的入手辦法是把歷史現象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起來，描出一幅粗綫條的歷史輪廓來，然後再從現象深入本質，從事物的歷史聯繫中去尋找事物的邏輯聯繫。這可採取兩種辦法，即整理長期統計數字和編寫年表或編年紀要。

就近代經濟史研究來說，長期統計數字乃是科學研究上的基本材料。例如，經濟各部門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對內對外貿易狀況等等長期統計，就是把複雜的經濟現象，概括為簡單的数量概念的基本材料。對這些材料進行科學的加工，製成統計圖表，人們就能把經濟發展趨勢及其中的內在矛盾揭露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頁。

②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0頁。



出来，大大地有助于发现问题和确定历史过程的阶段性。

历史现象中，有许多是难以用统计数字去表现的，这就需要编撰年表或编年纪要。

把历史事件写成编年纪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马克思就写过详细的世界历史事件“编年史”。

在具体工作中，有几个要点值得一提。首先，人们不能随意抓到任何历史事件都拿来编写年表，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去考虑历史事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决定取舍。其次，必须像马克思那样严格地查考史料的准确性和史事的真实经过。第三，应该牢记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简单经过及其主要影响。这是清理历史联系，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推理工夫的思想支撑点，常常很有助于我们“追踪”历史过程中的依次发展阶段。第四，对于那些进步的新生事物要作比较详细的探索，追根究底，明确其产生经过。因为进步的新生事物产生，乃是落后的陈旧事物衰朽灭亡的信号，即使是零星、微弱的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五，抓住历史的转折点或各种矛盾的焦点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经济史上，重要财经制度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转变等等事件，常常形成这样的转折点；而武装斗争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则突出阶级矛盾的焦点。转折点和矛盾的焦点都是历史过程上的“节骨眼儿”的地方，能够集中地、突出地暴露各阶级的真实面貌。从这里，人们往往能够找出在通常状态下不易察觉的那些本质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追踪”历史过程中依次发展阶段的另一种办法，这就是对时间上同时存在而在性质上形成依次发展阶段的那些现象进行研究的办法。

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发现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时存在着进步的新生事物和落后的陈旧事物，以及处在这两极之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过渡形态。例如，在旧中国，人们可以同时看到封建地租中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可以同时看到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三种形态。研究这些现象首要的一步工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些现象的“内部联系”，进行科学的分类归纳，正确地估计各种现象的历史的先进性和历史的落后性，以便据以突出历史过程的发展线索。

让我们向列宁学习。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四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地方自治局的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记录少数年份的“横断面”的现象，而不是前后连续成长时期的“纵剖面”的现象。但是，列宁却巧妙地运用科学的分类方法，突出了历史过程的发展线索。列宁的提法是：农民的“分化”、上等农户土地的“集中”、下等农户土地的“出让”、国内市场的“形成”、工役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产生”、……等等，一句话，列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对“农民分化的静态”^①（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进行了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必然性。

必须指出，我们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1页。



的观点去进行考察，不言而喻地同时意味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进行考察。

对经济史工作者来说，在具体运用阶级分析法去处理实际问题时，有几点值得一提：

首先，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包含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态或其产物。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不仅包括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斗争，而且包括在经济过程本身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在日常生活中，正是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每个农民所交的每一升租谷，每个帮工所做的每一天劳动，每个集市所成交的每一笔交易，等等，概莫能外。

一般说来，封建地租是吸干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按照地主的欲望，他还要尽可能地侵吞农民的必要劳动，多多益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如果认为每个时代的每家地主都能如愿以偿，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有些地主的收租记录证明，某些农民是不交足额定租谷的，所以，他们就被地主诅咒成“顽佃”、“恶佃”等等。所谓“顽”，所谓“恶”，正说明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

其次，必须把阶级斗争的形势当作出发点或前提去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许多文献资料都证明了，在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占领区

内，乃至其周围的边缘地带，农民普遍地少交租谷或根本不交租谷。但是，到了天京失陷以后，许多地主立刻“清租”倒算，有的地主甚至硬逼当时的佃户，代偿久已退佃的前一家佃户的旧欠租谷，或者捏造欠租假账，任意勒索。这些事实说明，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或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农民的声势上升，地主的气焰下降，因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有所削弱；到了地主重新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或在阶级斗争进入低潮时期，地主便又死灰复燃，对农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那种心目中全无国家机器的反作用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企图运用纯经济观点去进行所谓纯经济的分析研究，是要落空的。

第三，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人们常常很难一眼就看穿这种过程的阶级实质。这个时候，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对谁有利？列宁在指导人们辨别各种观点、提議、措施的政治意义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①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一教导也完全适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研究工作。这就是，当人们还看不出某种经济现象的阶级实质时，就应该提出这种现象对谁有利——对哪个阶级有利的問題。从这里去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某种经济现象的阶级实质，会有很大帮助。

三、多次加工，分阶段地总结写作，逐步提高认识水平

全部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过程。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串复杂的连锁。试拿

怎样收集资料工作来说。人们为了做好这项

^① 见《“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工作，首先，必須明確自己的研究需要什么資料的問題；其次，應該明確到哪里去收集資料的問題；再其次，還需要具備鑑定資料價值的本領。而所有這些問題又都包含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例如，為了解答需要什么資料的問題，人們就必須首先明確自己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而如前所說，這却又要首先掌握豐富的資料，足夠暴露事物的主要矛盾。這就無異於說，要靠掌握資料和運用資料去收集資料和鑑定資料，要靠研究問題去提出問題。

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上，人們最有心得、最有領悟的地方，往往正是在自己心目中存在實際問題，並掌握足夠的資料，力求運用經典著作上的理論原則去解決實際問題的那種地方。這就是說，要在運用理論原則的過程中，去體會理論原則，要在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實踐中，去學習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方法。

人們對待科學研究工作不能像對待車間生產那樣，可以按照嚴格的加工程序和操作規程去進行勞動，重複返工，便成浪費。相反的，科學研究中各項工作的相互制約性緊緊地局限着首次“加工”的成熟程度，使得重複返工成了正常的、甚至是經常的事情。當然，科學研究工作也有和車間生產近似的一面。這就是後一階段的工作總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人們必須做好思想準備：每做一項工作，儘管估計其必將重複返工，却還要求其儘量完善。

其次，正由於科學研究中各項工作都緊密地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着，所以，人們就

不該孤立地進行某一項工作，而需要對許多工作統籌兼顧，交叉並進。比方，人們在收集資料時就應該隨時分類排比，隨時加工消化，隨時構思自己的論點，並隨時收集目錄學知識，隨時重溫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上的某些原理，隨時回顧前人論著中的某些分歧，等等。這樣做，工作量是很大的。但科學研究的本性就是這樣的，它要求人們在頭腦中反復綜合各種因素，融會貫通，庶幾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各項工作得以相互發明、相互促進。

科學研究工作的這種特性，要求我們對材料進行多次加工，分階段地總結寫作，逐步地提高認識水平。

所謂多次加工，就是對原始材料進行粗制、再制、三制、四制等多道加工程序的改造製作以至於完成待用“部件”的意思。當問題複雜而原始材料分量龐大或零碎不成系統時，人們是不可能從原始材料一步就寫成科學論著的。例如，利用零碎殘缺的文字記錄來拼湊複雜的歷史過程，就需要一件一件史事地考訂，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考察。首先作成全面研究所必需的各個“部件”，然後再根據這些考訂和考察的結果去逐步拼湊史事經過的全部面貌，進行理論概括。

所謂分階段地總結寫作，就是在工作進行到一定時期，或思想醞釀到一定程度，或資料積累到一定分量，就系統地分析資料、消化資料、清理自己的思想，作一次全面的總結，並把它們寫下來。人們在研究工作的全部進程中，必須有目的、有計劃地劃定總結階段。到了這樣的時機，就必須毫不遲疑

後



地进行这种总结写作。

分阶段地对资料进行整理、消化与总结，清理自己的思想，动笔写下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实行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之一。马克思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把他所读的一切归纳成一定的系统”，“不仅在思考，还要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叙述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曾经为了“自己求理解，而不是为了付印”，写过“许多篇专论形式”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那部著作，也正是为的“自己求理解”^②。

科学研究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这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实践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

通常人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总会对自己的问题逐渐形成某种初步的看法，预想以后达到某种结果。这种看法和预想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通过研究实践去作检验。事实上，人们从事研究的结果，毫无改变地证实初步看法，实现预想结果的事情是很少的，全部否定了的事情也是有的，而绝大多数情况是那些初步看法和预想结果只具有一部分真理性，另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都由于研究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而必须改变提法。我们强调及时地对资料进行整理、消化与总结写作，正是为的及时地进行检验，否定其应该否定的部分，注意发掘实际资料所涌现出来的新问题，锻炼新思想。

在这种锻炼中，人们通过历史过程的具体事实去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就会更加具体、亲切、深刻；同时，人们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驾驭历史过程的具体事实，对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也就提高了敏锐力、洞察力。

我们特别强调阶段总结中“为自己求理解”的写作，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思维活动是无形的。把无形的思维变成有形的文字记录，就会有助于反复推敲，并且写作本身就是强迫自己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逻辑思考的绝好手段。通常人们在理论学习中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地方，经过写作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在历史事实的掌握上，粗枝大叶、若有若无的某些印象，经过写作就会得到澄清；而自己对问题的零星看法，哪些只是无根据的遐想，哪些可能成为抓到关键、值得展开发挥的苗头，也会因通过写作而更加明朗化、系统化。至于在资料取舍上，哪些有较高的价值，哪些根本是废料，哪些还待补充，哪些应该适可而止，通过写作当然也就及时地、更好地得到检验、补充或修正了。

总而言之，分阶段总结，特别是“为自己求理解”所做的写作工作，为下一阶段的资料收集、思想酝酿和理论学习等等工作，奠定了提高的基础。那种不肯进行阶段总结，企图收齐资料然后算总账、“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利于研究工作的。

① 格拉塞：《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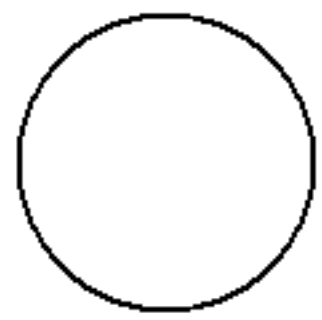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I、IV页。



红旗

HONGQI

20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期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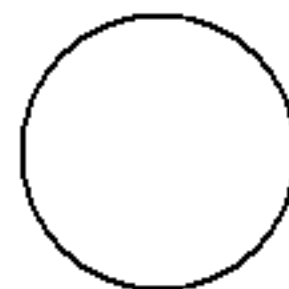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1)
红旗杂志编辑部
-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2)
-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4)
-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6)
-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7)
-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9)
-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10)
-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12)
-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13)
-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15)

“灵活反应”战略——一条紧勒着美帝国主义

- 脖子的绞索 范 地 (17)
- 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 施央千 (28)
-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薄一波 (34)

☆ 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挠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



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留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美国的投資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價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貴产品的购买者”。“金錢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搶走我們的一千块美元，就給我們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謂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絕沒有放棄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統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們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剝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組織軍事集团，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經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等等方式，繼續把这些国家作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应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掠奪这些国家的財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們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对这些国家进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維持对这些国家的統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軍事政变，进行顛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攬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險、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請問苏共領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說消灭殖民主义已經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領導为了給自己的謊言辯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們說，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說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嗎？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論点，并不能給苏共領導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論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剝削”，他們“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經濟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領導力图掩飾的东西。

苏共領導还制造了一个“理論”，說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謂經濟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們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开的”；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絕不是像苏共領導所說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漲，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們国家中的势力，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彻底独立。这



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



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



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远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錯誤观点和錯誤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棄爭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來說，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魯曉夫就曾經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問題，当作是法国的“內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談到阿尔及利亚問題时說：“我考慮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內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見法国《費加罗报》記者时又說：“我們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討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經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給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臉。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說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記在他們的那本所謂“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剛果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剛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剛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贊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軍去剛果的決議，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剛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軍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魯曉夫在致卡薩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說，“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贊揚联合国“帮助剛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剛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贊加去参加在联合国軍“保护”下召开的剛果議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騙說，剛果議会的召开是“年輕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錯誤政策給美帝国主义侵略剛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贊加被拘禁，許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剛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責任嗎？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訓，改变他們的錯誤路綫和



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誣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論”。公开信說,“根据这种理論,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們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壟断資本集团同壟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

我們还指出,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

我們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們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論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們是这样說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統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絕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問題,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問題。”

这些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也都是从現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結論。

誰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



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轉移的。我們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資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臟地区，由于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偉大日子，終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經說过：“极大的世界風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現出来了。”“我們現在正处在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頁。）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說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銳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頁。）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話都說錯了嗎？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显然，当苏共領導一心要貶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碼常識，連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統統不顧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領導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階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領導权問題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論点。公开信說：“中国同志竟想‘糾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小資产階級或民族資产階級，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領導。”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張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須坚持无产階級領導权的时候說，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階級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爭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爭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階級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阶层，組織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一战綫。这个統一战綫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階級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領導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須建立广泛的反帝統一战綫的时候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願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們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資产階級，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資产階級，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

我們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階級的領導权，同时



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則問題。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須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須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結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階級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階級世界革命的結束。他們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服从他們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險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階級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碼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頁。）

斯大林說，“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們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結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們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頁。）

斯大林描繪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嗎？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險嗎？这不会使我們同其他国家发生糾紛嗎？我們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嗎？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沒有危險……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頁。）

斯大林的結論說，“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頁。）

現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們自以为是聪明人，他們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沒有危險的事情”，他們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糾紛，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們迷恋于所謂两个超級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評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話，正好是对現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們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說，“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



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



人民說：“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暫时的虛偽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們还公然說：“問題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們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經過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場。最近，法共领导辯解說，他們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們跟着法国壟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偉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問題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請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們那里哪有一絲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絲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們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場，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駁“种族論”和“黃禍論”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論。他們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場，說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說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見”。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說这种謊話，倒还能够騙一騙人。可惜，这种謊話的制造者們生不逢时，現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說得好：列宁主义已經“拆毀了橫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間的墻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頁。）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墻壁，只能是枉費心机。

当代的民族問題，归根結底，是一个阶级斗争問題，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結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一战綫。这条統一战綫，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問題，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問題。

被压迫民族必須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



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卖“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闹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闹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闹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



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誹謗“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誹謗“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紅軍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須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謠說，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魯曉夫今天誹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語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誹謗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語言。人們很难找到二者之間的区别。

应当說，赫魯曉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殘羹剩飯，喂肥了自己。他們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現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經驗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須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結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須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們的影响。

历史經驗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須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結成紧密的同盟，必須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們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說：“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頁。）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辯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掙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怎样粉飾，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脫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擋的。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是終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灵活反应”战略——一条紧勒着 美帝国主义脖子的绞索

范 地

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采用了一个新的军事战略，即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这个战略的中心思想是所谓“有控制的反应原则”。这个战略要求美国建立能够进行“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的“多样化军事力量”，以便美国“在几种作战计划中，选择最有利的那一级战争”。这个战略在发展尖端武器，进行“核讹诈”，准备最后与它的敌国作决战等方面，同它的前届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基本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这个战略在加强核军备的同时，还积极发展常规兵力。

肯尼迪等人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只强调“原子报复力量”的作用，而忽视常规武力的作用，因此，不能“适应现代复杂的国际局势”，使美国到处失败。而“灵活反应”战略则克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军事战略的“缺点”。这个战略，一方面大力发展核军备，把核力量作为反对它的敌国，控制其“盟国”，支持常规战争和所谓“特种战争”的“王牌”；另一方面，又不忽视常规武力的重要作用。他们妄图采用这个战略对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压倒他们的敌国，并且妄图消

灭或颠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达到独霸全世界的罪恶目的。

肯尼迪及其军事领袖们，对他们的“灵活反应”战略大吹大擂。最早鼓吹这一战略的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灵活反应”战略“既不受任何一种武器系统的拘束，也不受任何一成不变的未来战争概念的拘束”。他又说，这个战略“力主采取一种进取的姿态，以便尽量使战争远离我国海岸。它应使我们的盟国安心，而不是使它们远离”。他认为最得意的是，这个战略能使美国领袖，“在将来历史上某一危急时刻必须决定什么是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适当军事反应时，能有广泛的选择余地”。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军事战略了。

美帝国主义的这个战略，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美妙呢？运用这一战略，是不是真的可以挽救他们走向死亡的命运，实现他们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呢？

不！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之所以必然失败，是由这个战略存在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的。从形式上看，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弥补了前届政府军事战



略的某些“缺点”，但是，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军事战略的矛盾，而且恰恰相反，更进一步加深了那些矛盾。它的命运，决不会比它的前届政府的军事战略的命运更好些。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无论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或常规兵力，都不可能制止各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美国想控制核武器来迫使其“盟国”为它的战略服务，正遭到日益强烈的反抗。同

时，这种既准备“核大战”又发展常规兵力的齐头并进的办法，势必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经济的困难，加深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集团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帝国主义的更大的失败。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肯尼迪的这个“美妙”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一些主要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执行这个战略以来的不美妙的结果。

一、“靠不住”的新“原则”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仍然是进行“核讹诈”，积极准备核战争。在这方面，同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肯尼迪政府为了保存美国的“社会结构”，想只杀死别人而不“自杀”，主张采取所谓“不打城市”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以“先发制人”的办法，突然袭击敌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同时以后备攻击力量威胁对方城市，阻止对方回击，迫使对方谈判，以便“寻求有利条款结束战争”。麦克纳马拉把这个办法说成是：“要给予可能的敌人以可以想像的最强烈的刺激力量，使它不打击我们的城市。”

肯尼迪为了实现“不打城市”的原则，除了积极发展核军备以外，还积极发展反导弹武器，大搞所谓“民防”，修建防御放射微粒的“掩蔽所”。肯尼迪表示，美国将“以最大的速度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反导弹防御的可能性”。

对肯尼迪政府的这个“创造”，美国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人认为并不聪明。美国一些高级将领、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对这个原则

提出了怀疑。他们说，这个原则“是防务问题智囊人物的不现实的创造”。他们自己也承认：（1）美国“不可能消灭”对方的核反击力量，特别是不可能消灭革命的人民。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即使是核战争也不一定是摧毁文明的‘亿万人死亡的战争’”。他今年一月在美国国会秘密作证时承认，即使把美国的力量再增加一倍或两倍，也不可能实现消灭他的敌国和消灭世界革命的罪恶目的。（2）一旦爆发“核大战”，对方不会按照美国的如意算盘“不打城市”。（3）攻击军事目标很难不波及城市。美国的许多军事目标都在城市附近，例如，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德克逊城周围就有十八个大力神导弹发射阵地。

在发展反导弹武器方面，希望更加渺茫。美国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防止导弹的手段。美国军方出版的《星条报》一九六三年一月透露：科学家们认为，美国所寄希望的新型奈基-X反导弹武器的研究、发展、制造和部署完竣，还需要十年的时间。美国的一些军事科学家甚至对反导弹武器能否发展成功及



其作用，表示怀疑。

美帝国主义要大搞所谓“民防”，修建防御放射微粒的“掩蔽所”，也遭到人民群众和某些上层统治者的反对。一九六二年一月，美国二十四个州四千多名妇女在白宫附近集会，反对建立微粒“掩蔽所”。美国大财阀、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曾经提出拨款一亿美元在该州各学校修建“掩蔽所”，由于遭到人民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一九六三年六月初，美国俄勒冈州州议会及该州首府波特兰市市议会，甚至通过决议“取消民防计划”。

同五角大楼有密切联系的美国新闻评论家艾尔索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许多“有思想的人开始对核武器作为国家政策的主要军事工具的价值表示怀疑”。这些人讽刺说：

二、常规战争“决非易事”，而所谓“特种战争”是一场“失望的斗争”

进行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这是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中不同于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肯尼迪及其军事将领们，特别重视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肯尼迪认为，这种战争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而且将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战争，是“冒险性最少的积极手段”。泰勒则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把“原子报复力量”当“宝剑”，把常规武力当“盾牌”；“灵活反应”战略把“原子报复力量”当“盾牌”，而“有限战争力量则成了可以灵活运用——招架、还刺和进攻——的宝剑。因此，这把宝剑的实质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更大的重要性。”

肯尼迪政府为了准备进行常规战争，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常规兵力，并且，迫使其

“鲍勃·麦克纳马拉是近乎天才的人。他的不打城市的理论是要使核武器合理化的一个杰出尝试。但是，这个理论是靠不住的”。

企图以核武器毁灭别人，而结果把自己置于被毁灭的地位，这是美国过去的军事战略中就已经存在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矛盾，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妄想“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而且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这个矛盾会越来越深。美国原子科学家拉普，在一九六二年底出版的《屠杀与过度屠杀——全歼的战略》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军事政策在历史上从未遭到现在这样的自我怀疑和矛盾。”这个科学家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美国战争贩子对美国核战略的矛盾心情。

“盟国”和仆从国加紧扩军。肯尼迪在一九六三年国情咨文中说，为了在战略上取得“核毁灭和退却以外的选择，就必须大大加强”常规部队，“这是一项美国同自由世界共同负担的任务”。美国计划把地面部队的兵力，从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一百零三万五千人，增至一九六三年六月的一百一十五万人。同时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中欧战线的地面部队，由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一个师，在二年内增加到三十个师。在最近二年多的时期里，美国陆军的作战师已从十一个师增加到十六个师。

常规战争有把握吗？美国要依靠常规武力，“在一场全球性赌博中一试高低”，并不容易。美帝国主义虽然在国外有一百多万驻军和几千架飞机，但是，它们分散驻在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军事基地里。一旦打起常规



战争，美帝国主义必须到处出动它的常规部队，这就必然造成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到处挨打的不利形势。

艾尔索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古巴危机时期，“当时曾有人建议使用美国常规武力对付卡斯特罗。这项建议受到考虑。但是，反对直接干涉的一项理由是，在干涉行动中，可能牵制住太多的美国常规武力。据估计，攫取和占领古巴，至少需要六个师军队对付决心抵抗的游击队。这就是说，美国可用的地面部队，将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投到这个岛上。”这个评论员直率地指出：“美国投于自己的军队（尤其是陆军）的金钱和人力，究竟是否能够在战力上多收效果，一直是一个问题。”而且它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提供炮灰的兴趣很有限。因此，按照艾尔索普的说法是，“选择”常规战争，“决非易事——甚至根本不可能”。

在古巴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这是美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美帝国主义的常规兵力即使再多，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核大战是“自杀”，常规战争“决非易事”，都不能冒昧地“选择”。肯尼迪现在已经“选择”并且大于了几年的，是所谓“特种战争”。

在这个所谓“特种战争”中，肯尼迪之流的作为又怎样呢？越南南方是肯尼迪的“特种战争”试验区，就让我们从这里看看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在这方面的情况吧。

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简直呕尽心血。他们除了以大量武器和金钱支援吴庭艳傀儡政权以外，还直接参加了这个罪恶勾当。他们不仅研究了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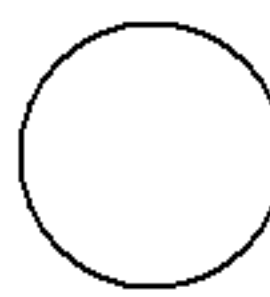
所谓“反游击战战术”，训练了所谓“反游击战”的部队，而且制造了各种新式轻便武器，大量使用直升飞机，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作战。

美帝国主义的“军事观察家”经常吹嘘，“美国的武器、人力和美元正在帮助吴庭艳政府赢得对共产党游击队进行的战争”。但是，美国国务院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近一年来，美国给吴庭艳反动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达七亿多美元，派往越南南方的美军官兵达一万五千多名。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起了“运输队”的作用。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用缴获来的大量新式武器装备了自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美国军官说：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拥有金钱能够买得到的一些最好的军事装备。……这是美国造的并由美国出钱买的”。另一个军官说：“我们向作战双方供应物资”。

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紧紧同人民团结在一起，打得敌人狼狽万状，疲于奔命。美国国际合众社在描写美国以直升飞机同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作战的情形时写道：美国“花费了成千上万加仑汽油的直升飞机的袭击，只发现空旷的稻田和没有人烟的村庄”。

《纽约时报》在评论越南南方的战争时写道：“观察越南陆军在湄公河三角洲各省份进行扫荡行动的人，常常对荒无人烟的村庄感到惊奇。军队一来，除掉老年人和儿童外，全都逃走了。没有人提供情报，没有一个人忙着挂旗”。大部分的乡村是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控制的，军队一撤走，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就回来了”。

越南南方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这个强大的



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英勇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一九六二年，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毙伤敌军五万多名，俘虏五千多名，另有三万六千多名吴庭艳的官兵开小差或向人民革命武装投诚。一九六三年头九个月，已经歼灭美军和吴庭艳的反动军队达七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六百多名美军官兵，缴获的武器达七千六百多件，击落和击伤敌人的飞机达三百五十多架，比去年全年击落和击伤的敌机多六倍。现在越南南方四分之三的地区掌握在人民革命武装手里。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胜利，有力地鼓舞了仍被美吴反动集团统治的地方的人民的革命斗争，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军人和吴庭艳反动统治集团，经常吹嘘他们的“战绩”。他们说“消灭了”多少人民革命武装，“缴获了”多少武器。但是，这种骗人的把戏，现在连美帝国主义自己也不相信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最近就不打自招地说，在越南南方

关于人民革命武装伤亡人数的报告“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们是以空中观察员的估计为基础的……”。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这个道理甚至连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今年一月五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直升飞机不能代替人；南越战争暴露了机器时代的缺点》的文章中写道：“不管机器有多么好，也只能帮助和辅助而已，不能代替战场上的使用两条腿和手拿步枪的士兵。”这家报纸悲叹：“美国军人忘了这一点”，而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知道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一方面继续加紧镇压，同时，对这场战争已公开表示没有信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肯尼迪承认，在越南南方的战争中，美国是在一条看不到头的地道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则说，在越南南方“预料要进行一场长期、激烈和令人失望的斗争”。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又失败了。

三、西欧的伙伴们“对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打了好几拳”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不能不引起美国战争贩子的“自我怀疑”和这个战略的失败。这是美帝国主义十分伤心的。但是，使美帝国主义更伤心的，是由于推行这个战略，使它的西欧“盟国”，更加众叛亲离。

美国资产阶级报纸评论家李普曼，在评论戴高乐反对美国核战略这一问题时写道：“戴高乐对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打了一拳。”艾尔索普则认为：“事实上他不止打

了一拳而是打了好几拳”。人们可以根据事实，再补充一句，不仅戴高乐打了好几拳，而且英国、西德和美国在西欧的其他一些“盟国”，也一拳一拳地打击着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础。

很久以来，美帝国主义就企图以核武器来控制其西欧“盟国”。美国为了不让其西欧“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有独立的核力量，竭力推行一种叫作“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统统



納入由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通过这个組織，剝夺英国和法国在核力量方面的独立，造成它們对美国的依賴。这个計劃一直遭到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

一九六二年，美英拿騷協議以后，美国提出由二十五艘海面舰只，配备二百枚北极星導彈，組成“多边核力量”。其中規定，核彈头由美国掌握，参加国不得撤出其力量等等。这就是泰勒所吹嘘的让“盟国”“安心”而不“远离”的办法。但是，美国的这个办法并没有使它的西欧“盟国”感到“安心”，而是感到可怕。英、法两国的評論一再指出，这是美国山姆大叔的“巧妙圈套”，如果上了这个“圈套”，就会使自己淪为“二等国”的可悲地位。

英国对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計劃，存在着极大的恐惧。一方面，它怕西德参加了，会抬高西德的地位而降低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参加以后，丧失独立地位。英国《卫报》在綜述英国对“多边核力量”計劃的态度时写道：“沒有人支持这一力量”。理由是：一、“这对我們的防务是不必要的”；二、“作为还击武器，水面舰只不大可能有什么价值”；三、“在有限战争中水面舰只显然比潜艇的效力差得多”；四、“成本太大，估計建立这支力量需要五亿英镑，这就意味着国防預算只有二十亿英镑不到的英国，不得不放棄我們国防力量的某些重要部分来支持一項等于是外交、政治計劃的东西”；五、“由于美国人仍拥有否决权，因此，扳机上还是美国的手指”。这家报纸断言：“‘多边核力量’将造成北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分裂。”

一直梦想当西欧領袖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国利用“多边核力量”控制法国的企

图更为惱火，反对更甚。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戴高乐在記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并且鼓吹建立一个同美国对抗的“在經濟上也在政治上軍事上团结的欧洲”。戴高乐宣布，这是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目标之一。

一九六三年五月，美国为了推行它的“多边核力量”計劃，召开了渥太华會議。戴高乐不但不服从美国指揮，相反，在會議后公然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撤退了自己的舰队，以作为在明年进行氢彈試驗的时候防护試驗区之用。

戴高乐一再声称：“法国不会作美国的卫星国”，“法国无需保护者”，“真正的盟国是并不向人点头哈腰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則公开宣称：“我們敌人（指美国——作者注）的意图是明显的。他們要迫使我們放棄威懾力量，因此，今天斥責这种力量是无用的玩具，明天又斥責这种力量有无法估計的致命后果”。法国《民族报》更以同美国完全对抗的口气煽动：“如果人們真正希望欧洲存在，并事实上在世界上起作用，就只有在經濟、政治、防务三个方面保持团结才行，……这是欧洲共同体的命运所系，誰要是拒絕这些方面的一个方面，誰就沒有一点共同体精神。”

美帝国主义在推行它的“多边核力量”計劃中，对西德寄予的希望特别大。美国企图以此使西德分担軍費，并进一步扶持西德的軍国主义势力，为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卖命。西德則企图借此来获得核武器。但是，西德也不甘心受美国的控制。因此，西德一方面表示“决心”同它的“盟国”一起，“大力推行”“多边核力量”的計劃；另一方



面，又声称“法国关于欧洲成立原子力量的提法是‘值得考虑的’和‘重要的’”。几年以前，法国和西德就签订了“法德条约”。西德前总理阿登纳同戴高乐之间往来密切，互相吹捧。阿登纳“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那些能看到事物本质而不是只看到事物外表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戴高乐则为阿登纳的健康“干杯”，使阿登纳“这位年迈的总理，深受感动”。这一切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法国和西德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对西欧的控制。阿登纳最近虽然下台，但新上台的西德总理艾哈德一再表示：“我不打算采取新的执政方针”，“我们坚持旧方针”。

四、壟斷資本之間的劇烈鬥爭，使肯尼迪很難順利推行“靈活反應”戰略

肯尼迪的“靈活反應”戰略，如果只是在外面碰壁，里面順利的話，他也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不知所措”。問題是他推行這個戰略，在內部也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

肯尼迪的“靈活反應”戰略，要求對軍事的領導高度集中，“希望使總統在他的核機器上有一串按鈕，從開頭的嚴格的限制的戰術核戰爭，其間經過若干不同程度的戰爭，一直到最後的大決戰”，“也希望使總統有一部非核機器”，“希望使文職領袖，而不是軍事領袖從頭到尾掌握按鈕的工作”。事實却是，美國陸、海、空三軍之間以及它們同政府之間矛盾重重，很難達到肯尼迪所要求的那種高度的集中。

美國歷屆政府都有總的軍事戰略，但是，美國陸、海、空三軍在制訂和支配軍事預算時，卻盡量把本軍種的軍事思想和意圖摻到具體軍備計劃中去。例如，陸軍是根據“長

肯尼迪企圖以自己的核力量作為控制其西歐“盟國”的“王牌”，結果卻是使西歐“盟國”更加分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寫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處在混亂中，“似乎有着許多的小兵，需要一位好軍官的吆喝，來使他們重新排成整齊的隊伍”。若把北大西洋聯盟目前的状态，“比之于一面有着許多糾紛的裂紋的破鏡子；以致使人懷疑它，是否有一天還再全面和清晰地反映出一九四九年的團結來”。其實不必懷疑，這一天永遠也不會有。因為，正如這家刊物所說，“在一九四九年使聯盟保持完好的釘子是美國的核壟斷，這只釘子現在已被拔掉了”。

期的消耗戰”儲備軍事物資，而空軍則是根據“短期核突擊戰爭”來作準備；同時，三軍還各自發展多種多樣的導彈武器。這不僅在執行軍事戰略上，造成“混亂”，影響作戰效果，而且在備戰計劃上，形成嚴重的重複和浪費，加深了美國財政和經濟的困難。

肯尼迪上台以後，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實行“靈活反應”戰略，授權麥克納馬拉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實現”總統和國防部長對戰爭的絕對控制權，改組軍事指揮體系，剝奪三軍參謀長對武裝部队的直接指揮權；統一情報、通訊和後勤工作；掌握對重大武器體系的發展和採購的決定權，等等。

但是，肯尼迪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但沒有解決三軍之間和三軍同政府之間的矛盾，相反，進一步加深了三軍之間和三軍同政府之間的矛盾。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由於採取以戰略空軍為主的“大規模報復”戰



略，引起了陆军的反对。肯尼迪的这个战略，则使空军和海军都大为不满。前空军参谋长怀特一九六三年四月发表文章攻击麦克纳马拉，说他的战略思想“接受了”“核僵局”的局面，指责“新军备计划越来越依靠固定的、不灵活的、单一的武器，例如民兵和北极星导弹，并且主要强调常规力量”。海军参谋长安德逊对改组海军部削弱他的职权，表示强烈反对，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麦克纳马拉加强对军队的集中控制，不仅加剧了美国各军种间利益的冲突，并且使美国国防部内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的传统性的权势之争，更形尖锐化了。美国军事评论家鲍德温说：“在所有三军中，特别是空军和海军中，过去两年里失望情绪日增”，“对国防部长权力显著集中的趋势相当不满。”美国一家报刊报道，五角大楼的一个军官说：“最惊人的事，是军人们竟然为一群从未上过战场，不认识战场为何物的小子所指挥。”美国《航空周刊》也承认，美国文职人员与军人之间的“裂痕”已“加深、加大”，成为“不可弥补的鸿沟”。

美国政府同陆、海、空三军之间以及三军内部的这些严重矛盾，决不是用“改组指挥体系”、“撤职处分”所能解决的。美国的军事战略，是由美国大垄断资本决定的。美国政府同三军之间以及三军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矛盾的反应，因此，是不可调和也无法解决的。

让我们听一听美国众议院军事拨款委员会成员惠吞的自白吧。惠吞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公开承认：“与军事开支有关的特殊势力，大概是美国国内政策和政治的最重要因素”；

“国家防务仅仅是决定防务开支时考虑的因素之一，而其他的因素则是：大量开支、扩大防务开支的受益面、照顾各军种、给所有承包商以适当的份额、使军事基地扩散到所有地区，等等”。

军火生产的利润比一般工业利润高一倍左右，因此，军火生产订货，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最重要的争夺目标。美国垄断资本之间在争夺军事订货方面，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芝加哥太阳时报》写道：“在争取军火合同时有许多政治斗争。谁认为情况不是，那是十足天真的想法，……华盛顿到处是进行活动的人，纯粹是想得到这些合同。”

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订货，美国垄断资本家们，一方面派遣了自己的代表直接掌握军事部门，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另一方面，他们收买大批现役军官，或把大批退役的军官安插在企业里，为自己拉生意。因此，美国陆、海、空三军将领，各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他们总是竭力突出本军种的地位及其拥有的武器的作用，激烈地争夺军事预算的份额，借以扩大与自己有关的军火商的利润。每一个军事将领，在实行某一战略时，都是以自己的后台老板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美国政论家希尔写道：“这种战神和财神之间的联盟是靠美元来巩固的。军事将领们在服现役时替军火大王们拉生意，而在退伍后则担任军火承包商的高薪职员。”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调查小组的材料，美国有一千四百多名上校以上的退职军官，在一家最大的军事订货公司任职，其中包括二百六



十一名将级军官。制造导弹飞机和核潜艇的通用动力公司，雇佣退役军官最多，计有上校以上的军官一百八十七人。一九六二年，它获得的订货达十二亿美元以上。获得军事订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洛克希德公司，雇佣上校以上的退役军官也有一百一十一名。

美国垄断资本除了直接同军事部门的将领官员勾结外，还运用所谓“院外集团”的活动，对两院进行控制。《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军火承包商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同它设有工厂的各州议员“保持接触”，有的议员“平均每天要接到防务承包商三次电话”，而国防部“每年要接到两院议员近五十万次有关防务计划的电话和信件”。

在争夺军事订货的斗争中，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演出了各种各样的丑剧。麦克纳马拉被逼得当众痛哭一事，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一九六二年，美国决定制造一批价值六十亿美元的 TFX 战斗轰炸机。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投标价格虽然比通用动力公司低，但麦克纳马拉却偷偷把这批订货给了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通用动力公司。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制造合同之所以给了通用动力公司，“是因为它将在准民主党的得克萨斯州制造这种飞机，而如果是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获得了这个合同，那就会肯定是给共和党占优势的堪萨斯州提供好处”。

这件营私舞弊案件，引起了波音飞机制

造公司老板的恼怒。波音公司的老板马上通过自己在国会的代表，对麦克纳马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攻击他“试图在五角大楼建立一个王国”。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调查”时“询问非常严重”，麦克纳马拉当场“痛哭流涕”，“有一个人由于神经受不了而不省人事，在这次询问后需要作两周的治疗”，另外两个人表现出“极度疲倦的症状”。“在询问中甚至采用了‘陷害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说话严厉，连珠炮式的询问，打断讲话和要求对复杂的问题径直回答‘是’或‘不是’。”

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美国参议员杰克逊对“国家安全问题”作了一番“研究”之后说：“这种新的安排在整个购买武器过程中替政党分肥制度和贪污腐化开辟了道路，而且对武器质量也是个‘灾难性的打击’。”

显然，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使垄断资本的胃口越来越大，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反过来，垄断资本之间如此剧烈的斗争，又使肯尼迪很难顺利实现军事指挥上的高度集中，从而也很难顺利推行他的“灵活反应”战略。麦克纳马拉公开承认：“美国各军种对准备打什么样的战争具有不同的观念，结果，陆、海、空军指挥下的部队不能协调一致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效果。”

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五、美国人民不要炸弹，要面包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指出：“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

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



这样做的。”^①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英明的预言。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一方面使垄断资本的腰包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美国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美国人民不要炸弹，要面包；不要战争，要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强调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扩军备战，着重发展核军备，削减常规兵力，但是仍然造成了巨大的预算赤字。肯尼迪政府为了实现“灵活反应”战略，既大力发展核军备，又积极发展常规武力，结果使直接和间接的军事预算开支大量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一九六一年度为六百五十多亿美元，一九六四年度即达到七百七十九亿美元。

由于军费开支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更加膨胀，经济情况日益恶化。肯尼迪执政三个年度的预算赤字将达二百一十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八年的预算赤字。美国国债已由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二千九百多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三千零五十五亿美元。美国黄金大量外流，截至一九六三年八月底，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降至一百五十五亿多美元，比美国所谓的黄金储备的“危险点”还低二十四亿美元。由于通货膨胀的发展，黄金外流，美元不断贬值，以一九三九年一美元为一百，一九六〇年三月跌至四十七点三，一九六三年跌至四十四。

美国垄断资本的残酷剥削，早已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困苦，肯尼迪疯狂扩军备战和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又进一步加

深了美国人民的苦难。一方面，工人遭受的失业威胁，日益严重。一九六二年，美国平均失业人数达四百零一万人。另一方面，广大工人阶级不仅在军火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受到日益严重的剥削，承受大大加重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而且要负担扩军备战带来的沉重后果。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税收。据统计，美国人民的纳税负担，一九二九年每人平均为八十一元九角二分，一九六二年每人达六百六十六美元。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被大垄断资本通过纳税的形式捞走了。

美国广大工人生活日益困难，甚至肯尼迪也公开承认，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有三千二百多万人生活极为贫困。十分之四的中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失业失学的青年达一百万人。肯尼迪说：“我们仍然有一千七百万美国人每天晚上在营养不良的折磨下睡觉”，“饿着肚子上床”。

美国广大人民对这种恶劣的生活处境，忍无可忍，更加激烈地展开了反对核战争，要求和平，反对扩军备战，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

几年来，美国工人的经济性和政治性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据一九六二年统计，肯尼迪上台后的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工人罢工达六千九百多次，参加者达二百七十万人，罢工日数达三千五百三十万个。美国的和平运动已经具有全国规模。青年、妇女、黑人、

^①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1页。



科学家和社会名流等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和平组织，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广大人民公开拒绝执行肯尼迪的备战计划。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国一百多所大学的五千多名学生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禁止核试验，结束军备竞赛。

同年四月，美国进行“民防演习”，在纽约有三千多人拒绝进入防空壕。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则举行“静坐示威”。

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时期，美国人民反对肯尼迪政府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更加激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干涉古巴。

肯尼迪政府对广大人民的争取和平的斗

争，企图进行镇压，但是，越是镇压，人民的斗争性越强。一九六二年三月，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妇女争取和平委员会负责人，指责该组织有“颠覆”活动的嫌疑。消息传出以后，全国有一千多名妇女自动赶到华盛顿为该组织辩护。

正如美国的一些报刊指出的，这些斗争“反映了美国人民的为和平与民权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巨大潜在力量”。毫无疑问，美国人民的斗争，是阻止肯尼迪顺利推行它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支强大力量。而且，可以预料，美帝国主义越是推行他们的罪恶的战略，美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也越是会进一步地广泛、深入和发展，斗争的胜利必然会越来越大。

矛盾重重、四处碰壁，这就是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的处境。肯尼迪这个美国垄断资本的宠儿，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纽约时报》写道：“华盛顿现在正流行一种怪疾”。这种“怪疾”是“肯尼迪当政头几个月的兴高采烈的兴头消失了，即使在今年一开头时十分明显的打算重新开始的情绪也为怀疑和不知所措所代替”。

美帝国主义的以美国人民为敌、以全世界人民为敌的“灵活反应”战略，已使它自己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它更加虚弱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等人，公开承认美国成了“上了年纪的斗士”，“自由世界”的权力，正“从美国分散出去”，“美国正在衰退”。

事实很明显，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是一条勒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条绞索将会越勒越紧。美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长了。

美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正在更加积极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新式核武器，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推行他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达到消灭他们的敌国，消灭世界革命，独霸全世界的目的。但是，美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就越要加深它在各方面的矛盾，促进人民的革命斗争。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只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斗争，就一定能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制止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

——讀反映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文学作品

施 央 千

今天，一个强大的声音响彻云霄，激动人心。这声音就是受了数百年奴役和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呼声。非洲的黑人，拉丁美洲的黑人，美国的黑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帜，擂起民族解放的战鼓，唱出时代的强音。从美国、拉丁美洲到非洲，一股黑色的革命火焰正在燃烧，越燃越旺，已经包围了奴役和压迫黑人几世纪之久的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寿命已经不长。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中所指出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和拉丁美洲黑人的斗争、非洲黑人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也是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也强烈地感染着读者，让人们看到正义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反映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黑人文学，是随着美国黑人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进步和解放的斗

争而产生和发展的；它的主流，无论在哪个时期，总是健康的、革命的。进步的美国黑人文学，忠实地反映了长期以来被压迫、被奴役的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觉醒。它的优秀作品是勤劳勇敢的美国黑人的理想与智慧的结晶，是美国进步文学宝库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美国黑人女作家、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汉姆指出：“要是没有黑人的丰富多采、生气蓬勃和优美的诗篇与歌曲的话，美国文学在广度、质量与数量三方面都远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黑人对文学所作的贡献，加上描写黑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构成了美国文学的主要部分。”^①特别是优秀的黑人诗歌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它们像火焰，燃烧着读者的心，像战鼓，鼓舞着人们前进。

但是美国的黑人文学，在美国向来是受到歧视和迫害的。“直到现在，一个黑人想要出版一个作品，不管他写的是历史著作，是小说或者是诗，都立刻会被贬到‘隔离’的‘第二等’的地位。……黑人写的所有的作品

^① 雪莉·格雷汉姆：《美国文学中的黑人》。见《世界文学》1959年5月号。



都不分好坏地被扔到标为‘黑人宣传’或者‘黑人的民间艺术’那一堆东西里去了，因此也就很难会被认为是文学。”^①

中国人民一向关心被压迫、被奴役的黑人弟兄的命运，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早在一九〇一年，林紓、魏易合译的美国白人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原书的书名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即引起广泛的反响。那时中国人民正受着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这部描写黑奴痛苦生活的小说（尽管它在主题思想上和黑人形象塑造上有很大的缺陷），在当时能受到中国人民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小说后来还被改编为剧本，从一九〇七年起先后在留学生界和上海等地演出，一九三二年还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瑞金上演过。一九五七年在中國話剧运动五十年紀念的时候，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又重新编写剧本，改名为《黑奴恨》，在北京等地演出。剧作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写的后记中说：“现今，在美国，黑人还是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迫。黑人的生命财产、基本人权都无保障。……我以对被压迫者深切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极端的愤慨写了这个戏……”^②

今天，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正以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时刻都在深切地关怀那些尚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痛苦生活的黑人弟兄，我们始终全力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珍视和欢迎反映他们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目前我国已陆续翻译出版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

中，在体裁上，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有诗歌、散文，有文学传记；在题材上，有反映惨绝人寰的黑奴生活的，有揭露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的，有描写可歌可泣的英雄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事迹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反动派加在黑人弟兄身上的种种暴行，也看到了黑人坚强勇敢、前仆后继的斗争。

在美国进步的黑人文学作品中，反映了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揭露了殖民主义者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活动。在波浪滔天的大西洋上，一艘艘的奴隶船扬帆西去，把黑人从非洲运走。正如美国黑人诗人布朗所描写的那样：

他们强拉你们离开自己的故土，
把你们连锁在一起，
塞进肮脏的仓口，像重迭起来的
的匙子，
他们贩卖你们，为了几个绅士
的安逸。^③

已故的著名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指出，每运一个黑人奴隶到美洲，至少要有五个黑人死在非洲或船上。当时，在黑非洲通向海口的道路上，到处白骨累累。自由的非洲黑人被迫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当奴隶，过着暗

① 雪莉·格雷汉姆：《美国文学中的黑人》。
② 《黑奴恨》，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
③ 《黑人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无天日的生活二百余年之久。根据殖民者的法律，奴隶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随意鞭撻和虐杀黑人，可以任意蹂躏黑人女奴隶。美国南部大庄园里的珠光宝气，正是建筑在黑人奴隶的鲜血和尸骨之上。美国黑人奴隶所受的非人待遇和他们要求解放的渴望，不仅是许多黑人民歌（如《奴隶的锁链》等）的主题，而且也是美国进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美国一些资产阶级进步作家，都对深受痛苦的黑人奴隶表示同情。马克·吐温在他的短篇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里，希尔德烈斯在他的长篇小说《白奴》里，对奴隶主的残忍、奴隶所过的非人生活、蓄奴制和奴隶贸易等都作了真切的描写，揭露了那个时代美国野蛮的种族压迫的真相。因反对蓄奴制而受到迫害的诗人惠特曼，在他的《自己之歌》、《埃塞俄比亚人向旗帜致敬》等诗中，不仅对黑人奴隶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对他们的反抗斗争作了热情的歌颂。诗人朗费罗，在他的诗集《奴役篇》里，展示了一幅幅关于黑人奴隶痛苦生活的悲惨画面，在《警告》一诗中还指出被压迫被奴役的黑人，将有一天像《圣经·士师记》里所写的被侮辱的大力士瞎参孙一样，挣脱身上戴着的铁锁钢镣，奋不顾身地举起臂，把这个国家制度的基柱动摇。

被压迫被奴役的美国黑人，决不能安于奴隶的命运，长期以来，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境况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威廉·福斯特称这一斗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①，

而这部英雄史诗的第一章，就开始于黑人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在优秀的黑人文学作品里，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奴隶为粉碎奴隶的枷锁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壮丽画面，塑造了富有艺术光彩的叛逆者的英雄形象。美国黑人诗人罗伯特·海登在《加布瑞尔》的诗里，歌颂了领导奴隶起义的美国黑人英雄加布瑞尔的诗中写出：“加布瑞尔吊在绞架上，那是乌金閃射着光芒，他的头颅，像起义的火把……”，加布瑞尔所“发动的起义，决不会徒劳……定会再度掀起风暴”^②。雪莉·格雷汉姆在她的文学传记《从前有个奴隶》里，也描写了黑人奴隶反抗白人奴隶主的斗争，歌颂了这一斗争暴风雨中的闪电和雷鸣，再现了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英雄形象，反映了黑人要求自由、要求解放的革命意志。

在美国黑人奴隶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有许多进步的白人跟黑人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这在美国黑人文学中也有深刻生动的反映。以参加黑人解放斗争杰出的英雄人物约翰·布朗为例，约翰·布朗是个出身贫寒的白人，但他在生活和斗争的实践中，把自己的命运和黑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为黑人和白人携手向共同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提供了光辉的榜样。从杜波依斯的文学传记《约翰·布朗》中，我们看到了约翰·布朗怎样把他的一生和一家，全都贡献

①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序言，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② 《黑人诗选》，第80页。



給黑人的解放事业，最后自己也在絞台上英勇就义。

可是，美国南北战争甫告结束，美国黑人洒在战场上的鲜血未干，北部的工业资本家已与南部的种植园主勾结起来，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剥削和奴役黑人。反映这一时期的黑人真实生活的作品，在美国进步文学中相当丰富，读了令人义愤填膺。加德维尔在他早期的小說里，以不少篇幅反映了受到白人地主奴役压迫的黑人佃农的痛苦生活。父亲因为不忍看着自己的女儿挨饿，最后用猎枪打死了女儿，自己也被送进监牢（《女儿》）^①；一家黑人佃农一连饿了好几天，他的老父亲饿急了，夜间出去找吃的，不幸找错了路，掉进地主的猪圈，被一群凶猛的公猪撕得粉碎；另一个黑人青年激于义愤，顶撞那个地主几句，竟被一群白人暴徒用乱枪活活打死（《跪在上升的太阳下》）^②。

美国黑人文学作品，还无情地揭露了反动种族主义者怎样随便捏造罪名来加害无辜的黑人，用各种合法化的私刑处死、屠杀赤手空拳黑人的事实。许多美国黑人作家，如朗斯敦·休士在小說《家乡》和《父与子》里，克劳德·麦开在《私刑》的诗里，都以充满愤慨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了白人中的种族主义者怎样捏造罪名和运用私刑虐杀无辜黑人的各种罪行。美国南部有各种各样的迫害黑人的恐怖组织，其中罪恶昭彰的是三K党。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一书中，这样描写了三K党的活动：“……有组织的蒙面、携带武器的人群，入夜以后在乡村中到

处横行，一路上鞭打、射击、伤害、残杀妇女、儿童和赤手空拳的男人，或者砍去他们的四肢，他们以暴力冲进睡着了的人们的家里……用手枪、来福枪、刀和绳子胡干。为许多目击者所证实了的这类罪行，就是路易西安那州用来选举美国总统的办法。”曾经震惊世界的斯考兹勃罗案件，即阿拉巴马州斯考兹勃罗城的九个黑人青年被一群种族主义者诬告强奸两个白人妇女，虽然他们连那两个妇女的面都不曾见过，而且其中的一个妇女后来都亲口否认了这种控告。但这九个黑人青年仍全被美国反动当局无理判刑，其中的一个黑人青年贝特逊曾三次被判死刑，后来由于全国进步人士及世界舆论的声援，才被改判七十五年徒刑。贝特逊在牢里共关了十八年，于一九四八年越狱逃出，写成《斯考兹勃罗案件》一书，将他本人和他的黑人同胞遭受迫害的经过以及美国监狱中的种种黑暗情形暴露于世。作者在结尾时写道：“我经过了一场很大的斗争。但是，我要全世界知道，我并没有屈服。”^③

美国的统治阶级强加于黑人的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在黑人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哥伦比亚的黑人作家萨巴达·奥利维雅在他的《我看到了黑夜》一书中，描写了他在美国旅行时所受到的种族歧视。黑人不能和白人一同乘车，也不能在白人餐馆里吃饭。一个抱着婴儿的黑人妇女从火车上下

①② 《美国黑人生活纪实》，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③ 《斯考兹勃罗案件》，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来，因为找不到为黑人特設的餐館，不但自己找不到吃的，也沒有东西可以喂她的黑女孩。朗斯敦·休士在他的小說《一个星期五的早晨》里，描写了有天才的黑人学生仅仅因为肤色的关系，被剝夺了領取奖学金的权利，那些評判老爷們只是在获悉得奖的是个黑种女孩子之后，才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决定，把奖学金另授給別人①。

美国統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竭力粉飾国内种族歧視和种族压迫的殘酷现实，大肆吹噓什么美国的所謂民主和自由，胡說什么美国黑人可以从宪法中得到人权的保障和享有黑人的公民权利。而在进步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却无情地撕下了美国所謂民主和自由的假面具。詩人戴維斯在《南方产棉区的画像》詩中写道：

这里有最充分的民主

.....

“人人可以做总统”

“机会均等”

这些，翻譯出来是——

富人越来越富

大农场主的土地越来越多

他們控制着土地和市鎮

主宰着他們的傀儡官吏

.....

沒有选举权的黑人永远得不到

与他們繳納的捐稅相称的报酬。②

从优秀的黑人文学作品塑造的黑人英雄

形象，和所描写的日趋激烈的斗争中，我們看到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們反对种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日益发展。許多黑人虽遭到美国反动当局的殘酷迫害，但他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甚至在监牢里依旧进行着不屈的斗争。美国黑人作家劳埃·布朗的长篇小说《铁城》，就描写了黑人共产党员在监牢里为援救另一个无辜被判死刑的黑人青年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契斯納特在长篇小说《一脉相承》里，塑造了一个主張武装自卫和敢于斗争的黑人英雄形象。他說出“与其像狗一样地活着，不如英勇地死去”这样的豪言壯語，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一光輝的黑人形象給讀者留下鮮明、强烈的印象。

从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我們还看到，美国黑人的斗争經驗和阶级觉悟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許多人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詩人罗伯特·海登在《演說》一詩中，揭穿了美国反动派分化美国无产阶级的詭計：

听我說，黑人弟兄們；

白人弟兄們，听我說：

我听見他們說了许多話——

全是为了分化你們

在你們中間安起一道铁刺网，

我听見他們說——

① 《黑人短篇小说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黑人詩选》，第60、63頁。



“髒黑人，旁白人”

这是同一个声音說的……①

优秀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越来越尖锐深刻，人物形象也越来越血肉丰满。黑人作家基倫斯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揚布拉德》一书中，刻划了一个有觉悟的黑人工人家庭的形象——揚布拉德一家，并通过这个家庭，反映了美国新生一代的黑人的觉醒。在基倫斯笔下的黑人罗伯特，不但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同时还不屈不挠地跟美国工人阶级弟兄在一起直接参加了阶级斗争。杜波依斯的长篇小说《黑色的火焰》三部曲，更是美国黑人文学进一步成熟的标志。这部宏伟的巨著概括了近百年来美国黑人遭受迫害和进行英勇反抗的悲壮历史，揭示了黑人民族在历史潮流冲击下逐渐觉醒的过程。作者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还以极大的热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谴责了美国反动派发动的侵朝战争，歌颂了黑非洲的觉醒，把黑人的解放事业与全人类的整个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美国黑人在斗争中前进着。他们的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海地诗人让·布里埃尔在《我同你在一起，哈列姆！》的诗中，强调受压迫的海地黑人和美国黑人之间“虽然隔着关山重重，但是咱们有共同的爱，也有共同的恨”，当美国黑人“在佛罗里达遭到毒打时”，“一刹那間，我的头巾也同样浸透

了鲜血”②。印度尼西亚诗人里沙哥达在《寻找自由的人们》的诗中热情洋溢地歌唱，

啊，斗争的人们，
爱好自由的美国黑人，
起来吧，只有用流血的斗争才能把
自由夺到手中！③

加納诗人乔治·阿翁納尔·威廉斯，也在《黑色的鹰觉醒了》的诗中，表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的热情支持：

自由的呼声响彻广大的土地，
鼓依旧在咚咚地敲响，
从纽约港的所谓“自由法令”下面，
黑人弟兄们要求自由的呼声傳到了
我們这里，
哟！哟！哟！
同我們的鼓声远远地呼应。④

我們深信，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而反映这一正义斗争的美国黑人文学，在革命火焰的强烈光芒照耀下，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深切关怀下，必将开出更加美丽灿烂的花朵，唱出更加嘹亮雄壮的歌声！

① 《黑人诗选》，第81--82页。

② 《我們的怒吼》，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129页。

③④ 《人民日报》，1963年8月27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社会主义古巴》而作)

薄 一 波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伟大历史任务。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极端落后的。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基础非常薄弱。主要的工业，是一些棉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等轻工业；只有很少的重工业，那是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国资源而举办的极少的采掘、冶炼工业和只能担负修理、装配任务的机械工业，部门残缺不全。无论轻工业和重工业，绝大多数都被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与此相适应，工业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合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这种情况，使我国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

在反动派统治的年代里，多少中国人想“工业救国”，希望把自己的祖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但是都成了梦幻泡影。我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才有可能实现把自己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很重视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立即没收了蒋介石反动政府所经营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我们分别地采取作价收购、管制等办法，也把它们逐步地转变为我国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同时，我们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彻底消灭了统治我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我们在一九五二年底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由六百多项重点工程组成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初步基础，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大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地联合成为人民公社。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过去，我们没有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航空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精密机床制造业、精密仪表制造业和化学合成材料工业等等；现在，这些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我国工业部门不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过去，我们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自己不会设计，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设计；现在，我们已经从仿造发展到独立地进行设计。过去，我们只能制造技术比较简单的中、小型设备；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一部分大型的、精密的设备。过去，我们的许多重要建设工程，是由兄弟国家帮助设计的，并且供给主要的或者全套的设备；现在，许多重要建设工程，如年产一百万吨煤的现代化煤井、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合成氨二万五千吨的化学肥料厂、重型机械厂、设备容量六十五万千瓦的发电站，等等，我们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并且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建设起来。这就是说，我国工业建设的技术力量大大地增强了，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由于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技术力量的增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的自给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机器设备的自给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钢材的自给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已经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工业的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我们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几个城市；现在，不仅沿海这几个城市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化的工业。过去，我们只有鞍山钢铁公司这个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而且这个基地也没有完全建设好；现在，不但完善地建设了这个基地，而且在武汉、包头等地建立起新的钢铁工业基地。过去，我们的电力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现在，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以至若干农村都有了不同规模的发电站。过去我们的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几个沿海城市；现在全国很多省份已经建起新型的纺织厂。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地区的工业都有了普遍的发展。

十几年的时光，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只是一瞬间，而我们所取得的工业化的伟大成就，却是我国以往的历史不曾有过的。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甚至连我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了。事情正是在这样发展着：中国的衰弱，迅速走向它的反面——强盛。我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的国际的朋友为此感到高兴。

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争取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把包括农业在内整个国民经济转移到现代技术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我们要使我国重工业生产的原料、材料和各种机器设备，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技术改造的需要，能够适应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使我国轻工业生产的各种消费品，能够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会有种种困难，但是，困难从来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我们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勇敢的六亿多人民，有久经考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切内部条件。同时，我们还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支持。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快得多。过去，我们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今后，我们也一定能够以同样的跃进速度，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能够比较快地发展，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这样阐述过。他说：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这三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关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实践中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够孤立地进行的。必须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在发展中相互适应，而不是彼此脱节，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改善人民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经常地教育干部，坚持我国工业化的道路，防止和纠正了在具体工作中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或者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片面做法，因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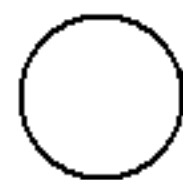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对待农业的发展，这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有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国家里，农民的状况如何，农业的状况如何，对于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

我党中央总结了我国建设的经验，明确地提出农业是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六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资料，主要是由农业提供的。农业又是我国轻工业的主要原料基地和一部分重工业辅助原料、材料的来源。我国工业化所依靠的是国内市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的主体，是在农村。发展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是依靠国内积累的，它的很大一部分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来自农业。所有这些，都是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的表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把广大的农民同盟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工业部门的支援下，大力发展农业，大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能够供应城市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副食品；就能够供应工业越来越多的棉花和其他原料；就能够从农业中腾出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中来；就能够动员广阔的国内市场对于工业提出巨大要求，吸收大量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就能够为工业建设筹集充裕的资金。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促进而不是延缓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改善全国人民生活 and 巩固工农联盟。

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工业的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应当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基本上相适应。第二，工业在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中，应当以农业为主要对象。无论轻工业和重工业都必须以广大农村为主要市场，重工业尤其应当把支援农业技术改革作为首要任务，使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密切结合，互相促进。实践告诉我们，我国的工业化只有沿着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前进，同这两方面的要求相适应，它的方向才是正确的，它的前途才是无限广阔的。

我们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工业，这同以重工业为中心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以农业为基础，丝毫也不意味着削弱重工业的发展，恰恰是为重工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直接要求逐步建立起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强大的工业，首先



是建立起生产资料的主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生产资料得到优先增长，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才能够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为国防力量的增强，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够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去花很大力量建立起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重工业，我们就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建筑材料，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就无法装备农业、轻工业、运输业，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我们也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

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农业国里，而且又处在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战争势力作斗争的前线。我国人民对于发展重工业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我们党完全理解人民的这种愿望，一贯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在过去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工业建设中正是把主要力量放在重工业方面，在我们建设的重大工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工业企业。这是完全必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那种把我们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认为是对重工业的忽视，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或者曲解。

在实践中，我们也体会到，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地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人们知道，工业不仅担负着提供劳动手段的任务，而且担负着提供消费品的任务，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工业的这种任务是很重的。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就可以活跃市场，保持物价的稳定，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使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人民的切身利益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不仅如此，轻工业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密切地联系着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将以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品，去同农业方面交换更多的农副产品，推动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轻工业也是积累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轻工业有着建设较易、投资较少、见效较快、赢利较多的特点。同时，轻工业的发展又需要从重工业部门吸取大量的原料和机器设备，这又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我国工业化的经验证明，那种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以为积极地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不是促进而将妨碍重工业发展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还包括着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内容。

在我国，中央工业一般地是大型企业，它们是建立工业体系的骨干力量；地方工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它们是建立工业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从管理体制上、生产规模上、以至工业布局上，正确地处理中央工业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使它们都有计划地发展，以迅速增强工业生产能力，改善



工业布局，促进城乡结合，加速农业技术改革的进程，从而大大地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那种片面强调发展中央工业和大型企业的做法，以及那种不顾国家统一规划盲目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小型企业的分散主义做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都是不利的。

三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是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主要地依靠外援呢？我们坚定地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方针。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来进行建设，在我国更是如此。人们知道，我国有六亿五千多万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又是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如果依靠大量地进口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那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依靠我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发挥本国的一切潜力，才能够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工业，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才能够使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国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贡献我们的最大力量，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够更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是怎样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推进工业化的呢？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巨额的建设资金。我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部积累。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我国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在国民收入日益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条件下，我们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我们在一切机关、企业、学校和广大群众中，坚持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的风尚，把可能聚集的资金都积累起来。我们充分地注意合理地运用资金，竭力避免浪费，尽可能用较少的财力、物力、人力，办较多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经常地注意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这两部分的关系，使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正确地结合起来。

自力更生地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迅速提高我国工业技术的水平，增加产品的品种，逐步地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的自给程度。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注意正确地处理工业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质量之间的关系，使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同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地结合起来，防止和纠正只顾数量，忽视品种和质量的偏向。为了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不断地加强了科学实验工作。

自力更生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要求加紧培养建设人材，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队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



方面，我們有计划地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材；另一方面，我們积极地举办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不断地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业务水平。

在調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我們也努力爭取并且也得到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国际兄弟的支援。我們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經驗，努力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相互支援。同时，我們也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了同那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貿易往来。这种情况表明，我們所实行的自力更生的方針，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援，是統一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和发展国与国之間的經濟往来，也是統一的。那种脫离社会主义陣营的“单干”、“民族閉关自守”等等說法，同我們实行的自力更生的方針，是毫不相干的。

四

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們不断地加强了党的領導，这是我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对經濟建設的領導，最主要的是政治上、思想上、方針政策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的領導。我們党不但提出了工业化的方針路綫，而且不断地同离开党的正确路綫的右的或者“左”的傾向进行斗争，以保证党的路綫的正确地貫徹执行。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场偉大的生产斗争，这场生产斗争是同階級斗争交織着进行的。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对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七年又粉碎了資产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因而在經濟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但是，在我国，仍然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資产階級中抗拒改造的分子，被推翻的地主階級，他們不甘心于本階級的灭亡，总是企图复辟。小資产階級自发势力，經常产生新的資本主义分子。由于資产階級的侵蝕和小生产者自发势力的影响，在我国工人階級队伍中，也有极少数不坚定的人，蜕化变质，成了新的資产階級分子。同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在极力散布他們的影响，甚至妄图顛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階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将存在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在生产斗争中，忘記或者忽視階級斗争，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們党不断地对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階級和階級斗争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們的階級觉悟，提高他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防止和克服資产階級思想的侵蝕，并且对反动階級的复辟活动給以坚决的打击。

为了保证党对工业建設的領導，在我国的工业企业中普遍建立并且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組織。



企业党的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在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方面，我们实行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领导制度规定：在企业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由党委集体讨论和决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由厂长负责执行。这种领导制度，一方面，继承了我们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传统的领导制度；另一方面，它又适合于现代工业企业生产需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特点。实行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党委对生产行政工作的领导，同时也充分发挥了行政负责人和行政部门的作用，并且可以使企业领导人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

我们党的领导，是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党是紧紧依靠着工人阶级来管理企业的。我们在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发动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职工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我们在企业中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和解决企业中的重要问题，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行政工作。

我们在企业中所实行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同那种“工人自治”的虚伪口号和错误作法是相对立的；我们的集中，又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这又同那种片面地依靠行政命令、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作法，有根本上的区别的。

我们在企业中普遍地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包括专业管理人员）、工人群众“三结合”的办法，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技术理论知识 and 劳动实践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推行“三结合”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工人参加部分日常的生产管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干部要不要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干部究竟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还是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脱离群众。参加劳动，可以使干部保持普通劳动者身分，不闹特殊化，避免脱离群众，是保证干部不致蜕化变质的一个根本条件。干部参加劳动，还可以使干部同生产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使干部能够及时发现生产的积极因素，能够洞察生产中的问题，同群众一起想办法加以解决，避免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

就工人群众说，参加一部分日常生产的管理，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心，发扬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逐步掌握管理企业的能力。我们有许多干部就是从普通工人中锻炼和选拔出来的。

实践证明，实行“三结合”，还大大有助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创造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互助团结向上的关系。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具有深远的意义。



红旗

HO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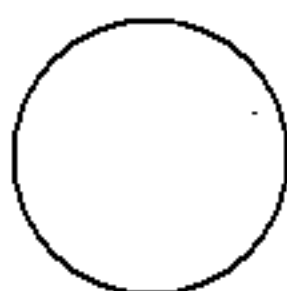
21⁰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一期 ★

目 录

列宁斯大林論十月革命的道路施东向 (1)

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剝削者万 光 (13)

“八一”公社五年間万紹鶴 (23)

在生产斗爭、科学实驗中認識和

运用自然規律甘子玉 (28)

☆ 十一月七日出版 ☆



列宁斯大林論十月革命的道路

施东向

这个偉大的日子离开我們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

——列 宁

四十六年前，在偉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英勇地举行了十月武装起义，最先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陣綫，摧毁了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国家机器，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革命。

十月革命以前，历史上曾經发生过許多次革命，每次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但是，这些革命，归根結底都只是用一种剝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剝削制度，劳动人民依然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同过去的一切革命不同，十月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剝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社会的革命。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轉变，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轉变，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轉变。

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同腐朽沒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統治，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列宁指出：“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則，构成現在已經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①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說：“重要的是，坚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开通，道路已經指明。”^②

十月革命的道路，如果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現的具体形式，而就其基本点來說，反映了人类社会发長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內关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

列宁說：“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③，“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經做过的事情。”^④

① 《論意大利社会党党內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4頁。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頁。

③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2頁。



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遵循着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有很大不同，必须予以充分重视，但是这些规律仍然在普遍地起着作用。

“这些共同的规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一九五七年宣言所指出的这些共同规律，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时指出：“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①“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經驗，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經驗，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經驗，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②

坚持伟大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世界人民争取胜利的基本保证。

十月革命的經驗指明，无产阶级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联合全体劳动人民，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实现共产主义必要的政治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必须把它摧毁。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它们用以统治人民、维护剥削制度的工具。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首先

^{①②}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第1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89页。



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国家机器，粉碎它的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就根本不可能推翻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在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的时期里，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①他又指出，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在君主制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空前地扩大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更必须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应该学会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包括议会的与群众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武装的与和平的等等，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在原则上拒绝议会斗争，但是，如果把议会斗争看作是最高、决定性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斗争形式，认为通过议会斗争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就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列宁指出，每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首先动用武器，“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它的反动统治。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准备用革命的武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镇压。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②

早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列宁就说过：“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3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①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又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②“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经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如果能够这样，那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是最有利不过的了。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变革，而在于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和平变革。列宁指出，革命的和平发展，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简直是小到了极点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绝不当把自己的革命方针，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经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争取革命的胜利。

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④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始终积极地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反对迷恋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倾向，准备夺取政权。在二月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曾经出现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力争实现这种可能。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因此丝毫放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在短暂的和平发展的机会消失而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及时号召和组织群众举行武装起义，粉碎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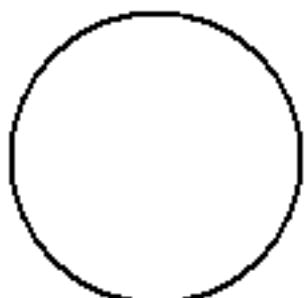
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⑤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各方面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阶级斗争的形式改变了，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着。列宁说：“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⑥

列宁指出，被推翻、被剥夺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113页。

②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388页。

④ 见1934年7月23日《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⑤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页。

⑥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8页。



百倍的仇恨，进行坚决的反抗，企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列宁指出，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会从各方面包围、浸染和腐化无产阶级，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会经常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列宁又指出，在工人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由于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的影响，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列宁还指出，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和和平瓦解的危险，都还继续存在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的外部条件。

斯大林也指出，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它总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同时也竭力设法用隐蔽的办法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这都是同国际资本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系的，而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面对着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技术基础的严重任务。同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全部国民经济，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彻底消灭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旧社会的传统观念，教育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为了逐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巩固工农联盟，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彻底消灭一切阶级，把全体人民引向共产主义。

列宁说：“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①

列宁多次指出，消灭阶级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消灭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绝不会消灭的。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无产阶级专政要经历一个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决不会在阶级彻底消灭以前，决不会在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①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②

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在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斯大林领导下，反对了各种削弱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三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他指出：“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并且这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③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开始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劳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动员全体人民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领导和组织经济的管理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个体经济的根本保证，是全部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列宁说：“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④

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以后，列宁指出，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就必须迅速发展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部国民经济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他说：“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⑤，“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

①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7页。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③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1—222页。

④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4页。

⑤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



为独立国家”^①。

列宁指出，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分散落后的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合作化，是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没有农业的合作化，就没有巩固的社会主义。列宁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②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只有把全部国民经济纳入计划的轨道，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服从于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这就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的集中领导。列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③。

列宁坚决反对破坏国民经济的统一计划和统一领导。他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否认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借口反对官僚主义，让各个企业各自为政，这就必然会使自由竞争、投机倒把之类的现象发展起来。这样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而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

在苏维埃国家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强调指出必须把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性的工作，按照什么路线，采用什么方针、政策来进行经济建设，这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的政治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时候，决不能无视现实的阶级斗争，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而必须首先从政治上来考虑一切经济建设问题。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④“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⑤

按照列宁提出的方针，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苏联人民曾在无比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资金，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

十月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5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

③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8页。

④⑤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



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无产阶级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偉大事业是国际的事业。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保证。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偉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馬克思說：“过去的經驗证明，忽視在各国工人間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視这应该鼓励他們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①

列宁始終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他指出，应该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他說，共产国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是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团结和兄弟合作，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須执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結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

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竭力支持和勾結俄国的反革命势力，企图扼杀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而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帝国主义仍然剝削和压迫着广大的人民群众，鎮压他們的革命斗争。这样，就給布尔什維克党提出了一个必須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地認識和处理苏維埃国家和世界人民革命的关系的問題。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只要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巩固的工农联盟，只要有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充分依靠和发挥本国人民的力量，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列宁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严格地加以区别的。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解决。

列宁指出：“十月革命一开始，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問題就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問題，摆在我們的面前，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从此把世界一切国家牢牢地結成一个体系，也可以說是結成一个肮脏的血腥的集团，而且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們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因此，我們怎样使其他国家的革命扩大起来，怎样給帝国主义以回击，就成为革命的主要問題之一了。”^②

列宁和斯大林一方面反对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謬論，另一方面也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看作是可以自滿自足的事情。他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必須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对于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絕不应当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列宁指出：“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③“我看問

①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1頁。

② 《全俄工、农、哥薩克和紅軍代表苏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4頁。

③ 《为了面包与和平》。《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366頁。



題，不應該从‘本’国的观点出发……，而應該从我要准备、宣傳和推进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观点出发。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任务。”①

斯大林也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②，是“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③。他說：“不相信国际无产階級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們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擋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們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結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們国家的利益而牺牲。”④

为了影响和促进世界革命，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一方面要捍卫革命成果和建設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說，要最高限度地实行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要尽自己的力量，以一切可能的形式，給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直接的援助。列宁指出：“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結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階級的对外政策。”⑤ 他又指出，真正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要求是：“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階級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階級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資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⑥

在列宁制定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下，苏联人民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国际主义的支援，不仅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苏联能够在資本主义包围中屹立不动，除了依靠苏联人民自己的力量外，还由于取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資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的革命运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都打击和牵制了帝国主义，使它不能集中全部力量来反对苏联，这就有力地帮助了苏联人民为保卫和建設社会主义事业所进行的斗争。斯大林說：“如果认为我們的党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因而已不再需要支持，那就錯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們的党和我們的国家过去始終需要，而且将来仍然需要国外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⑦

①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頁。

② 《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2頁。

③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3頁。

④ 《問題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頁。

⑤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頁。

⑥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頁。

⑦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見《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6日第1版。



在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援助从来就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片面强调自己对别人的援助，而抹杀别人对自己的援助，决不能把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看成是负担或恩赐。斯大林说：“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①

十月革命和苏联几十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努力援助各国人民并取得各国人民的援助。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尽到了自己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巩固和发展。

五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证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伟大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绝不可能由任何其他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去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阶级。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一定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政党。

列宁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具有严格的统一的纪律；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必须敢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一个革命的而不是改良的政党。无产阶级的革命党，绝不能把眼前利益当作一切，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绝不能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党应当具有充分的勇气，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而不能借口避免牺牲取消革命，去走所谓“阻力最小的”道路。党应当在任何时期都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领导群众去进行反对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俄国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党。这样，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就有了一个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斗司令部。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7页。



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相类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西欧的一些国家里也出现了革命形势。可是，由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绝大部分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党已经蜕化成为改良主义的党，结果使革命遭到了失败。一九一八年，列宁指出，“欧洲的最大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①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一些国家里革命运动的失败，从正面和反面说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徒有其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具有决定意义。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一个革命的党，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列宁说：“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②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③

十月革命后，列宁同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作用的“工人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一年，“工人反对派”提出了把国民经济领导权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主张。列宁指出，“工人反对派”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谈论一般生产者，“专门指望非党群众或者迎合非党群众”^④，这就完全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根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抹杀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促成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私有制的复辟”^⑤。

斯大林也一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它首先是依靠党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在现今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⑥

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党如果不与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把他们清洗出去，就不能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就有使自己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就有使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丧失的危险。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6页。

②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0页。

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④⑤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235页。

⑥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①他又说：“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②

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组织和鼓舞者，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者。正因为这样，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新型革命政党的光辉榜样。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③

毛泽东同志还说：“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④

在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苏两国人民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来珍视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民都将永远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现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国家，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一个包括古巴在内的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新的觉醒。帝国主义正在一天一天地烂下去，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十月革命的旗帜是各国人民胜利的旗帜。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被压迫民族就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就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十月革命的红旗必将在全世界飘扬。

① 《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页。

②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③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第1版。

④ 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我国的宴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第1版。



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万 光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暴发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十九世纪，美国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开辟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但是，随着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上首要的工业国家，成为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和垄断的国家，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矛盾也迅速加剧，大资本家便越来越把贪婪的目光转向国外。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美国工业品输出急剧增长，并且开始较大额的资本输出。美国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时期。

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战后，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从欧洲移到了美国。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资本积聚大大加速，财富更加集中在垄断资本集团手中。战后，美国国内经济矛盾尖锐发展。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各国中，美国是经济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经常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中小农户被剥夺的规模特别巨大的国家。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最为频繁，经济增长速度最为缓慢，工业经常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家越加感到国内获利的场所过于“狭小”，必须加紧向

国外扩张。而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普遍削弱的条件，在资本主义世界称王称霸，使得美元吸血鬼的触角能够伸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帝国主义已成为空前未有的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资本输出，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呆滞趋向的发展，资本输出更加激增。根据美国官方统计，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美国私人对外投资平均每年增加十七亿三千万美元；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平均每年增加四十三亿八千万美元。从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总额，从一百三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五百九十八亿美元*。

而且，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对外“援助”等形式，大规模输出国家资本，来为垄断资本对外扩张开路。根据美国官方统计，从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和经济“援助”累计共达九百七十一亿美元。美国政府战后还操纵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作为美国资本扩张的工具。

* 美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数额的。私人对外投资，除隐瞒和少报的外，统计中的直接投资是按账面价值计算的，实际上，市价比账面价值高一倍以上。



在一九六二年底，已偿还的贷款除外，美国政府在国外的债权有二百零三亿美元；美国私人 and 政府对外投资总额为八百零一亿美元。

美国对外投资数额，超过了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总和。美国国家资本输出，远远走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前面。在私人对外长期投资方面，一九六二年底，美国私人对外长期投资总额，即使按照面价值也已达五百二十六亿美元；而其他国家私人对外长期投资数额折成美元计算，英国估计为二百五十二亿美元，法国估计为八十亿美元，西德估计为十二亿四千万美元，日本估计为四亿三千六百万美元。

同资本输出紧密联系的，是对国外原料的掠夺。战后，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原料，特别是矿产原料和燃料，比战前增加，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加紧掠夺世界原料的表现。据统计，从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美国国内所需要的一些矿物依赖进口的比重，铁矿石从百分之二点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三，铜从不依靠进口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九，铅从百分之零点二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九点四，锌从百分之六点三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九点九，铝和铁矾土从百分之五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九十点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石油出口国，现在则是一个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一九六一年美国进口的石油，占美国国内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二十点七。美国所需要的锰、锡、镍、钴等一些战略性原料，输入部分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美国帝国主义控制和攫取的世界资源，比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多。据研究帝国

主义争夺原料产地问题的学者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国境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煤、铁、铜等二十三种重要矿物原料的开采量中，美国资本控制的份额，从百分之十六点一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加上美国本国的原料开采量，一九五二年美国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三种重要矿物原料的开采量中所控制的份额，达到百分之六十三。这比美国工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高出不少。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从国外掠夺廉价的原料供应国内，而且在于控制世界原料市场，加强美国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地位。

商品输出在美国整个生产中，虽然所占比重不高（同西欧国家和日本相比较来说），但是对美国经济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全国生产总额来说，美国工业品及其他非农业产品输出的比重占百分之八，农产品占百分之十五。有一些工业部门，输出的比重相当高，以一九六〇年为例，机车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一，石油机器占百分之三十一，建筑和采矿设备占百分之三十一，工作母机占百分之二十三。在主要农产品方面，美国的输出情况如下：一九六〇年，输出的棉花占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九，大米占百分之五十七，大豆占百分之四十一；一九六一年，输出的小麦占产量的一半。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商品输出国，近几年商品贸易出超额，达到平均每年四十多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际支付中，就主要是依靠对外贸易盈余来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外军事和经济扩张开支的。

应该指出，现在仅仅商品输出，已经远远



不能反映美国壟断資本占領国外銷售市場的程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商品竞争的加剧,美国壟断資本为了越过其他国家的进口壁垒,越来越着重在其他国家開設企业进行生产,以直接占領这些国家的市場。根据美国官方統計,一九六二年底,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資总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加工制造业。这种投資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西欧国家。

美国国外企业的商品銷售額已經大大超过美国本国的商品輸出額。以一九五九年为例,美国私人直接投資控制的国外企业的商品銷售額达三百五十亿美元,美国本国的商品輸出額为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前者超过后者一倍多。

另据美国官方統計,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国外企业的銷售額,从一百八十三亿美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六亿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而美国本国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額,仅从一百零八亿美元增加到一百一十三亿美元,增加不到百分之五。在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公司在美国国内的銷售額,也只增加百分之七。这些数字說明,美国壟断財团是怎样热衷于爭夺国外銷售市場的,而美国对外投資又在爭夺国外銷售市場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美国壟断資本从对外擴張中攫取了惊人的利潤。

資本輸出,在国外生产和銷售,归根結蒂,是要利用国外劳动力价格低廉、原料便宜和其他条件,榨取比国内投資更高的利潤。馬克思說过,“如果資本被送往外国,所以会如此,决不是因为在本国絕對不能使用。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它在外国能够依更高的利潤率来使用”^①。

据統計,許多美国国外企业的利潤率,比美国国内企业的一般利潤率,高出一倍以上。不少的美国国外企业每年的利潤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甚至更高。

美国国外投資的利潤率这样高,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美国許多国外企业使用现代装备和技术,残酷剝削当地工資水平低下的劳动者,而获得高額利潤。美国帝国主义在資本主义世界占有的各种特权,美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各种資助,也使得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利潤更为增加。

美国国外企业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用从剝削当地劳动者得来的資金,进而再扩大剝削当地劳动者。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十年間,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資的增加額中,百分之四十五点九是利潤再投資。把利潤再投資除外,美国每年从私人国外直接投資中汇回本国的利潤收入,也已經超过新資本輸出。根据美国官方統計,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五年間,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資汇回美国的利潤收入超过美国直接投資輸出淨額,共五十亿美元,平均每年十亿美元。而美国官方公布的这些利潤統計,还是大大低于实际數額的。

美国壟断資本每年究竟从国外掠夺得多么龐大數額的利潤,他們是尽力保守秘密的。据估算,仅仅是美国国外投資的收益,以及通过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对“不发达地区”的剝削这两項,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从国外攫取的利潤,即达一百四十亿美元左右。美国壟断組織在“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各国国内,通过低价收购出口物資和高价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6頁。



售出进口物资所获得的中間剝削的利潤，以及通过航运、銀行、保險事业等方面在国外获得的高額利潤，还没有計算在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公司国外投資的利潤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国内投資利潤增长的速度。根据美国官方統計，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資的利潤增加三倍半，而国内投資的利潤增加不到百分之七十。对外直接投資的利潤在美国公司納稅后的国内外利潤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一九四六年为百分之七，一九六二年为百分之十七。实际的比重还不止此。根据較為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字計算，在一九六二年，美国从国外投資和国际貿易中不等价交換这两項榨取的利潤，占到美国国内外利潤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美国最大財团的利潤里，国外利潤所占的比重更要高，因为美国私人对外投資，比国内生产，更加集中在壟断資本集团手中。根据美国官方报告，一九五七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資，一半以上掌握在四十五家大公司手中；私人对外直接投資利潤，則百分之六十三为二十五家大公司所占有。

从以上各个方面可以看到，美国帝国主义以帝国主义历史上空前的規模，向国外进行經濟擴張。美国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富有寄生性、最富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二

帝国主义是叮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列宁指出，不多几个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絕大多数人民实行殖民地奴役和財政奴役，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而发财，这是“財政資本时代和帝

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現象”^①，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風起云涌，严重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統治基础。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到处擴張它的势力，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厉害地榨取“不发达国家”的财富，成为現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列宁指出，資本輸出，“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少数最富国家的資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資迅速增长。根据美国官方統計，美国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不发达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資總額，一九三六年为三十二亿九千多万美元，一九五〇年为五十八亿四千万美元，一九六二年底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亿美元。其中，在拉丁美洲的私人直接投資，一九三六年为二十八亿四千七百万美元，一九六二年底达到九十五亿二千八百万美元。美国資本占外国在拉丁美洲的全部投資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美国在亚洲“不发达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資，一九三六年为三亿五千六百万美元，一九六二年底为二十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在非洲的私人直接投資，一九三六年为九千三百万美元，一九六二年底增加到十

①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5頁。

② 《論修改党綱》。《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8頁。

③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5頁。



二亿四千六百万美元。

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私人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是在原料开采部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私人直接投资，几乎全部在石油业。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三分之二以上在石油和采矿业。

据研究帝国主义争夺原料产地问题的学者统计，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的石油、煤、铁、铜等二十二种重要矿物原料的开采量中，在一九三七年美国资本控制了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英国资本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法国资本占百分之二点六，三国资本共占百分之七十三点四；到一九五二年，美国资本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九点六，英国资本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法国资本占百分之三点五，三国资本共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

由此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发达国家”的重要矿物原料开采，绝大部分依然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而美国在其中占有最大的份额。

“不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帝国主义操纵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把这些国家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压制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这些国家不能摆脱经济落后和依附状态。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底层。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力图把经济危机的重担转嫁到这些国家身上。特别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原料价格不断下跌，而工业品价格继续上涨，帝国主义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不等价交换愈益加甚。据

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不发达国家”赖以出口赚取外汇的原料的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十四，仅仅这一方面，就使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损失了约六十亿美元。

几年来，许多“不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逆差激增，外汇储备锐减，财政经济遭到严重困难。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又利用给予贷款的机会，使不少国家进一步陷进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罗网中。

帝国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榨取异常高额的利润。按照美国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美国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不发达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把利润再投资除外，汇回美国本国的利润收入，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分别达到十七亿二千一百万和十九亿一千七百万美元；而美国向这些国家新输出的直接投资，这两年分别仅有四亿四千六百万和二亿零一百万美元。

据估算，一九六二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等六个国家，从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中，以及从国际贸易对这些地区的不等价交换的剥削中，掠夺到的利润总额为二百亿美元以上，占这六个国家从国外投资及不等价交换中所获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美国帝国主义一九六二年从“不发达地区”榨取的利润数额达一百多亿美元，约占美国在国外获得的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以上这些材料充分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一系列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但是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剥削还在继续加强；而美国帝国主义则是最大的殖民掠夺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蓬勃高涨的民



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被迫对许多殖民地国家放弃直接政治兼并的统治形式，转而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就是扶植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扼杀弱小民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进行政治兼并；一种是允许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财政、军事上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美国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在推行这种新殖民主义政策方面却是老手。

为什么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能够有效地使用间接统治的方法呢？

列宁回答说，在这个时代，“财政资本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是在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上起决定作用的巨大力量，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使用财政资本力量的规模更为扩大，手段也更为多样。

美国帝国主义者推行新殖民主义广泛使用的一种手段，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所谓“援助”。

美国帝国主义通过“援助”，豢养一批傀儡政权，把一些国家拉进殖民军事集团，在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帝国主义竭力利用“援助”干涉“不发达国家”的内政。它通过“援助”，取得在这些国家投资和销售商品的特权地位；通过监督美“援”使用，干预受“援”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事务；甚至还利用美“援”从各方面扶植亲美势力，在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制造分裂，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肯尼迪政府的“新援助计划”的主要之

点，就是要更进一步取得长期、全面干涉“不发达国家”各方面事务的权利。这个“新援助计划”的标本，是对拉丁美洲的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美国给予长期经济“援助”的条件是：受“援”国家提出各方面的长期发展计划，由美国审查和监督执行；受“援”国家必须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所谓“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有利于美国垄断资本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扩张和掠夺。

美国的所谓“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也是一面推销美国剩余农产品，为垄断资本谋利，一面作为干涉受“援”国家内政的一种武器。

肯尼迪政府成立的“和平队”，则是从各方面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的一支新殖民主义别动队。

美国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另一个手段是，鼓励美国资本家同“不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家开设“合营企业”，或者鼓励在美国海外企业中吸收当地大资本家的股份。美国建立“合营企业”的目的是，抵制当地公众关于清除外国垄断资本势力的强烈要求，企图使美国企业同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长期结合在一起。在政治上，通过“合营企业”，就可以有一批代表美国利益的当地大资本家，美国资本家自己也可以以当地企业代表的身份出来活动，直接干预当地事务。在经济上，这种名为“合伙经营”的企业，实际上绝对控制在拥有雄厚资本和技术力量的美国股东手中，它们只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当地夺取巨额利润的工具而已。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最早的“试验场”和最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2页。



具有代表性的实例，是在拉丁美洲。当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扩张主义者的矛头伸向拉丁美洲时，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直接殖民统治，形成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美国通过武装侵略、军事占领、制造政变、施加外交和财政压力等等，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系列由美国代理人掌握的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又把美洲军事联盟条约和双边军事协定，强加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身上。美国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网，控制这些国家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并且在财政金融上扼住这些国家的咽喉。这些国家虽然保存政治独立的外壳，实际上完全被套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锁链中。

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据美国官方统计，一九五七年，在拉丁美洲的采矿和工业生产中，美国资本控制的企业约占三分之一；在拉丁美洲的商品出口总额中，美国企业的产品约占三分之一。美国企业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美国使拉丁美洲国家畸形发展原料生产。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依靠一种或两种农产品或矿产品的出口，工业品以至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都仰赖输入。美国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买主和卖主，利用贵卖贱买以及限制拉丁美洲产品进口的办法，来打击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拉丁美洲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仅仅一九六一年一年，拉丁美洲国家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就损失了十四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美国帝国主义从拉丁美洲拿走大堆大堆的财富，而留下的是饥饿、疾病和死亡。目

前，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中，一亿多人吃不饱，一亿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和不卫生而患着各种疾病。请听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里的血泪控诉：“在这块半殖民地的大陆上，饿死、并非由于不治之症而病死或未老先衰而死的人每分钟约有四个，每天有五千五百个，每年有二百万个，每五年有一千万个。……与此同时，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列宁在分析美国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点时就说过，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不采用直接殖民统治形式，“它掠夺它们，而且掠夺得非常巧妙”^①。列宁又说，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绞杀弱小民族时，“善于绞杀，而且绞杀得彻底”^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又把这种“巧妙”的、“绞杀得彻底”的新殖民主义方式，进一步广泛使用到亚洲。菲律宾是美国新殖民主义在亚洲的“传统橱窗”。南朝鲜和南越成为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新型殖民地。印度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大猎场。美国新殖民主义者还加紧在非洲扩张势力范围，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把刚果攫为己有。

现实表明，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建立起当代最大的新型殖民帝国。美国帝国主义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当前最危险的敌人。

①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9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186页。



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①；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不仅在兼并“不发达国家”方面，而且在兼并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方面，也达到了最大的规模。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战败或衰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霸主，压迫其他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帝国主义对西德和日本实行军事占领，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军事联盟等加强对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美国私人资本接着大量渗进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能不更加深刻和尖锐。

美国帝国主义在战后大规模地蚕食衰败的大英帝国。

美国在英国本土的投资，已达到相当庞大的规模。据美国官方统计，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在英国的私人直接投资，从四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三十八亿零五百万美元。美国资本控制了英国汽车工业、农业机械制造业、炼油工业等部门的一半左右。英国市场上的许多食品、药品和生活用品，更满贴着美国企业的商标。英国人愤慨地用“美国的侵入”、“美国把我们变为它的殖民地”，来形容美国垄断资本势力的扩张。

美国越过英“帝国特惠制”壁垒，在英国本土开设企业，既着眼于英国国内市场，也为了便于伸入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把英国资本排挤出去，在加拿大更加形成压倒优势，在中东石油产地使英国资本屈居下手。美国资本势力迅速渗入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等英国海外投资重点地区，并到处打进英国最后扼守的各个殖民地。

美国在西欧大陆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投资，也大量增加。同在英国一样，美国在西欧大陆国家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和炼油业，特别是一些发展迅速和新兴的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为的是越过“共同市场”的关税壁垒，直接占领“共同市场”国家的国内和海外市场。

据美国官方统计，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在西欧“共同市场”六国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三十六亿七千一百万美元。一九三六年美国在德国的私人直接投资为二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在西德的私人直接投资达到十四亿七千二百万美元。

美国在法国的私人直接投资，一九三六年为一亿四千六百万美元，一九六二年底增加到十亿零六百万美元。美国资本力图控制法国一些关键性工业部门的做法，在法国已经引起了严重的不安。法国一些资产阶级报纸说，美国投资是派到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里面来的“许多特洛伊木马”，是要“把欧洲生活中许多方面的决定权转交给美国人”。这些报纸大声疾呼，必须不让美国“把法国和欧洲殖民化”。

美国资本势力也广泛伸进法国在非洲及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1页。

②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5页。



其他地区的殖民势力范围。

美国帝国主义战后使日本壟断資本集团从属于自己。美国控制日本的对外贸易，抓住日本的原料供应线。日本进口的工业原料、燃料、机器和粮食，相当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历年巨额逆差。美国战后对日本大量贷款和进行技术投资，私人直接投资在一九六二年底也增加到三亿六千九百万美元。美国已经从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日本的石油、钢铁、电力、化学等工业部门。近几年来，美国私人资本加速涌入日本，要把日本变成美国企业的一个海外工业基地，以扩大对东南亚的出口。

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战后吸收大量美国资本，也并不是束手就擒，甘受控制，而是相互利用，相互斗争。英国在战后经济窘境中，需要利用美国的“援助”和投资，来改善自己的黄金外汇储备景况，更新工业设备和技术，加强出口竞争能力。战后一段时期里，英国曾经一面从美国取得贷款，一面自己继续输出资本至海外殖民地，尽力抵抗美国资本对英国海外势力范围的进攻。法国也利用美国资本，来加快建立法国的新的工业基础，增加同美国抗衡的本钱。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败，需要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复活。在西德和日本壟断资本战后的恢复和发展中，美国的“援助”起了显著的作用。

美国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渗透，实际上更加促进了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分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斗争，目前正在激烈发展。西德、法国等六国结合在“共同市场”集团中，同美国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法国并提出，要

采取限制美国资本输入的措施。英国被关在“共同市场”门外，力图加强欧洲七国“自由贸易联盟”和英联邦集团，来同“共同市场”对抗。美国也不得不忙着部署对付来自西欧的“最大的挑战”。帝国主义阵营这样分裂为好几个国家集团进行重新分割市场的斗争，表明帝国主义矛盾正在进一步加剧。

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排除其他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狂想，已被打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美国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达到了顶峰，但是不久以后，帝国主义力量对比就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随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德、法国等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也日益要求获得同它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法国已经公开出来同美国分庭抗礼。英美矛盾更加深刻。日美矛盾日益表面化。美国战后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建立的一套独断专横的秩序，已经难于继续维持了。

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各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发展到了战后的一个新阶段。

四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壟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①美国帝国主义的实践，更加证实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特征的这一论断。

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依仗是暴力。为了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1页。



在国内维持反动统治，特别是为了保障垄断资本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权益，目前，美国的军事暴力机器加强到了和平时期空前庞大的程度。美国政府的军事开支，达到和平时期的最高峰。美国目前现役武装部队，达二百七十万人，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七倍；后备役部队，达四百多万人，超过战前二十倍以上。美国财神爷的守卫摆到了世界各地。美国现役武装部队的五分之二，即一百万人，驻扎在美国以外的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军事暴力机器这样发展，不能不对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经济已经纳入永久军事化的轨道，军事生产成为美国最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美国政府每年军事采购达到三百亿美元以上。在美国现役武装部队、政府军事机构和军事工业中直接为扩军备战服务的，即达八百万人。全国四分之三的科学技术人员集中在军事工业部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在卸任演说里承认，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永久的军备工业”，“这种巨大的军事机构和大规模的军备工业的结合，是美国的新经验。每个城市，每个州议会和联邦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能感觉到总的影响——经济上、政治上、甚至精神上的影响。”

美国已经成为经济军事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军国主义化最畸形发展的国家，成为世界上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

美国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

战争政策，大大加强了美国帝国主义本身的寄生和腐朽趋向。美国政府庞大军费和对外扩张开支在吞噬着自己。美国政府连年财政赤字，国债已达三千亿美元以上。国际支付严重逆差，黄金大量外流，美国黄金储备一九四九年为二百四十五亿美元，现在跌到一百六十亿美元以下。美国政府已经靠增加对外债务，来支撑岌岌可危的美元地位。对外扩张和扩军备战的沉重负担，首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美国企业把原料供应和加工生产更多转移到国外，不断扩大在国外投资的比重，而减少在国内投资的比重。由于进口更多的国外廉价原料和制成品，美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也在增长。垄断企业加紧进行工厂现代化和自动化，加紧对工人的压榨，来提高竞争能力。中小企业纷纷被压垮，被兼并。所有这些，都使得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劳动人民景况更加恶化。美国国内生产和市场矛盾的发展使得资本加速输出，而资本加速输出的结果又更加深了美国国内经济的矛盾，更促进了美国国内经济呆滞趋向。

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过程正在加速，国内的阶级矛盾正在加深。美国黑人群众性斗争的蓬勃发展，就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全面加速衰落，它犹如一棵被虫日益蛀空了的大树，虽然外面还维持着庞大的架子，内部却已经腐朽得很了。

美国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不管它怎样疯狂挣扎，也将难逃复灭的历史结局。



“八一”公社五年間

万 紹 鶴

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們江西省南昌縣“八一”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員，个个欢天喜地，热烈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五周年。

自从办起了人民公社，我們这里的变化真是大得很！生产大大地发展了，社員生活也提高了。

世世代代，我們农民作田全靠一条耕牛、一部水車、一把鋤头。如今在我們这里，已經很少能見到那些靠着小河旁，用几根木杆搭成的水車架；也很少看到那些小池塘边伊呀呀响着的老牛車盘。現在，我們有了拖拉机，有了电动抽水机，也有了打谷机和碾米机。春耕夏种，“铁牛”整天在田里跑；老天不下雨，也很有些办法了；磨谷碾米，也不用老牛啦！

我們“八一”公社处在贛撫平原上，东有撫河，西有贛江。这里怕洪水，又怕干旱。过去，三年难得一年好收成。如今，我們公社的二万五千多亩农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流灌溉和机电灌溉。电动抽水机，已成为主要的提水工具，只在极少数的零星高块田里，还用老水車車水灌溉。公社的拖拉机站，一年可以耕耙七千多亩农田。五年来，我們这里虽然碰到过几次严重的水旱灾害，

可是生产上都沒有受到大的損失。就拿去年來說吧，遇到了历史上不曾見過的大水和一連八十多天的大旱，可是仍然取得了好收成，粮食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八。从去冬到今春，一連二百多天沒有下过透雨，这是古今少有的春旱。在解放前碰到这样的坏天气，田非荒了不可。現在有了人民公社，再大的災害也难不倒我們了。今年，我們社里的二万多亩早中稻，获得了大丰收，收了稻谷九百零三万斤。“八一”大队的二千七百五十五亩早稻，共收干谷一百三十二万三千六百多斤，平均亩产四百八十斤。如果除去今年新开垦的三百四十八亩湖田的产量，平均亩产达五百一十多斤，超过了历史上最好年成的亩产量。

生产一年年上升，社員生活也愈过愈好了。社員說：咱們的日子像倒吃甘蔗，越吃越甜，越过越舒心。我看这話說得一点也不錯。

我們貧苦农民，在解放前哪家不是过的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許多人家逢年过节还打不开鍋盖。穿的就更不用說，一件破烂棉袄，要穿几十年，补釘落补釘，补了一层又一层。現在呢？全社三千一百多戶人家，一



万五千多男女老少，家家户户吃穿不愁。每家一年从集体中分到的粮食吃不完。过年过节，社员家里不是宰猪就是杀鸡。拿今年春节来说，全社就杀了二千多头猪。穿的，一年四季，单的、袂的、棉的样样齐全。过去十冬腊月还光着脚板在雪地里走路的人，现在下雨出门都穿上了套鞋、球鞋。许多人家，过去住在破烂的茅棚里，有的一家十几口挤在一间小房里，如今，许多社员都盖起了宽敞的砖瓦房。在最近两年，全社就有三百多户社员盖了新房。还有二千多户社员家里安上了电灯，有二百多户人家买了自行车和收音机。许多社员在国家银行和公社信用部还经常有存款。这些，都是解放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在人民公社化以前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天都实现了。

我们社里的文化福利事业，这几年的变化也很了不起。过去，我们贫苦农民的子女上不起学，识字的人很少。解放以后，特别是有了人民公社，因为生产发展，社员生活提高，我们贫苦农民的子女也能进学校念书了。全公社现在有十二所小学，在校学生二千九百多名，比五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公社化以后，又办起了一所中学，现有学生一百五十多名。许多青壮年中的文盲通过业余教育也都识字了。五年来，公社还培养了二百多名拖拉机手、抽水机手、农业技术员和医生等。公社还办起了一所医院、一所产院和两个医疗站。

公社对于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孤、寡社员，也都有适当的照顾，使他们过

着安定的生活。拿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说，公社和大队就拿出了一万四千多元公益金扶助他们。像社员曾毛头，一九五九年得了重病，公社拿出了四百多元，送他进县人民医院住了四个月，治好了病。社员章细塘，因为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去年他生病，在公社医院住了半年，完全是免费治疗的。这要是在解放前，他们不是家破人亡，也要满身债务了。

成立人民公社的这几年，我们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我想从亲身的经历来说。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前家里很困难。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地主，进行了土地改革，才翻了身。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农民都欢天喜地，有了土地，又不用交租，开始过起舒心的日子了。可是，我们世代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家底子都很薄，有了土地以后，还缺农具、缺耕牛，生产、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的家乡——濠溪万村，五十二户人家，土改后，还有二十户没有耕牛，不少人家缺少水车、犁耙。一九五一年插秧大忙季节，贫农万绍柳，因为自己没有牛，眼看着人家插秧，自己还没有翻田。这年夏天干旱严重，家家都要抗旱，贫农熊桂生因为没有水车，又借不到水车，眼看着七亩禾苗活活被旱死。土地改革后还不到两年，有些贫农、下中农就又欠了债，有的人又把土地卖了。像贫农万绍丰，就是不得已才把自己分来的田卖掉了二亩。

“小农经济好似独木桥”。农民只有走上



集体化的道路，才会有真正的好日子过，才能彻底翻身。自一九五一年起，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互助组，以后又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才一步一步地上升，生活才一步一步地改善。就说抗灾吧，当初我们组织了互助组，很好地发挥了原有提水工具的作用，增强了抗灾的力量。成立了初级社，我们有了五架铁牛车盘，抗旱排涝的力量又增强了。到了高级社，社里的劳动力增多了，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办社两年，我们买了四部煤气抽水机，抗旱排涝的能力又比初级社大多了。

但是，互助组、合作社还不能完全满足我们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要求。比如说，在合作社时期，我们很想多种些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可是那时感到力量单薄，不敢多种，因为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又非常分散，这个社和那个社的农田交错在一起，不能有计划地开挖灌溉渠道。碰到严重的水旱灾害时，要修建大的水利工程，就更感到力量不足。例如，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夏秋受旱，当时的“八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千多亩水田种了一千五百亩双季稻，因水利设施不够，劳动力少，部分田就没有收成。一九五八年夏季，种了二千亩双季晚稻，插下秧后，发生了严重的干旱，湖塘都现了底，眼看禾苗要干死。我走了八里路，到了抚河岸边，看到河里有水，可是怎么引进来呢？拦河筑坝吧，全社劳动力一起上阵，十天半月也修不起来。这一年，多亏和附近的几个兄弟社联合了起来，用七天

的时间筑起了坝，禾苗才得了救。

在抗旱斗争中，我们农民都亲身体会到联合起来力量大，不联合起来，各干各的不行。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周围的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八一”人民公社。从此，我们的路就越走越宽了。

过去，水旱灾害是这里农业生产的大敌。我们祖祖辈辈都想治服水旱灾害，可是办不到。直到公社化以后，修建了赣抚平原水利工程，才改变了过去这里“晴三日旱死，雨三日浸死”的状况。赣抚平原水利工程，是江西省最大的农田灌溉工程之一。修建这样大的水利工程，可不简单啊！没有国家的扶助，没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是办不起来的。修建整个工程的事我不说了，只说改变旧的水利设施，建立新的水利设施，要挖掉一部分农田这件事，别说单干的时候办不到，就是在合作社时期也很困难。我们从前办过的莲溪农业生产合作社，总共才有二百多亩田，全部拿来挖渠道也不够。只有人民公社化以后，依靠公社集体的力量，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才能顺利建成这个工程。公社对因水渠占去土地的生产队，也都作了适当安排。我们社里的杰楼生产队，因为修水渠被占去了一部分土地。公社根据他们队的具体条件，安排他们专门种蔬菜。种菜用工多，收入也大，因此杰楼生产队社员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个冬春，我们依靠公社的集体力量，大兴水利建设，开



挖了大小十三条共长五十里的排灌渠道，把大河里的水引进来，一下子使七千多亩易旱易涝的农田，不需要任何提水工具就能自流灌溉，加上又添置了大批排灌设备，现在我们社里是清水长流，再也不怕水旱灾害了。

人民公社的人多、力量大，扩大了经营范围。公社、大队举办了石灰厂、农具厂、砖瓦厂。有了这些企业和其他各项副业，大大增加了收入，增多了公共积累。公共积累增加了，就有更多的钱可以购买农业机械。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公社、大队先后拿出了二十七万多元公积金，购买拖拉机、电动抽水机和其他农业机械。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八一”大队的公共积累，平均每年有一万多元，比高级社时期增长了一倍多。去年秋旱时，“八一”大队一下子就拿出了七千多元，买了七部电动抽水机。

现在，我们全公社已经有了六台拖拉机，五十五部电动抽水机，十部内燃抽水机，三十三部打谷机，十三部电动碾米机和其他机器。有了这些机器，我们就实现了排灌机械化、耕作部分机械化以及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部分机械化。

我们的农业机械虽然还不算多，可是这些机器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是过去合作社时期不能比的。一九五三年合作社时期，这里遇到了几十天的干旱。当时我们“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动员了全社六百多名劳动力，和所有的抗旱工具，坚持苦战了六、七十天，才战胜了旱灾，保证了晚稻的好收成。去年遇到了八十多天的干旱，可是这回

只用了十几个人去抗旱，其余的人照常进行耘田、积肥、追肥，旱灾就被战胜了。就这样，十几个人作了过去六百多人作的事，还没有过去那样劳累，晚稻同样得到了好收成。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现在用的抗旱工具，已经不是古老的水车了，用的是电动抽水机。

使用这些新机器，别说单干的时候办不到，就是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也有困难。一台拖拉机，要耕四百亩水田，一台抽水机，也要灌几十亩、几百亩田。单干时候，一家一户，几亩、几十亩田，还是东一块、西一块，哪能用得上这种东西。合作社时候，土地多了一些，一两台拖拉机也就够了。但是维修又成了问题，总不能为这一两台拖拉机设一个修理厂。自己不能维修，出了毛病，拿不动，扛不走，拖拉机就会成为废物。出一点毛病就请人修理，修理费也拿不起。再说，要添置一台拖拉机、一台电动抽水机，动不动就要几千元、上万元，单干时谁能买得起？解放前，我想买一套纱和鞣，苦干了四年，还是没买成。许多农民干一辈子，还买不起一条牛、一张犁，哪里能有钱买机器。一九五三年初级社时候，遇上了干旱，我们的社员看到附近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用抽水机抽水灌田，大家都说这是好东西，很想买，可是没有那么多的钱。直到高级社时期，我们才买了四部煤气抽水机，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事。

今年旱情特别大，赣抚平原水利干渠水位低，水流不进我们社里各条支渠来。断了



水源，春耕、播种就不能进行，情况很严重。就在最紧迫的时候，公社立即拿出了一万多元，买了七台较大的电动抽水机，帮助各大队把干渠的水抽到支渠来，解决了春耕、播种育秧的用水问题，适时插下了早禾。夏旱虽然也很严重，但是所有稻田一天也没有缺过水。今年早中稻能够获得空前大丰收，社员们都說这是人民公社带来的“金满斗、谷满仓”。

我们的人民公社，五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越办越好。我们社员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公社紧紧联系在一起了。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思想，已经在社员里扎下了根。

我们公社社员支援国家建设的热情很高。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五年中，全社向国家交售了二千一百多万斤粮食，三千多万斤蔬菜。社员还积极向国家交售肥猪、家禽、鲜蛋等农副产品。五年中，共交售了二千多头猪，二十多万只家禽，以及大批鲜蛋等。今年上半年，我们原定向国家交售二百五十多万斤粮食，早中稻大丰收后，社员主动要求多向国家交售一些，现在实际已经交售了三百二十多万斤。社员们說，没有国家工业化，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援，哪能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哪里有今年的大丰收！哪里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为家出一分力，国家带给我们的是十二分的好处啊。

社员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对集体的财产也很爱护。我们社里有个名叫公海水的社

员，他是个抽水机手。在今年春旱严重的时候，他整日整夜地守着抽水机，不肯休息。有一天他正在渠道边抽水，突然来了大雨，为了保护机器，他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盖上，宁可自己赤膊淋在大雨中。雨停了，他又挺着快冻僵了的身子继续抽水。去年夏天洪水特别大，我们渠道上的一座渡槽被水冲垮了，凶恶的江水直冲下来。为了不让大水淹掉禾苗，社员吴俚仔，不顾生命危险，跳到急水中用草袋堵住缺口。我们社里还有个老社员陈万发，他的儿子、媳妇、孙子都是好劳动力，完全可以供养他。但是他还要主动地为队上放牛、捡粪，做些他能够做的活。生产队的干部劝他在家休息，他也不肯休息。年轻的女社员刘小妹，今年月月超额完成定勤任务，天天像男社员一样在田里干活。

像他们这样的社员是很多的。

社员们常爱这样說：“天大，地大，没有国家、集体的利益大。”先国家、后自己，先集体、后个人，在我们公社里，已成为风气。我们的社员，心里开朗，干劲十足，大家都为进一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努力生产。

我说了上面这些，不是說我们“八一”人民公社现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走上集体化道路还不久，公社建立只有五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哩。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更大的干劲，把我们的人民公社办得更好。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农业劳动模范、南昌县“八一”人民公社社长）



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 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 甘 子 玉 ·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我们要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正确认识与运用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要在自然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正确认识与运用自然界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同自然界进行着复杂的斗争。我们正在逐步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例如，改良土壤、绿化荒山、兴修水利、改造沙漠等等。我们正在积极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利用大自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动力和矿产资源，进行工业生产。例如，采掘矿石，生产动力，冶炼金属，制造各种化工材料；并在这个基础上，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和交通运输工具，建设新的工矿企业，生产各种人民生活用品。我们同自然界的斗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了，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入认识自然规律，并用以指导生产活动。

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

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①人们认识了自然规律，就可以预计到它的作用，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利用它的有利作用，避免或限制它的不利作用，或者把自然的破坏力引导到为人们需要的方向上来。比如，对于江河的水害，人们如果不认识它的规律，当洪水到来的时候，在灾害面前就会束手无策。当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水文资料和其他科学调查资料以及总结了实践经验之后，人们就能够制止水害的破坏力，使水害变为水利。又比如，我国南方某些丘陵地区的红壤，土壤贫瘠，土壤结构不良，种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很低；而当人们认识了红壤的性质和豆科作物根部的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氮的作用之后，经过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就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理办法：施磷肥、种豆科作物，实行合理的轮作制度。这样做，不但能使土壤中的氮素增加，而且可以逐步改善红壤的结构性能，使红壤逐步变成肥沃的耕地，以利于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中也是如此。每一项工程的顺利竣工，每一种产品的优质生产，都同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物质的规律分不开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规律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4—195页。



的認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人們也就能更加扩大利用自然界的范围，在更大程度上征服自然。許多过去不能利用的資源，現在可以利用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人們只能采集、猎狩天然存在的魚、兽、植物，制作石器工具；然后人們学会了制作青銅工具和铁器工具；后来人們又学会了使用水力机械、蒸汽机、复杂的机械、电能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們利用了各种各样的資源，利用着自然界所存在的各种能源（太阳能、水能、可燃矿物、核能等），发展着自动化生产，制造出許許多多具有各种特殊性能的生产工具和自然界所沒有的“人造材料”，农作物的产量不断地提高，工业生产的規模和种类成倍成倍地扩大。

自然規律是客观存在的，人們可以根据自然規律去改造自然，但是，人們不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廢除、改造自然規律，否則就会对生产斗争造成严重危害。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認識。人們在变革自然中的胜利，是人們按照自然規律行事的結果。違反自然規律，人們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懲罰。

違反自然規律的严重后果，有的是在当时或短时期内就会暴露出来。例如，无视电流的規律，无视各种不同物质具有不同导电率或不同絕緣能力的性质，在供电、配电系統和用电装置中不采取应有的絕緣和安全措施，就会发生严重的設備事故和触电事故。

人們在变革自然的活动中，如果違反自然規律，即使在当时收到一定的成果，可是經過較長時間以后，却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在坡地进行不适当的垦荒，短期內可能有一些收益，但却带来水土流失的結果。又

比如，在机械設備的生产中，应该进行一小时热处理的零件，只进行半小时的热处理，似乎可以减少工时，提高生产的速度，可是零件的机械性能就达不到要求，制造出来的机械設備就会縮短使用年限。在自然斗争中，我們能否正确估計生产活动的較远的影响，是能否正确掌握与运用自然規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規律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是可以被認識的。人們認識自然規律的根本途徑只能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种認識正确与否，也必须通过这两种实践的验证。

毛澤东同志指出：“首先，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經過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①

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史表明，生产的需要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人們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索自然規律；生产中提供的各种实验工具和器材，給科学技术的研究試驗提供了物质条件。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人們对自然規律的認識，归根到底，也是以生产活动中所积累的丰富感性材料为源泉的。从古代民族的游牧活动和农业活动的經驗中，产生了最早的天文学。其后，农业灌溉工程、城市建筑、手工业的发展，使力学发展起来了；酿酒、冶炼、制药和其他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1頁。



化学生产的活动，发展了化学，等等。近两三百年来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技术改革，更是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基础科学和一切应用技术发展的基础。近二三十年来，原子能、喷气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有机合成化学、各种新型材料等工业的兴起，一方面，它们是在生产中应用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果，另一方面，它给人们认识自然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地发展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人们认识的两个飞跃，不但深刻地概括了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过程，而且也深刻地概括了对生产斗争的认识过程。

第一个飞跃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在生产斗争中，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反复观察到事物的许多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和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些认识，一般是作为生产经验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生产经验，经过总结、提高，在人们的脑子里就产生了科学的概念，认识到这些自然现象的本质，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拿农业生产中的密植措施来做例子。人们在农作物高额丰产的经验中，肯定了密植能够增产。然而，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人们对于密植与其他农业生产因素（如水、肥、土、种、田间管理、轮作栽培制度、劳动力等）的内部联系，对密植与各项自然条件的联系，是不很清楚的。只有综合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并通过试验，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总结，经过科学的推理、判断，才能形成合理密植的科学认识，正确地掌握了作物在播

种、栽植和生长过程中密植的规律性。没有生产实践的经验，我们不可能形成对密植增产的正确认识，但是不经过科学的试验、总结、推理、判断，我们也不可能认识合理密植的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

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目的，不仅在于能够解释自然现象，而更重要的是根据这种认识去变革自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②。比如，当我们根据生产经验的总结和典型试验，提出了某一地区、某种作物的大体上的合理密植方案，还必须拿到实际的大田生产中去检验。如果这个方案的预期目标达到了，或大体上达到了，那么，这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即在当时条件下对合理密植问题的认识）才算是完成了。我们对某一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或大体正确，只有通过生产实践（有时则通过科学实验的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除了生产斗争之外，进行科学实验也是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重要途径。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

^{①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页。



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自然科学的实验，作为人们认识自然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在十七世纪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而开始大量地应用起来的。在这以前，自然科学的知识，大都是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运用着比较简单的观察和推理方法而取得的。正像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只有当工业巨大地发展起来，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工具，并使新的仪器的制造成为可能，这个时候，才可能有真正的系统的实验科学。人们一经运用了科学实验去研究自然界，就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空气唧筒等科学实验和观察用的仪器装备相继发明并被广泛应用。人们开始使用机器。由于当时航海、造船、采矿冶炼和军事等的需要，人们揭示了許多自然规律：托里拆利从实验中证明了空气压力的存在，波义耳发现了气体压力定律，笛卡儿创立了解析几何学，牛顿和莱布尼兹创立了微积分学。这个时期科学实验成果的积累，带来了牛顿在力学和天体力学上的伟大发现。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科学实验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进行生产斗争的必不可少的前哨战。今天，对微观世界物质结构认识的日渐深入，原子核能的释放，电子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飞快进展，各种新型材料的发展，对生命现象的深入研究，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等等，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为什么科学实验对人们认识自然规律起着这样巨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实验可以借助于精密的仪器的运用，在人为的控制下，把自然界的进程或生产过程加以简化或者缩小。在科学实验中，可以剔除一些次要的或偶然的因素，增加、减少、变化、固定一些因素。这样就有可能透过头绪纷繁的自然现象，揭露它的基本的变化过程，研究各个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并且进行对各个对象和因素的综合研究，从而可以比较精确地发现支配自然现象或生产过程的规律。比如，为了定量地研究光照、气温、水分、各种营养成分等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人们建造了能够准确控制上述条件的“人工气候室”，以便进行在一般自然环境中难以做到的精确的系统的观察。

第二，在科学实验中，人们可以创造出地球上天然所不存在的特殊条件，比如，高温、高压、低温、高真空、高速度等，使物质变化的过程，向指定的方向强化，这样，就有助于揭开自然的奥秘。由于各种仪器的运用，又大大地扩展了人类器官所能观察到的范围，比如，光学显微镜能够使人们看到细菌，而电子显微镜则使人们能够观察病毒，这些都是用肉眼所不可能看到的。人们还运用了許多特定的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很方便地模拟自然过程和生产过程，有时还可以在短促的时间内重演这些过程。比如，人们通过高电压试验装置来研究雷击对绝缘子、避雷器等的作用，通过繁殖很快的果蝇来研究遗传的规律等。这些都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能力。

第三，通过科学实验来寻求变革自然的方法，往往是一种最经济、最可靠的途径。



因为通过科学实验，可以在小得多的范围内，验证我们的设想、方案是否合乎自然规律，然后拿到自然界或生产过程中去实际应用，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损失，少走许多弯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实验常常是人们变革自然的必要的准备阶段。农业方面要种试验田，工业方面要有试验室研究和中间试验，技术革新运动中要实行一切通过试验才能大量推广的办法，都是这个道理。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实验是人们有系统地精确地深入地认识自然规律的一种有效方法。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探寻自然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科学实验验证自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亲自参加科学实验，常常是直接认识某些自然规律的必要条件（当然，通过生产斗争也可以直接认识某些自然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①

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是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源泉，是人们检验这些认识的标准。两者应该互相补充、互相结合，而决不是互相割裂、互相排斥的。

有一种认识，以为我们只需要生产斗争的经验，把科学实验看作是脱离生产实际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它没有看到科学实验在认识自然规律中的重要意义，没有看到科学实验的成果对生产斗争的指导作用。科学研究实验的成果，常常为生产开辟新的途径。有些科学实验工作，发现了新的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虽然当时还不

能看出它的实际用途，但是，在将来总是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生产斗争发生作用的。比如，在核物理研究的初期，人们还不能断定它的具体用途，但是后来却带来了核能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的巨大影响。

还有一种认识，以为只有科学实验是认识自然的唯一方法，忽视了生产斗争是人们认识自然的最基本的实践，这当然也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讲，科学实验的需要是从生产发展中提出来的，生产推动科学的进步。科学实验不为生产服务，不同生产紧密联系，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同时，科学实验能够达到的水平，是由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实验装备和材料的技术水平来决定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科学实验所处理的，是简化了的（或缩小了的、模拟的）、在人工控制下的过程，它不能替代从大量复杂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的丰富材料和经验，而且，生产活动中所提供的新问题、新现象，往往是科学创造的来源。科学实验的成果，在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的时候，还需要生产实践的经验来验证，并把它更加丰富和完善起来。

在实际生活中，科学实验和生产活动常常交错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截然割裂开来。一般地说，在工业方面，试验室的实验成果，往往需要通过中间试验，才能用于生产；在中间试验当中，科学实验和生产过程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小面积土地上或人工控制条件下的实验成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果，需要通过大田試驗，才能适合大面积推广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农业上的綜合性技术措施，如栽培技术的改进等，需要在农业生产中总结群众經驗并加以研究提高，才能用于大面积的生产。工业中大量的工艺問題的解决，一般也宜于結合生产过程进行試驗，以便更好地适应生产条件，易于推广。还有許多科学技术上的实验研究，必須或宜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比如，一些大型机械设备的試制，其中的科学技术問題，在模型試驗中有时不能全部解决，有的还要留在試制过程中边試制、边試驗才能解决。因此，开展工厂和农場現場中的研究試驗活动，同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适当地分工、配合和相互衔接起来，对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毛澤东同志还指出：“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許多时候須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預想的結果。”^① 任何一个科学理論体系的建立，任何一个科学定律的发现，任何一个发明、一个新产品的試制乃至一項技术革新，往往都需要經過多次反复、多次修改，

有时还經過了許多重大的挫折失败，才能最后获得成功。因此，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我們要提倡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态度。当主观的設想、方案同实践的结果不一致时，就要虛心地周密地檢查原来設想中不符合客观規律的地方，及时地加以修改。同时，我們又要有坚持試驗、不怕失败的勇气。因为越是重大的創造、革新，所遇到的困难挫折可能越多，只要实践证明它的方向是大体正确的，是有科学根据的，那就要百折不撓地坚持試驗，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認識，一直到能够符合或大体符合客观規律为止。沒有这样的精神，不經過这样的艰苦钻研的过程，就会半途而廢，得不到正确的認識和預期的結果。

今天，我們正在进行着向大自然开战的复杂斗争，我們要建設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現代科学技术和現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密切地交錯在一起的。我們要投身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偉大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学会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掌握馬克思主义認識論这个武器，并用以指导認識和运用自然規律，这是取得生产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32-233頁。



红旗

HONGQI

22⁰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二期 ★

目 录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
- 历史的教训 (2)
- 最大的骗局 (5)
-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7)
-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11)
- 是斗争还是投降 (14)
-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17)

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 钱学森 (19)

对农业科学工作者和群众结合进行研究的

- 一些体会 俞启葆 (28)
- 在所谓“生而自由”的国度里 陈 原 (34)
- 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 王 方 (39)

☆ 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



在战争与和平 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



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①。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②。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③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④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

①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0页。

② 《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8页。

③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

④ 考茨基：《民族问题》。



和平騙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①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險，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②这些老修正主义者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③。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④这些老修正主义者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⑤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⑥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⑦。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⑧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

①②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③ 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2 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1910—1913）》第 2 卷。

④⑦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⑤ 《社会党国际 1919 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⑥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⑧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①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②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③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④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抗的了。”⑤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⑥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⑦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斯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① 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2 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1910—1913）》第 2 卷。

② 考茨基：《再论裁军》。

③④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⑤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⑥ 《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37 页。

⑦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74 页。



最大的騙局

世界上最大的騙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說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陣营之間的中間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十八年来，連續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現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論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們說，出現了能够清醒地估計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魯曉夫曾經贊揚艾森豪威尔，說“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絕對信任的人”，“真誠希望和平”，“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魯曉夫現在又贊揚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的人，“表现出对維護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創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謊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魯曉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勁。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們这种謊言的人提出質問說，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嗎？”

他們显然不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謂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場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壟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敗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詞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騙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〇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



苏联所有的‘軟’的和‘半硬’的軍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們許多极为坚固的導彈发射場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們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核導彈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導彈的核潛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揮下的北大西洋集团軍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貼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軍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軍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試驗場，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經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揮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統轄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調动他們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軍事指揮中心，还組成了分別設立在飞机和軍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揮所和紧急海上指揮所。

这些事实說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軍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見，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魯曉夫向它念聖經、唱頌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魯曉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薩。在这方面，不管赫魯曉夫怎样給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絲毫不給赫魯曉夫賞臉。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魯曉夫的耳光，宣告赫魯曉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謬論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辯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問題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險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們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訴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問題，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毛澤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論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澤东同志在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談話中就說：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強調美苏战



爭，鬧得烏烟瘴氣，就使人不能不來看看他們的實際目的。原來他們是在反蘇的口號下面，瘋狂地進攻美國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國向外擴張的一切對象國都變成美國的附屬物。我以為，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只有這個鬥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①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話，是針對着當時對於國際形勢的一種悲觀估計說的。那時候，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日益加緊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鼓吹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蔣介石反動派也大肆進行這種宣傳，來吓唬中國人民。當時有一些同志，對於這種詭詐，產生畏懼的心理，在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反動派發動的武裝進攻面前，表示軟弱，不敢堅決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毛澤東同志則相反。他指出，只要對世界反動力量進行堅決的有效的鬥爭，新的世界大戰就可以避免。

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論斷，已經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所證實。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國際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澤東同志指出：

“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同志在各國兄弟黨會議上，詳細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的變化，論證當時國際形勢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他借用中國古典小說中一句成語“東風壓倒西風”來形象地比喻這種形勢。他說，“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点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③

毛澤東同志是從國際階級關係的分析中得出這個結論的。他很明白地把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都放在“東風”的一邊，而“西風”只限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戰爭勢力。這個比喻的政治含義是異常清楚和確切的。蘇共領導及其追隨者把這個比喻歪曲成為地理的、種族的或者氣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們硬要把自己擠進“西方”的行列，來討好帝國主義，煽動歐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義。

毛澤東同志提出“東風壓倒西風”，主要地也是為了論證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增長

①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頁。

②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報》。

③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頁。



了，社会主义国家爭取和平建設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論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見，說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謠言。

可見，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論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魯曉夫的什么“創造”。

可是，赫魯曉夫真的一点儿創造也沒有嗎？不，創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謂創造，絕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魯曉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說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須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險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員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險。按照他們的論調，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經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險丧失警惕。

第二，赫魯曉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說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經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錯誤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剝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經過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規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談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論点以后說，“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①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魯曉夫是錯誤的。

历史告訴我們，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則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連續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

^① 《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版，第27頁。



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①。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②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③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④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①②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4—75、75页。

③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页。

④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页。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誰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不隱蔽自己的观点。我們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說，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偉大的战争”^①。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們好战，那只能证明我們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罵布尔塞維克“好战”，咒罵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領袖“好战”的。我們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罵，正好說明我們高举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魯曉夫等人大肆宣揚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論調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論。他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訛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論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理論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現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規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在本世紀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現以后，已經沒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們說，“原子彈不遵循阶级原則”，“原子彈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袭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壟断資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計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現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須放棄革命，必須放棄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則，人类就要毁灭。他們說，“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災的星星之火”；“現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們将会毁灭自己的諾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訛詐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魯曉夫說过，“毫無疑問，一場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話，必然会

^① 《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5頁。



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們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們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聳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們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們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們，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誰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使用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們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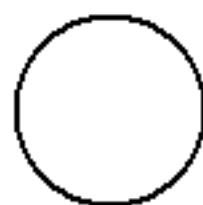
我們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們願意指出，偉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紅軍过去是，現在是，将来也会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訛詐基础上的赫魯曉夫的軍事思想却是完全錯誤的。

赫魯曉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現代軍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軍和海軍已經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減而是要被代替。”

担負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輕重了。他說，“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們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軍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話下。赫魯曉夫有一句著名的話：民兵，对于有現代化武器的我們來說，这不是軍隊，这是一堆肉。

赫魯曉夫这一套軍事理論，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軍隊的学說，照这种錯誤方針做去，只能瓦解軍隊，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魯曉夫的錯誤的軍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險的境地。

赫魯曉夫尽可以給自己加上“偉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給自己頒发“和平奖金”，給自己戴上英雄的勳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輕率凶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險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訛詐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爭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針。

針鋒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經驗。

毛澤东同志說：

“蔣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对，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办法办事。”^①

他还說：

“蔣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們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②

^{①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126頁。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說过：

“‘針鋒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对；有时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对。……人家打来了，我們就打，打是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①

毛澤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針鋒相对、寸土必爭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②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針鋒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針鋒相对的斗争方针。我們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針鋒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針鋒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說，同帝国主义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嗎？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許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許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們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張爭取和緩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

毛澤东同志說，“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願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③

① 《关于重庆談判》。《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158頁。

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针》。《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128頁。

③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讲话》，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他还說，“美国壟断資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絞刑。”^①

一九五七年宣言說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們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辯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說，你們主張針鋒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絕談判。这也是乱說。

我們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絕談判，这絕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經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談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絕談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东同志說，不論是全面的和平談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談判，我們都应当做准备。“我們不应当怕麻煩、图清靜而不去接受这些談判，我們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談判。我們的原则性必須是坚定的，我們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談判。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談到朝鮮停战談判的問題时說：

“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現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願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問題，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撓談判的进行，則朝鮮的停战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③

經過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談判中接受了朝鮮的停战协定。

我們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會議，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貢獻。

我們对于侵占着我国領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張同它坐下来談判。中美大使級会談已經进行了八年多。

我們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撾問題的日内瓦會議，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撾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協議的簽訂。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許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談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談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

①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437頁。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會議的开会詞》，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保卫世界和平的談判，我們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澤东同志說过：

“我們支持首腦會議的召开，不管这种會議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①

我們贊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談判。但是，絕對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談判，散布对于談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說，赫魯曉夫这样一种对待談判的錯誤态度，对于談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魯曉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擇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魯曉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談判迷的姿态出現，結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綜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我們同苏共領導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計劃，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綫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貫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綫。我們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陣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統一战綫。

我們所主張的这条路綫，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規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綫的。

按照这条路綫，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綫，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陣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綫，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綫，就可以充分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綫，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詐，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計劃。

^① 見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科学技术的組織管理工作

錢 学 森

科学实验，是建设我们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一。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随着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研究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学技术的組織管理工作。这是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就必须充分地运用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计划地有組織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因此，加强科学技术的組織管理工作，

是关系到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高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的科学技术的組織管理工作，是在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是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因此，我国科学技术的組織管理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必须实行政治挂帅。

这里，就科学技术組織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意见。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是一个科学技术研究或研制*单位内部的組織管理工作；至于全国范围的科学技术組織管理问题，那是社会主义建设組織与计划的一部分，不在这里多谈。

科学技术組織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现代科学技术特点之一是分工细、专业多。光说某一位科学工作者是数学家还不足以明确他的专业，必须进一步说清楚他是数论工作者还是代数工作者，是几何学家还是拓扑学家，是函数分析专家还是微分方程专家。同样，光说某一位工程师是冶金工程师也不足以明确他的专业，还必须进一步说清

楚他是炼铁工程师还是炼钢工程师；是有色金属冶金专家还是稀有金属冶金专家。不但在一门学科里分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而且又不断出现老学科之间、不完全属于一门老学科的边缘学科，如化学物理、地球化学、

* 研制是发展新产品过程中的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统称。



生物物理、物理力学、天文物理、地质力学等。有人說現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的数目不是几十个，也不是几百个，而是几千个，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分的这么細？这是由于人們对自然界的認識逐漸深化。現代科学技术的内容非常丰富，决不是一个人在一生中所能全部掌握的，要能在一生的头二十几年基本学会一門，就非这么細分专业不行。

現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特点是，研究工具的复杂化、大型化，以至設計、使用和維修这种研究工具，也成为一套专门的技术，需要专业的人員。我們常說的例子是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工作者使用的高能加速器，或是气动力学工作者使用的超声速風洞。这些誠然是突出的例子，每一台这样的装置要耗費几千吨的鋼材，运转时要几千瓩以至几十万瓩的电力，要几十人以至百人的专业的使用和維護队伍。但是，就是在普通的实验室里，現在也与五十年前或甚至二十年前大不相同，到处是光谱仪、紅外光谱仪、质谱仪、各种磁共振仪、色谱仪、高真空泵、各种示波器、各式各样的电子仪器和设备。它們使試驗工作者能非常敏銳地观察現象，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确度；但这些研究工具也必須經常地調整、标定、維護。这本身就是专业技术。有人把这种趋势称为“科学的技术化”。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使得理論体系日臻完整；除了极小的世界如基本粒子、原子核，或极大的世界像总星系等之外，我們对自然界的認識，包括生物現

象，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今天的成就不会一成不变。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将来科学技术的新創造，只能使我們对自然界的認識更深入一步和更充实，而不会根本推翻我們今天的認識。有了这么一个基础，現代科学技术工作者感到任何建設任务在原則上都是可以办得到的：如果要造一条跨度为五十公里的桥，那也办得到，只要組織一支必要的科学技术力量；如果要朝下钻入地壳一百公里，那也是办得到，只要組織一支必要的科学技术力量。問題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权衡整个国家現阶段建設的需要，决定“要不要”。

現代科学技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实验室研究到工程技术上实现的时间大大地縮短了。人們往往在实验室看到苗头，就能相信工程技术上的实现必然到来，从而如果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就立即組織力量，全面开展工作。例如，在原子能事业的早期，当钚 239 的化合物还只有几微克的时候，一弄清楚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证明它的用处，就开始設計产几公斤钚 239 的工厂，一下子就从微克量到公斤量，扩大十亿倍！这种情况，就自然要求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設計師密切配合，并肩战斗。这也可以称为“技术的科学化”。今天的所謂尖端技术，原子能利用和星际航行，每一方面都有一支成千成万的各个专业的科学家、工程师、設計師、工艺师所組成的綜合队伍在工作着。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科学技术的专业分工尤其重要。現在我們的科学技术人員



为数还少，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让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让我国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地培养大量有政治觉悟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青年科学技术干部。根据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从大学毕业到能独立工作，一般要五、六年，而且要能在五、六年内“立业”，除了本人的干劲和专家的指导之外，还必须让每个青年专于一行。举个例子：光说让那一位青年搞力学，那范围就太宽；说让他搞力学中的物理力学，那是学科的细分枝了，也还嫌太宽；还要比学科分枝再细，专让他搞一个小方面的问题，如超高温气体的热力学、或超高温气体的输运性质。再如光说让那一位大学毕业生去搞火箭发动机，那范围就太宽；说让他搞火箭发动机里面的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那是工程技术的专业了，也还嫌太宽；让他搞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部分组合、操纵系统吧，那还不够细；我们必须具体指定让他搞操纵系统里面的一个部件，如压力调节器，那才能行，才可能在几年之内把他培养成一位这类压力调节器的专家。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任务，一般是综合性的。如果任务

是总结陈永康同志的水稻丰产经验，或是曲耀离同志的棉花丰产经验，那就不只是水稻作物栽培专家或棉花作物栽培专家的事，植物生理专家、农业气象专家、土壤专家、微生物专家、昆虫学专家、农业化学家等都得参加；甚至于为了弄清楚其中机理，得出理论规律，还需要某些专业分枝的力学工作者、物理学工作者、化学工作者、数学工作者来参与研究工作。所以，一方面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培养科学技术干部要把专业分得非常细；另一方面，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一般又带综合性，要多方面、多专业的工作者共同来完成，做到互相配合，步调一致。这就需要组织计划工作。这也可以称作是科学技术的参谋工作。

现代科学技术工作所需要的复杂而庞大的研究工具必须有保证，不然研究工作是无法顺利进行的。但是，保证这种研究条件的工作本身，也必须有专责分工的人员来作，不专也是搞不好的，不分工也是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专业干部来的。这方面的工作就是科学技术的后勤工作。上述参谋工作和这里所说的后勤工作，可以统称为科学技术和研制工作中的组织管理工作。

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的内容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研制工作中的组织管理工作，可以具体划分为计划工作，器材设备工作，机械和设备的建设与维修工作，情报资料工作等方面。

计划工作的第一项内容，就是长远规划，也就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家总的发展规划，并参考世界科学技术的现状，作出全面的科学技术长远规



划。这样一个规划，对每一个科学技术方面或每一个学科来讲，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还缺少具体的安排。每一个方面或学科的计划工作者，还需要在全面、长远规划的基础上，作仔细的计算和分析，制定详细的事业规划。也就是根据研究或研制工作的科学技术内容，结合各项有关人力、器材、设备和基本建设的统计资料，制定机构设置、人员培养、器材要求、设备条件和基本建设的规划。这种细节的计算和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要开展一项研究工作，往往会提出一连串有关特种材料，特种工艺，新测量技术，高精密度分析，重大设备，以及在高等院校设置新专业等的要求。要把这些条件搞清楚，提早作好准备，不然就不能为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研究规划就不落实，就不能按要求的进度执行。

计划工作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年度计划，这是一个单位*的一年研究或研制计划。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必须密切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把计划定得既能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又要留有余地。但也要看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研制工作总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在制定年度计划的时候，不可能把一切都预见得那么准，要准备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出现没有预计到的情况；而且计划总要人来执行，人的因素也会有这样和那样的变化。因而计划会要调整，在个别情况下，还会对原来的计划作较大的修改。这就是说，计划工作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光有计划而没有紧密的计划检查，不能只有计划而没有计

划调整和修改。不然的话，计划是计划，工作是工作，两者会脱节，研究和研制计划就不会起推动工作的作用。当然，要达到这种要求，计划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到科学技术工作第一线上去，了解工作进展的情况，参加研究和研制工作的讨论会，了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見和看法；也就是要使计划人员与科学技术第一线工作人员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制定年度计划的时候，也必须合理地规定研究课题的经济指标。说研究或研制工作可以不讲经济效果、不算账，那是错误的，是造成浪费的原因之一。

在编制年度科学技术工作计划的时候，往往要解决单位内和单位之间协作的问题。一项综合性的课题，要具体落到科学技术工作人员身上，必须先要把任务进行分工，哪一部分安排给哪一个研究室、哪一个设计室、哪一个试验室，或哪一个工作组去做。这是单位内的协作。也常常会有一项工作要外单位完成的，这就是单位之间的协作。这些协作，可以由下级提出，请求上级安排；也可以在上级领导机关把任务分解成几个部分，安排在不同的研究单位，组织协作。

计划工作部门，还应当组织有关科学技术人员进行成果鉴定，督促编写科学技术报告、技术资料，这是科学技术和研制工作的最后成品，必须抓紧。其实，成果鉴定也不能只在本单位内的范围来做，总要依靠群众来最后鉴定。因此，计划工作部门还应

* 这里说的单位是总人数由几百到一千左右的科学技术研究或研制单位，以下都是这个涵义。



組織各種學術討論會和科學技術工作交流會。這種會議規模不要太大，主要由同行的人參加；都是行家，就能關切地進行討論，互相促進，交流推廣。

計劃工作，是為一個科學技術研究或研制單位的領導所做的參謀工作，但是科學技術工作計劃一旦被批准，就成為全單位的行動綱領。在這個意義上，科學技術計劃工作在全單位起着主導作用。

現在來談器材、設備工作。器材工作人員應當根據一個單位的年度研究或研制計劃，和歷年工作的統計資料編制年度的器材計劃，它包括各種儀器、儀表和品種繁多的消耗性器材。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自然要熟悉本單位器材需要的情况，熟悉國內生產的器材品種規格和它的性能，也得有一定的國際上器材供應的知識。這也就要求器材工作人員深入到研究和研制工作的戰綫上去，親自了解器材的使用情况。其實，科學技術器材部門就是科學技術單位的“百貨商店”，它的首要任務是保證必要器材的供應，盡量避免因為器材供應不及時而影響了科學技術工作的順利進行。當然，也不能為了保證及時供應而在器材倉庫里堆滿各種各樣的器材，造成嚴重的積壓；也不能因為保管不妥當，導致器材的損耗、變質。因此，對於科學技術器材工作，應當定幾個經濟指標，像“器材供應額”、“器材不供應額”、“器材管理費”和“保管損耗率”等，這樣才能具體評價工作的好壞。

研究和研制工作還會需要一些特別設計

的、專用的非標準設備。其中大型的就是整套設備，像粒子加速器、風洞、激波管、高壓裝置、化學的擴大試驗設備等；小型的就是實驗用的配件，像管道、特種閘門、電纜網、試件等。這里一般有三個問題，一個是設計問題，一個是加工問題。設計工作可以是集中地搞，在一個單位里設一個設備設計室，總管全單位的設備設計；這樣做的好處是，人員集中，可以積累經驗，工作水平提高得快。設計工作也可以分散到各研究室或設計室去搞；這樣做的好處是，設計工作密切結合工作需要，意圖容易貫徹。看來兩種組織方法可以結合起來，設計可以分散到各具體工作單位去搞，但最後為了解決圖紙的工藝性和標準化的問題，必須集中在器材設備部門做一次統一的審查，把一把關，消除圖紙上的錯誤和不合適的東西。

一般地說，科學技術研究和研制單位，必須有一個足夠強的加工車間或工廠；根據單位業務的需要，工人人數可以從幾十人到幾百人。這種車間或工廠的性質不同於成批生產的工廠，它搞的基本上是單件生產，所以，應該不用工藝裝備、或用極少的工藝裝備，因此，要求工人的手藝要高，能滿足多種多樣的要求。上面所說的工人人數，看起來好像很多，其實，因為現代科學技術工作對實驗設備的要求量既多，質又高，沒有這樣的工廠及時地解決設備加工，研究工作是不能順利進行的。

當然，設備加工的要求也不是全部都能在單位的工廠內部解決，有些尺寸特別大，



精度要求特別高，这种工艺要求高的部件还必須拿到单位外的上級直屬工厂、或国家大工厂去加工。这里就有加工协作的組織工作。

現在来談談研究所中实验设备的建設、運轉和維修工作。管这类工作的机构可以叫做一个单位的技术系統，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例如，研究所的基本建設工作，由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而导致的基本建設的改造工作，水、壓縮空气、煤气、乙炔气、电等系統的管理和維修工作，大型实验设备，像風洞的經常維護工作，等等。在某些研究和研制单位里，因为有帶危險性的操作和使用有毒、有爆炸性的材料或容易起火的器材，那就必須注意技术安全，經常有專責人員进行安全檢查，貫徹技术安全的規章条例。

科学技术单位維修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項是仪器、仪表的定期維修和标定校核。实验工作，总是以仪器、仪表的讀数或記錄表达出来的。仪器、仪表不准，沒有标定校核，那就不能得到正确的結果。而且仪器、仪表的性能总是在变化着的，今天校准了的，过一个时期又会变成不准了，所以一定要根据仪器、仪表的性质，規定适当的維修校准周期。每件仪器、仪表都得有一張履历书，維修部門經常查閱，一到期就进行維修校准，然后才允許再次使用。

現在再来談談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中的情报資料工作。情报資料包括图书、期刊、学术會議的論文、各国政府的出版物、研究单位的各类研究报告和技术报告、各类学位論

文、各級标准資料、专刊文献、产品目录和广告、报刊的片段报道等。情报資料是科学实验中不可缺少的。它是有時間性的，今天最有力的情报資料，过一个时期就不一定还有用。因此，一个单位的情报資料应该定期审查，失效的要調出去，可能对另一个单位会有用。科学技术单位的情报資料部門，不应该变作“藏書楼”，藏起来留給后代，那就会大量积聚，成为“永远加書庫”！当然，即使一份看起来无用的資料也会偶而有人要看，完全不留也是不行的，但这样的“冷門”，可以由少数的国家大图书馆去收藏。

今天由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空前活跃，科学技术情报資料的积聚是非常迅速的，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它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使这么多的文献及时地与科学技术人員見面，是个繁重的工作。而且一件資料包含的内容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标题能說明的，它有几个方面，因此，会有人从不同角度出发来看这份資料，如何使他們都能各自沿着自己的思路找到它，这是資料檢索工作中的大問題。現在已經有世界通用的分类法，以及人名法、主題法等纵横交錯的檢索系統可以利用，我們必須把檢索系統建立起来。

情报資料的收集还是工作的第一步，我們还要进一步消化它，加以分析整理，最后写出綜合总结文件。这样才便于研究和研制人員利用。这种工作也就是写綜合述評、写丛书、专論、編手册的工作。因为它是情报資料的加工，也叫做情报資料的研究工作；它所需要的人力比建立檢索系統还要大好



几倍，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工作。

情报资料总要交流，有时还向地理上隔离很远的地方寄送，因此，经常要复制情报资料；但每次复制的份数不会多，是个批数多、份数少的复制工作。本来我们祖传的汉字就不容易写，打字也慢，而且科学技术资料里总有那么多的表格、插图、设计图纸、照相图片、数学公式和各种符号，所以必须创制和推广简易的少量复制技术。

最后还要讲一讲另一件要紧的事。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单位必须简明扼要地

准确地及时地向领导机关反映工作情况，这是取得上级指示和支持、避免自己工作差错的重要措施。这样的报告不容易写：不能长篇大论，不能写洋“八股”，要鲜明、生动。但是难不等于不能，动脑筋想办法，练就练得出来。也可以想各种办法来辅助文字之不足，例如，文件里可以用图片、示意图，让文图并茂。这类文件一般由单位的科学技术组织管理部门来起草，所以科学技术组织管理部门要培养能起草这样报告的干部。

在组织管理工作中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

前面所讲的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的确十分繁重，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上的困难要我们去克服。但是，一切事物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上也不例外。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是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和研制工作出成果服务的；反过来，科学技术的成果也自然会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提供各种工具。我们现在来看看如何在组织管理工作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

要管好科学技术器材仓库，使门类规格复杂的器材存放得井井有条，出纳登记得准确，每天都能统计出器材的库存情况，这是一件烦琐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引用哪怕是最起码的自动化技术，用一些机电远距离控制，少数几个人就能把器材“百货商店”管好。

情报资料的量太大，应该想办法压缩它的体积和重量。现在已经有显微胶卷和显微照片的方法，它可以把资料的体积和重量大大地缩小，只不过读胶卷和照片的阅读器还不够方便，因此，还有人不喜欢用它。但改进阅读器不是一项困难的技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微粒照相胶片，进一步缩小资料照相的尺寸比；如果能把胶片上的字迹比显微胶卷再缩小十倍，放大后仍然能清晰而准确地阅读，那么每单位胶片面积上的信息量又能提高一百倍，资料的储存就更加方便了。摄制和阅读这种“超小型”胶卷也是现代技术能够解决的事。

近年来，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动态规划，有了迅速的发展，这项理论能够帮助设计最有效的情报资料检索系统。实际上，今天也已经有人在研究检索的理论问题。我们



可以叫这门学问为“检索学”吧。不但检索工作的理论基础正在建立，在具体检索工作中也可以引用机电的自动装置，这方面还只是在初始阶段，还可以进一步发展。

现代计算技术的进展和高速电子计算机的实现，也为计划工作创造了条件。计划工作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平衡和协调；我们把计划中的人力、物力安排问题，归为计划平衡问题，把计划中的进度安排问题，归为计划协调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都由于近年来运筹学的发展而得到了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用这个理论来具体平衡和协调研究和研制计划，因为计算工作量很大，还必须用电子计算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有条件来发展这两门新学问；计划平衡技术和计划协调技术，可以科学地作科学技术研究或研制的计划平衡和计划协调。这里“科学”的涵义是：第一，有准确性，第二，有预见性。所谓准确，就是指有数字的精度，而不是只凭估计。所谓能

预见，就是指的按计划执行，就能预先看到能出现的困难，预知人力、物力的不平衡和进度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其实，能预见的好处还不只是如此，我们还可以设计各种不同的人力、物力部署的方案，各种不同的工作程序和进度安排，放到计算机上去算一算，不必真的执行就能得到每一种方案、每一种安排的效果。就这样我们能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案，一种最好的安排，而且结论是明确的，不会有什么臆测的成分，从而计划工作中的争论就能妥善地、可靠地得到解决。另外，计划平衡的准确、计划协调的准确也就是计划定得严密，就便于领导机关检查督促，从而促进了研究和研制前进的速度；这是计划平衡技术和计划协调技术的又一个优点。

现代科学技术宝库中的东西，能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利用的决不止于上述这些，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自己应该努力去发掘，把它们充分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以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

从前面所讲的情况来看，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工作本身作为第一线，它的组织管理工作作为第二线，这种分工是合理的，各有各的专门学问。作好第一线的工作固然不容易，作好第二线的工作也不容易。以前我们对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工作本身的认识比较清楚，但对组织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我们今后应当大力加强第二线的力量，以取得第一线与第二线的配套。因此，要抽调一批具备条件的科学技术人员到

组织管理工作岗位上。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削弱了第一线，但结果会加速研究和研制工作，整个科学技术战线将变得更强了。在抽调一部分第一线的科学技术人员到第二线的时候，也要吸取一定数量的财经专业和商业专业的毕业生到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岗位上，让他们把其他有关方面的经验和学问带过来，帮助解决新任务中的问题。

在这支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组织管理队伍中的干部，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



性，應該看到自己工作的廣闊前途。也應該知道工作要求是高的，不那麼容易達到；我們的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幹部，不但必須學好自己專業的學問，並不斷充實提高，而且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領會黨的科學技術工作的政策，能與研究和研製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配合，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共同形成一個團結的、有戰鬥力的、科學技術研究或研製集體。一句話，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

當然，做一個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有它的具體困難：第一，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是一個新分出來的行業，還沒有形成一套學問，要靠自己去摸索；第二，在高等院校里還沒有設置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的專業。因此，有的人說：沒有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的專著，搞不了基本功，找不到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的經典著作，等等。這是實在情況。一門新的業務還沒有完全建立，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還沒有人來得及寫書，當然沒有關於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基本功的書籍。但這並不等於說就沒有材料可以學習。材料是有的，只不過材料要自己去收集。這兒一本書中有些章節，那兒一本期刊中有一篇文章，以及報刊上的經驗介紹，即使不直接說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的，也會有參考價值，它們都是學習的好材料。

也許有人會說：作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的幹部如果“脫產”不做科學技術研究或研製工作，會逐漸變成外行，不懂科學技術工作了，從而也做不好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這個說法也不對。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的行業不同於科學技術研究或研製工作本身，

兩個不同的專業，有什麼“脫產”不“脫產”的問題呢。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需要科學技術知識，但他們所需要的科學技術知識在深度上不同於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人員和研製工作人員，要能了解研究或研製工作就夠了，不必具備像研究或研製工作人員那樣的具体去解決課題的能力。另一方面，由於組織管理工作要接觸幾種甚至多方面的科學技術專業，因此，一個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應當“博”一些。有了一定的專業基礎，這種科學技術知識可以從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的實踐中獲得，並不斷更新補充，此外再學習一些有關科學技術方面的動態、方向的報道，就完全夠了。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需要努力鑽研的倒是上面所談的、他們自己行業的業務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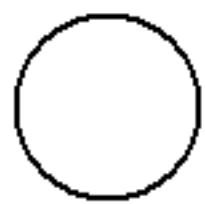
為了交流並總結工作經驗，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也應當經常開業務討論會。將來有了比較系統的理論，就可以開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的學術討論會。在適當的時候，還應該考慮在學校中設置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的專業。

為了培養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幹部，以上點滴建議自然是很不夠的。但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是要有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革命幹勁，只要有了這兩條，如何鑽研的問題一定能夠解決。我們相信，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組織管理工作人員一定能樹起雄心壯志，很快地學會自己的新專業，做好研究和研製工作中的計劃、器材設備、機械設備的建設和維修、情報資料等幾個方面的工作，充分運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祖國科學技術早日現代化作出貢獻。



对农业科学工作者和 群众结合进行研究的一些体会

· 俞 启 葆 ·



农业科学研究所包括的学科和专业极多，研究的对象各不相同，研究的方法很自然地不能千篇一律。在农业科学研究中，专家和农民群众相结合进行工作极为重要。近年来，我们采用这种方法，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收到了很大效果。下面简单谈一谈我们的一些体会。

首先是，农业科学研究的课题要从什么基础上提出来？在旧中国和解放初期，曾经有一度是靠翻国内外资料来找课题的。看人家研究什么，我们也就研究什么。例如，研究田间试验布置方法、农作物的阶段发育、牧草大田轮作等等。这些课题，在我国某些省、区，或在农业科学研究的一定进程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一定全国一起都来研究。解放十多年来，农业科学工作者逐渐认识到，研究课题的提出，要从我国当前生产实际需要出发，以迅速实现农业技术改革，达到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持续增长，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着眼点。这种转变，可以说是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在思想改造中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在旧社会，农业科学

研究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因此科学工作者只能自发地从主观出发去找题目。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高涨，迫切要求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支援。这样，农业科学研究的课题同农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就很自然地对上了口径。既然研究课题要从生产实际出发，农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当前生产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专家在确定课题之前，必须用较长的时间，和群众一起观察、讨论、研究许多问题。经过研究、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明确什么是真正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以便进一步在科学研究上找到解决的途径。从找课题的过程来看，专家离开了群众，是寸步难移的。

农业生产的实践性很强。农民群众从千百年来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生产经验。在往昔的条件下，这些经验中所总结的一些做法，可能是最恰当地综合、平衡利用了当地的资源，既经济而又有效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现在，社会条件改变了，人



們对于自然界的規律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这就有可能变更原来的經營方式、投資方式和各种技术措施，使人們可以少投劳动力和資金，而获得更丰富、质量更好的产品。农业科学工作应该密切結合当前农业生产的实践，研究在目前条件下，如何在科学技术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陕西省关中地区用鋤翻地，深度可达八寸以上，对后茬作物增产起很大作用。尽管农民有这种宝贵的經驗，但是，在农业集体化以前，由于人力条件的限制，鋤翻地不可能大面积推广。农业实现集体化以后，經營管理制度改变了，可以更合理地組織人力，再加上拖拉机逐渐增多，深耕的面积才扩大了。又如气象观测逐步广泛和細致，和农作物需水量的科学实验逐步精密，使人們有条件进一步考虑利用各地的气温（或热量）和水文資源，来增加生产。但是，人們所掌握的，特别是新参加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們所掌握的，仅是农业科学上的一般規律，远远适应不了各个地区农业技术改革中的具体要求。因此，人們必須根据当地的特点，进一步掌握这些規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調查研究，向事实、向群众学习。针对当地的情况和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的基本环节，找寻哪些規律在这里验证一下就可以运用到生产上去，哪些可以引用外地的經驗，哪些还得亲自动手找出規律。不经过这番和农民群众相結合的艰苦、細致的調查工作，要对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作出突出的貢獻，那是很

难想像的。认真一些說，可能連題目都找不到，或者找得不是那样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科学研究怎么能够为生产服务呢？因此，只有老老实实地和群众結合起来，科学研究才能有效地为生产服务。

当然，到群众中間打个轉，“走馬看花”，不能算是和群众結合。因为农业科学技术問題，是很复杂的。它和一个地区的自然、經濟条件密切相关，和当地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也紧密联系着。假如不深入了解这些情况，而仅仅“走馬看花”，很可能所看到的只是些表面現象，还没有看到本质。用这种不甚可靠的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据，是很危險的事情。例如，我国在初級合作化期間，某些地区提高复种指数，对农业增产起了一定作用。以后，有一些地区，只听到了人家的成功經驗，沒有认真研究本地的条件，以为自己所在的地区也可以推广这种先进經驗。結果在推广中，有些成功了，但是有些失敗了。总结失敗的教訓，有些就是由于当初提出这个課題的时候，沒有真正和群众結合，深入地进行調查研究的緣故。

第二步要考虑的，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地点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是在生产基地进行，还是在科学研究单位所在地的試驗基地进行？这需要根据問題的性質而定，不能籠統地規定。假如在生产基地和試驗基地都可以的話，应该选择在生产基地。因为在生产基地进行研究，和群众結合的机会更多，容易得到他們的帮助，对彻底解决問題是有好



处的。例如，从解放初期到现在，陕西省关中地区改造过三个衰落了的老梨区。这些梨区历史很久远，最老的树树龄已达一百年以上。由于旧社会、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反动统治阶级的严酷摧残，自然灾害的侵袭，到解放前夕，这些梨产区已陷于奄奄一息的惨状。解放后，陕西省果树科学工作者，先后组织了工作组，在现场和群众一起调查、回忆、观察、研究。在改造老梨区时，特别是改造第一个衰落梨区，由于衰落的原因十分复杂，同时还缺乏改造的经验，几乎很难着手。但是，群众能清楚地诉说三十年前这个梨区是怎样的情况，遭遇了什么灾害，产生了什么现象。二十年前又是什么情况，一直追述到当前，给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样，结合当前看到的现象，和一般梨树常有的各种各样的生理、生态习性，科学工作者大体上就能揣摩出来这个梨区衰落的历史轮廓，从而设想出梨区衰落的前因后果。经过不断的科学实验证明，逐步地明确了衰落的真正原因。然后设计了相应的改造措施，使衰落了的老梨区，在新社会里得到了新生。这就不仅为社会多提供了产品，同时，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群众对于科学技术的信任，也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很难设想，这类研究离开了产区的群众，在研究单位的试验基地上能够顺利地

进行。
 农业受当地的气候、土壤、和由此影响而形成的生物群落、特别是经济条件的支

配。离开了这些条件，科学研究所需要掌握的情况就不会那么确切。了解当地这些情况最深的，当然是天天在这里生产和生活的群众。他们所知道的可能不是那么系统、深入，对事物的因果关系不能联系起来，但必须承认，他们是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最多的人。农业科学工作者研究问题能够得到当地群众的指点，供给记忆中的资料，帮助是最大不过的了。何况有些研究对象，搬又搬不走，移又移不动；勉强搬走、移动，由于环境的改变，所表现的又不是原来的现象。因此，农业科学工作者倒不如安下心来，在当地研究的好。这样，既能确切地了解当地农业生产的情况，又能就地拜群众为师，经常请教，何乐而不为呢？

获得初步科学研究成果之后，第三步要进入示范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科学工作者仍不能“孤芳自赏”，还得和群众打交道。因为每项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对于这些应用的条件，只有参加研究的科学技术干部，才最熟悉。假如仅仅依靠一纸研究成果示范说明，就认为可以把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开来，使它在生产中发挥作用，这是想得太简单了。因为群众对一种新的技术，没有从头到尾亲身体会一番，很难有深刻的体会，不论示范说明书编写得怎样好，总是生疏的。所以科学研究成果的示范，必须由参加这项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亲自用事实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才能逐步推广。



經驗證明，也是如此。我們從一九五四年起就在關中地區推廣夏季麥田綠肥草木樨，和秋冬棉田綠肥毛苕。雖然經過多少次報章、雜誌、專冊、報告等的宣傳鼓動，幾年來生下根的四個縣，都是先後由農業科學工作者組成的綠肥工作組長期駐過的地方。種植綠肥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高深技術，但是，只有在選地、掌握播期、播種、播前種子處理、前作物收割後的適當管理、綠肥的及時翻壓、翻壓後的管理、在綠肥田之外建立留種地等等，這一系列工作都做到家，才會取得顯著成效。農業科學工作組駐過的縣，群眾和科學工作者較長期地打過交道，群眾無形中掌握了整個技術環節，推廣工作進行得就順利。可見，推廣研究成果還要依靠參加研究的人員，親自動手參加示範，通過實踐培養推廣科學技術的幹部和農民技術幹部。這樣，才能使科學研究成果在生產中起作用。

另外，現代科學技術的內容，日趨複雜，而我國當前農村里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水平還不是那樣高。同時，推廣科學研究成果是要對生產技術加以改革；而人們的習慣勢力是不容易一下子改變的。因此，在科學研究成果初步示範的時候，農業科學工作者必須同時對群眾進行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沒有這種宣傳教育，人們對改革往往會有抵觸情緒。何況新成果的示範，還有一套不能“走樣”的措施要求，群眾也不可能一下全部掌握。可見，要求新成果的創造人參加新成

果的示範，是完全必要的。

第四，在成果推廣的過程中，專家還需要和群眾結合。解放以來，特別是高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後，由於投入生產的勞動力和資金多，一些比較難於貫徹的技術措施得到了堅決執行，科學成果在生產中的作用表現得十分顯著，初步站穩了腳跟。例如，在關中地區歷來種棉花較少的旱地，推廣穩收高產經驗；在油菜產區推廣改蕎麥、油菜混種為純種油菜，從而能適期播種，加強田間管理，冬春防治了病蟲害，使棉花和油菜單位面積產量增加了一倍至數倍。因為增產作用大，以後仿效的人很多。但是有些成功了，有些不成功。科學工作者並沒有因為已經得到初步示範成功就滿足，而是繼續地進行觀察、分析，並做了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在種植棉花方面，強調了整地質量、種子質量、播種用具，並在生長期較短的地方推廣了早熟棉種。在種植油菜方面，強調了施足基肥、及時間苗定苗、後期追肥等一系列措施，使新技術發揮了增產作用。由於棉花和油菜栽培技術的全面改革牽涉的面很廣，影響改革成功的因素很多，只有步步抓緊，一着不漏地自始至終地貫徹技術措施，成果的推廣才有保證。推廣新技術成果取得成效的農民，親自體會了技術要求的嚴格性，在生產中，能夠堅持新技術措施的貫徹執行，因此增產結果能夠鞏固下來。他們在群眾中成為應用新技術的標兵、推廣新成果的旗手。但是，農業科學工作者假如僅僅滿足於這種初



步推广的成果，不去帮助他们继续提高，并总结经验，巩固和扩大成果，就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孤军，再加上一些气候的不顺，这些宝贵的成果就会因受不起风吹浪打而逐渐复没。这也是值得农业科学工作者注意的。例如，过去有些地区推广棉花育苗移栽、水稻改籼为粳，初步获得成功之后，由于一些伴随着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结果这些增产措施，就没有坚持下去。相反地，有些地区解决了必须解决的问题，科学技术成果就坚持下去并推广开了。

科学成果的推广过程，对负责这项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是试验研究成败的最终考查。在这个期间，科学工作者要不辞艰苦地投身进去。科学技术工作者不能憧憬于示范的成果。因为示范是面窄量小的业务，而推广却不然，牵涉到成千成万的人。科学工作者假如不通过总结示范中的经验教训，在推广过程中诚恳地不憚辛勤地向群众宣传关键性的措施，很难不出岔子。这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成败的分水岭。从道理上说，经过苦心钻研，又有示范阶段的经验教训，成功有绝大的可能。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复杂，研究和示范过程中吸取群众意见的程度，推广区内群众接受的程度和宣传教育是否做得够，在在都能影响研究成果推广的效果。在推广过程中，科学工作者如果能密切结合群众，针对群众对推广新成果的技术措施的认识，作必要的安排，虽不能保证新成果必然成功，

至少不会严重地失败。

最后，研究成果经过推广并已扎根之后，研究工作是否可算已告一段落，不须再到群众中间去调查研究了呢？不能。因为在示范和初步推广阶段，面积小，新成果对自然、经济等等条件的影响，还不容易看出来。只有在成果广泛推广之后，各种矛盾才逐渐表现得尖锐，有时尖锐的严重程度，达到了新推广的科学研究成果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步。例如一九五一年关中大面积地推广碧蚂一号小麦，三、五年内几乎普遍到关中全部适种地区。进展之猛，锐不可当，开农业科学研究成果推广迅速程度少有的纪录。当时一些观察敏锐的选种家和老农，有一些隐忧；但是大多数人对碧蚂一号充满了热情和期待，对少数人指出碧蚂一号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祸害，视为杞人忧天。经过一九五六年夏收时霪雨连绵的侵害，部分地区成熟的小麦在田间大量发芽；一九五七年部分地区碧蚂一号叶上条锈病流行，造成严重减产。人们才普遍体会到了小麦良种单一化的危害性，明确了小麦良种推广必须要品种组合。所幸碧蚂一号推广过程中，小麦选种工作并没有间断，一些条锈病为害严重的地区，必须采取换种来解决问题的，也有种可换。可见，研究成果虽已普遍推广，并且基本上已经巩固了一个阶段，也还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而仍需倾听群众的意见，并继续观察研究成果在生产中的表现，预测今后的发展情况。



科学研究成果普遍推广以后，会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农业科学工作者在調查研究中，不仅要調查研究成果对发展生产有利的一面，也要了解由于新成果普遍推广而引起的不良的副作用。假如不消灭这些副作用，就不可能使这些新成果的推广得到真正的巩固。在科学成果未推广以前，当地人們的生产、生活以及生物群落有一定的平衡，彼此相安无事。一个重大科学成果推广以后，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在一定期間要建立一个新平衡。在这个新平衡之下，除了消灭掉的事物之外，其余的要各得其所，使它們向着有利于人們的生产、生活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样，新成果才能巩固得下来。近代农业发展史上发生过不只一次的風波。例如硫酸铵大量推广的初期，带来了土壤平衡的改变，有机物减少，化肥剩余物硫酸根的积累，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严重受影响的地区，数十年恢复不过来。农业机械在某些地区推广时，因役畜减少，畜牧业跟不上去，曾产生过流弊。水利化，带来了土地盐碱化。作物单一化、某些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在世界上也都曾惹过禍。我們在技术改革中所遇到的还只是星星点点，可是今后应当注意，避免走人家已經走过的弯路。只有在成果初步扎根之后，不断和群众結合，听取群众从各种各样角度上反映的意見，加以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措施，才能使科学成果长远地在群众中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

农业科学研究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內容已經十分丰富。以上所說有些課題特别是与当前生产十分密切的一些課題，必須結合群众一起进行研究；但是，并不一定所有課題都必須采取这种方法。根据課題的性质，有些需要自始至終密切結合群众搞的；有些只要有一个阶段結合即可；还有一些基本上是實驗室、試驗場內的工作，勉强結合，反而帶來彼此不便。因此，不能簡單地用一般化的方式去处理各种性质不同的課題。

解放以来，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結合群众进行科学研究。一九五八年以后采用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有些方式已經基本上巩固了下来。例如，在群众中建立試驗基地，长期派科学研究人員同群众一起进行科学研究；聘請农民特約研究員經常地或长期地到科学研究机关和科学研究人員一起进行研究；支持群众举办力所能及的科学試驗；最普遍的方式，是組織科学研究人員下乡进行各种科学研究活动；等等。我們已經积累了許多經驗，当前需要深入总结这些經驗，使它坚持下去，巩固起来。如果条件成熟，还要把它逐渐形成制度，經常化地貫徹实行。

現在，我們許多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已經深切体会到科学研究人員下乡和群众結合进行科学研究的优越性。但是，也还有一些抱有不同意見的人。为了逐步地把意見統一起来，还需要經過反复的討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的認識，这样，推行起来，力量可以更大。



在所謂“生而自由”的国度里

陈 原

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借助骯髒的奴隶貿易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資本的原始积累时，曾經指出：“美洲金銀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剷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轉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場所，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①

从十五世紀开始的血腥的奴隶貿易的历史，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由后起的美国用历史上少有的貪婪、背信、伪善和殘暴，續完了最后的一頁，也是最野蛮的和最卑鄙的一頁。

美国，这个当时刚从殖民地状态下独立的号称“生而自由”的国家，由于它的南部种植园正在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廉价的奴隶劳动。于是，在从非洲到美洲的漫长的航道上，美国的奴隶販子絡繹不絕地用他們新造的“飞剪快船”，大于其走私的奴隶貿易。据西方一个殖民史家說，这个时候的奴隶貿易，不仅規模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殘酷了。因为害怕这些“貨物”碰到巡邏艦查緝，船舱造得特別狹小，“奴隶們挤在一起，蜷曲着身子

像‘湯匙’似的，上岸时竟至于站也站不起来”。有时为了逃避查緝和处罰，这些灭絕人性的入販子們，甚至“把奴隶成百成千地扔去喂鯊魚”。

据說，这个时期从非洲运出的黑人比过去多三倍，但是三分之二却在公海上被杀害。所有最殘酷的奴隶販子，都是美国人，或是在美国国旗掩护下的流氓。当时英国駐华盛顿大使在一份报告中說：“奴隶販子，連同各国的流氓、海盜，現在都蜂拥到美国国旗下了。”英国駐里約热內卢的領事也在一八四三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进行奴隶貿易”的国家。

奴隶貿易，不仅对美国的奴隶販子們來說，是一宗“一本万利”的发財买卖，可以給他們帶來神話般的紅利，而且更重要的是給美国的种植园主們提供了可以任意榨取財富的源泉。美国，这个当今最大的国际剝削者，它最初积累的財富，很大一部分就是殘酷地奴役黑人的結果。正如馬克思在分析直接奴隶制是資產階級工业基础时所說的，在北美南部等地，“沒有奴隶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8—949頁。



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① 据统计，一八四〇年，美国纺锭开工数为二百二十八万五千枚，到一八六〇年已激增到五百二十三万六千枚；同期，美国南部的棉花生产量则从六亿四千万磅增加到二十三亿七千万磅，可以供应全世界需要的八分之七。这就可以想见，美国资产阶级和奴隶主剥削黑人的血汗，到了怎样的程度。

美国的种植园主们，想尽一切最残酷的办法，从奴隶的劳动里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利润。据美国书刊介绍，在美国，“大种植园里的奴隶从太阳刚出来就干活，在鞭子的抽打下辛苦地干，……直到太阳落山”。在这些种植园里，奴隶主们安置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厉害的监工，只要这些监工们能够保证生产大量棉花，“主人决不会过问他们害死了多少黑奴”。在这些种植园里，黑人在镣铐、皮鞭、烙铁的折磨下，过着令人不能想像的悲惨生活。据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园主说，他养活奴隶的费用平均每年每人只花七元五角钱，即每天平均两分多钱。

在种植园主的眼睛里，黑人根本不算人，而只是财产，只是“会说话的工具”。黑人奴隶被剥夺了一切人权和政治权利，种植园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们施以各种各样的酷刑，直至把他们处死。这从十九世纪美国报纸上寻捕逃亡黑人奴隶的广告中就可以看出。试录几则如下：

“在逃黑男一名，名亨利。左眼已瞎，左臂里外两面都有许多小刀子扎的伤痕，身上鞭伤很多。”

“在逃黑妇一名，黑童二名。在该妇逃走前几日，左脸曾被烙，烙痕约略作M字形。”

“赏格五十元，寻找黑奴吉姆·布雷克。该奴两耳各割去一块，左手中指第二节以上割去。”

像这样的广告，用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话来讲，就如同在报纸上登广告说晚上演什么戏一样的被视为家常便饭。

可是，爱好自由的黑人，从来就没有向这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奴役和迫害屈服过。当他们被用暴力押出非洲海岸的时候，就起来抗争了。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举行暴动。从现在还保存的贩奴船的航行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奴隶贩子们被黑人的英勇反抗吓得惊恐万状。据一个船长说，当奴隶们集中在甲板上吃饭时，为了防止他们暴动，所有不参加分发食物的人和照料他们的人，“都武装戒备着”，甚至“有的人在装好弹药的、对准奴隶们的大炮面前，手执点燃的火绳，一直到他们吃完回到窝一般的舱里去才罢”。

被掳掠到美国的黑人，尽管受到奴隶主更加残暴的管制，他们也仍然坚持斗争。他们不仅用怠工、逃亡来反抗，而且用放火焚毁种植园、杀死种植园主、群起暴动等办法，来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在美国奴隶史上有记载的黑人暴动，至少达数百次。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得到了遭受同样命运的印第安人的帮助，被压迫的白人兄弟也和他们一起斗争。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页。



到十九世纪中叶，奴隶劳动已经不能适应美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经过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资产阶级宣布了有名的所谓“解放宣言”。这样，一百年前，即从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起，美国黑人总算是在纸面上得到了“解放”。可是，“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①

一纸“解放令”并没有能够解放黑人，实质上却是把黑人投入新的奴隶劳动中。种族歧视反而变本加厉了。美国新兴资产阶级很快就和南部种植园主勾结起来，加紧了对黑人的压榨。正如一个美国学者说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今天才是南部的真正统治者。支配南部经济生活的正是他们，庇护种植园制度和种族等级制度的也就是他们。”

要知道名义上被“解放”了的黑人，在这个“生而自由”的国家里受到了什么样的“自由”待遇，用不着考察什么三K党或者什么约翰·伯奇协会之类的野蛮组织的暴行，也用不着调查警察怎样使用警犬、电棍和水龙来对付即使是静坐抗议的黑人群众，只要随便举出下面这样一件事，就很清楚了。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它以美国统治阶级的无知、愚蠢、野蛮、无耻而轰动了世界。原来在南部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七岁的黑

孩子辛普森和一个九岁的黑孩子汤普逊，碰巧同一个七岁的白女孩萨顿做游戏。白女孩认出九岁的黑男孩，是她家从前用过的黑人女僕的儿子，隔了很久未见了，不由得用美国社会所惯用的礼仪，吻了吻那个九岁黑孩子的脸。就这样，那个被吻脸的黑孩子和那个没被吻脸的黑孩子，立即同时以“强奸白妇”的罪名被捕，并且在经过一次所谓“单独而平等的审讯”后，被判决送到感化院去“感化”十四年！

请看，这就是美国统治阶级给予美国黑人的所谓“自由平等”！

还是列宁说得对：“关于黑人所处的屈辱地位是无须多说的，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好些。”^②

美国的“解放宣言”已经颁布了一百年，美国历届总统所说的关于保障黑人“自由”的漂亮话也已不计其数，但是美国黑人被奴役、被迫害的屈辱地位依然如故。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从来就是美国统治者对待黑人的惯伎。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这方面更是一个能手，早在他上台以前，他就向美国人民发誓说，他“准备在入权领域中前进”，他将克尽“最大的道义和教育力量……以维护每一个美国人享有他的权利”。一九六一年，当他走进白宫的时候，他又假惺惺地表示，“有些同胞”因为“种族关

^{①②}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系”，“被剥夺宪法权利”，实在“使国家的良心感到不安”（这是假的——作者注），“而且使我们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这倒是真的——作者注）。于是，他欺骗说，这个问题“将会受到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注意”。

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今年六月十七日报道说，在南部各州，“尽管黑人人口不少，他们能去投票的仍然是极少数”。为什么？因为黑人交不起人头税，因为黑人通不过“智力测验”，或者因为黑人受到三K党的威胁不能投票。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生而为黑人的缘故，连没有什么用处的、只不过是“民主橱窗”的投票权也被剥夺了。

美国《人民世界报》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一篇通讯也报道说，密西西比州“种植园贵族”完全剥夺了该州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人口的黑人的投票权，“五十万适龄的黑人中，只有二万人去投票”——这就是肯尼迪所一再吹嘘的什么“崇高保证”。

一九六二年，肯尼迪又煞有介事地宣称：“值此黑奴解放令发表一百周年将在明年一月来到的时候，让每一个政府部门——和每一个公民——的行动，都表现出使全国感到自豪的正直作风。”

这同样是虚伪透顶的谎言。美国劳工部的凯斯勒今年七月发表的文章证明，一九六二年黑人的失业率达到白人失业率的两倍半以上，而在一九四九年只不过是一倍到一倍

半。这位官员还证明，一九六二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者每百人中已有二十五人。《纽约时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的报道，也给了肯尼迪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家报纸说，纽约市黑人每周的平均收入，比之美国官方公布的能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起码生活水平的数字还少将近一半！据美国一个经济学家的估计，由于把黑人的薪金压得特别低，资产阶级获得的超额利润在一九六二年达到一百四十亿美元。试问，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黑人，他又能感到什么样的“自豪的正直作风”呢？

一九六三年，肯尼迪又吹嘘什么“任何一个美国公民，不应以种族和肤色的理由而被剥夺世界上最贵重和最强大的权利”；“我们所以可以作的事情……就是使全体美国人都享有享有完满生活的公平机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完满生活”和“公平机会”呢？美国反动派喉舌《新闻周刊》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版的《黑人在美国》专辑上，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这个专辑在列举了美国黑人所受的种种屈辱之后说，这些“三等公民”现在的起码要求是结束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要求有更好的职业、更高的薪金、更好的住屋，要求跟白人平起平坐——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住在白人隔壁，他可以在白人身边工作，他可以把儿女送到白人儿女读书的学校，他可以在白人的饭店里吃饭，在白人的旅馆中住宿，在白人的教堂内做礼拜。



一边是总统向国内外竭力地吹嘘美国式的“民主传统”，一边却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尽量野蛮地压迫黑人、榨取黑人，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神话与现实。

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凭着一纸“解放令”，黑人是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美国黑人正在日益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子弟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九六〇年，为了抗议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一九六一年，为了争取在乘车方面同白人平起平坐，黑人举行了大规模的“自由乘客运动”；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了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又一次组织了群众性的斗争；今年，在美国，黑人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争取自由和职业的斗争，并且在八月底组织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吓慌了美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大声惊叫道：“暴徒在发疯啦！”“形势非常不好！”这些心毒口辣的伪君子，一面假惺惺地劝告黑人群众，说什么有事慢慢来、有事上法院去解决、有事上国会去辩论，要黑人“君子动口不动手”；一面却又出动大批军警，用警犬、水龙、电棍、拷打、逮捕和监禁来对付上了街的黑人。

但是，无论美国统治阶级怎样镇压，也无法阻止逐渐觉醒了的黑人的斗争。他们对

这一切作了响亮的回答。

伯明翰一个被捕的十五岁黑人青年在法庭上宣称：“我们足足等待了一百年了。”

他的母亲在旁边说，“年青的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那样生活下去了。”

迈阿密一个失业的黑人说，“斗争吧，开枪吧，这样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好。”

底特律一个黑人起重机驾驶员说，“我们总是面对危险的。作为一个黑人，他生下来就很危险。”

《新闻周刊》向一些黑人作了调查，四个黑人中就有三个说，他们知道示威会“引起暴力，流血，丧命，财产损失，暴行，坐牢，憎恨，甚至暗杀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都认为，只有起来自卫斗争，才是出路。这家反动周刊感叹说：“现在在黑人社会上，关牢监已经由耻辱的标志转化为荣誉的徽章了。”

今天，美国黑人还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领导黑人起义的白人兄弟约翰·布朗临刑前的壮语：“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今天，美国黑人越来越相信被迫流亡国外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的警语：“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这个黑人领袖庄严宣称：“我们宁愿作为自由的人活三十秒钟，而不愿屈膝贪生一千年！”

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火焰正在美国燃烧！它将烧尽几个世纪留下来的耻辱！

美国黑人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他们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

王 方

动，愈来愈猖獗了！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美国的传教士们就在世界各地从事配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事业的各种活动。早期的帝国主义凭借其优势的武力，更侧重于依靠炮舰政策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和剥削。随着美帝国主义的日益腐朽，和它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面前遭受了一连串失败，美国统治者感到必须加紧采用镇压和欺骗相结合的两手政策，并依靠欺骗和腐蚀的这一手为前一手服务。艾森豪威尔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曾经任命了一个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九名美国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检查了美国的对外文化侵略活动，并就加强这些罪恶活动出谋献策。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和外交的一份报告中，也狂妄地提出：“要在全世界腐蚀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更公然提出了“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的战略，也就是在扩军备战的同时，大搞文化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8页。

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①这两种职能是互相配合的。刽子手用武力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牧师”从精神上毒害被压迫者，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美帝国主义在国内需要这两种职能，对外进行侵略也需要这两种职能，这就是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而文化侵略是对武装侵略起辅助作用的。美帝国主义者运用武装侵略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通过思想、文化上的侵略活动，来奴役和麻痹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使他们放下武器，不要斗争。

美帝国主义把他们的对外文化侵略活动，称之为“不外交的外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安德鲁·贝丁说：“文化外交已经成为发展对外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文化外交在对外关系中已经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鼎足而立了。”无数事实说明：在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部署中，这种思想文化上的侵略活



侵略。肯尼迪在《和平战略》一书中公开提出，应该“大谈打赢争取人心的仗”。美国统治阶级当权人士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于企图从文化思想上奴役和麻痹世界人民，寄予多么狂妄的幻想。

夺取两大阵营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是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的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也说过：“不发达国家掌握了决定未来世界力量对比的关键”；肯尼迪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叫嚷：“美国必须为全世界新独立的国家提供领导”。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培植由他们所操纵的傀儡政权的头目。肯尼迪政府正是这样地把他那毒害、奴役和麻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侵略的重点，放在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亚洲是美国文化侵略活动原有一定基础的地区。目前它在这个地区的活动继续有所加强，其中又以印度和日本为重点。非洲目前是美国对外文化侵略最猖獗的地区。肯尼迪早就说过：“非洲的将来，不管变好变坏，都将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前途”。在他上台后不久，很快就决定把美国新闻署对非洲的活动扩大一倍，并增拨了大批款项。该署在非洲的机构也迅速地从一九五九年的二十六处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四十一处。拉丁美洲本来被美帝国主义认为是它的后院。肯尼迪认为，“拉丁美洲对于我国安全的重要性肯定不下于东南亚……反美情绪在这里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强烈”。肯尼迪政府十分重视对拉丁

美洲进行文化侵略活动。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所说：“拉丁美洲已经成为华盛顿海外宣传活动的第一个目标”。它们千方百计地对拉丁美洲人民展开“攻心战”。作为肯尼迪政府侵略工具之一的“和平队”，派往拉丁美洲的人数最多。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活动，有着更狂妄的野心，就是腐蚀和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肯尼迪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曾经公然叫嚣：“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完成西方在外部所不能完成的事情”。肯尼迪之流究竟打算怎样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完成西方在外部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呢？其中主要的阴谋手段之一，就是加紧进行文化侵略活动，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意识形态与外交”的报告中所叫嚣的那样：“鼓励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集团内部的演变。”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应该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最近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文化思想上的侵略活动，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二

美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是不惜工本的。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式和途径。在他们看来，“用于这方面的每一个美元，价值等于用于国防



上的五个美元。”在美国官方的对外文化侵略机构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新闻署。这个反动机关，在一百多个国家设有两百多处分支机构，通过广播、电视、新闻、书刊、电影、展览等一切方式，进行造谣欺骗，散布思想毒素。美国国务院的教育文化事务局是这方面另一个重要机构，它主要掌管人员方面的接待和派遣，进行收买和腐蚀的勾当。国际开发署（即前国际合作署）通过它掌管的各种“援外”计划，来诱骗需要发展文教事业的新兴国家上钩。美国政府还有十几个单位参与对外文化宣传活动，其中包括像十分热衷于“宣传”工作的国防部这样的大机关。在私人组织方面，美国更有着形形色色、多得数不清的团体，从事着这种罪恶的活动。它们包括：大资本家们在“慈善事业”的幌子下设立的拥有数十亿美元财产的几千个基金会；作为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别动队的宗教团体；名目繁多的所谓“志愿服务组织”，乃至像“自由欧洲委员会”、“美国解放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等等臭名昭著的反共团体。此外，美国还操纵着大批的国际组织和外国组织，来为其文化侵略服务。所谓“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美国统治当局吹嘘这个组织是“保证”美国“领导世界”的手段之一，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些组织，通过教育、宗教、电影、电视、新闻、广播、书刊、展览、人员交换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渠道，大肆传播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和美国生活方式，进行

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宣传。其中，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来，美国政府通过了好几个法案，花了数亿美元，来开展和外国之间的“教育交流”。美国公私机构还通过在国外大量兴办学校、向外国大学提供“援助”、派出教授和专家、“帮助”外国进行教育改革等各种方式，妄图对青年学生灌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

宗教在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活动中具有最长久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传教事业”一直在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充当开路先锋，美帝国主义在整个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中，建立了名副其实的霸权。一九五九年，美国基督教各差会的经费高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四倍于所有其他国家差会经费的总和。一九六〇年，欧美各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总共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名“传教士”中，北美竟占了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名，占百分之六十五，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人。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十年间，美国“传教士”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仅是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如何看重基督教这种披着“慈善”外衣的侵略工具了。美国反动统治阶级舍得花这许多钱来支持“传教事业”，并不是事出无因的。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经不讳地说：“帝国主义的进展总是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殖民地总督”。这就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美国的电影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的。特别是最近以来，美国除了继续拍



摄那些誹淫誹盜的影片以外，还特别大大增加了反共影片，一九六一年好萊塢拍制的反共影片为前一年的三倍以上。美国反动統治者經常吹嘘他們电影的作用。他們說：美国电影是“提供給世界的一个抵制共产主义的最好手段”，是“影响世界民意唯一最强有力的工具”。目前，美国电影业的国外收入已經超过国内收入，每年达两亿美元以上。美国电影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占了总商业放映時間的一半以上。美国新聞署还經營着資本主义世界最龐大的非商业性电影放映系統。該署每年也拍制了数百部密切配合美国对外侵略政策的影片。

通过“美国之音”来制造謊言，散布各种思想的毒素，更是美帝国主义对外文化侵略的看家本領之一。在美帝国主义者看来，广播是“接触大批群众最直接和最便宜的方法”，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因此，美帝国主义紧紧抓住这样一种宣傳工具，美国新聞署投入了它最大的一笔經費，来經營“美国之音”的广播系統。它以三十多种語言，每周用七百多个小时的时间，向外国进行各种反动宣傳。美国壟断資產階級还用大量金錢，来“資助”着专门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造謠誣蔑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个臭名昭彰的电台，收买了从东欧国家逃亡的反动分子，不擇手段地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顛复破坏活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时，“自由欧洲电台”竟公然成了指揮者。

美帝国主义在新聞出版方面的对外文化侵略活动，也是絲毫不肯放松的。他們通过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这两家为美国壟断財团直接控制的私营通訊社，和資本主义世界最龐大的非商业通訊社——美国新聞处，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观点，每天发布大量新聞稿。与此同时他們还以当地文字在国外出版大量报刊（其中仅美国新聞署就出版有七十种以上），并向国外大量傾銷美国报纸杂志。他們认为，在各种宣傳工具中从傳播反动思想的功效来看，“都是不能与图书的經久作用相比的”，即使“在通訊技术創造新奇迹的时代，图书对于傳播情况和思想的重要性依然是基本的。”他們还采取了在国外大办图书馆、大量免費贈送、和当地出版商“合作”等各种办法。十年来使美国图书的出口額增加了四分之三，美国新聞署还在国外开办了几百个图书馆、閱覽室和所謂“两国合办”新聞中心。他們把这些图书馆看作“美国最好的陈列櫥窗”，并且是“美国外交活动不可缺少的財產和永久性的助手”。美帝国主义正是妄图通过这些图书报刊来欺騙和毒害全世界的人民。

三

正如在其他方面侵略手法的演变一样，美帝国主义在对外文化侵略方面的策略，不仅形式越来越多种多样，其手法也是更隱蔽、更阴險、更狡猾。这里讓我們略举美帝国主



义对外文化侵略的一些伎俩，来看一看，

第一，我們可以看到，欺騙撒謊是美国对外文化侵略中慣用的手法。美帝国主义的“宣傳能手”之一、“自由欧洲电台”的头目艾恩斯特·兰根就曾經这样供认道：“在这个电台的广播中，謊言已經成了影响听众思想的主要工具，……必須注意不要让受我們影响的人发现可以在当地证明出来的謊言，……应当撒謊和欺騙，但是不要被人識破”。美国另一位心理战“专家”法拉戈在《智慧的战争》一书中也說：“宣傳要把真話和謊言合并应用”。他們甚至大言不慚地宣揚戈培尔讲的話：“利用无限的重复就能使謊言受人欢迎”。公然认为要巧妙地撒謊和欺騙，这說明美帝国主义的所謂“对外宣傳”，是多么下流无耻！

第二，在美帝国主义对外文化侵略中，还常常恬不知耻地伪装进步。他們往往第一步先騙取人民的信任，第二步再贩卖反动的毒品。美国卫理公会海外傳教部一个头目麦尔温·威廉士就曾出过这种最无耻的主意，即要正在美国受訓的“傳教士”們，在国内参加爭取公民权利的抗議运动。他认为：“如果一个未来的傳教士因此受到拘留的处分，将来他到非洲就較能贏得非洲人的信任”。美国一个名叫約翰·吉卜逊的記者說得更是露骨，他談到：当一个准备專門到知識分子中間去进行工作的“傳教士”接受訓練时，他必須把“馬克思主义”的詞句学得烂熟，知道如何冒充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等到群众对他发生

欽佩之意的時候，再把自己原先的論点逐条駁斥。美帝国主义在对外文化侵略活动中，像这样使用混入人民中間冒充“进步”的伎俩，并不仅限于宗教范围。美国国务院的国际教育文化諮詢委员会，于今年四月致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就強調在各方面要运用这个手腕。

第三，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活动本来完全是亲自出面的，但由于他們的牌子太臭了，所以現在他們愈来愈多地使用退居幕后、借刀杀人的办法。在有些国家，除了充斥于市的美国精神毒品以外，許多为之帮腔伴奏的別国貨色实际上也是属于美国主子的。現在美帝国主义这种欺騙外国人民的新花招，几乎遍用于一切活动领域。美国参議員艾兰德在訪問了三十多个国家美国新聞处的图书馆以后，建議把所有这些图书馆的美国招牌全部摘下来，改为“两国合办”的新聞中心，企图以此来蒙騙群众，偷运侵略者的毒品。在这种策略指导下，美国和外国“合办”的两国新聞中心在五年間竟增加了三倍，很快就赶上了美国新聞处图书馆的数目。这种两国新聞中心实际上是換湯不換药，仍然是贩卖美国那一套貨色。专营对外图书业务的美国弗兰克林出版社的董事长威尔逊在吹嘘他的經驗时，也狡猾地主張“使用当地人管理办事处的工作”，“放手让当地人选定出版的书”等等。美国新聞处一个小头目狄薩德在介紹美国在外国新聞界进行活动的經驗时，說得更是露骨：“在国外进行



宣傳最好的手法是通过外国編輯和作家的手笔”，而“控制一家报纸最可靠的手段就是占有它或收买它的編輯或出版者”。在宗教方面，美帝国主义还用所謂傳教人員“土著化”的詭計，即由本地人出面担任宗教組織的領導人，美国“傳教士”則退居幕后操纵。不久前，有一些美国“傳教士”加入了外国籍，另外一些美国“傳教士”則尽量隱藏自己的身份。美国福音联盟駐南罗得西亚主任傳教士諾曼·艾佛瑞克就說：“我从来不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做賊心虛实在到了可笑又可怜的程度！

第四，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的罪恶活动，向来是四处泛濫、无孔不入。近年来，他們更特別重視誘騙普通群众，其中尤其強調拉攏青年人。美国新聞署在公报中供认，該署各項計劃都集中針對青年人。在这方面一个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大量向外派出形形色色的所謂“志願服务組織”，諸如“和平队”、“国际生活实验”、“非洲十字路口計劃”、“国际学生亲善計劃”等等。这类花招的普遍特点是：打着“舍己为人”的旗帜，以“帮助”不发达国家建設为名，誘騙美国青年到这些国家的落后地区，对当地人，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帝国主义的罪恶宣傳活动。参加这些組織的美国青年都必须經過严格的甄別和訓練。这类組織一方面深入到以往美帝国主义很少到达的偏僻地区去散布影响、培植信徒、搜集情报，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們特有的伪善面貌具有更

大的欺騙性。据他們自己供认：这类組織还負有当这些地区发生人民革命运动时，当作一支別动队来鎮压革命的任务。

第五，从美帝国主义对外傾銷的精神毒品的內容来看，这些貨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目張胆地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說教，从正面来毒害人民的思想；另一类是腐朽沒落的黄色文化，从側面来腐蝕人民的心灵。前者可以說是集一切反动之大成，它們标榜什么“富足社会”、“福利国家”、“新凱恩斯主义”、“人民資本主义”等等，用一些动听的名稱和美妙的詞句做外衣，但归根結蒂都是要麻痹人民的斗志，分化人民的团結，轉移人民的革命目标，模糊人民的認識，从而直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后者則囊括了世界上一切沒落腐朽下流的东西，其中有抽象美术、电子音乐、先鋒派戏剧、扭摆舞，以及充滿色情、淫秽、凶杀、恐怖、变态心理等等題材的书刊和电影。所有这些烏七八糟的东西，都为反动思想的傳播提供必要的气候和土壤，在政治上起着配合美国侵略活动的重要作用。

美帝国主义在对外文化侵略中玩弄的花招和手法，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些，而且这些手法經常变化或混合使用，这里只不过是就其重要方面作些揭露罢了。

四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的危害和恶



果，現在已經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識破。

人們已經認識到，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使許多国家的人民受到思想上的毒害，使許多国家的民族文化遭到严重摧殘。据挪威一位文化界人士指出，一九二七年圣诞节，挪威出售的图书中百分之九十是本国人写的，只有百分之十是外国作品。到了一九五八年圣诞节时，这个比例竟顛倒过来，挪威作品只占百分之十，外国作品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主要是美国作品。挪威文化界人士們沉痛地說：“挪威的文化处在严重的危險之中。假如不做有效的文化工作，它将走上毀灭的道路”。美国輸出的黄色文化，还使不少国家发生社会道德敗坏、犯罪事件大量增加的现象。据挪威报纸报道，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挪威犯罪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从两万七千余人增加到三万八千余人。而十四岁到十七岁的青少年犯罪者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九年竟增加了一倍以上。挪威这种社会道德不断敗坏的现象，被认为是充滿了凶杀犯罪內容的美国书刊电影大量

泛滥的直接后果。

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对許多国家人民思想和生活上的毒害是多方面的。加拿大著名作家戴森·卡特在一篇题为《加拿大的文化快要淹死了》的文章中，曾經这样写道：“来自五角大楼的美国的……‘文化’浪潮，……在无情地腐蝕着加拿大人民的道德、民族觉悟和灵魂”。

現在，在全世界广闊的土地上，已經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地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丑恶面目。全世界人民憤怒的抗議声正愈来愈响亮。他們的揭露正愈来愈深刻而彻底。在人民群众觉悟和斗争面前，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不断到处碰壁，使美国人自己也不能不感到：“今天美国在世界上处于空前无比的孤立状态”。

应当指出，不管美帝国主义在对外文化侵略領域里，說了多么动听的好話，耍了多么巧妙的花招，它兜售的貨色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注定了迟早要被人民群众所識破和唾棄，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敗。



红旗

1102604

23



一九六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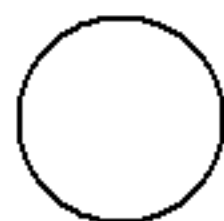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三期 ★

目 录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1)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5)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8)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9)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14)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17)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20)

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邓子恢 (21)

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刚果的真相 苑 文 (30)

现代资产阶级的新实在论哲学 任 华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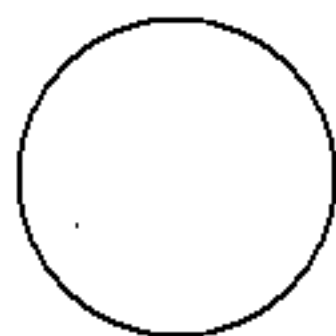
☆ 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問題，要算是赫魯曉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問題了。

苏共領導口口声声說，他們忠实于并且創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們把世界各国人民經過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記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領導大肆宣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贊成和平共处，大肆誣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說什么中国主張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領導把自己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背棄无产階級世界革命、背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許多言行，說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摆在我們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張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魯曉夫等人主張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魯曉夫等人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又是怎么样的貨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問題。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預見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①。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說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②。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③。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說：“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④。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②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案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9页。

③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8页。

④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0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①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②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③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④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⑤。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⑥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

②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页。

③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3—124页。

④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7页。

⑤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5—446页。

⑥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2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①。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②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③。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④。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⑤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⑥

①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② 《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③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页。

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①。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②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③。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

①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6页。

② 《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见1952年4月2日苏联《真理报》。

③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48页。



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則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③

①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十四年来，我們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們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們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們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們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們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們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們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們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們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們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們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經同許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門、緬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納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緬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圓滿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的目的，拆穿了說，就是要掩盖他們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結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①。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②，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③。

(二) 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④，“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⑤。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⑥。

(三) 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⑦，“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⑧。

(四)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⑨。

(五) 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⑩，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⑪。

(六)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⑫。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

① 苏联《真理报》1962年11月18日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

②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期，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③④ 赫鲁晓夫1960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⑤ 赫鲁晓夫1960年2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⑥ 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⑦ 苏联《消息报》1961年12月4日编辑部文章。

⑧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1961年12月30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⑨ 赫鲁晓夫1961年7月5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⑩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2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⑪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2年第2期，第89页。

⑫ 苏联《真理报》1961年2月8日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影响增长了。”①

(七)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②。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③。“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们赞成共产主义！’”④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說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① 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②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③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2 年第 12 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④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說来，沒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項原則，是針對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許侵犯別国的領土和主权，不容許干涉別国的內政，不容許損害別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許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別的国家 and 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絕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來說，它是絕不願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別的国家 and 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險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始終存在着尖銳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軍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計地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軍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們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鎮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魯曉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揚帝国主义已經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魯曉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軍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損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邏輯，赫魯曉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則作交易，俯首貼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邏輯，赫魯曉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問題上坚持正确的原則，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魯曉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間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魯曉夫說：“必須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識形态之間的



斗争。”^①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②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③ 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

① 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② 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1962年1月3日苏联《真理报》。

③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①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4、347页。



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页。



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①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的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②，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③。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

① 苏联《真理报》1963年12月6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②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1962年3月9日。

③ 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1963年8月18日的电视谈话。



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①。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②。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③。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④。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⑤。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⑥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⑦。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

① 英国《时与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1963年4月18至24日。

② 法新社1963年7月14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③ 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1960年4月20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④ 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⑤ 肯尼迪1963年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⑥ 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⑦ 肯尼迪1961年11月25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風險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①。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②。“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③。“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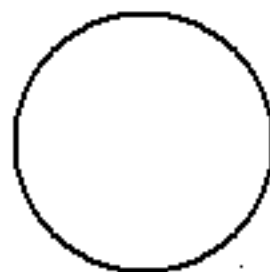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⑤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⑥。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⑦。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 ① 赫斯克 1963 年 9 月 10 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 ② 杜勒斯 1959 年 1 月 31 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 ③ 杜勒斯 1958 年 12 月 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 ④ 杜勒斯 1959 年 2 月 8 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 ⑤ 艾森豪威尔 1960 年 9 月 30 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 ⑥ 肯尼迪：《和平战略》，第 199 页。
- ⑦ 肯尼迪 1960 年 10 月 1 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人們不难看到，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領導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討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揚美帝国主义的 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騙政策的需要。

苏共領導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階級和压迫階級、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許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領導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範圍內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門，这恰恰适应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員。在这里，我們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說过的两段話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說：“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內部繼續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經說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間里，我們可以达到我們政策的偉大目标，这就是出現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願望、放棄了統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則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則行事的人們所統治的。”^①

杜勒斯还說：“长远的前景——說实在的，我要說，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統治者們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們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②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纏住了那些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們簡直对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着了迷，根本不願意想一想，他們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的灵魂

苏共領導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閉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們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違反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項原則。苏共領導所以不断宣揚和平共处是他們对外政策总路綫，說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的灵魂。

請看他們的妙論：

“現代两个最偉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

① 杜勒斯 1956 年 5 月 15 日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

② 杜勒斯 1958 年 10 月 28 日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



后面。”①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②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③。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④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①②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③ 赫鲁晓夫1961年9月5日同美国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④ 葛罗米柯1962年12月13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①，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②。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③。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情报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

① 赫鲁晓夫 1959 年 9 月 17 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② 赫鲁晓夫 1961 年 6 月 16 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③ 苏联《消息报》1963 年 8 月 21 日评论员文章。



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騙。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的时候了。



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邓子恢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个有着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是与农村人民公社、供销合作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从而巩固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农村信贷领域中，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农村社会主义信贷阵地的重要力量，是国家银行的有效助手。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是正确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结果。

信用合作社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作用

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为地主、资产阶级壟断农业信贷、高利盘剥农民的剥削活动效劳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是为劳动农民群众服务的集体金融组织。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建立起来。全国解放以后，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发展。

在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的劳

动农民群众由于还没有摆脱个体经济的束缚，还不能完全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在经济上还没有彻底翻身，农村的阶级分化仍是不可避免的。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有利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缺少资金的困难，向高利贷活动作斗争，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合作化创造条件。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经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①其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代替物。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发展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又强调指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2页。



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合作互相分工而又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从而逐步地把农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联结起来，逐步地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小农经济。”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正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经过不断的努力而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呢？实际生活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农村信用合作社不仅在当前是必要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都需要存在，它对组织农村资金的余缺调剂，吸收闲散资金，帮助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解决副业生产和生活上某些临时性的资金需要，以及支援集体农业生产，仍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第一，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允许社员在不妨碍集体生产劳动的前提下，经营家庭副业和少量自留地，作为对集体经济的补充。同时，农村还存在着集市贸易，作为社会主义商业的补充。在集市上，允许生产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农副产品征购派购任务后，按照市场管理规定，进行农副产品的余缺调剂。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特点和农业生产商品流通的这种情况相适应，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有必要继续存在，并按照社会主义信贷政策，组织农村资金余缺的调剂，开展信贷活动。只要商品经济继续存

在，只要继续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之间持有资金不平衡的状态就必然长期存在，这种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也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义集体金融组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大有可为。

第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会甘心灭亡，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的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也必然在农村信贷领域中反映出来。因而在农村金融方面还将长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进行这场斗争，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家银行，就必须依靠由贫农、下中农联合中农所组织起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有力武器，是在金融方面反击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劲旅。因此，积极领导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大力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这是关系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任何削弱或取消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想法和作法，都不利于防止和打击高利贷，不利于击退资本主义的进攻，不利于贫农、下中农的阶级利益，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的：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



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我們就絕不能削弱农村信用合作社，而要进一步办好信用合作社，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信贷陣地。

第三，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銀行开展农村信贷工作，調节货币流通的有力助手。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主要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国家銀行在农村的信贷活动，主要是以生产队为对象。但是，国家銀行現有的农村营业机构和人員，要直接联系所有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是有困难的。目前国家銀行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信贷业务，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的，对社員个人贷款則全部通过信用合作社，在农村举办儲蓄业务也需要通过信用合作社与高利貸斗争才能顺利开展。因此，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成了国家銀行在农村进行信贷业务的有力助手。大家知道，商品交换是現阶段农民可以接受的經濟联系形式，而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来实现的，这样就經常有大量的货币在农村流通。因而农村货币流通的状况如何，对全国市場的货币流通影响甚大。当然，从整个來說，货币在农村的出籠和回籠，主要是取决于工业品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数量。但是，銀行、信用合作社在农村开展的信贷和儲蓄活动，对于有计划地調节货币流通，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存款、放款业务方面广泛联系群众，对于組織調剂散布在亿万戶农民手中的零星货币，尤有显著的作用。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有必要繼續存在，是适应現阶段农村社会經濟的客观需要的，它是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村两条

道路斗争的大問題，是能否有效地运用信贷这个工具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問題。当前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正确方針，应该是加强领导，积极办好，认真整頓，巩固发展。

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不同时期，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任务，都曾作过明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決議》中指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任务是，在国营經濟的领导下帮助农民摆脱高利貸剝削，发展农村儲蓄和低利贷款，为农村生产服务，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中指出：应该积极組織农民的信用合作，和高利貸者作經濟斗争，逐漸縮小高利貸者的剝削陣地，直到最后消灭高利貸。《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中規定：“巩固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和农村儲蓄业务，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資金周轉的需要。”从党和政府历次的指示中可以看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是在国家銀行的领导下，依靠貧农、下中农，联合中农，开展存款、放款的信贷活动，帮助有困难的社員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向高利貸作斗争，同时支援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不仅在过去是适用的，而且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內仍然是适用的。

高利貸是生产資料私有制的产物。在旧社会里，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迫使广大劳动农民陷于貧穷破产的境地，而高利貸



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它像寄生虫一样吸吮着农民的血汗，而又使他們牢牢地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高利貸对农民的剝削更为殘酷，它是劳动农民穷困和遭受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消灭高利貸的根本途徑在于，打倒反动阶级的統治，消灭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并进一步引导农民經由集体化的道路，走向共同富裕。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經過土地改革，以及通过互助組、初級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等一系列的步骤，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后又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是消灭高利貸剝削的根本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农民的收入水平还不高；由于現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仍是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員之間劳动力多少、强弱和收入不尽相同，这就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資金不足而需要借貸，另一部分人資金有余的情况。这样，群众之間互通有无的利息不高的借貸，当然允許合法存在。但是，非法的高利貸活动，也就有可能伺机而起。

正因为上述情况，我們防止高利貸活动的根本問題在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并在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人民公社向高级阶段发展和农民进一步共同富裕創造物质条件，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利貸产生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实现上述的宏伟目标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

是在遇到災荒歉收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和貧农、下中农社員，在生产和生活上难免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就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国家銀行的领导下，能够帮助有困难的社員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資金需要，并多方面帮助生产队克服困难，有力地支援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

总之，既要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为最終消灭高利貸創造物质基础，同时又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防止高利貸活动，以支援社員生产生活，支援农业集体經濟。这两方面的工作要很好地統一起来，不能有所偏廢。

綜上所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第一，依靠貧农、下中农，联合中农，开展信貸活动，积极帮助有困难的社員解决生产、生活上的資金困难，防止高利貸活动，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資金运用計劃，要注意与国家銀行的貸款計劃密切配合，互相銜接。应该尽先把信用合作社的資金，用于帮助有困难的貧农、下中农社員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信用合作社資金不足的，銀行应給予支持；信用合作社資金有余的，也可按照国家規定的貸款政策，直接对生产队发放貸款。但是，信用合作社直接办理生产队的貸款业务时，注意不要使生产队占用信用合作社的資金过多，以免影响对社員生产和生活貸款的主要业务。

第二，办理农村儲蓄，吸收农村閑散資金，調节农村货币流通。

第三，积极配合国家銀行，用好、管好国家支援农业生产的各項資金，协助国家銀



行做好对生产队的贷款工作，以支援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依靠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 办好信用合作社

依靠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这是在方针、任务确定后，必须解决的组织路线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那么，谁是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真正可靠的依靠力量呢？

从根本上说，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支阶级队伍，这是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社会基础。贫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高利贷的剥削最厉害，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最积极的拥护者，信用合作社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办的。依靠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党在农村进行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阶级路线，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权切实掌握在贫农、下中农的手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机构，诸如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应该牢固树立贫农、下中农的绝对优势，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要由贫农、下中农来担任组长。对于混入信用合作社组织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必须坚决清洗出去，以纯洁信用合作社的组织。信用合作社在制定业务方针、计划和进行信贷活动时，必须充分听取贫农、下中农委员会（或小组）的意见，与他们商量研究，把信用合作社的各项

业务活动置于贫农、下中农组织的监督之下。总之，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联合和团结中农，才能孤立高利贷者，才能切实办好信用合作社，并使之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除了依靠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办好信用合作社之外，还必须加强和整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干部队伍。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一批政治可靠、热心信用合作事业、在群众中有威信并对业务熟悉的干部是不行的。目前全国农村的信用合作社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密切联系群众，任劳任怨，埋头工作，正在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干部，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信用合作社的干部，有的是由于政治学习不够，思想觉悟不高，在遇到某些困难的情况下，患得患失；有的是不善于依靠党、政领导，依靠群众，工作局面打不开，有畏难情绪；还有的是由于经常被抽调做其他工作，无法开展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等等。今后必须切实贯彻执行阶级路线，纯洁组织，整顿干部队伍，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培养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关心信用合作社干部的生活福利。为了便于信用合作社干部积累工作经验，发挥创造性，还必须使信用合作社系统的干部稳定下来，同时也不要随便临时抽调他们去做别的工作。应该明确认识，信用合作是农村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金融战线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信用合作社的干部队伍得不到加强，就会削弱社会主义在农村的信贷阵地，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影响解决贫农、下中农生产生活



的困难，不利于防止和打击金融战线上的资本主义进攻。这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根据群众性组织的特点和它所担负的基本任务，从便于接近群众，便于群众存款取款，便于群众贷款还款，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出发，因地制宜地设置，多种形式并存，不必强求一致。就各地的经验看来，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按公社设立信用合作社，按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设立信用分社或信用服务站，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于按原来大乡范围设立的公社，实行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制的地区。它的优点是便于公社党委的领导，便于与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密切配合，同时由于社区范围大，业务量较大，费用开支比较节省。缺点是中间环节多，领导不方便。如果不设立中间环节机构，群众存款取款又不方便，会影响业务开展，并且不便于群众监督和实行民主管理。

第二种，是按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设立信用合作社，在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在公社一级设立联社。这样设立的信用合作社，它的社区范围大致相当于公社化前按小乡设立的信用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点是社的辖区较小，存款取款方便，便于群众监督和实行民主管理。问题是占用脱离生产的干部较多些，并有一部分信用合作社的费用开支有困难。一般地说，费用开支的问题经过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开展业务，

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种，在某些地区公社范围很小，公社以下不设大队的，则可以按公社设立信用合作社，在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公社所属生产队比较多的，可由信用合作社于部分片包干，经常到小组去办理存放款。

第四种，是在渔区、牧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以及少数与全民所有制农场合并在一起经营管理的公社，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可以适应地区的特殊情况，与一般农业地区有所不同。

总之，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形式的研究和确定，必须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设立，既要便于领导，又要便利群众；既要注意到便利存放款业务的开展，又要注意到与供销社、粮食等财贸部门的工作配合；既要注意现行的行政区划，又要考虑到自然地理条件、传统的经济联系和信用合作社的原有基础。一般地说，应该更多地考虑作到便利群众，便于开展存款放款业务。

第二，确定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不能由少数干部自行决定。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究竟如何设立，应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几种方案，说明利弊，让群众反复讨论，互相比较，然后再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是关系到是否认真贯彻执行民主办社方针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忽视。

信用合作社的组织领导 及其与国家银行的关系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合



作組織，它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由社員当家作主，实行民主办社。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員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由社員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第二，信用合作社章程由社員代表大会民主討論通过。

第三，信用合作社的組織机构、人員編制、貸款限額、信貸計劃、利息标准、干部福利待遇等重大問題，都要經由社員代表大会討論确定。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实行民主办社，是尊重集体所有制經濟的財权、人权、經營管理权，从而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保证。經驗证明，信用合作社凡是能認真贯彻执行这项原則的，就能够做到群众拥护，組織健全，业务开展，否則就会脱离群众，組織涣散，业务停頓。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单独核算的基层組織，而没有其上級联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銀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要負責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业务活动。信用合作社业务上的重大事項，諸如确定貸款政策、制定資金运用計劃、調整存放款利率等，都要提交社員代表大会討論通过后，报銀行审查批准。銀行还要协同地方党委，做好信用合作社干部的配备、訓練等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

銀行和信用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經濟的两种不同形式。一个是全民所有制經濟，一个是集体所有制經濟。国家銀行是領導力量。两者既要相互支援，共同发展，以巩固社会主义

的农村金融战綫，促进整个国民經濟的繁荣，又要承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划清界限，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銀行要从資金上、人力上积极支援信用合作社，成为信用合作社强大的后盾，信用合作社要在国家銀行的领导下，充分發揮开展农村信貸业务，防止高利貸活动的助手作用。国家銀行应该从政策上、业务上加强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和帮助，但又不能包办代替，要注意从經營管理、資金运用、干部人选等方面，帮助信用合作社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原則，尊重群众意見。銀行在与信用合作社的經濟往来中，应该按照互利原則，存款計算利息或付給手續費，以發揮信用合作社独立自主經營的积极性，维护集体所有制經濟的正当利益。信用合作社在經營上，則应依靠群众，勤儉办社，力求做到自力更生，不依賴国家。事实证明，凡是办得好的信用合作社，都能做到开支自給或基本上自給。同时，也有不少信用合作社还提留了为数可观的公共积累。当然必須看到，国家的援助也是不可少的。在信用合作社遇到农业生产因災减产，資金周轉不灵，或經濟条件較差，存款来源較少，暂时不能維持开支等困难情况下，国家銀行应该予以适当支持，满怀热情地帮助信用合作社克服困难。

信用合作社的整頓巩固工作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经常不断地整頓和巩固，这是信用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經驗。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經營管理情况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信用合作社办得不好或者很不好。各地农业銀行应该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抓



紧时间，经过调查摸底，分类排队，制定规划，分期分批地进行整社工作。

为了做好整社工作，首先，要引起各级党、政领导和银行的高度重视，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战线上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是贫农、下中农在生产生活上的资金互助组织，是防止高利贷活动的一支劲旅。只有明确认识，引起重视，信用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才有可能逐步开展起来。

其次，要建立整社的领导机构，组成整社队伍。目前农业银行已经成立，各地党委应迅速把各级银行，特别是县支行的信用合作部门配备起来，以此作为整顿信用合作社的县领导机构，并调配得力干部作为整社队伍，在党委领导下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期分批地整顿全县的信用合作社。

第三，必须保障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所有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为信用合作社的全体社员所有，任何机关、企业和个人不得抽调。凡是违反政策规定抽调了信用合作社的股金、公积金、存款等各项资金的，应区别情况认真加以处理；凡是国家各部门动用了信用合作社资金的，应由有关国家部门负责清理归还；凡是国家银行放出的贷款，而转作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应如数冲转银行，并退回所占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凡是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与社队所发生的债务关系而转作信用合作社的贷款的，应由有关部门负责清理，并退回所占用的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必须强调，任何机关团体企业，都不得违反政策和制度的规定，随意抽调、动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以切实保障信用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所有权。

第四，要彻底清理账目，收回挪用资金，

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要根据中央规定的政策，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依靠贫农、下中农，在信用合作社组织中认真进行清理账目，清理债权债务，清理资金的“三清”工作。对于不正当占用的资金和拖欠的贷款，应立即清理收回，暂时无力归还的，应定出还款计划，限期收回；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确实因生活困难较大，无力归还到期贷款的，经过清理后应主动照顾，缓期收回。经过“三清”后，要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违反制度，随意挪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信用合作社的干部，有权拒绝那些违反制度动用库款和贷款的要求。此外，在一部分老灾区、经济贫困地区和困难较大地区的信用合作社，经过“三清”整顿后资金仍甚困难，国家银行应该积极地设法给予支持，使其在业务上逐步活动起来。

第五，整顿信用合作社组织，纯洁干部队伍，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凡是信用合作社缺乏专职干部，或虽有专职干部但长期调做其他工作的，应迅速调回原干部或另配干部加以充实；凡是信用合作社人选不当的，应适当调整。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农、下中农的手里，社员代表会、理事会、监事会应该树立贫农、下中农的政治优势。对于信用合作社的干部，要挑选政治可靠，热心信用合作事业，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来担任。同时，要建立和健全社内的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群众对社务、业务和财务的监督。

第六，要解决某些信用合作社干部生活的实际困难，适当调整干部工资待遇。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同是集体经济组织，其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原则上应该



与农村基层供销社干部的待遇一致起来。

第七，要結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貧农、下中农群众經常进行防止和打击高利貸活动的斗争，积极地树立信用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了加强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力量，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股金是必要的。存款是信用合作社资金的主要源泉，股金积累是巩固信用合作社必要的物质条件，两者都不应该忽视。通过整顿，凡是有条件的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社章规定給社員分紅，以昭信守。信用合作社应积极举办儲蓄，吸收存款，以回籠货币，这是农村金融战线上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加强党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

党是一切工作的組織者和领导者，党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組織，是社队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加强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是巩固和发展信用合作社的根本保证。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群众性的組織，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它是与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而为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的经济工作，它必須在各级党組織的統一领导下，开展信貸活动。銀行、信用合作社应该經常向地方党組織汇报农村资金余缺情况，信貸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社务組織工作等情况，以便能在工作上得到党委的指示和支持，并将信用合作社的业务工作納入农村各项工作的統一部署中去，使它更好地为党在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才不致迷失方向，保证办得好。

地方各级党組織在领导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需要組織各个战线的力量，农村金融战线則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此，地方党組織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要把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列入自己的議事日程，切实监督銀行、信用合作社贯彻执行中央所确定的有关政策和指示，执行上级业务部門所批准的章程、規則、制度、計劃；关心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关心信用合作社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經常加强对信用合作社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們解决实际困难問題；注意挑选政治可靠、群众拥护而又有一定能力的干部加强信用合作社組織，并使他們較长期地稳定下来，成为又紅又专的干部。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信用合作社的职能作用，为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服务。各地經驗证明，地方党組織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加强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信用合作社就能办得好，就能够更好地为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

整顿信用合作社工作，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方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是个很大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如果只靠銀行、信用合作社干部，而沒有各级党組織的强有力的领导和貧农、下中农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必須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組織銀行、信用合作社的干部，依靠貧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去进行。各地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結合社会主义教育，制定整顿信用合作社的规划，組織干部力量，統一行动，善始善終，切实把整顿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以迎接我国农业生产正在出現的新高漲的大好形势。



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刚果的真相

· 苑 文 ·

列宁一九一六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最大企业家垄断同盟的统治。一旦所有原料的来源都掌握在某些人的手里，这种垄断同盟就巩固无比了。……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紧张，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各国垄断资本为争夺原料产地而进行的殊死斗争，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内部关系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地盘，它们彼此为了击败竞争对手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的斗争，更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在刚果所进行的激烈的争夺战，正是它们之间瓜分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加剧的缩影。

刚果是非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素有“世界原料仓库”和“中非宝石”之称。特别是在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矿产方面，它更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工业用钻石、半导体的重要原料锗、制造导弹和喷气式飞机必不可少的钴、钽等，产量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锡占第四位，铜和锰占第五位。此外，刚果还是帝国主义铀原料的一个重要产地。其他如制造热核武器所需的铀、钼、镉、铍、钍，以及金、银、钨、锌等，储藏量也很丰富。除了矿物资源，刚果还拥有丰富的农业原料，如棕榈产品、橡胶、棉花、咖啡、可可等，每年都有大量出口。

刚果地处非洲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从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帝国主义举行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在非洲角逐的中心。在那次会议上，由于各大国谁都不愿意让刚果被强大的对手所独占，因此在决定与会各国共同享有在刚果的航行和贸易自由的权利后，将管辖权交给了小国比利时。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2—253页。



近八十年来，比利时一直把刚果作为自己的摇钱树。它不仅依靠从刚果掠夺来的大量廉价原料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还用来补充换取外汇所需资源的不足。在比利时的出口总值中，差不多有十分之一是从转售刚果原料得来的。据统计，一九五五年比利时股份公司在纳税后的利润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来自刚果。在刚果拥有巨额投资的比利时四大垄断财团——比利时总公司、布卢菲纳集团、安班集团和康米尼埃尔公司，控制或影响着刚果百分之八十五的公司。其中最大的是比利时总公司，据估计，它在刚果的投资超过了其他三个财团投资总和的三倍以上。

除比利时外，英国垄断资本在刚果也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刚果的保险业几乎完全控制在英国资本手中。英国尤尼莱佛集团是刚果棕榈产品的垄断者和橡胶、可可生产的最大经营者，其中仅棕榈一项就占刚果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一。这个集团还掌握着刚果进口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刚果的主要经济部门采矿业中，英国垄断资本也有巨额投资，并凭借英国在整个中非、东非和南非的政治经济势力，而成为刚果采矿业的实际操纵者。例如，以英国为第二大股东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就完全垄断了刚果的铜、钴、锌、镭、铀以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开采和初步加工，其矿产出口值占刚果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家公司的出口物资有一半是由英国资本的运输系统承运的。另外，英国南非奥本海默财团还享有刚果全部钻石的

专卖权。

美国垄断资本对刚果的丰富资源垂涎已久。当一九〇六年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成立时，力图取得全世界铜垄断地位的美国铜业托拉斯，就曾想挤进去，但遭到英、比资本的拒绝。其后，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安排下，美国葛根汉集团始在美国刚果公司和刚果国际林业与矿业公司中，分别得到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尽管如此，美国在刚果的利益还是长期受到在刚果的经济中占优势的英、比两国势力的抑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刚果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最大的原子工业的原料产地，利用自己在大战中所处的有利地位，迫使英、比两国与之签订协定，承认美国对刚果铀矿的管理权，并且规定美国有权获得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下剩四分之一给英国。可是这个协定开始执行以后，英国就被迫把自己的份额让给美国。但整个说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果的经济命脉仍然掌握在英、比垄断资本手里。据统计，到一九四三年，美国在刚果（包括卢旺达、布隆迪）的投资只有六百五十万美元，远远少于英国和比利时资本。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利用西欧国家普遍削弱的机会，加紧排挤老殖民主义者的势力，而拥有丰富资源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刚果，更是它势在必争之



地。特别是，美国制造原子武器和发展军事喷气技术，迫切需要从刚果进口大量的稀有金属，这就决定了刚果对美国的意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这样露骨地说过：“如果我们从刚果、中东和苏伊士运河丢掉了，‘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为维持我们的生存、为制造钢铁和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料呢？’”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也赤裸裸地供认：“刚果的矿藏对于美国的工业和军事需要有很大贡献，我们和刚果的未来关系必须能保证这些矿产品的继续供应。”

为了把刚果丰富的矿产原料控制在自己手里，美国垄断资本竭力想打进刚果的重要采矿公司，特别是为英、比垄断资本控制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一九五〇年，英国英格兰银行出卖法国抵偿英国战债的坦噶尼喀租让公司的股票，美国垄断集团曾企图把这笔股票全部购买过来，以便通过这家上层持股公司间接控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但由于英国垄断资本的严密防范，这笔股票的大部分都落入英国与比利时垄断资本之手，只有百分之八的股份为美国垄断集团所获得，远不足以形成对这家公司的控制。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规定，在十年内，未经英国政府准许，坦噶尼喀租让公司在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所掌握的股票，不得任意出售或转让；如果出售，英国政府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这样，美国要想控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就更加困难了。

列宁曾经指出，“财政资本不仅重视已

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重视可能发现的产地”^①。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刚果已开发的矿藏进行渗透的同时，还力图设法把那些尚未开发的矿藏也控制起来。但是，这也同样受到英、比垄断资本的抵制。

刚果广阔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刚果河下游的下刚果地区，是一个地下资源还没有开发的处女地。这个地区同加丹加一样，蕴藏有大量的铜、铀、锰、锡、铁等矿物资源，而且还有在加丹加尚未发现的铁矾土矿藏（估计储量在五亿吨左右），以及占世界总储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水力发电潜力。比利时早在二十年代就对这里的资源进行过勘察，并提出了关于建立水力发电站等工程的“英格计划”。这一计划如果实现，下刚果地区不仅将成为非洲的“鲁尔”，大大有利于发展各种巨型冶金、电力化学和原子工业，而且整个刚果也将因其在经济上具有压倒优势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抱有囊括非洲野心的美帝国主义者，对英格水力发电工程计划一开始就抱有浓厚的兴趣。据估计，这个计划的全部投资将达三、四十亿美元，只有美国才有能力负担得起，这就更助长了美国垄断资本插手的野心。

一九五四年二月，美国援外事务管理署派遣了以孟山都化学公司前董事长兰德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英格进行现场考察，并酝酿组织兴建水力发电工程的公司。美国这一行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3页。



动引起了英、比壟断資本的警惕。他們担心如果英格計劃实现和下剛果采矿业建立起来，其異常低廉的电力和地处海口的运输便利，将使加丹加采矿业不可能与之抗衡。因此，他們宁可暫不开发或分批分期开发这里的水力和矿产资源，也不願让美国插手。按照美国《柯里尔》杂志的說法，这些壟断者是“打算把英格和下剛果的矿藏保留給自己的孙子們”。

英、比老殖民主义者对于美帝国主义利用强大的財力来挖自己牆脚的作法，一直存有戒心，并且公开表示不滿和抗拒。英国在海外的广播电台就曾抱怨說：“如果让美国投入太多的資本，那么非洲丰富的矿产在开采以前就已經是美国人的了。……我們絕不能存在任何片刻的幻想，似乎受美国黄金灌溉的非洲会长成英国的玫瑰。”一九五五年，比利时殖民部甚至还发布了一項受到英国支持的关于限制外資的特別声明，規定比利时資本今后在剛果建立的所有新公司中所占的比重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一，而且公司的經營管理必須由比利时人担任。

但是，經濟、政治实力已經大大超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不会忍受这种抵制的。它們迫不及待地要求把剛果从老殖民主义者的手里夺取过来，使其变成完全受自己支配的势力范围，从而更有把握、更可靠地控制剛果的原料，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利用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統治发生动摇的机会，借口所謂“填補真空”，把老殖民主

义者从他們自己的陣地上排挤出去，取而代之，从来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所慣用的手法。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談到他所謂的“未見分曉的地区”时，就曾毫不掩飾地說，“机会最丰富的地方莫过于动荡不安的南非联邦以北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之間的地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肯尼迪还认为，为了“直接同非洲各国接近”，“即使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部分国家发生磨擦”，也在所不惜。

一九五九年一月，比利时殖民者在剛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爭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在原則上同意剛果独立。美帝国主义立即利用出現这一所謂“权力的真空”的机会，在剛果大肆活动，一面派出大批官員訪問剛果，物色代理人；一面派出代表团考察所謂“技术援助”的可能性，积极进行“接管”剛果的准备。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企图控制剛果的阴谋活动，引起了英、比老殖民主义者强烈的反对。但是，在剛果已經独立和难以在剛果全境与美国相抗衡的情况下，他們被迫采取了固守剛果东南部采矿地区、特别是固守加丹加地区的办法，以保持它們的既得利益。

加丹加是剛果財富最集中的地区，它占有剛果矿产的百分之八十，被称为“地质学上的奇迹”和“剛果的乳牛”。英国和比利时在剛果的投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剛果政府的全部財政收入，也有一半左右是来自这里。

加丹加还是英、法、比、葡、南非等国



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南非地區的“礦業帝國”的重要一環。這個礦業帝國以英國南非公司為樞紐，用交叉投資、互派董事等辦法，將諸如英、法兩國的羅斯柴爾德集團、英國南非的奧本海默集團、比利時總公司以及其他國際壟斷集團組合在一起，共擁有約五十億美元的資本。它控制着南非、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安哥拉以及剛果東南部廣大地區的採礦業，壟斷着資本主義世界黃金生產的百分之七十五，銅的百分之二十五，鈷的百分之八十，幾乎全部的工業用鑽石和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鈾；而其中銅的百分之四十，鈷的百分之八十，鑽石的百分之八十及鈾的很大部分，都產自加丹加及开赛省南部。因此，加丹加的得失，直接關係到老殖民主義者在整個中非、南非的經濟障地是否會被動搖的問題，如果失去加丹加，也就必然意味着這個老殖民主義者的礦業帝國“基本完蛋”。

但是，對美國新殖民主義者來說，加丹加也是一塊必爭的“肥肉”。正如美國《紐約時報》所招認的：“加丹加對能夠控制它的財富的任何人來說，是一個大家爭奪的好東西。”現在，美國所需要的許多重要原料都越來越仰賴於這個地區。一九三七年，美國從剛果掠奪的原料總值只不過三百萬美元，但到一九五七年就激增了三十三倍，達一億零三百萬美元，這還不包括從英、比兩國轉口的數字。

不僅如此。美國奪取加丹加的目的，還在於用控制原料產地的辦法，來剝奪敵方進

行競爭的可能性，以利于巩固自己的壟斷地位。在美國壟斷資本看來，英、比壟斷資本在加丹加擁有豐富的礦產原料，對自己是很不利的。例如，加丹加的銅的生產就直接威脅着美國銅礦托拉斯的利益。加丹加的銅礦和英國控制的北羅得西亞的銅礦脈相連，蘊藏量居於世界主要銅集中產地的首位，含銅率高出美國國內銅礦二到五倍，多數礦山可以露天開採，並有廉價的勞動力，這些優越的競爭條件，使它成為美國在世界銅市場上主要的競爭對手。一九三七年，它的銅產量就達到資本主義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八左右。自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世界銅的生產過剩危機開始以後，到一九五九年，美國控制的銅產量在資本主義世界總產量中的比重，已從百分之六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六，而加丹加——北羅得西亞銅礦的產量所占的比重，則從百分之二十一點四上升為百分之二十六點五。這種情況當然是美國壟斷資本所不能容忍的。

加丹加的得失，不但關係到老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經濟利益能否保持，而且由於這個地區位於剛果的南端，是進入中非、東非和南非的門戶，在非洲據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從來都是殖民主義者用來控制剛果並進而控制非洲的據點。長期以來，英國一直想把加丹加同它在中非、東非和南非的殖民地、附屬國用某種“聯盟”的形式連結起來，以巩固它在非洲殖民統治的“最後基地”。而美國新殖民主義者，也同樣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把加丹加從老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取過來，作為自



已插足中非、东非和南非的跳板。

一个蛮横地要全部鲸吞，一个顽强地想重点据守，彼此针锋相对，各不退让，这就使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三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他们掠夺世界，互相争斗，互相厮杀。想长期掩盖这一点是不可能的。”^①列宁还说：“私有制就是掠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强盗的国家，而强盗为了分赃就不免要互相厮杀。”^②尽管它们有时采取“和平”的斗争形式，但是，当这种形式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时，它们就要用武力来解决。近几年来，以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为一方，以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为另一方，为了争夺刚果所进行的三次火并，又一次证实了这个正确的论断。

一九六〇年七月，当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拼凑“联合国军”出兵刚果时，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为了把加丹加从刚果分裂出来，也指使其傀儡冲伯集团，匆忙宣布加丹加“独立”，企图以此造成分裂和继续霸占加丹加的“合法”局面。但是，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帝国主义不但照样把“联合国军”开进加丹加，而且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不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所有比利时和其他外国军事和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等立即撤离刚果”。这个决议还赋予“联合国军”“在

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权力。比利时殖民者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将军队撤出加丹加，但是却把包括飞机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交给冲伯集团，帮助冲伯集团扩充军队，建立封建部落武装，并在西欧各国和中非联邦、南非等地招募雇佣军、扩充实力，准备顽抗。

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帝国主义一面指使它的代理人组成所谓“中央政府”，将支配刚果的政治大权抓到手里；一面加紧向加丹加增运“联合国军”，积极进行夺取加丹加的军事部署。九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驱使下的“联合国军”向加丹加发动武装进攻，从而爆发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第一次火并。这次火并，由于老殖民主义者支持的冲伯集团坚决抵抗，“联合国军”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暂时停火，但是经过重整实力之后，很快就在同年十二月又再次发动了第二次火并。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种“暴力行动”，老殖民主义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英国资产阶级报刊连续发表社论，猛烈攻击“联合国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奉行的是一种完全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和愿望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既简单又丢脸：搞垮冲伯政府，控制加丹加的钱，以使得这些钱可以像刚果其余的资源一样被挥霍掉”。比利时的报刊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利用联合国吞并加丹加的“侵略”

①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

②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1页。



行动也一再表示不满。

第二次火并虽然使新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某些优势，但还是没有能使冲伯集团屈服。于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公开出面，安排利奥波德维尔政权同加丹加冲伯集团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新老殖民主义者也不断在幕后进行活动。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无法调和，经过将近一年的讨价还价，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

一九六二年底，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击英国策动中、东非国家排挤和代替联合国干预刚果的企图，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一次驱使“联合国军”对冲伯集团发动进攻。这次火并终于迫使冲伯集团宣布结束加丹加的分裂状态，承认阿杜拉政府对加丹加的管辖权，从而实现了美国统治集团所谓的“统一”。

经过三年来的明争暗斗，美国帝国主义在刚果的地位正在加强，老殖民主义者的势力受到了排挤和削弱。现在美国帝国主义不仅通过它一手扶植的阿杜拉傀儡政权，控制了刚果的财政和对外贸易，而且还通过经济“援助”，使刚果对它的依附愈来愈深。从刚果宣布独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底，美国以“联合国刚果基金”、“特别信用基金”等名义，拨给刚果政府的经济“援助”共达一亿二千三百多万美元，为美国在刚果倾销“剩余”商品开辟了道路。一九六二年美国对刚果的出口额已猛增至六千八百万美元，为一九六一年的三倍，成为刚果市场的首要供应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美国政府与阿杜拉政府签订的

对美国私人和公司在刚果投资的保证协定，更为美国资本大量渗入刚果打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已经逐渐取代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地位，成为刚果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

四

刚果在名义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刚果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得到解决。在刚果的经济实力远比美国雄厚的老殖民主义者，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根据各自的利益，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法，与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对抗，竭力保持甚至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事情正像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招认的那样：“尽管联合国军在那个麻烦的国家取得了军事胜利，较多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将发现它在刚果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

刚果“统一”以后，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不仅仍然保持着各自在刚果的经济利益，控制着刚果的主要企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新的投资和加紧拉拢阿杜拉政府。不久前，比利时政府通过同阿杜拉政府缔结技术合作协定，答应给予刚果以“充分的技术援助”，企图卷土重来，扩大它在这个傀儡政权中的影响。据美国报刊透露，现在已经派到刚果帮助阿杜拉政府改组财政、工矿企业和进出口贸易的比利时顾问和专家，以及各种行政、文教和技术人员，已达二千人左



右。此外，比利时政府还利用美国改編剛果军队的計劃，积极与美国爭夺对剛果政府軍的控制权。据英国报纸透露，英国政府在今年七月邀請阿杜拉訪英后，也表示要向剛果提供“經濟援助”和幫助阿杜拉政府訓練军队。最近，英国政府已經接受阿杜拉政府的要求，同意給予約二百万美元的“援助”。与此同时，正在非洲积极巩固和擴張自己势力范围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为了把剛果拉入“非洲——馬尔加什联盟”，也向阿杜拉政府提出了包括許諾給予每年两亿美元在內的一系列“援助”項目。四月間，法国派往剛果的一个代表团并且声称，法国对剛果的“援助”将采取直接提供的形式，“不通过联合国”。

在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支持下的冲伯政权，虽然被迫解散，但是冲伯一再表示他絕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剥夺加丹加的“自决权”。他說，“关于剛果問題用武力强迫实行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是肯定的解决办法”。今年六月，冲伯又揚言他絕不放棄他的职责，而且准备“接管”中央政权。事实上，冲伯集团至今仍然控制着加丹加西部的路阿拉巴省，并在东加丹加省保持着强大的影响；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也基本上还保存在自己手里，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活动。据法国《国际論壇》周刊今年九月自伊利沙伯維尔发出的一条消息說，“加丹加的秩序远沒有恢复。除了联合国部队勉强地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安全的主要城市之外，前加丹加政府的部队实行了恐怖統治。冲伯的宪

兵躲在丛林中繼續进行破坏活动，悍然反抗利奥波德維尔当局派去追赶他們的部队。看来这些宪兵并不打算交出武器和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叛乱分子期待着冲伯将在伊利沙伯維尔重掌权力的一天，他們认为这一天临近了。”

新老殖民主义在剛果的爭夺給剛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前門狼未走，后門虎又来。多少年来，剛果人民在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統治下，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但是，他們也从自己的苦难中，从生与死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广阔的国土被踐踏，丰富的宝藏被掠夺，勤劳的人民被屠杀，这一切不能不激起剛果广大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反抗。这些年来，剛果人民为了爭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并且一度贏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虽然由于狡猾的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扼杀，他們的解放事业在中途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这只是暫时的，剛果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出新老殖民主义者虛伪、贪婪和殘暴的反动本性，認識到摆脱奴役和苦难的道路只能是团结起来，坚决同新老殖民主义者——首先是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不屈不撓的斗争，一个也不留地把这些嗜血的强盜从剛果的土地上彻底清除出去。

已經点燃的剛果人民爭取独立、反抗侵略和压迫的革命火种，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尽管剛果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将是曲折的，但是，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他們爭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現代資產階級的新實在論哲學

任 華

新實在論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重要流派之一。它產生於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它流行於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英國新實在論的主要代表是穆爾、亞歷山大等。美國新實在論的代表是培里、霍特、孟太格等。一九二四年以後遷居美國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也是這派哲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

新實在論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折衷雜拌哲學。這種哲學是同馬赫主義、實用主義等現代實證主義流派一脈相通的，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日益和這些流派融合起來，以至現在它們之間的分別可以說已微不足道了。

新實在論者不敢公開承認他們的哲學是唯心主義，却把它叫做“實在論”，企圖以“認識的對象是客觀獨立的實在”這一說法，來掩蓋他們這種哲學的唯心主義實質。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曾經把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稱為“實在論”，新實在論者襲用了這種作法，不過在他們的“實在論”的前面加上一個“新”字罷了。

新實在論特別流行於英美兩國，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英美兩國的資產階級早已成了反動的階級，但是仍然披着“民主”的外衣，把它作為欺騙人民，維護反動統治的

工具，並且用它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英美兩國的資產階級把它們的国家說成是“民主自由”的堡壘，而它們的思想代表便成為表達這種願望的喉舌。新實在論者正是這樣的一種突出的思想代表。例如，美國的新實在論者培里就是所謂美國“民主”的大力宣傳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頌揚美國“民主”。他說：“極端革命的宣傳在這個國家（指美國——引者）取得這樣小的進展，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一向並沒有感到需要形成一個明確的政黨，這個事實是由于下面這樣一件事實造成的：即工人階級的確在現存制度中找到了他們的真正機會”^①。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在美國行不通，美國的工人階級不需要馬克思主義政黨，因為在美國的“民主自由”社會里，工人和資本家一樣有機會發財致富，得到幸福的生活。培里竭力美化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權，否認美國需要革命，他說：“我們現有的政體已經經受了國內外戰爭和巨大社會變革的考驗”，因此，“我雖然預見到重大的變化，但我却預見不到革命”^②。新實在論者把自己的哲學說成是適合並服務於這種民主主義的哲

①② 《現代理想的衝突》，美國紐約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8年版，第502、539頁。



学。因此，新实在論在自命为“民主堡垒”的英美两国找到了它的最适宜的滋长园地，是不足为奇的。

这里，我們准备首先考察新实在論者歪曲利用现代科学成就，他們制定的所謂“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然后以培里等的著作作为代表，揭露新实在論者如何利用这种方法，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最后，指出这种哲学的危害性。

以保卫“民主”自詡的英美资产阶级，企图把科学这面旗帜攬到自己的手中，自封为科学的信奉者。它們的代言人新实在論者不但大讲“民主”，而且侈談“科学”，声称他們的“民主”是完全符合于科学精神的。

同馬赫主义者着重歪曲利用物理科学有所不同，新实在論者特別着重歪曲利用的是现代数学及随之发展起来的数理邏輯的成就。他們企图赋予数学和数理邏輯以一种先驗的、純粹概念的分析 and 演繹的性质，并且企图把这种分析和演繹方法，直接推广应用于哲学，从而提出他們的所謂“邏輯分析方法”。他們认为，只有使用这种方法，才能够把哲学納入科学研究的正軌，所以，哲学的本质就是邏輯。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論者說：“作为傳統研究方法的典范的邏輯与数学本身已經經過了一种彻底的修正，已經为准确思維的一般原理提供了新的綫索”^①。因此，“哲学必須和邏輯結合起来，……并且把最精确的科学形式的准則用到自己的建設程序上来”^②。所謂“最精确的科学形式的准則”，就是指邏

輯推論和邏輯分析原則。新实在論者用这种原則和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新实在論者的这种方法論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质。在这种方法指导下，他們把哲学变成了脱离实际的概念分析。照他們看来，哲学的任务，在于把常識和科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和命題，加以邏輯的、概念的分析；分析的结果并不能使人們得到真理，只能帮助人們把已有的某些概念弄得更清楚一些，使人們解除理智上的困惑。因此，哲学家应当采取一种为知識而知識的态度，把知識看成純粹可以“冥想的”。这就是新实在論者应用“邏輯分析法”所得到的“科学的哲学”。它不能够帮助人們認識客观規律。試問：这样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科学的气息？沒有，一点也沒有。它是完全同科学背道而馳的。

新实在論者的“邏輯分析方法”，其极端的表現，竟至要求把哲学变成他們所理解的那种所謂先驗的数学或数理邏輯的演繹系統。美国新实在論者霍特在他的《意識的概念》一书中宣称，现代邏輯是从少数未經定义的概念开始，把整个邏輯系統推演出来。他进而认为客观世界也应当是这样的系統。他把邏輯的基本概念和命題，說成是什么“中立的东西”，企图由此推导出所謂“复合物”。这种“复合物”，首先是性质，其次是空間、時間、运动、质量，再其次是物体，有机体，最后是意識。这样，在霍特看来，整个世界万物，完全变成了一个邏輯的构造系統，也就是邏輯的演繹系統了。霍特等人认为，这就是

①② 霍特、培里等著：《新实在論》，美国紐約 The Macmillan Co. 1912 年版，第 21、26 頁。



邏輯分析的最終目的，也是哲學真正科學化的最高表現。其實，這是很荒謬的。不用說，他們把數學和邏輯看成是純粹抽象概念的先驗演繹系統，已經是錯誤的唯心主義觀點；即使數學和邏輯具有明確的演繹性質，這也只是由於它們的對象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而演繹方法，是人們根據對客觀事物某種規律性的認識而得來的。它在一定條件下是有作用的，抹殺或低估這種作用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們絕不能把它的作用加以片面地夸大。新實在論者硬要把在數學和數理邏輯中起明顯作用的演繹方法，說成是唯一的科學方法，強使哲學數學邏輯化，其結果只能夠使他們走上荒謬的道路，使這種哲學成為唯心主義的虛構。

二

英美的新實在論者，以反對十九世紀末的新黑格爾主義自居，並聲稱要對貝克萊的唯心主義哲學進行批判。新實在論者的這種作法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他們真是在反對唯心主義，堅持唯物主義。其實不然。只要對他們的主張做一番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這種作法完全是一套騙人的詭計。

美國的一些新實在論者煞有介事地宣布：他們要把貝克萊的原理作為唯心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加以批判。他們說，貝克萊的觀點的錯誤，是由於他利用了一種所謂“自我中心的困境”所引起的。什麼叫作“自我中心的困境”呢？照美國的新實在論者看來，一個人是不能離開他和事物的認識關係來認識事物的；因為當他意識到對象時，他的意

識總是和對象在一起的。這會產生什麼困難呢？照培里的說法，困難就在於，如果我既已處在一種認識的關係之中，“為了要想發現（如果可能的話）一個事物恰恰是怎樣為這種認識關係所改變的，我就要發現一些關於在這種關係以外的事物的例子，以便於我可以把它們和在這種關係以內的事物的例子加以比較。但是我不能發現這樣的事例，因為‘發現’也是我試欲避免的這種關係的一種。”^① 孟太格也說，“我們可以把一隻狗放到一隻貓的面前而觀察到它叫，然後把它帶走，同時也看到它不叫了。於是我們滿可以得出結論說，狗的叫是依賴於它處在貓的面前的……但是我們不能在我們看見一事物之前或以後來看一看這個事物以便發現我們看見它是否改變了它的樣子”^②。

美國的一些新實在論者認為，貝克萊的錯誤在於利用了這種“困境”來論證他的唯心主義。培里說，“貝克萊最後一著就是訴之于這個論點”：“一個人不能想到事物離開意識而存在，因為一想到它，事實上就把它置於意識之內了”^③。美國的新實在論者表示反對貝克萊的這種作法。照他們看來，雖然由於存在着“自我中心的困境”，我們不能把認識關係以內和以外的東西加以比較，從而直接證明事物可以離開人的認識而獨立存在。他們並且表示，由於存在着這種“困境”，要求我們這樣來直接證明這點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特別是他們提出來，意識和我們所意

①③ 《現代哲學傾向》，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27—128、127頁。

② Runes 編：《二十世紀哲學》，美國 Littlefield, Adams and Co. 1956年版，第373頁。



三

識到的对象同在一起并不能决定对象是否依赖于意識而存在。培里說：“自我中心的困境”“絲毫也沒有证明什么。它只是一个在方法論上的特殊困难”，它只“包括有这样一个命題：每一論及的事物就是一个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复的命題，意思是說，每一被論及的事物是被論及的”^①。因此，它不能給“唯心主义的目的服务”。

美国新实在論者对貝克萊的这种批評，我們只要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观点同貝克萊的观点在本质上沒有有什么不同。他們既然承认人在与事物的認識关系中不可能证明事物是独立于人的認識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他們並沒有真正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中自拔出来。照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能和事物发生認識的关系中证明事物是独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这种情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存在新实在論者所說的“自我中心的困境”。

美国新实在論者的这种錯誤，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們本来就是要在“实在論”的名义下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他們对于貝克萊的批評也无非是一种作伪的手法而已。培里自己就泄露了这个秘密。他說，貝克萊的論点，“使人們注意到一个毫无疑問存在的情境而且那是哲学最重要的原始发现之一。沒有一位思想家能以……提到一个不是观念的东西，其明显而簡單的理由就是：当一提及它时，他就把它变成一个观念了”^②。培里既然承认只要人一提到事物就把它变成了观念，并且认为是哲学上“最重要的原始发现之一”，这岂不是对貝克萊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支持嗎？

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論者宣称，要用科学方法把認識論和世界观分开。孟太格說：“哲学家应当遵循科学家把他們的問題孤立起来而一个一个地来解决它們的榜样”，“把認識論問題孤立起来，研究在任何知者或認識者与任何他們所知道或認識到的对象之間所得到的認識关系，而不对認識主体或所認識的对象究极性质有所偏見，甚至不提出这方面的問題”^③。孟太格明确宣布，他和他的同道們只是在認識論的問題上同意和采取“实在論”的观点，至于在对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上，他們是持有不同的看法的。在这里，美国新实在論者又玩弄另一欺騙手法。

自然科学家为了研究某种自然現象，常常把一些有关的条件暂时撇开，把这种現象暂时孤立起来加以研究。美国的新实在論者故意曲解科学上所采用的这种研究問題的方法，企图以此割裂認識論和世界观的联系，以便把他們的認識論冒充为类乎唯物論的观点。但是，他們的这种詭計，是不难識破的。

大家知道，世界观和認識論两者是不容割裂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認識論。如果在世界观上不能够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原理，那么，即使把客观事物說成是某种独立于認識活动而存在的東西，也并不能够改变这种看法的

①② 《現代哲学傾向》，第128、127頁。

③ 見《二十世紀哲学》，第372頁。



唯心主义实质。实际上，美国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正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因此，要揭露这种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必须首先考察一下他们的世界观。

在 worldview 上，不少美国的新实在论者以反对二元论为名来反对唯物主义。他们企图掩盖自己哲学的阶级实质，采取所谓“中间路线”。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并且提出所谓“中立一元论”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他们以反对把心灵和物质看成两种独立的东西为借口，要求根本取消物质的概念，代之以所谓“关系”的概念；主张物质和心灵的分别只是关系上的分别，物质和心灵一样，都不是最根本的存在，而是某种更根本的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所谓“中性物”以不同的关系所构成的。培里说：“……心灵和身体两者都是可以分析成为较为原始项目的复杂体……”^①，“当它们一被分析时，看起来，它们所由组成的这些比较原始的项目，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可以互相变换的”^②。他还说，“这个观点在马赫《感觉之分析》这本小书中最好地被提出了，……按照这位作者的意见，物理的和心理的要素乃是一样的。”^③这个“要素”是什么呢？马赫说是“感觉”，詹姆士说是“纯粹经验”，新实在论者说是“中性物”或“原始项目”。这个“中性物”或“原始项目”，实际上仍然是“感觉”和“纯粹经验”一类的东西。因此，新实在论的这种哲学观点，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一样，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

美国新实在论者正是在这种“中立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来建立他们的认识论的，这样的认识论当然也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培里从所谓“中立一元论”出发，在认识论上也以反对二元论为名来建立他的所谓“内在的东西的独立性”的原理。实际上，这是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直接对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培里说：“内在说肯定知识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正如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区别一样，乃是一种关系上的和机能上的区别而不是一种内容上的区别，这样便纠正了二元论”，而“在对物体对象的知觉中便不再包括有什么特殊的困难了”。因为同一的东西，“在借助于一种关系而成为物体的东西的同时，它也可以借助于另一种关系而成为知觉的内容”。所以，“当我感知火星时，这个太阳卫星(物体)便是我的知觉(心灵)；这和我们假定我叔叔是我父亲的兄弟一样，是没有什么矛盾的。”^④这就是说，如果承认物质和心灵都是彼此独立的实体，这在认识论上必然把客观事物变成不可捉摸的东西，因而会导致不可知论。培里认为，要避免不可知论，只有采取“中立一元论”观点，把物质和心灵都变成同一种元素以不同的关系构成的东西。同一的元素，在一种关系中取得物质的性质，并不排斥它可以同时在另一种关系中取得精神的性质。像同一个人对于我父亲来说是兄弟，而对于我来说是叔叔一样，关系

①②③④ 《现代哲学倾向》，第302、303、303、304页。



虽有不同，人总是同一个人。培里认为，所谓认识关系，也不过就是这种心物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当我们认识一事物的时候，不能说，这事物是一种存在，我们对于它的观念是另一种存在，只能承认它们就是同一的东西，不过处于不同的关系罢了。既然如此，也就可以说，事物既是内在于我们的心灵的，同时也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这就是培里所谓“内在的东西的独立性”的原理。培里并且毫不掩饰地宣称：“现代的实在论比较地接近于休谟所建议的‘观念’的一元论的实在论”^①。

培里的这种所谓“内在的东西的独立性”的观点，也就是孟太格所说的“直接呈现的实在论”。孟太格宣布“至少我们意识到的有些特殊东西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时也照样存在”之后，接着就说，这些东西是“直接认识到的而不是间接通过摹写或心像认识的”，孟太格并且说：“这是与笛卡儿和洛克的代表的实在论或认识论的二元论相对立的一种直接呈现的实在论”^②。孟太格所谓“直接呈现的实在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论者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们说：这种观点是同“实在论”观点密切联系着的。他们说：“当知识发生时，在心灵中或其面前的知识内容是 and 所知的事物在数目上同一的。”“当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变成了意识的内容”^③。可见孟太格所谓“直接呈现的实在论”，正是培里的“内在性”与“独立性”的二位一体说。

从上面的这些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美

国新实在论者口口声声要反对笛卡儿和洛克等人的二元论，实际上是要利用这些哲学家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缺点来反对他们的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企图建立的所谓“直接呈现的实在论”，归根到底，就是要肯定客观事物和作为其反映、摹写的主观形象——观念是完全同一的，并且把这种主张同休谟的观点联系起来，这难道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吗？他们企图用所谓“中立一元论”来掩饰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是徒劳的。美国的新实在论者是在“中立一元论”掩盖下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中先把事物变成了观念，使它取得了观念的身份，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的认识论建立起来。他们企图用这种手法来调和所谓“内在性”与“独立性”的矛盾，是绝对办不到的。新实在论者说来说去，无非是要把客观事物和观念完全等同起来，把客观事物说成是一种观念。

四

从上述可以看出，新实在论的观点，实际上是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翻版。不过新实在论还有一点不同于这些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的表现，那就是它还杂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是同新实在论者侧重歪曲利用数学和数理逻辑有密切

① 《现代哲学倾向》，第300页。

② 《二十世纪哲学》，第372—373页。

③ 《新实在论》，第35页。



联系的。

新实在论者根据“逻辑分析方法”，要求把它推广到感觉性质以外的范围。培里说：“物理的和心理的复杂体不仅在可感觉的性质上，而且在一定的更为根本的形式关系上，……都有其共同之点。这些关系在它们的纯粹状态中只有用超越于可感觉的区别作用范围以外的分析才能够被发现。”^①于是他宣称：“科学并不是一切的真理，而物理的自然也不是一切的存在”，“物理科学预先承认了逻辑和数学；或者说，物理的实在是复杂的，可以分解为较为简单的事项和关系的”^②。换言之，“逻辑先于物理学，这意思是说，它需要涉及实在的较为基本的形式”^③。培里所说的“较为简单的事项和关系”、“实在的较为基本的形式”等，都是指逻辑和数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一类的东西。新实在论者不但把这些东西看成是最根本的，而且把它们说成是所谓客观独立存在的，或如他们所常说的“潜在的”共相的主要范例。这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孟太格说：新实在论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肯定“至少我们所意识到的有些本质或共相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是潜在的”，并且明确宣称，“这是柏拉图的或潜在的实在论”^④。在另一地方，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论者说：“新实在论者也是一个柏拉图的实在论者。他赋予思维的东西和感觉的东西，赋予逻辑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赋予潜在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以充分的本体论上的地位”^⑤。照新实在论者看来，一般的共相是和特殊的东西完全对立的，二者的存在

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特殊的事物是存在于时间之内的，但是“共相”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着。“共相”是永存的，是超时间的。

新实在论者把一般和个别割裂为永恒不变的“共相世界”和“特殊事物的世界”之后，就在这个基础上也把知识割裂为经验的和先验的两种。他们的所谓先验的知识，是不能被经验所证明的，它只处理“共相”之间的关系。这种知识，照他们看来，主要就是逻辑和纯粹数学的知识。新实在论者的这种观点，把反映事物的普遍概念变成客观独立存在的东西，并把它们同客观存在的个别事物割裂开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根本否认了二者的联系，否定了理性认识必须来源于感性认识的唯物主义原理。这种观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新实在论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割裂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企图否定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经验知识的确实性。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他们认为，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一切经验的知识都是或然的，没有必然的确实性，而数学和逻辑的知识却是必然的。新实在论者认为，数学和逻辑知识的必然性不是由经验得来的，因此就只能是先验的了。既然这类知识是先验的，因此它的对象就不可能求之于现实的世界，而必须求之于另一世界了，即所谓“共相世界”，

①②③ 《现代哲学倾向》，第 303、109、110 页。

④ 《二十世纪哲学》，第 373 页。

⑤ 《新实在论》，第 35 页。



这就是他們的邏輯。这种邏輯是很荒謬的，它抹杀了事物发展的規律性，否定了經驗知識的客观必然性，也否定了数学和邏輯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

* * *

总起来看，新实在論是现代实证主义的一个流派。它歪曲利用现代数学和数理邏輯，提出所謂研究哲学的“邏輯分析方法”，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这种哲学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新实在論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規律性，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規律性是可以認識的，把客观事物的必然性归之于所謂“共相世界”。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說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现实世界轉移到所謂“可能的世界”，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他們不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利于帝国主义的統治。

其次，新实在論者还用这种哲学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作論证。培里說，“实在論的倫理学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①。因为它是一种多元論，而“多元論者要說在个人中有着一种內在的和最后的价值”^②。

新实在論者还根据他們所标榜的“中立一元論”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論。他們宣称，事实上根本没有馬克思所假定的这样一种在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間的明确的划分，因为，在现代世界里，已經出現了一个新的“中等阶级”，这个新的“中

等阶级”已經把以前由资本家所行使的一切或大部分职能接受过来了，因此，这个阶级似乎起着越来越大的左右社会和調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他們的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論”，是他們的“中立一元論”的根据，同时他們的“中立一元論”，又轉过来促进这种“理論”的傳播，对广大人民起着麻痹的作用。

最后，新实在論者所宣揚的“邏輯分析方法”，还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煽起一股煩瑣的歪風，专务不着实际的文字概念游戏，为稍后的邏輯实证主义和所謂英国分析哲学等等作了准备。新实在論本身也进而同这些流派融成一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汇为一股更加与馬克思主义为敌的实证主义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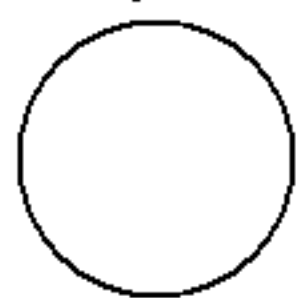
新实在論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也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它所标榜的“实在論”曾經迷惑过一部分人。特别是它所宣揚的邏輯分析哲学，曾經使当时一部分自命清高而不过問政治的哲学工作者，沉溺于玩物丧志的学院式的煩瑣哲学研究，对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拒絕的乃至对抗的态度。在这种新实在論的影响之下，所謂沒有事实的必然，只有邏輯的必然，成了当时一部分哲学工作者的信条，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無論从新实在論在今天已經成为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一个組成部分来看，或者从它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所曾經发生过的影响来看，对这种哲学流派进行批判，都是十分必要的。

①② 《现代理想的冲突》，第279、375頁。



红旗

HONGQI



24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四期 ★

目 录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

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 扬 (1)

- 一 一部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辯論和斗争,并且战胜它們的历史..... (3)
- 二 批判現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綫头等重要的任务..... (11)
- 三 总结和研究当代革命斗争的經驗和問題,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22)
- 四 建立和壮大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家的队伍..... (27)

☆ 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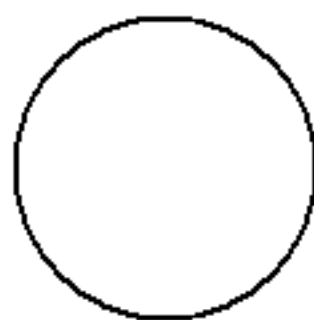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

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周 揚



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线。这条战线，在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下，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担当什么任务呢？

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现代修正主义者吹嘘自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而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教条主义者”、“假革命”，加以各种荒谬绝伦的攻击。到底谁是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呢？这就在全世界一切革命政党、一切革命人民、一切肯用思想的人面前提出了问题，使他们不能不认真地注视这场论战，认真地思考、研究、比较，以便辨明是非曲直，决定何去何从。

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一切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派一道，坚决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颠扑不破的论证力量，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实践已经而且将要继续证明，我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具有无限的威力。我们的成就，使全世界一切革命的、觉醒的、有志气的人们为之欢欣鼓舞，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殷切的希望。

很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积极地投身到反对现代修正



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投身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我们就将一事无成。我们应当积极地在学术战线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系统的批判，应当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为我国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在他刚刚开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就不满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脱离政治，而指出，只有同政治结合才可能使当前哲学成为真理。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哲学的命运，要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这就是说，理论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影响千百万人，变成物质的力量，促进世界历史面貌的改变。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战线才能成为真正战斗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战线。

这就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树立批判的旗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理论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不破修正主义，不遏止这股逆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正如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马克思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榜样，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问题，研究世界人民革命的经验和问题，研究我国和世界历史，而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到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学术研究如果失去和现实斗争的血肉联系，就会变得毫无生气；厚古薄今，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脱离正确的轨道而走入歧途。

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有战斗力的、经得起风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

这就是当代革命斗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国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必须担当的战斗任务。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② 《一八四三年九月马克思致阿·卢格的信》。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在这个斗争中从事新的学习，开始新的探讨；在科学研究、教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年轻的人材逐步地生长起来了。总的说来，我们的队伍是好的。但是我们所已经做的和客观形势所要求于我们的，还是相距很远。

我们应当如何在学术战线上来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呢？如何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安排我们的研究课题呢？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培养和锻炼我们的队伍呢？这些就是我们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这次会议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下面我就这些问题说说我的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

谈到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回顾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在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辩论和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应当如何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而继续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始终坚定不移地同那些与无产阶级根本敌对的理论反复交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在理论上批判的锋芒，首先针对他们所师事、所尊敬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正是从这两位导师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同时给以批判。他们以无比锋利的笔调批判了他们同辈的黑格尔左派的理论家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派别。马克思、恩格斯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然后两人共同执笔，创作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后来，马克思专心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发。这样，就逐步清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



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这个运动以西欧为中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这个斗争是十分艰巨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破除对未来社会结构的幻想，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他们几十年来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科学社会主义既然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那末，谁要“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谁就会给社会主义理论带来“灾难”^①。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表示了绝不妥协的态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被搁置达十六年之久，当恩格斯要求发表这个文件，并且严正地指出，再延迟发表“就未免是犯罪”的时候，仍然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多方阻挠。对杜林的批判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里遭到了多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在发表恩格斯晚年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的时候，故意删去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段落，把恩格斯歪曲成为无条件地赞成“和平”策略而反对“暴力”的人，这引起了恩格斯的严重抗议。考茨基等人编写社会主义运动史，故意瞒着恩格斯，不请他参加，这使老人在与世诀别之前看出了机会主义者们的居心叵测。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正在冒出头来。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有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面，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所最惧怕、最仇视，因而千方百计想要修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恨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都主张阶级斗争。”^②这就是问题的关

① 《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

② 《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



鍵。在这个關鍵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的立場是最堅定、最鮮明的。他們早在給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就曾严正声明：“将近四十年来，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視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认为它是現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們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階級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①后来恩格斯又坚决地指出：“无产階級的发展，無論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內部斗争中實現的，……在可能團結一致的时候，團結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團結一致的东西。誰要是像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资产階級，我們只把它当做一个階級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鋒），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煩惱了。”^②

你們看，統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极其珍視无产階級队伍的團結，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和那些把階級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决不能为了團結而放棄原則。这是馬克思主义創立人給我們留下的最重要、最寶貴的遺訓。背叛这个遺訓，就是背叛馬克思主义。

坚持还是放棄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坚持还是放棄无产階級专政，这是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水岭。

恩格斯死后不久，首先是伯恩施坦，接着是考茨基，就出来公开地、系統地修改馬克思的学說。恩格斯所創立的第二国际的領導，逐漸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由于当时資本主义处在一个較“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階級內部产生了工人貴族，修正主义思潮和派別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泛濫起来，伯恩施坦就是这个思潮和派別的最早的代表。

伯恩施坦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經济学到政治，全面地修改了馬克思的学說；他鼓吹“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式。随着修正主义的出現，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开始了。始終坚持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一位年青的、偉大的无产階級革命家身上。这就是列宁。列宁就在同一年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书》和《我們的綱領》，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列宁作为彻底的无产階級革命家和成熟的馬克思主义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久，他又发表了《怎么办？》，反对了輕視理論、否定理論的經济主义，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堅固的思想基础。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

① 《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日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② 《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致奧·倍倍尔的信》。



中的两种策略》，反对了民主革命中的孟什维克的機會主义策略。他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給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以深刻的、有力的批判，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辯证唯物主义。他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駁斥了考茨基的反动的“超帝国主义”論，銳利地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解剖。他在《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两书中，卓越地发挥了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同时詳尽地批判了脱离群众的“左”傾思想，闡明了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有什么奇怪呢？龐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們要起来代替他們了。

經過这些論战，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叛徒面目被揭露无余。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們对列宁和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更加恶毒的攻击。考茨基竟誣蔑布尔什维克所主張和实行的那种无产階級专政只会导致“鞭撻式的社会主义”，連“亚洲式的社会主义”都够不上，因为亚洲还誕生了孔子和釋迦牟尼。考茨基曾經妄想新生的苏維埃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結果呢？不管是外国的武装干涉也好，考茨基的瘋狂謾罵也好，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巍然屹立在地球上。历史证实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列宁作为这个国家的締造者永远名垂青史。而考茨基之流呢？只落得作为无产階級叛徒而遺臭万年。

斯大林对列宁在恩格斯以后的这个时期所作的理論貢獻，給予了极高的估价。他认为列宁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了起来，并从各方面批判了馬克思主义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別。斯大林引证恩格斯的話說：“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偉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他认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① 斯大林认为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和策略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斯大林指出，列宁把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同以托洛茨基、布哈林为代表的联共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別，进行了尖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論列宁主义基础》、《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

① 《論列宁主义基础》。



《再論我們黨內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民族問題和列宁主义》、《論联共（布）黨內的右傾》等等著作，这些著作絕大部分都分別收集在《列宁主义問題》和《論反对派》两部选集中。晚年他又写了《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学問題》和《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斯大林继承列宁領導苏联人民艰苦创业，建設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贏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在中国，毛澤东同志同黨內各种机会主义路綫进行了激烈的論战，不顾曾經强加于他的“狹隘經驗論”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結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經驗，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战》、《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战争和战略問題》、《新民主主义論》、《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頓黨的作風》、《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以及在革命胜利后所写的《論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著作，就是他一貫反对黨內各种“左”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結晶。正是遵循着毛澤东同志的路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取得偉大的胜利，繼續十月革命的偉大事業，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見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这些龐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們（他們領導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复的轉化。

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苏共領導人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他們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后尘，逐渐堕落到修正主义的泥坑。現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和更加恶劣的发展，是适应日益崩潰的帝国主义的需要的产物。由于現代修正主义出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是列宁的故乡，它的迷惑力和危害性就比老修正主义大得多。但是同时，現代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也比过去反对老修正主义的时候更加雄厚了，而且正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內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別、小組和个人，他們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在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之間所进行的这场大論战中，現代修正主义者



集中地、不择手段地、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以那样敌视毛泽东同志，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定地站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列。

四十多年来，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艰苦的、不倦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地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又多次地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因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全世界人民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也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同志的任何诽谤，都是徒劳的，都是丝毫无损于毛泽东同志的。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謂予不信，拭目俟之。

现代修正主义者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列宁曾经说过，“在革命的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面孔我看得够多了，那些感情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的人，他们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并不能使我感到不安。”^①他又说，他的“命运”，就是反对政治的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的“连续不断的战斗”^②。这自然不只是列宁一人的“命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命运”，斯大林的“命运”，一切革命家共同的“命运”。

回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而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步夺取阵地的。一百多年来，不管敌人如何从外面来攻

^① 《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

^②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



击，从内部来“修正”，都没有能够把它打倒。相反地，正是在反对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敌人的反复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从小到大地成长壮大起来。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各式各样理论和派别中的一派，这一派最初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但是，因为它正确，因为它真实地、科学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它终于在斗争中战胜了一切同它敌对的思想体系，赢得了全世界革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拥戴。

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曾经处于少数地位。站在修正主义方面的，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当时拥有崇高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老资格的领袖和权威的理论家。列宁是根本不在这些人的眼里的。但是，列宁的思想代表着真理，适应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它并没有被猖獗一时的修正主义所压倒，终于战胜了修正主义而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帜。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方面转化。

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力量必然发生重新组合。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到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暂时地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当历史要求德国工人居于无产阶级斗争前列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都因此而感到自豪。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断的。”^①

二十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当考茨基还是革命家的时候，曾经说到革命的中心将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后来，虽然考茨基成了革命叛徒，列宁还是赞同地引证了考茨基早年的这个革命预言。

革命的暴风雨吹到了东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东方国家人民的觉醒，曾经寄以最热烈的同情，予以很高的评价。他们一直认为，东方各国的革命人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伟大同盟者，他们的革命运动将反过来影响和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

^① 《〈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



命。正是列宁，在欧洲工人阶级遭到修正主义侵蚀的时候，看出了“投入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的亿万亚洲人民的新起的力量。

亚洲的先进人物向西方寻求真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种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能够正确地领导人民的斗争走向胜利，因而丰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那末，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它都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反之，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列，抛弃革命的旗帜，抛弃本国的革命传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采取消极的，以至反对的态度，那末，这样的党就会变成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党，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丧失它的地位。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实际上根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狂妄地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实行垄断。好像法国国王自称“朕即国家”一样，他们也大有“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味道。谁要不赞成他们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赞成他们的党纲，谁就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违反什么“国际纪律”。这种恶劣态度，除了说明他们的深入骨髓的大国大党主义，极端落后的封建世袭思想，彻底反动的唯心历史观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革命的暴风雨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火花要四处迸射，那是谁也不能够阻挡的。

现在的世界革命力量和革命形势比起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又有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而英勇斗争。全世界人民正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展开着广泛的斗争。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工人运动以及围绕这个运动的斗争，基本上只限于欧洲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在更加广阔的、真正是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过去曾经站在斗争前列的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受到现代修正主义的腐蚀；而长期被人瞧不起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现在站到斗争的前列了。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



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認識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終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訓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論什么国家，不論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現代修正主义者和現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們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終势必会被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規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不正是一幅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波瀾壯闊的图画嗎？

列宁曾經指出：十九世紀末叶革命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偉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現在，革命馬克思列宁主义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世界无产阶级新的、更加偉大的革命战斗的序幕。

可以預計，今后半个到一个世紀之內，将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偉大时代，是一个天翻地复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在这个偉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鋒队領導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二 批判現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

我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以及在这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政治上和理論上对現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之間的爭論的全部实质，就是承认不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問題，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問題，承认不承认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問題。

积极参加这个論战，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从学术战线上批判現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各种表现，捍卫、宣傳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学术領域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的傳声筒，是资产阶级意識形态的变种。它



是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是为它提供理论基础的，是为它进行辩护、制造舆论的。在苏联学术界，有一部分人的修正主义思想，正随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配合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运动，在“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的口号之下，对斯大林的全部理论著作，一概加以否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悍然宣布列宁主义原理已经过时。他们极力吹捧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和纲领，把它们奉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修正主义如何在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等几个主要方面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哲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斯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敢公开宣称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相结合，他们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来阉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搬运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观点。他们既然在政治上执行了背叛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他们在哲学思想上背叛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必然的逻辑。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上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代替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末期在美国产生的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否认客观存在，否认客观规律，否认客观真理。它认为，真理不过是人在应付环境的行动中取得眼前利益的手段。它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这是一种十足的市侩哲学，是没落的、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对生活的反动观点。这是最典型的美帝国主义哲学。他们不能按照客观规律的知识、按照真伪是非的原则来行动，因为这些规律和原则，是同他们的利



益根本对立的。他们只能按照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观察社会、应付环境，并且需要实用主义哲学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同时，实用主义又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的哲学，它引导人民群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变革的远大前景，只去追逐眼前利益，不去为自己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当然，他们并不公开宣布自己信奉实用主义，因为那样，对他们伪装革命是不利的。

列宁对老修正主义有一段很好的描述：“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①

现代修正主义比老修正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他们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服投降；另一方面又同美帝国主义合伙，向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核讹诈。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就是迷信核武器，实行核讹诈。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否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相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可能是核武器毁灭人类。他们宣扬，在核武器面前，原则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原则已经被消灭了。“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②这就是他们的实用主义的保命哲学。这样，什么天下人的疾苦，什么世界革命，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这样用一种苟且偷生的市侩哲学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既然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方面本质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对理论十分轻视，就是很自然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当作必须坚持的真理，而把它当作临时应付的工具，任意加以篡改和伪造，作为可以随时适应他们的眼前利益的“辩护学”。

现代修正主义者肆意歪曲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规律的学说，宣传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观点。

他们借口所谓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点，宣传所谓“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的“新提法”③，宣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所谓“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② 1963年8月16日苏联《真理报》：《比健全的理智更左》。

③ 费多谢也夫：《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领域内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1962年第3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新现象”、“新过程”^①。有些哲学家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公式已经“过时”。

这种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理论，这种宣称矛盾规律已经“过时”的理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修正。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说，既适用于阶级社会，也适用于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矛盾有非对抗性和对抗性的区别，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和和不可调和的区别；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为解决矛盾而进行的斗争，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一切不愿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一切保守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变化，回避和抹煞矛盾。而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则希望事物的改变，敢于正视矛盾，而且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产生，需要用新的方法解决。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矛盾中前进。只有彻底的革命家，才能做彻底的革命辩证论者。

毛泽东同志在发展辩证法方面表现了他高度的理论勇气和天才。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使我们日益学会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如何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惕，并且为避免这种危险采取正确的必要的措施。这就使我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修正主义的免疫力。

过去，有些同志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看不到在夺取政权以后的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任务。他们只承认团结

^① 米丁：《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任务》（1962年第4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就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使辩证法为之中断，“无冲突论”不脛而走。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所犯的認識上的錯誤，正好为今天的現代修正主义开了方便之門。現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融合矛盾、調和矛盾的理論，来为他們的所謂“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謬論提供哲学上的根据。不仅如此，他們还把这种融合矛盾、調和矛盾的理論扩大到国际斗争的范围，从哲学上来为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綫作辯护。他們用虚构的人类生存和核武器之間的矛盾，来掩盖当前世界上各种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們认为，在核武器出現以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原则已經失去意义了。他們說，“原子彈不遵循阶级原则”。他們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壟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調和、融合起来。这就是他們的結論，他們的政治目的。

現代修正主义者彻底拋棄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們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論来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代替科学共产主义。他們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論的旗帜。他們把所謂“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中。

他們說：“共产主义意識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識形态”^①；“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人道主义这个詞在广义上同共产主义相融合”^②；“共产主义制度意味着人性的胜利”^③。他們反复宣傳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一切人的博爱万岁”等等口号。他們吹嘘什么“和平共处”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最人道的无产阶级方法”；什么全面彻底裁軍計劃是“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

铁托曾經自吹自擂地說：“我們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④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大捧什么“铁托主义”，說它“比世界上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流派的馬克思主义要合乎人性得多”，說它“重新建立了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原理之間的联系”^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現代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人道主义”、人性論的妙处所在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人道主义从来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們对欧洲十四——十六世

① 《苏联共产党綱領》。

②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編：《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③ 庫西宁等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④ 1958年11月19日铁托在茲列尼亚宁县人民委员会为他設的午宴上的講話。

⑤ 查尔斯·麦克維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



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坚决反对用抽象的人性论和博爱的说教来代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反对把人道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

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历史使命。相反地，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理论，都不是以对社会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而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根据主观愿望，提出改革社会的蓝图；它的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社会革命论，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人道主义则鼓吹通过一切人之间的“博爱”，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博爱”，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实现它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总是强调革命的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的正确结合，把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而人道主义则总是把个人尊严和个人幸福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实际上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的个人尊严和个人幸福，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失去个人尊严和遭受个人痛苦，实际就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我们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实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但是要实现这种社会，必须经过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①。所有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是人类思想的伟大飞跃。现在，修正主义者篡改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重新回到早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到历史后面去了的抽象的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的说教，以及“人对人是兄弟”之类的口号，这不是思想的大倒退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融合，又是什么呢？那些口头上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人，不正是企图通过所谓“人道主义”这座桥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以至基督教义调和起来、融合起来吗？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则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成熟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



起来。他们特别利用马克思早年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写成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竭力利用“异化”概念来宣扬所谓“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徒劳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初期，确曾受过同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密切相联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某些影响，但是，当他们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发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后，他们就立刻清算了这种影响。他们同费尔巴哈从此分道扬镳。费尔巴哈企图以“人本学”来代替“神学”，但是他所鼓吹的人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化的人。抽象的人同上帝一样，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费尔巴哈虽然反对了旧宗教，却创造了崇拜抽象的人和宣扬“人类之爱”的新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抽象的人的崇拜，应当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所代替。而建立这种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功劳，正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人对热衷于“人道”说教的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无情的批判。他们批评“真正社会主义”，说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① 这是何等一针见血的批评！

至于“异化”，这原来是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中一个流行的术语，意思是说，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黑格尔在运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充满着神秘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倒立着的，必须使它用两脚站起来，才能发现包藏在神秘外壳中的合理的内核”^②。在异化问题上也是这样。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异化，按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个辩证规律来理解异化，这就使黑格尔颠倒着的异化概念倒转过来，两脚着地了。这样，就应当承认，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异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

黑格尔用异化来表述他的所谓绝对观念如何把自己转化为外部世界，然后又回复到自身的过程。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不同，他用异化来说明人如何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然后在它面前膜拜，而只有当人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破除对于上帝的迷信。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不同，他借用这个术语来表达他的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正如人用脑创造了上帝而受上帝支配一样，工人用手创造了财富而受财富支配。工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却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另外的人。因此，这些财富，财富的占有者以至劳动本身就都成了和工人敌对的、统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

② 《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治他們的、異己的力量。馬克思从这里揭露了私有制度的不合理，指出要消除这种異化現象，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消灭社会分工的对抗形式。后来，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劳动价值学說，发现了資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規律，打破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这就进一步揭露了資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进一步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进一步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經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彻底消灭資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残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逐步地和最后地克服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控制和駕馭他們的那些異己力量，摆脱商品拜物教的束縛，成为不仅是自然界，而且是社会的真正的自觉的主人，才能开始充分自觉地創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所說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毛澤东同志所說的，“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①。

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異化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論，矛头是針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們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說成是同人性对抗的、異己的力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說，“以劳动者的名义进行統治和摄政团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統治是一样的。”^②他們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人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都是不自由的。他們认为，有一种所謂“永恒的人性”，社会对于个人的任何制約都是“人性的異化”，因此只有摆脱任何社会制約，才能使人性复归。他們认为，要消除“人性的異化”，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們鼓吹“人性的复归”，实际上就是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是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恢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性，恢复培植这种人性的資本主义的制度。

现代修正主义者热衷于“人道主义”的时髦口号，来掩飾他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他們口口声声說“一切为了人”。請問，为的什么“人”呢？他們对革命人民并不爱，对劳动群众并不爱，他們爱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首腦人物。他們害怕人民，害怕人民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主义”，風靡一时，流派虽多，但大都是反映着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壟断资产阶级的苦恼、恐惧和絕望，并且用来作为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实行核訛詐的思想麻醉剂。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謂“人道主义”正是和现代西方反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人道主义一脉相通的。

现代修正主义口中的人道主义，不但对科学共产主义說来，是一种大的反动，就是对于

① 《文匯報》。

② 普·弗兰尼茨基：《人道主义醫說》（1961年第7—8期南斯拉夫《我們的实况》杂志）。



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来，也是一种反动。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方面，现代修正主义者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革命。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精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力图抹煞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抹煞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力图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悍然宣布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领导和铁托集团正是一唱一和。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已经废除，不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任何再生”的条件^①，已经“排除任何人剥削人制度复辟的可能性”^②。苏共领导也宣布：在他们那里，阶级斗争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③。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说：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参加“社会主义”政权，就“没有任何必要不停地挥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手帕”^④。苏共领导也跟着宣布：“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了。他们还说，同这种情况相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已变为“全民的党”了。

苏共领导极力标榜他们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一套谬论，把它说成是“党的新发明”。

这哪里是什么“新发明”呢？

所谓“全民国家”，不过是反动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盖自己的阶级专政的陈旧的手段。资产阶级历来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做“全民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揭穿了这种欺骗，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从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是根本没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建立什么“全民国家”，而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去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才能使国家消亡。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⑥在社

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②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④ 1956年10月卡德尔：《同隆哥的话》。

⑤ 《苏联共产党纲领》。

⑥ 《国家与革命》。



会主义社会里，只要还有旧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重新产生的可能性，只要还存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亡。在这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消亡的。

同样，政党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超阶级的”、“全民的”政党是没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核心。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以前，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政党的消亡。

从现实生活来看，现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无例外地离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离开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很远。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些国家，无例外地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些国家，也是无例外地仍然存在。因此，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地和最终地解决。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反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使社会主义革命半途而废，就会丧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导致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两条路线，两种前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际上说，都只能导致用另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另一种性质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别的可能是没有的。南斯拉夫已经开了先例。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谁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就决不能有比它更好的前途。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跟在老修正主义后面，竭力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的基础。老修正主义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列宁针对这种反动宣传，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本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现代修正主义则宣传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或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宣称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已经过时。他们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他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当时还没有现在对于历史进程的发展、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许多现象。”^①他们还制造种种理论，掩盖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深刻矛盾，宣扬帝国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他

^① 1960年6月21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們这些理論，无非是老修正主义的早已在历史的实践中破了产的濫調的翻新，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理論家所制造的“人民資本主义”之类的神話用“革命”詞句裝飾起来的譯本。

在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上，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劳动者的集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則，即不劳动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現代修正主义者則从維護高薪阶层的利益出发，完全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則。在实际上，他們用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的口号偷換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張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則。他們把自己所提倡的对个人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說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①，說成是“社会主义計劃的核心和动力”^②，或者如赫魯曉夫所說的，是什么“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③。

現代修正主义者根本抹煞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反对把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政治教育摆在首位。他們一直沉醉于自己宣揚的“个人物质刺激”，結果只能是引导人們單純追求个人利益，助长个人貪財謀利的欲望，鼓励資产階級个人主义的发展，損害以至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

他們还用追逐利潤作为刺激企业經營的手段，把社会主义的利潤和資本主义的利潤混为一談，从而企图用資本主义經濟的利潤原則代替社会主义經濟的計劃原則，为实行經濟自由化政策，使社会主义經濟向資本主义經濟蜕化变质，开辟道路。因此，时髦的資产階級經濟理論越来越为現代修正主义者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关系問題上，苏共領導以“国际分工”为幌子，极力詆毀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針，把它說成是“民族主义”的方針。他們这种攻击，不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是別有用心的，那就是要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濟上处于对他們的依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也处于对他們的从屬地位，服从他們的指揮棒。这才真正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針。为着替这种企图效劳，有些人甚至要求生产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来为其他国家提供农产品。这簡直像新殖民主义理論在“国际社会主义分工”招牌下的变种。

总之，現代修正主义在各个学术領域，都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猖狂进攻。这样，他們就在各学术領域，都給我們树立了具体的批判目标。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起来粉碎現代修正主义的进攻，并且在斗争中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在各个学术領域中都得到新的发展。

① 苏联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学》教科书（修訂第三版）。

② 1963年2月7日苏联《真理报》：《計劃工作——社会主义經營管理的重要环节》。

③ 1961年2月11日赫魯曉夫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黑土地带农业先进生产者會議上的講話。



三 总结和研究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和国际斗争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所应当遵循的方向，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纲领。刘少奇同志不久以前在越南阮爱国党校的讲话中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必须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注重理论的应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用来指导革命的行动，使理论变成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每一个新发展，都是由于研究了、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则从不同的两极背弃了这个基本原则。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脱离实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停滞不前，不能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倒退。

列宁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一方面反对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革新”，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也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研究实际生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具体地应用于英国就不同于法国，应用于法国就不同于德国，应用于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在一九〇〇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说道：“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他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始终坚持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理论



联系实际这个問題的时候說过：“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問題不讲明白，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以“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自命的苏共领导，只許自己和他們的追隨者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准別人真正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不准別人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樣，“独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誰要这样做了，他們就給誰扣上“民族主义”、“个人迷信”的帽子。他們一方面放手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要別国的共产党把他們的篡改当作“圣旨”，亦步亦趋，照抄照办。所以那些揮舞指揮棒的和跟着別人的指揮棒团团轉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現代教条主义者。

我們必須反对現代修正主义，也反对現代教条主义，同他們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努力研究当代革命問題，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結合起来。

毛澤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学习問題就这样說过：“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規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問題。……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們要时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絶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

研究实际問題当然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掌握大量的现实的材料，需要善于掌握当前斗争的形势，掌握党的方針、政策。我們要作一个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研究实际問題。如果因为害怕困难而在研究工作中繞开实际問題走，把兴趣和主要精力都轉移到研究古代事物的方面去，那末，我們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走上厚古薄今的錯誤道路。厚古薄今的傾向是必須反对的。我們应当从各方面来鼓励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实际問題的研究，并且为他們进行这种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

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是极为丰富的。研究和总结这些經驗，对于指导我們的实践，教育我們的后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經驗中，有不少东西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以兄弟般的关怀和极大的兴趣注視着中国的經驗。从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統一战綫、党的建設、根据地建設、军队建設、农村政策、工商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等等，一直到許多具体經驗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政治工作的經驗和群众路綫的方法，以及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提出的新問題，所有这些，都是他們所十分关心的題目。对这些經驗和問題，毛澤东同志和我党中央已經从根本上作出了概括。我



們应当以毛澤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指导，对这些經驗和問題分門別类地作深入的、系統的研究，从理論上加以闡述和發揮，写成革命的科学的著作。

在加强对我国现实問題研究的同时，必須加强对世界各国現狀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經驗的研究。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們必須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的、仔細的分析。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显得薄弱的，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决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論先进还是落后，每一国家，不論大国还是小国，都可能在革命經驗、革命理論、科学文化等方面作出不同的貢獻。我們应当虛心地向他們学习，决不能有絲毫大国主义的情緒。

我們需要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資本主义世界的新現象、新問題，研究資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它們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有研究和批判了它們，才可能更好地創造我們自己的东西。

我們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問題、新經驗，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經驗，研究現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現。

我們需要研究世界各国人民为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經驗，特別需要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經驗。

我們強調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要重視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研究本国的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澤东同志早就批評过我們的一些同志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們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現代史上。馬克思透彻地理解了資本主义經濟，就为理解古代經濟提供了钥匙，正如他所比喻的，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毛澤东同志早在二十二年前就向我們提出了写近百年中国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的任务，我們至今沒有交卷。現在应当是交卷的时候了。

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編写世界历史，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应当担当的任务。我們不能滿足于襲用外国学者所編写的世界历史。对西方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歪曲世界历史，我們应当給以严正的实事求是的批判。

研究我国历史遺產，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給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課題。

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說：“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当給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貴的遺產。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指出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宁在这里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两点注意：一、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需要。

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一些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把这个工作摆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适当的位置上，继续做出成绩。

要不要继承祖国历史遗产，这是早已不成为问题的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是我们祖国一切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卫者和继承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清理历史遗产。近年来，随着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新的观点去研究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好现象。但同时也还有人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去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的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遗产中的精华，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成为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能够从我们祖先为争取祖国的统一、繁荣和进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中，从他们世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中，吸取于我们有益的经验 and 智慧。我们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对于祖国优秀遗产，我们不只是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者。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由此可见，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批判精神是何等地需要。从五四运动算起，对于我国古



代遗产的重新估价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回忆起当年那些敢于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它的偶像挑战的勇猛的先驱者，虽然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主义地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但是，他们那种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却是永远值得称赞的。现在有些人已经丧失这种精神和勇气了，他们似乎倒退到了五四运动以前的状态。某些人又把孔子当作偶像抬出来，在他的面前重新跪拜，不过这一回，孔子穿上了现代服装，跪拜也换成了脱帽鞠躬的新仪式。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够相容呢？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复古的倾向，并且反对这种倾向。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有他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的学说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阐发，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五四运动对孔子的大胆批判，是一大功劳，是我国人民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在科学工作中，没有这种革命的标新立异的勇气，永远不可能取得新的成就，科学工作永远不可能得到发展。

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特点。我们在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清理遗产，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一再告诫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占有详细的材料，要做周密的调查，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表面上似乎是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阶级观点，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这是为我们所不取的。

对于外国历史遗产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同样认真的态度，经过分析批判，吸取其中于我们有益的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的唐朝，或现代的“五四”，都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使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先后地放出了异彩。我们今天当然更需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吸收全人类的智慧，用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吸收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也一定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自己民族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加以鉴别取舍。外来的东西，要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具有我们民族

^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風格和特点，變成自己的東西。盲目崇拜西方，輕視祖國，一切都是外國的好，那是一種丑惡的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是一種最沒有出息的學術教條主義，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

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中，無論研究現實問題，研究理論問題，或者研究歷史遺產，都要堅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

哲學社會科學是階級性、黨性非常強烈的科學。在這個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離開了這個指導的方向，百家爭鳴就會變成現代修正主義者所希望、所實行的自由化的方針。反之，如果在學術問題上不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不鼓勵自由探討、互相辯論，不鼓勵獨立思考，而採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解決複雜的精神世界的問題，那末，學術界的思想就會陷於僵化。正如馬克思批評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文章中所說的，人們並不要追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放出同樣的芳香，怎麼可以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一種色彩呢？一方面要反對和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反對和防止思想僵化。這就是我們在學術思想領域內必須進行的兩條戰綫的鬥爭。

革命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需要對許多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進行新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發生這樣那樣的錯誤是難以避免的。我們難道可以因為怕犯錯誤，就放棄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職責嗎？

在科學探索上，錯誤認識往往是正確認識的先導。正是從錯誤中接受教訓，糾正錯誤，才能逐漸獲得正確的認識。所以只有不怕犯錯誤而又勇于改正錯誤的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偉大事業中作出貢獻，同時改造自己。列寧說過，“只有什麼事也不干的人才不會犯錯誤”。列寧對那些“以不犯錯誤而自夸”的“在革命方面沒有行動的庸夫們”，表示了多麼蔑視的嘲笑的态度。我國學術界的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要有尋求真理的願望和熱情，在理論問題、學術問題上陷入某些錯誤，是可以而且應當通過討論和實踐來改正的。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有勇氣去開拓前人所未有開拓過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未有探索過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①

四 建立和壯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的隊伍

形成一支強大的經得起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的隊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迫切的而又有長遠戰略意義的任務。

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總結當代革命鬥爭的經驗，清理歷史遺產，通過這些來發展馬克思

^① 《資本論》第1卷法譯本序。



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要担负起这个任务，人少了是不成的，停留在现有水平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努力扩大理论队伍，不断提高这个队伍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阶级的思想代言人，是制造精神产品，影响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立场不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完全相反。因此，如何去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应当按照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法来培养我们的理论队伍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来培养，使理论工作者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参加劳动，成为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能造就出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人才。另一条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即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的方向来培养，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是一条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者，培养出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或者使原来革命的专家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庸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反面经验，就是我们的殷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我国知识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就是说，知识分子需要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而关键就在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士兵打成一片，这个道理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以后，经过二十一年，现在已经为比较多的同志所接受、所实行了。这个道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工具。艺术家以艺术的形式来概括人民斗争的经验，社会科学家则以理论的形式来总结人民斗争的经验。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研究工农群众的斗争经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找规律性，发现新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是我们的应有职责，这也是保证我们不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致思想枯竭，从而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反之，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轻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关门从书本上研究，要想对革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一个想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而又同工农群众格格不入，



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不仅在从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而且在实践中提出各种理论问题，探求解答，很多创造性的见解经常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书本知识和理论修养，而现在我们许多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这一点，他在一九四二年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要求有书本知识和有工作经验的人互相结合。他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人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只对于理论工作，而且对于整个革命事业，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社会斗争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将由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而被更自觉地掌握，在革命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果。实际工作者中间将会出现大有希望的理论家。这样，以专业队伍为中心的、有广大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有可能比较快地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接触和了解实际，丝毫也不贬低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通晓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自己本行的业务，广泛地猎取各种知识，成为博览群书的人。

馬克思的学说所以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就在它不但敢于彻底批判旧世界，而且敢于用批判的态度去吸取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财富，用来丰富自己，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列宁在谈到馬克思的时候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①列宁自己就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讲到哲学的党性的同时又指出：“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

^① 《青年团的任务》。



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有极大的启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和非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帮助他们自觉地逐渐地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学习问题上，丝毫的自满和骄傲，都是有害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民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术上也应当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不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都出现过学术上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方面出了康德和黑格尔，文学方面出了莱辛和歌德。列宁以前的俄国，出了像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批卓越的革命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炎、李大钊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都把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推上历史舞台。这些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高度的成就，至今还使我们感到钦佩。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①

我们今天处在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正是需要一个产生新的巨人——不是以十数计而是以千百计的巨人的时代。解放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他们英雄般的劳动、斗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启发我们的智慧和思想，鼓舞我们前进。我们又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难道不应当在学术上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吗？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说道：“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②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不当辜负我们的时代，我们一定要以新的努力、新的建树、新的创造来迎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吧！

① 《自然辩证法》。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紅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到第二十四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总页码)

-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澤东 (16·619)
- 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澤东 (17·660)
- 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紅旗杂志编辑部 (3-4·93)
- 社論: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1·3)
- 革命的辩证法和对帝国主义的認識 邵铁真 (1·11)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2·459)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三次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 七月五日, 七月十日) (15·575)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15·580)
- 《人民日报》编者关于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按语 (15·582)
-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17·663)
-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見提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17·686)
-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 (17·688)
-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項建議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17·690)
-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18·719)
-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19·767)
- 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
——四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20·807)
- 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两条路綫
——五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22·887)
-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23·935)
-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
任务 周揚 (24·98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中国政府主張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倡議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15·584)



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 (16·621)
 考察战争问题不能背离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卢之超 (16·633)

新“神圣同盟”的结局决不会比
 旧“神圣同盟”更好……本刊评论员 (17·691)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
 废墟”这点上大造谣言?……文宜祝 (17·696)
 谨防假冒!……杜敬 (17·702)
 一个腔调 一个步伐……洪谷 (17·707)
 逻辑与脑子……林铭惠 (17·712)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7-8·297)(9·355)(10-11·415)

经济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薄一波 (20·840)
 把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到
 更高的水平……许辛学 (2·59)
 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
 的作用……吴众 (10-11·397)

论太谷县的农业技术改革……陶鲁箴 (5·197)
 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林一舟 (2·65)
 可贵的革命干劲
 ……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10-11·402)
 收获时节访小平易公社
 ……吴象 张长珍 姚文锦 (19·789)
 “八一”公社五年间……万绍鹤 (21·873)
 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戴松恩 (2·71)

我国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
 ……管大同 (6·250)
 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薛暮桥 (7-8·267)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备
 问题……许毅 戴园晨 (9·342)

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现阶段的
 历史使命……邓子恢 (23·955)
 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高征绳 (15·598)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
 在哪些方面前进了?……苏星 (1·39)

政治

社论: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周年
 …… (19·763)
 列宁斯大林论十月革命的道路……施东向 (21·851)
 既要重视政治 又要重视专业……闻师润 (1·19)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李踐为 (2·81)
 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虞挺英 (9·339)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进行活的
 思想教育……肖华 (15·588)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战斗力……魏文伯 (18·748)
 一个很好的革命传统……陈展超 (6·258)
 谈落实……唐平铸 (7-8·291)
 平凡工作与远大抱负……苗作斌 (7-8·294)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社论: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
 的一件大事……(13-14·500)
 一个团结勤奋向上的集体
 ……李成章 华福 (13-14·513)
 老贫农的本色……李廷凡 钱进 (13-14·517)
 “劳动带头干, 工作是模范”
 ……申元刚 连治水 (13-14·521)
 身份是社员, 劳动是本分
 ……孙汝纯 毕可友 (13-14·525)
 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郑际雄 (13-14·528)



社員的好榜样，青年的带路人
 莫占林 (13-14 · 533)

他們为什么能一貫参加劳动?
 万里云 潘用庭 (13-14 · 537)

四望山下 碧野 (13-14 · 540)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王樂生 杜加星 項紹棠 (13-14 · 545)

他是庄稼人 周維敷 任洁民 (13-14 · 550)

十三年手不离鋤 張健 任山 (13-14 · 555)

昔阳县四級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偉大范例
 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 (13-14 · 558)

把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永远坚持下去
 中共鞍山市委委员会 (13-14 · 564)

地委书记余錫梁同志 伊曉 (13-14 · 569)

哲学·科学

詭辯論和辯証法的根本对立 張世英 (5 · 213)

批判资产階級社会学在階級和
 階級斗争問題上的謬論 庄福齡 (9 · 348)

現代资产階級的新实在論哲学 任华 (23 · 972)

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 陈华癸 (7-8 · 276)

物理学研究中的理論和
 实验 周光召 何祚麻 (10-11 · 407)

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認識和
 运用自然規律 甘子玉 (21 · 878)

科学技术的組織管理工作 錢学森 (22 · 905)

对农业科学工作者和群众結合
 进行研究的一些体会 俞启葆 (22 · 914)

正确地对待考据 楊永志 (6 · 261)

关于发现問題和分析研究 严中平 (19 · 796)

文学·艺术

是共产主义呢，还是个人主义? 牧惠 (1 · 29)

高尔基的革命傳統和战斗精神 以群 (6 · 242)

不能把糟粕当作精华 公盾 (1 · 35)

題材多样化与作品的思想性 景元 (5 · 206)

談开展批評与鼓励創作 馮健男 (5 · 210)

深入生活，提高音乐創作质量 馬可 (7-8 · 285)

論演員的矛盾 舒强 (15 · 607)

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燒 施央千 (20 · 834)

国际

古巴卡斯特罗总理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2 · 47)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熊复 (10-11 · 379)

关于目前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
 若干問題 范承祥 (5 · 179)

关于资产階級国有化 有林 (6 · 232)

战后日本經濟的发展及其矛盾的
 加深 庄濤 (16 · 645)

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剛果的真相
 苑文 (23 · 964)

“不发达經濟学”是新殖民主义的
 “理論” 黄展鵬 (18 · 743)

美国統治集团在古巴問題上的
 爭吵說明了什么? 郭济洲 (9 · 335)

“灵活反应”战略——一条緊勒着
 美帝国主义脖子的絞索 范地 (20 · 823)

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剝削者
 万光 (21 · 863)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文化侵略 王方 (22 · 925)

在所謂“生而自由”的国度里 陈原 (22 · 920)

尼赫魯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貨色? 本刊評論員 (6 · 223)

在尼赫魯反华政策的背后 徐景琳 (18 · 731)

